

引 言

在近代科学史上，居里夫人的名字光彩照人。她同丈夫皮埃尔·居里一道，发现了两个比铀的放射性分别大 400 倍和 900 倍的新元素——钋和镭。镭的发现不仅产生了一种治疗癌症的新方法，在医学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产生了一种物理学上的新学科，为现代原子物理学奠定了基础。她是原子能时代的开创者之一，对科学的贡献卓越非凡。她是世界上第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在女性世界里，她更是获此殊荣的佼佼者。

居里夫人留给世界的精神财富更是无价之宝。从她的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是一位伟大的献身者。她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解放事业，是一位憎恨侵略，憎恨民族压迫，渴望和平并为和平进行不屈不挠抗争的坚强女性。她热爱科学，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学知识，献身科学事业，并为此付出了常人想像不到的艰辛努力。她热爱人民，献身人民，是一位生性善良、先人后己，对劳苦大众充满同情，时刻为别人着想，毕生为人类美好前途奋斗的伟大女性。她热爱生活，热爱亲人和家庭，不惜为亲人和家庭献身。对父母来说，她是最孝顺，最可爱的女儿；对丈夫来说，她是志同道合，体贴入微的妻子；对孩子来说，她又是最慈祥，最成功的母亲。她的坚韧顽强精神、艰苦奋斗精神、淡泊名利精神、无私奉献精神，是女性的骄傲，也是人类的骄傲。

居里夫人光辉的一生，显示了伟大的人格，展现了不朽的人生价值，树立了一座崇高的人生丰碑。特别是作为女性，她揭示了夫妻结合的最高意义和生活的价值，尤其是她在家庭、子女、事业、个人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协调和成就，充分证明了女性完全可以同男性一样，走出自己的路，创造伟大的业绩。她是科学巨匠，也是贤妻良母。

第一章 波兰儿女

1 华沙弗瑞达路

这是一所寄宿女校，一个寂静而幽雅的院落。这座院子显得分外秀丽、文雅。后院的二楼住着校长斯克罗多夫斯基夫人一家。

这位女校长出生于一个小地主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略有田产的小贵族。生性倔强而浪漫，爱上了一个门第比他高而又美丽动人的贵族少女，把她拐走秘密地结了婚，生下六个子女。岁月如波，这位美人逐渐褪去她那年轻的容颜，把自己美丽聪明、善良镇定的美德，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她的女儿——斯克罗多夫斯基夫人。并送她到华沙弗瑞达路这所女子学校受很好的教育。在学校里，这位小姐充分表现了她的聪颖和智慧，学业成绩总是鹤立鸡群。她倾慕教育事业，毕业后就留在了母校当教师，后来成了校长。她多才多艺，品行良好。不仅是一个优秀教师，而且是一个音乐家，能弹一手悦耳的钢琴，能用一种清脆的声音唱当时流行歌曲。在这个幽雅的院落里，常常荡漾着她那婉转娇柔的歌声，伴着清亮流水般的琴声，使女孩子们神魂着迷，使路人驻足留连。她美丽绝妙，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享受。这位美丽娴雅的知识女性，招来了无数青年男子的爱慕。这时，一个聪明洒脱的青年，一个追求完美的青年，正在圣彼得堡大学研究高深科学的乌拉犹斯拉夫·斯克罗多夫斯基教师大胆地向她射出丘比特之箭。尔后她们结了婚。

斯克罗多夫斯基一家也是当时那些由于波兰国家被沙皇践踏的厄运而破败衰落的小贵族之一。他们这一族的发祥地在斯洛第，在华沙北边约 100 公里。他们均以耕种为生，但在沙俄入侵之时，他们的收获都逐渐减少，财产也慢慢消散。逐渐由富裕的农家而变得贫寒。斯克罗多夫斯基为衰败的家境而苦恼，他要努力拼搏，希望改变他那不宽裕的农家日子，并且显扬他们那引以自豪的姓氏，毅然弃农求学，希望用知识来奋起抗争，改变现实。天随人意，他以优异成绩被卢布林这座重要城市的一所男子中学聘做教师，而且后来当上了校长。他对科学知识有一种不知疲倦的追求和渴望，也希望拥有一个同自己一道愿为教育和科学事业共同奋斗的妻子。当他得知弗瑞达路一所办得非常红火的女子中学校长是一个美丽聪明的女子时，很快就找上门来求婚。他的才华和翩翩风度，很快就得到了这位出类拔萃女子的青睐，不久他们就瞒着父母坠入爱河，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婚后，为了妻子和家庭，斯克罗多夫斯基很快回到华沙，在一所中学教数学和物理学。这样，他可以为被称作“工作狂”的妻子减轻一些负担和劳累，更使他们甜蜜的爱情锦上添花。不久，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接着，又有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孩子。这群小伙伴使他们的家闹哄哄的，乱糟糟的，但却扰不乱他们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波兰人极喜欢用爱称，总是用“素希雅”代替大女儿的名字苏菲，儿子约瑟夫成了“约齐欧”。二女儿海伦威成了“海拉”。1867年11月7日，一股喜气又降临到弗瑞达路这所女校里，斯克罗多夫斯基家又添了个女儿。因为这是第五个孩子，夫妇俩虽然不是那么感到喜出望外，但仍兴高采烈。他们为这个小女孩取名叫玛妮雅，爱称是“玛妮希雅”。由于她长得漂

亮而浪漫，一对甜甜的酒窝，一双灰色的大眼睛，一头卷曲的金发，可爱极了，哥哥姐姐们围着她嬉戏。斯科罗多夫斯基夫人更是特别喜欢这个有着宽阔前额的小女儿，她认为这是聪明的象征。于是在她睡摇篮时又有了一个滑稽的绰号，“安秀佩希欧”。斯科罗多夫斯基夫人从不拥吻自己的孩子，当她的玛妮雅在摇篮里发出“啊！”“哇！”的叽喳声时，她的母亲总会用她那轻柔的手指抚摸她最小女儿的前额，用她那一丝示意，一个微笑和亲切的一瞥中，给女儿一种极深厚的慈爱，给自己极强烈的欣慰。这个美丽聪颖的小姐已经是一个多思多虑的妇人了。小玛妮雅在弗瑞达路这所女校里只住了几个月，就在1868年夏，她的父亲乌拉狄斯拉夫·斯科罗夫斯基被任命为诺弗立普基路那所“男子中学”的教师兼副督学。通情达理的斯科罗多夫斯基夫人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带着孩子，全家搬进丈夫因新职务得以居住的整套住房里。新的环境和条件使得斯科罗多夫斯基夫人不可能既保持女校校长职务，又照顾培养她的五个亲生孩子。在家庭和事业互相碰撞的情况下，斯科罗多夫斯卡夫人毅然决定牺牲自己，支持丈夫的事业，培养和教育自己的孩子，履行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她非常遗憾地辞去女子中学校长的职务。从此告别了她心爱的事业，告别了弗瑞达路那所住了八年的房子。

2 铁蹄下的幼苗

从 1772 年开始，整整一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弱小的波兰被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三个垂涎三尺的列强统治着。他们贪婪无厌地相互争夺、角逐，经过 1772 年、1773 年和 1795 年连续三次火拼瓜分后，终于将波兰瓜分为三个部分，成为他们的所属国。波兰人民不甘心这种屈辱的臣民地位，曾多次起来反抗这些殖民强盗。然而，每次斗争的结果都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和更加沉重的枷锁。德国、俄国、奥地利均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横行霸道。波兰的首都华沙沦为俄国之手。沙俄很清楚，华沙的人民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曾创造过 1831 年的英勇革命，虽然惨遭失败，但重新获得自由之心没有泯灭。因此，沙皇决意要征服他们的意志，残暴地惩罚起义的人们。在这些起义的人们中，有 5000 家被放逐到高加索，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一并没收；有 260 个学生被强迫编入军队，30 个参加起义的妇女被迫离家做修女。起义首领们的尸体挂在华沙城墙上的三个绞架上。除此之外，沙皇还规定俄语为官方语言，从此再也不许波兰人民使用本国的语言。儿童在学校里也只能说俄语。

沙皇的残酷统治给玛妮雅幼小的心灵里蒙上了阴影。在她生下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她这个连受教育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波兰女子可能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如果谁要问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五个聪明的孩子谁有出息时，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一定会指着他那惟一的儿子约瑟夫。在这个被压迫民族的贫穷家庭里，这群小家伙中约瑟夫年纪最大，又是惟一的男孩，知识最多，游戏点子极丰富，他拉海伦威做同盟，攻下“敌人”的要塞是其任务。苏菲、布罗妮雅、玛妮雅坚守阵地，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为目的。大家都圆睁双眼，嘴唇紧闭，竖起耳朵，生怕自己失败。玛妮雅很生气自己只有 6 岁，没有力量把“子弹”木块扔得更远，没有哥哥姐姐那样跑得快。但是她表现出来的机灵和勇敢比哥哥姐姐们毫不逊色。她在自己的指挥官布罗妮雅的指挥下，顽强地守护着自己的阵地，有力地投掷出一发发炮弹。子弹打完了，布罗妮雅大喊：“玛妮雅，我没有炮弹了。”她便飞快地把投出去的子弹捡回来，用带花边的小围裙兜着送给布罗妮雅，让她扔得更远一点，并使劲地呐喊助威。战斗结束，小玛妮雅稚嫩的脸蛋涨得通红，满身汗水，头发零乱，气喘吁吁。哥哥姐姐们会因为她在战斗中表现得英勇顽强而授予她“战斗英雄”的称号。每当此时，哥哥姐姐们会把她高高地举起，一种自豪和幸福感暖遍全身。

哥哥姐姐们喜欢这个活泼的小妹妹，父母亲更是喜欢她的聪明伶俐。她的家是一个极有文化教养的知识家庭。

玛妮雅从懂事的那天起，就认识了用俄文字镌刻着的“男子中学”。那时，她的父亲就是在男子中学授课，她就是在“男子中学”匾额虎视眈眈看着长大的。她抱怨自己怎么会变成个女孩，她多么羡慕哥哥约瑟夫，挎着书包神气活现地出入官立中学。她多么想变成一个男孩，早日进入父亲任教的这所诺弗立普基路的“男子中学”。她的脑子里总是重复着父亲说的那句话，“压迫者是无法从人们头脑中夺走知识的。罗马用武力征服了列国，而最后却是希腊的智慧打败了罗马”。玛妮雅懂得，钱财和土地可以被夺去，民族尊严可以遭凌辱，秘密警察可以使人们妻

离子散，甚至将他们处死，但是这些列强和压迫者却永远不可能夺走人们的知识。

斯可罗多夫斯基夫妇对孩子的学习非常关心，也要求严格。常常叫他们朗读和背诵课文。一天早晨，父亲对布罗妮雅说学校即将开学，你的书读得怎么样？接着翻开她的书本要她随念一段，而布罗妮雅却结结巴巴地，很多字似乎不认识，涨红着脸浑身都在颤抖。玛妮雅没有上学，几乎无事可干，布罗妮雅读书时，她就伏在姐姐肩膀上看，见布罗妮雅读不下去了，便从姐姐手上拿过那本书，很流利地接着往下念。起初，她为周围的寂静而得意，认为与姐姐玩这个有趣的游戏派上了用场。然而当她念完那段文字放下书本，抬头看到父母那被惊呆了的脸，又看了看布罗妮雅哭丧着的脸，急得不知所措，一本书啪地掉到地下，童稚的泪水滚出眼眶，像做错了事而被处罚的孩子，痛苦地重复着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请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布罗妮雅的错……只是因为它太容易了……”

看书，已成为玛妮雅认字之后一大嗜好，然而，这个爱好被取消了。哥哥姐姐们都在忙于读书。自己干什么呢？玛妮雅希望找到合适的游戏玩。她朝隔壁的那扇门看了看，木块在地板上滚动，墙壁隔不断叫喊的声音：那是工人们在劳动，不可能有什么好玩的，他们也不会与她去玩各种游戏和散步。到厨房去也没有什么希望，因为不断的闲谈声和很响的弄炉子的声音，告诉她仆人们正在做饭。她来到餐厅，餐厅里一个仆人正在烧菜，炉灶里的劈柴在欢乐地噼啪作响，明亮的火焰映在结着冰花的玻璃窗上，闪着奇妙的光。玛妮雅很想玩一下、闹一阵。但她觉得太乏味，她明白不大可能找到陪她做游戏的伴侣。

忽然她感到十分空虚和寂寞，这是一个5岁女孩所不曾有过的。于是她盼望哥哥姐姐们的假期到来，她们可以到乡下去住。乡下有他们庞大的家族，有太多的表哥表姐，到那里她可自由自在，畅快淋漓地玩教学游戏。她想起去年夏天和姐姐在乡下游玩的情景。她和布罗妮雅跟着表兄表姐在一条小河里划着小木船，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她们光着脚丫在小河里抓虾、捉小鱼；有一次她被一只大青蛙跳到脚上吓得大喊大叫，匆忙逃避而跌到在小河里，幸被表哥急忙抢救上来，像个落汤小鸡。回到家里表哥挨了一顿狠骂。自己反复认错也无济于事。她们还瞒着大人秘密地捏泥饼，泥饼放在一块只有她们知道的木板上晒，衣服和围裙上溅得满是泥点。记得在村外有棵又粗又大的老菩提树，是她们和表哥表姐七八个小捣蛋游玩的圣地。他们可以一齐爬上去，而不折断老菩提树的一枝一桠。由于自己太小太矮，常常是表兄把她举上树去，他们把带去的白菜叶、醋栗、生胡萝卜和樱桃等食物铺在大枝上，边吃边晒，又是笑又是唱，开心极了。于是她向父母提出要去乡下叔叔家。只要她不看书，父母均同意她的要求。于是，她被送到乡下，在那里她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她们可以大胆地用波兰话聊天，尽情地唱波兰歌曲，随时翻看亲戚家有限的书籍。亲戚家有高大温顺的耕马可骑，有毛皮光滑发亮的奶牛能挤出许多奶。他们在堆满干草的仓库里打闹玩耍，到树林里去采摘各种野果，衣服弄脏了，弄破了没有谁会指责。清新的空气，一望无际的铺着金色麦穗的田野，静静地拥抱着她，融化着她。常常玩

得饥肠辘辘，似乎从来没有饱餐过一顿。在她玩得开心，玩得饿极了的时候，她的叔叔总会来亲切叫她，拉她回去吃饭，饭食十分丰美！喷香的红黑色波兰香肠，夹着饱满的深紫色葡萄干的面色，填着苹果的烤肥鹅，还有小三角形的包着水果馅的薄皮饺。她津津有味地吃着，直到小肚鼓胀为止。她热爱那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祖国土地，深爱着波兰那宁静美丽的农村，这种感情在她一生中始终没有消失过。

在一间宽大明亮屋子尽头的墙上，有一张庄严的主教画像，镶在笨重的金色相框里，父亲认为这是著名画家提香的作品，把这幅作品挂在墙上，一是自己的喜爱，二是对提香的崇拜和纪念。这些，玛妮雅还看不懂，她特别赞赏的是写字台上的那个翠绿孔雀石座钟，它中间鼓起而且闪闪发光，像一只美丽又逗你喜爱的波斯猫。因为它美观而且形象，玛妮雅感到孤独时，就找它说话，对着它耍鬼脸，把它当作说话游玩的伙伴。此外，还有一件东西特别能引起她的兴趣。就是有好几个隔层的玻璃匣，里面装满了奇异而且优美的仪器。玻璃管，小天平，矿物标本，还有一个金箔验电器……这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教课的必备用品，玛妮雅的父亲常把这些东西带到课堂去。幼小的玛妮雅想不出来这些极有趣的小玩意儿有什么用处。她正踮起脚丫站着，极快乐地看它们，像欣赏一件壮观的玩具。

“玛妮雅”，“我的宝贝”，“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爸爸，这是什么呀！”

“我的安秀佩希欧，这是物理仪器。这叫天平，矿石样本，验电器……”父亲抱起她，在她的细嫩的脸蛋亲了亲。“你还太小，不懂得这些东西的用途。”

“物理仪器！”她靠在父亲的肩膀上，反复念着这些古怪而新奇的名字。她没有忘记这些名字。这些名字已经刻在她的心灵深处了。那时她还没有想到，这个古怪的名字以后联系着她的一生。

3 悲哀的日子

终于到了上学的年龄，玛妮雅被送到一所私立女子学校。这所学校无论校长还是老师，都有着极强的民族意识。她们憎恨沙皇俄国对波兰的奴役，怜悯幼小的孩子们不能用自己的祖国语言学习，担心波兰民族文化的命运。为此，除教授孩子们各类文化知识外，还利用各种形式作掩护，尽可能多地让孩子们多接触一些本国语言和历史文化，并且还教会孩子们如何蒙骗沙俄的禁令。玛妮雅如愿以偿，终于找到了如此的学校，盼到了读书的日子。她开心极了，对什么都感到新鲜，要学的东西多极了，她似乎对任何课程和科目都感兴趣，并且一学就会，读一遍就能背，老师讲的课程，她觉得太容易了，好像对这些书本知识她已经学过了一遍，所以每次考试，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并且永远第一。可是幼小的玛妮雅却对俄国佬嫉恶如仇，十分讨厌那个满脸凶相的俄国督学。这个督学常来学校检查校方是否遵照沙皇的命令行事，是否按照沙皇规定的课程授课，每次来学校，总是竖着耳朵听学生们背诵规定要记住的东西。譬如，俄国历史上沙皇的姓名，俄国统治的优越性等等。倘若学生说错了一个字，或者俄语语法出了差错，这个老师就必定要挨一顿谩骂和训斥。所以每当督学来校检查，老师总是叫玛妮雅回答问题。因为她的俄语说得很流利，而且记忆力极好，不管督学要她背诵什么枯燥无味的东西，都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一次，学校里轻轻电话声由楼梯平台的那头传过来。两声长的，两声短的。这是学校师生们熟知的信号。

这种无声的断续的信号立刻在各个不同的年级不同的班次引起一种剧烈的激荡。一双双敏捷的小手把课堂上正在学习的波兰文的笔记本和课本迅速收拾起来，堆放在预先安排的五个动作敏捷的学生的围裙里。这五个学生迅速抢着这些书籍，闪电般地由那扇通往寄宿生宿舍的门走出去，接着听见搬动椅子，打开桌子盖、再轻轻关上的声音。这五个学生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一系列动作，平静而安宁地坐下后，前厅的大门就赫然地打开了。

教室门口出现一个穿着讲究的制服，黄色长裤，蓝色上衣，缀着发光纽扣，腆着肚皮，身材粗壮满脸胡须，一副凶相的男人。他就是华沙城内私立寄宿学校的督学霍思堡先生。

陪他进来的校长西科尔斯卡小姐看着教室一片安然的情景，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因为出现在眼前的这 25 个小女孩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非常平静地在各自的座位上低头作针线，手指上戴着顶针，在毛边的四方布上锁着无可指责的扣眼……剪子和线轴散乱地放在空课桌上。

女校长大胆而从容地说：“督学先生，这些孩子每星期上两小时缝纫课。以锻炼她们的动手能力。”

霍思堡像是没听见一样，满脸严肃，迈着四方步走到教师身边。

“小姐，你刚才在高声朗读什么课本。”他毫无表情，冷冰冰地问。

“克雷洛夫的《童话故事》，我们今天才开始读。”教师温和而坦然地回答。这时杜普希雅努力保持着镇定，脸色也慢慢恢复了平静。

霍思堡仍然极不放心，却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把身边几个学生的课桌盖子掀开，全是空荡荡的没有书，没有笔记本，只有一些针线胡乱

地摆放着。

这 25 张充满稚气的脸，刹时变得十分懂事和老成，而心里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她们细心地缝完了最后一针，就把针别在布上，两臂交叉，端正地坐在那里。这些小女孩一律是深色衣服，白领子，一个式样。

狡黠的霍思堡心中的疑团仍未解，他在杜巴斯卡小姐请他坐的椅子上笨重地坐了下来，又开始施行他一贯的检查程序。他对着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说：

“请你叫起一个学生来。”听到这，25 个女孩子无不十分紧张，因为每次来视察的督学都要提一些辛酸刻薄的问题，一是为难孩子，二是伤孩子们的自尊心，以从中取乐。这时，坐在旁边第三排上的玛妮雅的心更加紧张，早就打起了小鼓，害怕老师又要叫她起来背那些使人厌烦的东西。她本能地把小脸转向窗外，避免与老师的目光相对。心里暗暗祷告着：“上帝保佑吧！不要再叫我……不要再叫我！……”杜普希雅很理解这些女孩子的心里，她看了看玛妮雅那痛苦可怜的小脸，心里像针扎般难受，可是，她又特别为难，让其他孩子回答问题，也许会弄出更大事端。于是她心里在说：只有再为难一次玛妮雅。“玛妮雅，请你回答督学先生提出的问题”。

她也条件反射般地知道老师一定要叫她，因为每一次她的老师都因她对问题回答得好而没有受到督学的谩骂和训斥。

她的名字终于被老师叫出来了。她颤抖地站起来，一种耻辱感卡住了她的喉咙，使她欲咽不能，欲哭无泪。

“背诵祈祷文吧！”是霍思堡冷漠而傲慢的声音。

玛妮雅虽是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虽然极反感厌恶，但为了老师，为了校长，为了同学们，她不得不回答。这是沙皇发明的最巧妙最恶毒的侮辱方法之一。天主教本是波兰人民的宗教信仰，沙皇表面上装作尊敬波兰人民的宗教信仰又要强迫他们忘记国家文字和语言，强迫波兰小孩每天用他们所痛恨的俄语背诵天主教祈祷文，这是对波兰人民民族感情的极大亵渎。玛妮雅极力避开任何人的目光，用流利的俄语熟练地背诵完毕。反抗的情绪深深地埋在心里。

这时，教室又死一般寂静。霍思堡洋洋自得地接着问：

“由叶卡特琳娜二世起，统治我们神圣俄罗斯的皇帝是哪几位。”玛妮雅的回答使督学感到精彩和满意。但是他不能就此罢休，因为这个问题是要求人人要背诵的，不能难倒她们，他要提一个难度大的问题，考察这个女孩是否真正记住了。

“叶卡特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玛妮雅冷眼地看了霍思堡一眼后，很熟练地背下去。

督学脸上呈现出满意的微笑，这个孩子记忆力真好，而且她的俄语语音又那么准确无误，真像是生在圣彼得堡似的。这个奸滑的家伙对玛妮雅的回答非常满意，他要继续问下去。

“说说皇帝的名字和尊号”。

“女皇陛下，亚历山大太子殿下，大公殿下……”

她按次序说完了那很长的一串名字。霍思堡开心地笑了。“这真是好极了”。他似乎觉得波兰的这一代已经掌握在他们的掌心了，波兰的未来就是大沙皇的了。可是他却未看见，玛妮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面

孔是冷峻的，内心的仇恨和反抗是多么的强烈。

为了炫耀自己在波兰教育界的统治者身份，也为了自寻开心，他依然洋洋自得地问：

“谁统治波兰？”

死一般寂静的教室竟没有一丝回音。

霍思堡涨红了脸，瞪大着眼睛，用更大的声音重复了一遍。

“谁统治波兰？”

这种森严冷酷的声音使缄默的女孩子咯噔地打了一阵冷颤。校长和杜普希雅老师向霍思堡射出火一般的目光，同时也为玛妮雅捏了一把汗。

这时，一种压抑着的带着稚气的声音又答了上来。

“亚历山大二世陛下，全俄罗斯的皇帝”。这种屈辱的表演使玛妮雅觉得喉咙里有无数毛毛虫在爬，她心里闷得发慌，脸色惨白，全身在颤抖。

考问终于结束，霍思堡退出教室。这时教室里便出现一阵骚动，诅咒霍思堡，诅咒沙皇的统治。大家摩拳擦掌，恨不得把这个讨厌的督学揍得稀巴烂，然而没有这样做，她们把仇恨埋在心里，在心里诅咒。怀着愤怒心情的杜普希雅迅速来到玛妮雅的身边。她一边抚摸着玛妮雅一边说：“我的孩子，你受委屈了。”

两颗痛苦的心在经过一阵煎熬之后，终于碎裂在一起。玛妮雅像在刑场上拉回来一样，倒在杜普希雅的怀里，痛哭起来。杜普希雅含泪吻着她的额头，说着极轻极细极体谅的只有玛妮雅才听得懂的波兰话，“委屈了你，我的孩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玛妮雅越来越憎恨俄国的统治。不仅自己亲身体验到的深深屈辱，而且父亲也在教学问题上受到了极深刻的侮辱。她父亲在一个俄国校长依凡诺夫手下教书。斯科罗多夫斯基是一位出身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而这个学校的校长伊凡诺夫却是毫无学识，又无管理水平的无知之徒，只是沙皇派来作监管的。外行领导内行，好多事情办得使人啼笑皆非，又不能提意见。老师们只有压抑再压抑。在这个人人都厌恶的家伙手下工作，实际上是活受罪。这个毫无教学常识的校长都要时常抽查教师的教案，学生的作业。一个学生在作文时，无意中使用了波兰语，被伊凡诺夫发现后，便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叫嚷，并要严格体罚这个学生。斯科罗多夫斯基忍无可忍，但他仍很平静地对校长说：“伊凡诺夫先生，要是这个孩子写错了一句话，那是由于一时的疏忽，你写俄文也有写错的时候，实际上你常常写错，我深信你和这个孩子一样，决不是故意的……”伊凡诺夫恼羞成怒，心想，一个教师敢顶撞一个俄国校长，好吧，等着吃好果子。他哼了一声转身走了。就是从那一天起，他对斯科罗多夫斯基便异常冷淡，常常挑他的毛病，在工作上为难他。

1873年秋，一个风雨大作的日子，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带着全家度假后回到诺佛立普基路，准备开课。当他来到学校，发现桌子上有一封公文：“奉当局命令，你的薪俸减低，副督学头衔以及按职务分配的住房，一并撤消。”这是一种降职，无缘无故地降了职。开始时，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感到纳闷，后来才想到就是那次顶撞了他。降职后不久，

这位校长竟倚仗权势将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赶出了校门。

斯科罗多夫斯基并未为此感到失望和悲哀，他依然是傲然正气，不屑一顾。只是增加了他对沙皇统治和校长伊凡诺夫的仇恨，这个浅薄的家伙竟对一个不肯奴颜婢膝的属员施行卑鄙的报复。从此之后，斯科罗多夫斯基一家开始过上了动荡、艰难、困苦的生活。在玛妮雅幼小的心灵里，以往安宁、甜蜜自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沙皇”、“警察”、“降职”、“减薪”“开除”等可怕的字眼镶进了她的生活之中。

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带着家小搬出大套房，几度迁居之后，在诺佛立普基洛和加美利特路拐角处的一所较小的房子里住下了。因为他断了收入来源，经济十分拮据。不久，他被一个倒运的内兄弟拉去作冒险的投机生意，搞一种“神奇的”蒸汽机厂。起初，这位教师很谨慎，不愿作这类毫无保障的冒险生意，后来，经不起这位妻弟的好说歹说，把他的全部积蓄投了进去，厂子没办成，却把3万卢布全部丧失了。这笔钱是供孩子上学用的，现在钱没有了孩子们以后上学怎么办。他非常懊悔，担心目前全家人的生计，焦虑将来，女儿们没有嫁资而被人取笑。为了维持生活，父亲不得不在家收寄宿生，开始两三个，后来七八个直到十个，这所房子变得像一个吵闹的磨坊。家庭的亲密感顿时消失了。

家境贫困并没使玛妮雅感到压力和悲哀。而使玛妮雅感到悲哀的是姐姐素希雅的死亡。那是1876年1月，那年冬天格外寒冷，处于铁蹄践踏下，华沙更是阴云密布，格外凄凉。连倒霉的斑疹伤寒病也来侵扰弱小的华沙人民。由于斯科罗多夫斯基被解雇后，只得在家里收寄宿生，其中有一个寄宿生患斑疹伤寒病，很快传染给了素希雅和布罗妮雅。那段时间里，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一家六口病倒了三个。两个小女孩子因发高烧而呻吟，打颤、抽搐。斯科罗多夫斯基夫人因患肺结核病而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干咳声，这可怜的家庭竟笼罩在一片悲哀焦虑之中。

布罗妮雅死里逃生，经过治疗渐渐地好了起来。

三个小斯科罗多夫斯基来到姐姐的床前，素希雅穿着白衣服，平躺在灵柩里，面容憔悴苍白，两手合在一处。仍是那样楚楚动人。玛妮雅见姐姐毫无动静，知道姐姐永远不会醒过来了，悲惨地叫道“素希雅，我的姐姐，你怎么啦！”接着，悲伤地大哭起来。这是她第一次遇到死亡，第一次送葬，穿着一件素黑的小外衣，哭得死去活来。

“素希雅，姐姐，你起来，起来呀！……你还要给我讲故事。你不能死啊！”

玛妮雅与这位大姐有说不尽的亲密感。在父母因怕她识字过早影响今后的学习，而不准她看书时，素希雅便在课余时间，带着她去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姐妹俩手拉着手来到长着稀疏小草的草地和围在墙里的树林中，玩“捉迷藏”，“摸瞎”，常常碰得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而让玛妮雅笑得开心，玩得愉快。

素希雅的想像力特别丰富，口才流利，表达力强，在那宽阔而又遍地鲜花的花园里，她和姐姐哥哥们手拉着手走过郁郁葱葱的绿草地，来到花园西南方的一棵大樟树下，那是素希雅给他们讲故事，表演滑稽剧的地方。她的想像力能给每一件事或神话加上非凡的渲染，甚至出神入化，使人感到神乎其神。在这里，素希雅是轻松自如地，讲短小的滑稽喜剧，还会手舞足蹈地，绘声绘色地表演那些虚幻的冒险故事，那些虚

幻的童话故事，美丽的寓言故事，使幼小的弟妹们笑得前仰后合。她的故事像是音乐名手奏出来的绝妙变奏，逻辑严密，天衣无缝。她具有大文学家的思想和想像力，她的创造才能和文学天赋，征服了聪明伶俐的玛妮雅，小小的玛妮雅从小就把姐姐当作崇拜的偶像。她像一个跟屁虫一样跟着素希雅，向她提出各种古怪的问题，而每个问题都能得到姐姐富于戏剧性的圆满回答。她是玛妮雅的老师、小伙伴和姐姐。可是今天，这个受她爱戴的聪明伶俐，活泼开朗的姐姐，这个多艺美丽俊秀的姐姐却要离开她，走向一个孤独而黑暗的世界。她怎能不哭，怎能不哀伤万分。布罗妮雅正在恢复期中，她不能出来，只能在病床上哭泣，她的枕头已经透湿，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由于身体太弱，不能出门，只能由一个窗户挪到另一个窗户，目送自己孩子的灵柩沿着加美利特路缓缓而去。犹如万箭穿心，悲惨至极。她太虚弱，太悲伤，她倒下了，倒在自己的房子里。

不知过去了多久，玛妮雅随着送葬的队伍返回住房，她强行推开母亲的住房，看见母亲瘫倒在地，一阵撕心裂肺的呼叫，使整个院子充满一片恐怖和哀愁，但很快玛妮雅就被她那美丽善良的姑母卢希雅拉出了母亲的房间。

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生下玛妮雅不久，因劳累过度，加之几次生产，身体极度虚弱，出现了核痨病的初期症状，后来5年中，虽然经多方调理，投医问药，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不过这位勇敢的基督徒总是生机勃勃，衣着整洁，照旧过着忙碌的主妇生活，不让人看见她是一个体弱多病，忧郁悲伤的妇人。不让年幼的孩子们过早地承受心理负担，她要给这些小家伙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气氛，所以她总是若无其事地、愉快地操持家务。

从玛妮雅懂事的那时起，她记得自己总是缩在母亲脚旁的矮凳上。几乎没有见过母亲的亲吻和拥抱。她最能感到母亲的温存的只能是母亲那轻柔的手抚摸她的前额。嘴里极度温柔极度关切地说：

“啊，我的安秀佩希欧，你睡觉了么？”

“没有睡，妈妈，我很好”。她靠在妈妈的脚上懒散的说。

这就是玛妮雅记忆中最大的幸福，最大的母爱，她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母亲的抚摸感到更加亲切、快乐。她奇怪她的母亲不抱她，不吻她。她最终没能得到母亲的解释。但是这个细心的小女孩却观察到：她的母亲虽然精神振作，端庄秀丽，整天忙忙碌碌，但总是背过身去，压抑不住频频而来的阵阵的干咳声。她那慈祥端庄的脸上，总是透出一种忧郁。吃饭时，只用她专用的餐具，从不给儿女们夹食物。那时，小玛妮雅就感觉到：母亲有病。这是她细心观察后得出的结论。

从此，每当她们到圣玛耶教堂时，她就热切地一千遍一万遍地请求耶稣保佑母亲早日康复。

一天，她受卢希雅姑母示意，与姐姐海拉又来到圣玛耶教堂，这是她接受洗礼的教堂，她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了。只记得第一次领圣餐是在多米尼加教堂，那是一个难忘的日子，玛妮雅和表姐亨利埃特发誓文约束，都立誓不用牙齿碰圣餐面饼。这一次她是专为母亲祈祷而来。她们走过了那宽宽的多转式大门，来到这个阴暗的教堂里又向前走了几步，玛妮雅就颤抖着跪下去。她喃喃地说着只有自己才能听懂的祝福。殷勤

地向她相信的上帝祈求。热切地请求耶稣把生命赐给世上她最爱的人，她的妈妈。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为了救她那可亲可敬又可怜的妈妈，她愿意替她去死，请求耶稣成全她的心愿。

玛妮雅对她的母亲怀有无限的爱。她觉得世上再没有人像她母亲那样娴雅，那样善良，那样聪明……母亲除满腹诗文通晓音乐，会学校管理会教书外，还会低下头去干一种很粗的粗活。几次生产和患病使她虚弱得不能到屋子外面去，她就在屋子里学会了鞋匠手艺。她那一群活蹦乱跳的小东西经常很快地穿坏了小靴子。斯科罗多夫斯基夫人拿着切皮刀和锥子，为她们做式样新颖的鞋。穿起来既舒服又美观。还能为她那贫寒的家境节省开支。除了皮子线就不花什么钱了。

常常是母亲手里拿出一双十分精美的靴子给兄弟们穿上。

“这一双是给你做的，玛妮雅，你看，穿上去多好看呀！”

每当穿上母亲为她亲手做的新鞋，她都会有几天的激动和荣耀，常常把小脚伸得老长，让大家看看那双漂亮的鞋，欣赏母亲的缝纫手艺。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斯科罗多夫斯基夫人病重，不能出门到维斯托拉河边购买和挑选苹果之类的事，便由卢希雅姑母带着玛妮雅和海拉去干。这一次，素希雅姐姐去世，母亲病情加重，卢希雅姑母为了给孩子分散忧伤的情绪，便带着海拉和玛妮雅去挑选水果。玛妮雅认真地看着姑母同小贩们讨价还价，学着姑母把苹果一个个地拿起来，转来转去地看，把大而好的扔进一个用柳枝编的大篮子，把烂的用力扔到维斯托拉河里，看着那红圆球沉下河去，便有一种胜利者的感觉，差的小的翻到一边，菜篮子装满了，手里拿着一个最好的苹果一边吃，一边蹦蹦跳跳地下船……玛妮雅很快学会了这一套程序，煞是开心。当时，连挑苹果这件简单的工作也能使这个小女孩兴致勃勃，因为她太没有事情做了。

每天晚上5点钟吃完晚饭，仆人们收拾好大桌子，点好煤油挂灯后，窄小的房子里便响起了孩子们的朗读声。寄宿生聚在他们两个或三个合住的屋子里，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的子女们聚在改作书房的饭厅里，各自打开了书和练习本。不大功夫，从整个房子的各个房间里，陆续传出嘈杂的朗读声，讨论问题的争执声和偶尔的说笑声。这几年斯科罗多夫斯基一家就像生活在闹腾的自由市场，整天不得安宁。开始的时候，玛妮雅极不习惯，她用手指或用纸团堵住耳朵，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只要她全身心投入，周围发生再大的事情也不能影响她的注意力。小伙伴们觉得她是个怪人，就想方设法来干扰挑逗她。她们常常搞一些恶作剧。有的装怪叫，有的敲铁皿，有的穿铁钉子的靴子，有的在地板上使劲地蹦蹦跳，有的大声喧哗，甚至在她的身边堆满桌椅，让她不小心撞倒以寻开心或打扰她的注意力。然而，无论她们怎样费尽心机，都无法引开玛妮雅的注意力，无法使玛妮雅抬头看一眼。然而这些智力参差不齐的孩子中，有的因要用俄文这种官定文字写一篇文章而叫苦不迭，有的为背诵这些恼火的俄文课本而苦恼，结结巴巴，如何努力就是弄不懂，更不能把它背出来……

而玛妮雅却没有这些烦恼，她觉得背这些讨厌的书本，是一件极简单而又轻而易举的事情。她的记忆力极好，同伴们见她一首诗只念两遍就能一字不错地背诵出来，极不相信，猜想是一种欺骗，总说她瞒着人读过这些诗。一天，几个小伙伴们想出一个办法要难住玛妮雅，事先他

们背熟几篇散文和诗歌，晚上，便在玛妮雅面前炫耀起来。看谁能很快背出来。玛妮雅翻开课本一面认真地读着，一面看她们拙劣的表现。半个小时后，一个伙伴开始背着，正在得意之时，竟把这首诗的诗句挪到那首诗里去了。玛妮雅不慌不忙地给予纠正，并流利地接着背完。那抑扬顿挫的音调和悦耳动听的声音，以及丰富生动的表情令小伙伴们张口结舌。一股神秘感荡然无存。她们不停地称道：“天才，超人的天才。”至此，不能不在事实面前低头。每天晚上她比别人早很多就做完了功课，常常是闲得无事可做，有时去帮助智力较差的同伴解决学习上的困难。

她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有功课之累，有学习之烦。但她满脑子装的是母亲的身体。母亲的健康给这个不到9岁的小女孩带来满心焦虑。

原来那个很美丽动人，很理想浪漫的斯科罗多夫斯基夫人，现在只剩下一个瘦削的身子。这天，医生悲哀地告诉他们，他已无力回天，准备料理后事吧！医生无可奈何地退出房间，这种宣判，无疑是对斯科罗多夫斯基家一个沉重的灾难，一个无可挽救的悲哀。斯科罗多夫斯基夫人也知道她即将辞别人世，她希望不因自己的变故而扰乱一家人的生活，不给丈夫和孩子们带来更大的打击和痛苦。就在1878年5月9日，她向丈夫提出请求，用牧师换走了医生。以减轻家庭的开支。牧师善解人意，她很懂这个基督徒内心的痛苦，理解她在留下4个孩子需要她深爱的丈夫照管的时候内心的悲哀，想到她要离去后几个孩子的前途和只有10岁的小玛妮雅的忧虑。这一切无时不在折磨着这个多思多虑的病体快快的妇人。

她深爱的丈夫和可爱的儿女们，都围绕在病床前，眼泪汪汪地望着她。在亲人面前，她仍挤出一丝微笑。就在她即将离去的最后一天里，她瞪大着那秀丽动人的灰色眼睛，默默地看着丈夫和环绕在病榻边的孩子，渐渐地，眼光变得黯淡，五张熟悉的面孔渐渐变得陌生而遥远。她使足最后一丝精力，用暗淡的眼光向自己的每一个亲人告别，后来慢慢地越发软弱了，她想作一个手势或再说一句话，她用尽全身力气，微弱地断断续续地挤出四个字“我爱你们！”她再想说什么，但已力不从心。她的手可怕地颤抖着，手势是画一个十字，这个记号是给丈夫孩子们的祝福！直到停止呼吸，她也没有闭上眼，她不忍心丢下这一群年幼的孩子，还有她真诚爱恋着的丈夫。

她的死正如她所希望的：不昏迷，不错乱，也不痛苦。

这次，玛妮雅并没像姐姐素希雅去世时那样悲天悯地，那是否因为姐姐太小而不应该走向死亡而致，还是死亡对她那幼小的生命来得太突然。母亲的死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痛苦。但是母亲的死已早早地印在了她幼小的心灵中。她早就清楚地觉得，自己热烈地敬慕之情，自己那出自内心的纯洁的爱，自己的虔诚祈祷，都阻止不了这件可怕的恶性事故的发生。也许她已有了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

玛妮雅满怀悲苦地再次穿上了那套曾为姐姐送葬时穿的黑色丧服。神情木讷地走在送葬队伍当中。

幼小的玛妮雅深深体会到了民族的压迫，亲人的不幸，生活的残酷。

姐姐走了，母亲又走了：一连失去两个最亲的人，这个小女孩失去了母亲的慈爱，失去了大姐的呵护，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差不多在没有人照料的环境中，她勇敢坚强地生活着，从来没有因环境的恶劣，生

活的艰辛而悲哀，而流泪，而叫苦。

她从前那么敬爱上帝，祈祷上帝保佑母亲安康。可是上帝却偏偏把善良和慈祥的妈妈夺走，她愤怒地叫喊上帝为什么要夺走我的妈妈，我们需要她呀！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些不公平的打击，不幸的痛苦降在幼小的玛妮雅身上，毁灭她生活中的快乐幻想和温存。她流着眼泪问姑妈：“上帝为什么要夺走妈妈。”姑妈悲伤地答道：“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上帝最清楚。”她知道问这些是没有结果的。到此为止，她对上帝再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再也不去教堂祈求和祷告。生活中的路还得靠自己去走，靠自己去奋斗。

4 中学时代

灾难列着队向斯克罗多夫斯基一家袭来。可是这种磨难并未击垮斯克罗多夫斯基，这位坚强的知识分子。他生来就有一种倔强和自信，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磨砺，更加炼出了一种锐不可挡的力量。事实证明，他拉扯着四个年幼的孩子经过艰苦努力，战胜重重困难，克服种种阻碍，走出了困境，创造了辉煌。以后这四个孩子都成了非凡的人物。

1882年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斯克罗多夫斯基先生为了不让孩子们沉浸在悲哀之中而荒废学业，决定搬出那愁惨的加美利特路，到来思诺路居住。他们住的院子很安静，阳台上爬满了野葡萄藤；正面颇有特色，有许多灰鸽子在里面咕咕低鸣。二楼既开阔又宽敞。在这里斯克罗多夫斯基一家可占用四间屋子，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孩子与那些寄宿的孩子分开来住。

来思诺路的“情调”远远超过加美利特路。这里宽阔的人行道旁，耸立着豪华的楼群，熙熙攘攘，车水马龙。是一座加尔文教派的教堂，一直到利基斯卡路，都是完全法国式的有柱廊的建筑，处处显示了西方的情调。

斯克罗多夫斯基一家刚搬进新居，大家围坐吃午茶时，孩子们都流露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在各自的学校里和班上都是出类拔萃的学生。这些令斯克罗多夫斯基特别欣慰，他的辛苦与爱心没有白费。几个孩子都很争气，都知道忍受一切痛苦与烦恼，而且一个个长得极为俊秀。16岁的海拉，颀长娴雅，一头秀丽的金发，明亮的灰色眼睛，成为她所在学校的校花。布罗妮雅那副白里透红的脸蛋，像一朵盛开的鲜花，一看就会使人着迷，她比海拉毫不逊色，而且她的学业优异，一年前中学毕业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约瑟夫穿着校服，高大而健壮，风度翩翩，气宇不凡，活脱脱的男子汉形象。他在离开男子中学的时候，得到一个跟布罗妮雅一样的金质奖章，然后到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当时波兰在沙皇统治下，只有男人享有高等教育权利，他是全家人中惟一的希望所在。斯克罗多夫斯基因为在智力方面的潜力很大，早就觉得读中学极不满足，觉得烦恼不安，诅咒华沙大学不收女生的规则。每当晚上，她们就围着约瑟夫讲述这所“沙皇大学”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尽管平凡而庸俗，但他们总是觉得新鲜而离奇。

由于波兰大学拒绝招收女学生，而家里一时又交不起供国外留学的费用，所以布罗妮雅只好呆在家里，帮助父亲料理家务，代替那个叫全家人不痛快的管家，管理账目，照料寄宿生。她像大人一样，把头发梳成髻子，穿着缀有许多小扣子的花围裙，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她娴熟地安排着家里的一切。每当大家听约瑟夫讲“沙皇大学”有趣的故事时，她会指挥仆人送上面包、黄油、奶油、果酱等食物，让他们边吃边讲，边吃边听。

玛妮雅穿着一身栗色制服，她已经进入中学，她以聪颖的智慧和超群的毅力，门门功课始终保持优秀，很快成为中学里一名出色的学生。但她从不骄傲，始终一如既往地认真学习。加之她性格温柔，待人谦虚，赢得了老师的器重，同学们的爱戴。她是十分懂事而又早熟的女孩子，每天早晨，她都得自己完成应该由母亲帮助完成的一系列工作。7点钟起

床，然后是洗漱，然后自己把那光亮的头发梳理好，并扎上绸带。再匆匆跑到厨房去。

“我吃黄油面包片……”

“我的赛叠基呢！……”

“黄油在什么地方？”

小斯可罗多夫斯基一边找一边嚷，几个人你要你的，她要她的。在布罗妮雅的精心调配下，早点丰富极了，巴煎茨，赛叠基、香肠、果汁。她们还把 11 点钟课间休息时吃的点心装在各自预备的布口袋里；一个小面包，两条叫做赛叠基的那种极好的波兰腊肠，一个苹果……然后就哼着歌声开门走了。约瑟夫夹着他的大笔记本匆匆离去，他是不带课间餐的。之后，这一片狼藉便由布罗妮雅来收拾。

玛妮雅一路蹦蹦跳跳地向察摩依斯基伯爵的府第“蓝宫”走去。这是她去学校的必经之路。这府第的老院子前面有一座铜狮镇守着，她正要把铜狮口里衔着重环翻起来放到狮子的鼻子上去。这是她与好友卡霁雅约好的信号。

“玛妮雅，我来了。”

“卡霁雅，你真准时。差一点我就要翻铜狮口里的重环了。”

“现在不用翻了，我已经距老远嗅到你的气息，听到你的脚步声了。”

“卡霁雅，叫玛妮雅下午到我们这里一起吃茶，我给你们做‘巴兹基’和冰巧克力！”开满鲜花的阳台上一个贵妇人高声喊着。

“谢谢，夫人！谢谢你！”

“好，好，妈妈！我一定把她叫来。”

踏进这所学校，这对小女孩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密友。卡霁雅每天都在门口等玛妮雅，玛妮雅每天都要去找她，若是约会地方没有人，玛妮雅就把铜狮口里衔着重环翻起来，放在狮子的鼻子上，然后向学校走去，卡霁雅看见这个环子，就知道玛妮雅走了，她就会赶紧追上去。

卡霁雅是一个活泼娇宠的小女孩，父亲是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现任察摩依斯基伯爵的图书管理人，资产丰厚，母亲是一个宽宏善良、美丽勤奋的妇人。每天她有母亲为她梳头，扎缎带，为她缝制各种各样的裙子，无忧无虑，快乐无比。普希波罗夫斯基先生和夫人非常喜爱的聪明的玛妮雅，十分同情玛妮雅的不幸遭遇。常常给她以父母般的慈爱和温存，设法使她忘记自己是个无母的孤儿，他们为她做喜爱的食物，常常给她缝制合身的衣裙，并十分赏识和欣赏她的优异成绩。在这里，玛妮雅感到了母爱的温暖，家庭的温馨。

在学校，玛妮雅极富斗争精神，生就一副顽强的个性。她讨厌那些道貌岸然的俄国教师，痛恨趾高气扬的学监。特别是那个极端可恶的学监梅叶小姐，更是玛妮雅取笑的笑料。她是玛妮雅的公开仇敌。她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报复那些开除父亲教籍的俄国佬。

梅叶是一个身材矮小，皮肤棕色，头发很油腻的女人，经常穿一双酷似奸细们穿的平底软鞋，不出任何声音地偷听师生们的谈话。然后把每个学生的名字和谈话内容记在笔记本上，向俄国校长报告，并当着校长的面，对学生进行训斥，以显示自己的威严和政绩。她对沙皇政府视察员总是竭力讨好，而对于有强烈民族感和顽强个性的学生总是百般挑

剔和责难。师生们对她恨之入骨，表面上不敢得罪她，背地里诅咒她。玛妮雅把对她的仇恨和厌恶深深地埋在心底，化作轻蔑的讥笑。梅叶无法从玛妮雅的品行和学业上找到毛病。有一次，玛妮雅站在梅叶的旁边，用一种固执而轻蔑的眼光俯视这个学监，这是在沙皇统治的学校里一个波兰学生根本不敢为的举动。平时，学生看到学监就会低头恭维，或是害怕得躲开，这样弄不好要受重罚或被流放的。梅叶发怒了，恶狠狠地说：“不许你那么看我……”

玛妮雅会笑着说：“事实上我只能这么看你！”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实际上是对梅叶的贬低，同时也意味着梅叶个子矮小。

梅叶非常气愤，心里已经埋下了仇恨。打那以后，梅叶小姐时时为难玛妮雅，斗争转为白热化，明朗化。

梅叶常发怒地说：“这个斯科罗多夫斯卡，太放肆，简直不值和她说话……也好比对牛弹琴。”

玛妮雅有一头美丽的金色卷发，这样使梅叶非常懊恼。她恶狠狠地说，这蓬乱的头发很不体面，影响了学校的形象。她用刷子重重地在玛妮雅头上刷，她要刷平那头卷发，卷成紧辫子，要把这个漂亮的波兰女孩变成格瑞渣。

但是，梅叶的恶毒心机总是徒劳，不过一会儿，那些柔软而不受拘束的卷发就又冒出头拥住那鲜艳的脸庞了。这件事没有达到目的，梅叶仍不死心，处处挑剔，事事为难玛妮雅。一次，她终于抓到了一根稻草，那就是当沙皇亚历山大被刺暴死，全国正在为他服丧，玛妮雅却和几个学生在教室里手舞足蹈以示庆祝，正好被突然闯进来的梅叶发现，她便抓住这件事大肆报复，不准玛妮雅上课，让她在沙皇像前站立默哀……

波兰民族是一个坚强勇敢的民族，波兰人比别的民族更显倨傲。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沙皇压迫愈烈，波兰人的心更加紧密相连。玛妮雅的遭遇深得学校老师们的同情，老师们主动偷偷地为她补习漏听的课程，批改她比其他同学迟交的作业。除波兰老师外，俄国老师也深表同情。一种强烈的反抗情绪在玛妮雅心中腾升。玛妮雅感到怨恨，决不是自由人们所能体会到的。除上课时间外，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同卡霁雅或几个好友躲到萨克斯花园。讨论救国救民的计策。后来，她叫它“我最爱的小华沙”。

一天，她们正在这里聚会，大谈波兰人民反抗沙皇的英勇斗争。玛妮雅把谈锋转向昨天一个沙俄教师讲的历史课。

那个可恶的家伙，他说波兰是一个省，波兰语是一种方言，而波兰人负恩，使深爱她们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因悲哀而死！这简直是诬蔑，是侮辱。

她越讲越激动，站起身来气愤地说：“那个可怜虫对我们讲这些话时惊慌失措。他的脸色窘得可怕。他的良心在受到谴责”。

卡霁雅接着说：“他的脸是绿的，因为他们编的那一套说教是苍白的，没有根据的。”她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块绿天鹅绒，以示对那个教师的鄙视。

这时，班上一个叫康妮茨卡的女同学摇摇晃晃地走过来，眼泪汪汪的。玛妮雅急忙走过去，把她披在身上的衣服扯好。

“怎么啦！康妮茨卡，出什么事了！”玛妮雅关切地问。

康妮茨卡越发呜咽起来，眼泪夺眶而出，一句话也说不出。

大家手忙脚乱，心急如焚围着她急切地问这问那。

过了好大一阵，康妮茨卡才断断续续地说了出来。

“我哥哥……参加了一个波兰密谋组织……被人告发了……我们三天没找到他了。明早就要被绞死。”

这一回答有如晴天霹雳，惊痛了大家的心。热闹的聚会，争先恐后的发言竟戛然而止，显得异常寂静，只有风吹树叶沙沙声和着康妮茨卡的哀哭声。大家握紧拳头，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她们的反抗意识和她们同情的泪水混杂着压紧了心头。她们扶着这个痛苦得全身抽搐着的女孩子，为她一次又一次地擦干泪水，陪着她流了一串又一串泪水。月亮沉重地隐退了，太阳艰难地跳出地中海，可怕的一天又来了。几个女孩子面对着东方的地平线，跪在地上，双手合十低声念诵着她们渴望祖国早日获得自由，使他们的同胞不再无辜地惨遭迫害。

越是压迫越要学知识，玛妮雅对学习十分用功。她对中学开设的科目都极其认真地研读，刻苦地学习，项项成绩名列前茅。数学第一、物理第一、历史第一、文学第一、德文第一、法文第一，似乎由于她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赢得了学校师生的好评。学监梅叶小姐也只能在小节上戳戳，骂骂咧咧，到底也不敢对玛妮雅施加恶毒手段。玛妮雅天赋极佳，完成好学业功课对她来说是一件极为容易的事情。她常常暗地里研读科学书籍，她把父亲那些数学、高能物理学带在身边，一有空就读，书上被她划满了红杠杠，蓝道道。

中学时代太短暂了，由于学业优异，她比别的女孩子提前一年毕业，1883年6月12日，学校举行了中学毕业典礼。玛妮雅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她为斯科罗多夫斯基家赢得了第三枚金质奖章。

1883年6月12日，这是玛妮雅迎来16岁的那个夏季，这是一个灿烂的日子。这天上午10点整，毕业典礼仪式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开始了。校长庄严地宣读得奖人名单。顿时，鼓号声、掌声汇合在一起。演说、军乐均在一种严肃的氛围中进行。教师致祝词。玛妮雅按照习惯穿全黑礼服，这件礼服是姐姐布罗妮雅为她精心选料缝制的。上衣上用扣针别着一束茶红玫瑰，站在讲台上，美丽腼腆亲切可爱。她的告别词是在热烈而亲切的掌声中作完的。玛妮雅深深地鞠了躬后，校长把金光闪闪的奖章挂在她的胸前，老师和同学们把无数鲜花、彩帕塞进她的怀中。一向坚强的玛妮雅激动得热泪盈眶。走下主席台，她很快被热烈的同学们包围了。大家热情地拥抱、话别，玛妮雅抱着一大堆当作奖品的俄文书，永别了在克拉科维大道的中学。出了校门，她回头看着熟悉的学校大门，轻轻地说：再见了，我的朋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卡霖雅。挽着父亲的胳膊迎着火红的太阳，百感交集地告别了这所克拉科维大道上的中学。

她的成功使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感到荣幸，感到骄傲。父亲特许她休息一年。玛妮雅在开始懂事时起，就没有过上几天轻松愉快的日子，一连失去两个亲人的打击；忍受着学校令人沉闷的压抑环境。作为比同年级同学小两岁的玛妮雅，又提前一年完成中学学业，她是在超负荷学习、生活，她太苦了，太累了，太需要休息了。父亲对玛妮雅关心，使玛妮雅高兴极了。

一年的假期，对她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研读科学书籍的自学阶段，按

照这个天才少女的性格，也应该是带着大堆书本在身边。可是，这一次却不同。她丢开课本，生平第一次如此，也是最后一次如此在闲荡中尽情游玩。

第二章初涉人生

1 贫寒的家境

玛妮雅带着满身的愉悦，兴致勃勃地返回华沙，过去的来思诺路已找不到她的家了。不久前，父亲已决定搬到诺佛立普基路一所比较小、质量较差的房子里。玛妮雅把带着的大包行李往地上一扔，大声嚷着：

“爸，我回来了！”便扑到父亲的跟前。

“好，我的玛妮雅，让我看看，哦，长高了，晒黑了。我们真想你啊！”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摸摸女儿柔软的头，说：“愉快吗？”

“很愉快！爸！我们滚铁环，打秋千，跳舞，太多太多，快乐极了。那里的野草莓又大又红，好吃极了，我的食量大得没有限制，爸，你想想不到我那种贪吃的程度……”她手舞足蹈，仍然陶醉在乡村生活的乐趣之中。

玛妮雅愈是激动，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愈感愧疚。30年的中学教书生涯，养成了一种庄重严肃，不苟言笑的性格。他整整齐齐的服装，规规矩矩的姿态，有理有节的言行，无不反映出他是一个严肃而训练有素的学者。玛妮雅爱她的父亲，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她心目中的父亲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犹如一个知识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父亲带他们去旅游，他必定预先研究好旅程表，标出风景名胜点，一路上他像熟练的导游评述这里的风景优美之处，人文古迹以及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引经据典，令人叹服。特别是对科学知识，不论你提出什么问题，他都会给你一个圆满而精确的解释和答案。在玛妮雅的心目中，父亲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博学多才的教师。所以在父亲面前，她永远是一个无知的小女孩。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也特别钟爱这个小女儿。那时他虽没料到玛妮雅会成为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但也知道，这个孩子会有出息。可是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极为复杂。曾经希望挣得更多的钱来供养一家人，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过上宽裕的生活。然而命运给予的回报是如此刻薄。他竟无能供孩子们出国留学。他又一次为自己损失那笔钱做倒霉的投资而后悔。而自己年纪渐老，家里已再收不了寄读生，虽然继续在学校教课，但收入维持家里收支平衡已经够困难了。孩子们还未成家立业，并且都是求学时代。想到这，他微笑的脸庞一下阴了下来，表现出一种内在的痛苦表情。他心里在喃喃地说：“我想送孩子们受最好的教育，让他们旅行，然后到外国去留学。然而……”聪明的玛妮雅一下刹住了那乐天乐地的兴趣，滔滔不绝的话语全然停了下来。

“爸，怎么啦！不舒服？”玛妮雅扶着父亲在一张大椅子上坐下来。这位秃顶、矮胖，永远衣着朴素的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女儿面前是从不流露出悲伤的，他摸摸头说：“没什么，孩子。”

玛妮雅定睛观察一下，一年间，家里的变化真大，没有了寄读生，只有一个粗俗的女仆。房子换了小的，比过去减了两间！屋子外面也只有一个极小的花坛。玛妮雅心想，这样还好，全家人可以住在一起，更加亲密。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白天，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去教学，布罗妮雅

到寄宿生家去讲课，约瑟夫上大学，海拉到朋友家去，玛妮雅就到父亲的书屋里翻着各种书籍。除俄国书籍外，什么书都看，特别是文学作品，例如吉卜林、多莱特的诗和著作，不知疲倦地在《丛林之书》、《黎明》、《西多》、《吉姆》这些书里寻求大自然的壮丽。她热爱大自然成为了她一生的爱好和追求。她熟记了几千首诗歌，有法文的，德文的，英文的，波兰文的……

每当午茶过后，夜幕降临，一家人就聚在父亲的工作室——书屋兼餐厅里，听父亲讲授各种有趣的知识。有时，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把他波兰文字的诗《生日赠友》、《为婚礼举杯》、《致旧日的学生》等拿出来，抽出其中他认为有价值的诗篇大声朗诵给孩子们听。有时还高声朗诵波兰作家描写奴役和反抗的诗篇。《塔杜施先生》中气壮山河的长段独白和《科学第安》中的沉痛诗句。

玛妮雅忘不了这些有意义的晚上，幸亏有这样的夜晚，幸亏有这样的父亲，她的才智才得以健康发展，她的思想才得以成熟。

约瑟夫每天放学回来，总是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大学活。讲有人想要暴力斗争，要不顾生命危险去组织密谋；有的想用论战去鼓动，还有人怀着一种神秘的梦想，因为天主教也是一个避身之处，是一个反抗信奉正教的压迫者的力量。讲他们这些波兰青年如何热血沸腾，如何想赶走侵略者，建设新波兰。

这是波兰青年共有的民族梦——波兰梦。这个梦对于 20 岁的布罗妮雅，17 岁的玛妮雅是同样具有的。要为波兰服务，单靠武力、蛮干是毫无用处的，而宗教信仰也随着母亲的去世一点点地消失了。要实行使祖国重新获得自由的愿望，首先要有知识，要给波兰创造伟大的智力资本。因为俄国人剥夺女子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就是要使波兰人变得愚昧无知，以便他们统治。但是玛妮雅作为女孩，同她的姐姐们一样，在波兰已无法上大学，俄国佬剥夺了她们的上学深造的权利。一个时期，玛妮雅与姐姐们商量如何选择职业，如何得到继续学习的机会。布罗妮雅决定去学医，玛妮雅打不定主意，但决计求学深造。她们深知，在沙皇统治下的波兰是实现不了这个愿望的，要深造就得离开波兰，到国外去上大学。可是哪儿来的钱呢？

布罗妮雅这两年来由于教了几个寄宿生，有了一些积蓄，但仅够旅费和读医学院一年的费用，而医科大学需要 5 年才能毕业。她已 20 岁了，再不能等了。布罗妮雅非常沮丧和焦急。生性先人后己的玛妮雅也为姐姐焦急，时时思忖着帮助姐姐实现愿望。不久，她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征得父亲的同意后，便对姐姐说：“布罗妮雅，我想出了一个让你到巴黎医科大学学习的好办法。”

“什么，办法？”

“对，用我的办法，过几个月就是秋天，你就可以走了。”

“什么？玛妮雅。”在布罗妮雅的心目中，这简直就是做梦。玛妮雅对这个才华超群的姐姐十分崇拜，自从母亲和大姐去世后，布罗妮雅总是给她以慈母般的关怀。四年来，她默默无闻地承担全部家务，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如今她已经 20 岁了。她一定要尽自己的努力帮助姐姐。所以她恳切地对布罗妮雅说：“你用你自己的钱先去，以后我设法为你寄钱，父亲也寄。同时，我也为自己将来去求学攒钱，等到你当医生的

时候，就该轮到我去上学了，那时，你来帮助我。”

“真的，玛妮雅。我的好妹妹。”布罗妮雅满含泪水，拥抱着玛妮雅。这时，她忽然想起了什么说：“玛妮雅，你这么小小年纪，到哪里去攒这笔钱。”

“当家庭教师，我可以找一个年薪不低于 400 卢布并且免费提供食宿的主顾，这样我就不必花什么钱，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妹妹的举动无疑使布罗妮雅感动万分，她和妹妹一样轻视那些对于社会地位的看法，她也是一个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社会的责任把两姐妹的心紧紧拴在了一起。在波兰，家庭教师的地位十分低下，是被人歧视的职业。妹妹为了使她能立刻实现上大学的愿望。而决定选择这种低下的职业，忍受这种丝毫不能引人入胜的职务，接受残酷而漫长的等待。作为姐姐，她怎能忍心呢？怎么能让妹妹去作牺牲呢？

一时间，布罗妮雅感动和悔恨交织。她动情地说：“不，玛妮雅你应该先走，你天赋好，愿望强烈，你的成功率比我高，比我快。你先走，我支持你。等你完成学业，我来巴黎找你。我是姐姐，有责任有义务照顾和帮助妹妹。”

“布罗妮雅，你别冲动，你已经 20 岁了，你已经耽搁了几年，而我还只有 17 岁，有的是时间。父亲也同意应该大的先走，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别犹豫了，从现在我们都开始全力作准备。等你有了工作，你来帮助我完成学业”。玛妮雅以她的诚心和执拗，终于说服了姐姐。布罗妮雅为这种伟大的奉献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她激动地搂住妹妹，抚摸着她的头发，她的肩膀，哽咽地说：“玛妮雅……我的小玛妮希雅！”

泪水，更加凝固了姐妹俩的情姐妹俩的爱。在一个硕果累累的秋天，布罗妮雅满怀内疚和感激，充满希望和信心，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华沙，登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

2 初试锋芒

1885年9月的一天早晨，玛妮雅起了个早床，在镜子前晃来照去，总认为不具备一个女教师的形象。她从挂衣橱里挑出一件最朴素大方的衣服，把一头蓬松的金色卷发尽力用发针扣紧，藏进褪了色的帽子底下，尽量使自己成熟、大方、平凡。

她尽力压制着腼腆和怯懦的心理，来到一个职业介绍所，看着那一个个求职者带着失望的表情快快离去，玛妮雅也显得不知所措起来。不久，她由一个瘦女人引着，走过宽大的前厅，来到隔壁一个小房间。

她小心翼翼地站着，手里机械地握着一小札文件。

“你有什么事，小姐？”书桌后面传来一个胖女人粗重的声音。

“我想找一个女家庭教师的职业。”

“有证明文件么？”

“有……我有中学文凭，还得过一枚金质奖章；我教过书，这是我的学生家长写的证明书。”介绍情况后，她似乎显得很轻松，然后把文件递上去。介绍所主任用一种职业眼光审视着她递上来的证件材料。然后抬起头来，认真仔细地打量着她。

“你精通几国文字？”

“德、俄、法、波兰文字都精通，英文略差一点。但已达到官定课程考试的标准。”

“你当家庭教师需要什么待遇？”

“年薪400卢布，以及提供我的膳宿。”

“你多大岁数？”

“17岁”。玛妮雅的脸红到了脖子根，然后又微笑着加了一句：“不久就18岁了，我的父母亲都是中学教师。”

介绍所主任用纯正的“英文”写下了玛妮雅的简历，并把证明材料交还给玛妮雅。

“谢谢你，孩子，一有机会我马上写信给你。”介绍所主任陡然转了语调，用十分和蔼亲切的语调对玛妮雅说。

很快，玛妮雅就接到通知，要她到一个富裕的律师家作家庭教师。这时玛妮雅天真地想着，律师是个多好的职业，律师一定是很善良，很有教养，有丰富的知识，这样家庭的孩子一定聪明可爱。然而，当玛妮雅到了这个家之后，看到的这一户人家与玛妮雅理想中的人家相去甚远。玛妮雅是在非凡的家庭中长大的。生于书香门第，父母都是博学多才，有修养的知识分子，身边还有三个拿到中学文凭和金质奖章的青年。他们均聪明，有志气，有理想，并热心工作，一家人和睦亲密，礼貌大度。她青年时期的伴侣也是具有高尚品质和敏捷智力的人。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玛妮雅，当遇到蠢笨、小器或粗俗的人和事的时候，难免不由自主地产生反感。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虚伪、贪婪、卑鄙的人还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

这家主人倚仗其社会地位和财富，根本看不起一个低下的家庭教师，他们对玛妮雅十分冷漠，甚至不与她说话，在他家那一排排宽大明亮的房间中，却不给玛妮雅一席之地，竟把她安排与仆人住一起的最底层，像储藏室式的阴暗潮湿的小屋。而这个律师的孩子也是个野蛮不讲

道德的愚蠢家伙。娇生惯养，极端任性，他从来就不会尊敬别人。根本无心学习，有时给他讲课或辅导功课时，他会突然跳起来撕碎课本朝玛妮雅砸去。

更令玛妮雅极端讨厌的是，这户人家的极端虚伪以及言而无信。他们似乎有钱，请了五个仆人以显示自己的高贵。装作自由主义的样子。当有显赫的贵客来时，律师夫妇极端献媚，殷勤致敬，谈吐高雅，大摆筵席，挥金如土，等客人走了之后，马上变成另一副面孔，把客人骂得一塌糊涂，言语十分粗俗，刻薄。他表面上显示出十分奢侈富有，十分大度开朗，而实际上非常吝啬。有时夜深了玛妮雅还在灯前看书，律师夫人就会大发雷霆，迫使玛妮雅吹熄灯火。有时天气阴暗，房间光线不好，玛妮雅看不清课本，只得点上煤油灯。这时律师的夫人就会闯进来吹熄煤油灯，并恶言恶语地刻薄她。

“老了，眼花了，那就用不着出来找事做，在家享清福吧！”

“你！你太尖刻了。”

“怕尖刻，就把眼睛睁大一点。”气得玛妮雅全身颤抖，泪水一个劲地滚出眼眶。她与律师夫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淡。

这家人还十分虚伪无信到不给玛妮雅发那微薄的月薪。有时玛妮雅忍无可忍提出来时，他们总会吝啬地说：“急什么，下个月给你嘛！”可是到了下个月又耍无赖。就这样，玛妮雅在这里干了6个月，竟未领到一卢布的报酬。但是为了显示自己富有的身份，又拿钱往窗口外扔，让仆人和穷苦人去争去抢，他们从中取乐。

玛妮雅在以前的生活中遇到过一些平庸愚蠢的人，可是她没有看见如此卑鄙和完全自私的人。她深为自己所生长的虽清贫却高尚知书达礼的家庭而自豪。父亲知识渊博，懂八国文字，哥哥约瑟夫是医科大学即将毕业的高材生。姐姐布罗妮雅正在巴黎攻读医科，姐姐海拉多才多艺，是未来的明星歌唱家，他们看重的是知识，是真才实学，都有一颗爱国之心，而律师这个粗俗卑鄙的家庭，使她感到十分厌恶。

玛妮雅在1885年12月10日写给表姐亨利埃特·米哈洛夫斯卡的信中说：

“我现在过的是犯人的生活。你知道吗？我找着一个位置，在律师B先生家里当教师，就是我最恨的仇人我都不愿意叫他住在这样的地狱里！……我甚至不能忍受下去……”

我在这里学会了把人类认识得更深一点。我知道小说里描写的人们都非常虚构，我也知道一个聪明的人不应该与粗鄙和财迷心窍的人交往……”

玛妮雅通过第一次作家庭教师懂得的不只是关于人类和关于“被财富毁了的人”的富有哲理的教训。她要对以前与布罗妮雅所作的计划大加修改。

她原指望在华沙作家庭教师可以赚到数目可观的款子，而且可以回家照顾父亲。还可以参与“流动大学”的活动。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她赚的钱并不多，城里的生活品又贵，加上与朋友们交往开支却不少。照这样下去，还怎么资助住在巴黎拉丁区求学，过着贫苦日子的布罗妮雅？父亲即将退休，靠领着养老金生活，难有节余的钱资助布罗妮雅。自己还想筹集资金继续求学，这如此等等，怎么办呢？

这些对于一个涉世不久的青年女子来说，无疑是一副重担，一种沉重的压力。

但是，这些困难在一个坚强而有主见的女子面前，却变成了动力。她找人打听，有人告诉她有一个乡下教师的位置，那里报酬优厚，而且地方偏僻，没有什么需要用钱。

她自我解嘲地说：“我应该早就去那里，我喜欢农村的新鲜空气。”

3 乡村女教师

18岁的女孩，花一样的季节，梦一般的年华。或许无忧无虑在大学念书；也许有一份称心如意的轻松职业；也许在父母的羽翼保护下过被人服侍的舒适生活。而玛妮雅却没有这个福分。她勇敢地告辞了父亲，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过着举目无亲的孤独生活。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她对布罗妮雅许下的诺言，实现自己将来上大学的梦。于1886年1月1日，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波兰大地，大雪纷飞，银装素裹，玛妮雅在这个残酷的日子中起程。她登上一辆笨重的把她带到异乡去的车子。在这个令人难忘的冬夜，她坐了3个小时火车，蜷缩在车厢里，心绪乱如一团麻，这一去不知多久才回来，衰老的父亲由谁来照料，我一走，父亲一定很伤心……火车终于到站了。又接着坐颠簸得叫人心惊肉跳的雪橇。玛妮雅又冷又饿，她把毛毯裹得紧紧的，帽子遮得严严实实。迎接着刺骨寒风的吹打，在这夜深人静之时，只听得清脆的马铃声在空中回响。经过4个小时的急速滑行。终于在两层建筑物前停了下来。在冰冷的夜晚里，主人打开了门。迎接她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先生，和一位半显老态、有着一张毫无光泽脸的夫人，几个孩子瞪着好奇的眼光盯着她。

他们用热茶和温和的语言接待着她。给她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

稍后，这家主人带她穿过一个小客厅，虽不甚华贵且仍很新的家具用凸纹布置着，地板上铺着耀眼的大红花地毯。一张大沙发的上方，挂着不甚名贵的雕刻版画。靠窗的地方摆放着一盆鲜艳的花。对面靠窗边有一个较大的壁镜。第二个房间里有壁炉，暖烘烘的。这是她两个小女儿的住房。走过这间住房有一个旋形梯级，顺着这个梯级上到二楼，便是他们的大女儿，大儿子的住房。玛妮雅的住房就在他们的隔壁。她们互道了晚安，B夫人便退了出去。虽然房间里壁炉的暖气还很大。但一种陌生孤独的感觉袭上了玛妮雅的心头，使她的心顿觉冰凉。

这个地方坐落在华沙北边100公里，叫斯茨初基。B先生和夫人是田产管理人。耕种沙尔脱利斯基亲王的一部分田地，管理200公顷甜菜的种植，B先生是个著名的农艺师，精通新技术。在这栋房子的周围几公里之内，没有一个丛林，没有一块草地，只有甜菜布满广袤的田野。

前面田野的尽头耸立起一座红砖建筑物。那是一家制糖厂，散居在周围的茅屋小村子里的是替工厂播种、耕耘、收获的农民。一条本来清澈见底的小河流经制糖厂之后，便变成了秽水，浮着混浊而有毒的泡沫，急速地向东流去。

B先生拥有制糖厂的大部分股份，是当地农民中的富裕人家。他的住宅是一所老式别墅。两层楼，看上去是低矮的板屋，然而，住房宽大，安静而且舒适。屋顶斜板撑在暗色灰泥墙上面，藤架上覆盖着五叶地锦，阳台全都镶着玻璃，只是密封度不高，风可以毫无顾忌地挤进来。

后院有一个美丽的花园，每到夏季，那像铺着绿色地毯的草场，嫩茵茵的，软绵绵的，为人们提供一个乘凉休息的去处。左边是一个球场，常玩的球类用具一应俱全。周围有剪得齐整的榛树荫蔽着它。房子前面有一个果园种有苹果、葡萄等，长得也不错。再远一点是红砖盖的四个小屋，里边有40匹马、60头牛。一色的红屋顶，点缀着这一望无际的绿

色庄稼。还有一个极大的玻璃温室，温室里种有黄瓜、香瓜和西瓜。

B 先生儿女不少，有三个儿子在华沙（一个上大学，两个上寄宿学校）。家里还有布朗卡（18岁），安雯亚（10岁），斯塔斯（3岁），另有一个6个月的小女孩玛丽史娜。布朗卡与玛妮雅一般大，这个女孩较聪明，是他们家里，也是当地人中的明珠，她很漂亮，并善解人意，与玛妮雅交情较好。

B 夫人虽然缺乏修养，脾气不好，但她善良慈祥，待人豁达大方，对玛妮雅也不甚苛求，因为她自己过去也做过女教师。

玛妮雅原先认为离开朋友和父亲，离开家庭，来到一个偏僻的乡村，可以领略到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可以享受到从草场和森林中飘出来的清新空气。可是当她推开十字窗户，跃入眼帘的却是高耸逼人的工厂烟囱，吐着浓浓的黑烟，遮暗着天空，染污着空气，方圆几公里，没有一个丛林，她想像中的覆盖着积雪的原野和挂满雪花、冰柱的树林一无所有。她摇了摇头说：“真是滑稽得可笑。”每当春天，冰雪融化后，农民们开始翻地，播种，然后除草，施肥，捉虫；到了秋天，他们便赶着牛车，把装满沾着泥巴的甜菜送到制糖厂；每到夏天，这里才有如画的风光，庭院内绿草如茵，灌木繁茂，一排排修剪得整齐的青杨树荫，遮盖着球场，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果园里满园花香。樱桃、醋栗、苹果应有尽有；冬天便是冰灯冰花冰柱，白的世界，给人一种清新的感受。如果没有那讨厌的烟囱喷出来的黑雾。这远离城市的乡村还是别有一番景致、一番情趣。玛妮雅每天工作7小时：4小时和安雯亚一起，3小时和布朗卡一起。这些孩子虽然有些懒散，不爱学习，但还算懂事听话，没给玛妮雅带来很多苦恼。工作是多了一点，但毫无关系，她本身也觉得孤单和寂寞。为了减少她想家的时间和孤单的情绪，她为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埋头工作。玛妮雅还是喜欢这个欢乐和谐的家庭。工作结束后，她就回到二楼给亲人朋友们写信。她发现这里的人趣味低下，一天谈论的不是跳舞，就是穿什么衣服。或者是一些下流的风流艳事。玛妮雅想帮助他们学一些文化，做一个有用的人。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办法。她只好把时间埋在自己的爱好里。

那个制糖厂虽然给环境带来了污染，但是厂里有一个给工程师和管理员预备的小住所，里面设了一个小图书馆，储备着不少的科学书籍。玛妮雅就经常到那里去看杂志和书籍，有空就与那些工程师聊一些科学常识。令人惊讶的是，玛妮雅的住房有一面墙，与一个极大的彩釉陶火炉比邻，使她的房间很暖和，心里也觉得温馨。每当夜深人静，人们已进入梦乡之时，正是玛妮雅读书的最佳时刻。她把借来的大批社会学、数学、物理、化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分门别类，排好课程安排表。孜孜不倦地钻研。特别是她喜爱的学科，常常看得如痴如迷。

一天晚上，她在看一本物理学书，越看越有味，一边看，一边在纸上划着公式。直到有人喊“玛妮雅小姐！玛妮雅小姐！”声音越喊越近，越喊越大，她才从思考中回过神来。“哦，原来已经天亮。对不起，夫人，我起早了点，赶着备课。”玛妮雅赶快掩饰。

“太辛苦你了，玛妮雅小姐：早安。”

“夫人！早安。”

为了将来进入索尔本大学，从现在起，她必须作好准备。在自学中，

她渐渐地爱上了物理和化学，这正是她今后要学习的科目。在自学中，当遇到特别困难的问题时，她就写很长很长的信请教父亲。而父亲总是耐心地作详细解答，每封信都是沉甸甸的。父女俩的通信越来越多，接触的问题越来越深邃。父亲很高兴，总是鼓励她帮助她转向自然科学。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人的注意力由盛行一时的浪漫主义思潮转向化学、生物等等自然科学领域。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虽无意追逐当时的流行色。但他自己梦寐以求的事情就是做科学家进实验室，可在俄国人的统治下，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很希望这个愿望、这个梦想能在小女儿身上实现。

玛妮雅不会辜负父亲的嘱托，她规定每天晚上自学物理化学2~4小时，并雷打不动。但是，为了换脑筋，她还涉猎一些文学诗歌。她贪婪地读着“没有害处的荒唐小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冈察洛夫的作品，波列斯拉夫·普鲁斯的《解放了的妇女们》。她对这本书极感兴趣，反复地阅读着，从中找到了与自己相似的影子，醉心于文化的波兰小姑娘形象。真实地反映出一个锐意求知而因客观条件不允许的青年女子的内心世界。她越看越激动，并认真地作了读书笔记和读后感。

还有用德文和波兰文写的寓言诗，海涅的诗，弗朗勃·科培的作品，还有一些哲学论文，总之不论是天文地理、哲学、文学统统涉猎，并用心地读、专注地记。对知识，玛妮雅的胃口大得很，也贪婪得很。

那段时间，她的确学了不少知识。过得也很充实。她在一次写给亨利埃特的信上说：

“……现在我要作的事情很多，有的日子我从8点到11点半，从2点到8点半，总是忙个不停，没有片刻喘息，吃完午饭，若是安霁亚听话，我就同她一起读书，不然，我就同她谈话，或是做我的针线。到晚上9点，若没有特殊情况，我就专心看我的书，并且作自己的工作……”

我养成了6点钟起床的习惯，以便多用点功，多挤点时间读书……我同时读几种书，专研究一种东西会使我的精神和头脑疲倦！若是在读书的时候觉得完全不能由书里吸收有用的东西，我就作代数和三角习题，若是稍微分心就作不出来的。这样，就会使我总是专心致志。”

她用拼命的学习和刻苦的求知来冲淡自己想家的心情，冲淡枯燥的环境，为自己将来深造奠定坚实的基础。她在40年后写道：“我对于文学，也和对于社会学和科学一样感兴趣。不过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我试着慢慢地找出我的真正兴趣所在，而我终于转向数学和物理学了……”她的枕头底下，工作台上到处是《代数教程》、《物理初级教程》等书籍。在光学一章里，她碰到了三角概念——正弦、余弦、正切。学微积分时，她对极限和导数的理解极为迅速和准确。好像事先就知道，她自己感到大为惊讶。

每天她生活在农民身边，看到那些衣衫褴褛的男孩和女孩，那一双双充满渴望的眼睛和那张张顽纯而坚强的脸，脑子里又勾起了计划。为什么不向这些单纯的孩子灌输进步的思想观点，启发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呢？她梦想过要“启发群众”。来这里后，就有过帮助这些孩子学文化的决心。而这里的孩子不识字，进过学校的人较少，这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若是秘密地设波兰文课，使这些幼稚的头脑里感觉到波兰民族语言的美和波兰惊天动地的历史，那该多好。

她把这个想法告诉布朗卡小姐，开始布朗卡小姐有点犹豫。她担心揭发而被放逐。提到西伯利亚，人们就不寒而栗。它意味着到那可怕的天寒地冻的旷野上去毁灭，永远不能生还。加之布朗卡的母亲也坚决反对。但在玛妮雅的说服下，一种强烈的民族感压倒了她的胆怯。她赞成和支持玛妮雅。孩子们的家长得知这个计划，更是奔走相告，高兴不已。

很快，这项计划在那些茅屋小村子里迅速地实行开来。教室就设在玛妮雅的住房里。幸好房子外面有一个楼梯通向她的房间，学生们来不必走正门，也就不影响农艺师家里的任何人。玛妮雅还从村长那里借来一张板桌和几条长凳子。就这样，农民“秘密学校”办起来了。两个青年女子每天给农民的孩子上两个小时课。学生们兴趣大，热情高。学生由5个增加到10个，后来增加到18个，成了一小班。这些孩子很愿意学习，而且也勤奋，学习进步很快。18个学生太多了，玛妮雅应付不了，只能分批轮流上课，并且手把手地教。除每天两小时外，星期三和星期六时间特别长，连续教学到5小时。玛妮雅便从自己那微小的积蓄里抽出钱来，给这些农民的孩子买练习本和笔。后来有七八个老实青年也坐进这间石灰墙的大屋子里，他们要学习，但接受能力却似乎低于孩子们。玛妮雅和布朗卡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帮助那些失败的学生，他们常常焦急得涨红着脸，直喘粗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拼不出一个难记的字来。

这些都是仆人、农民、糖厂工人的子女，卫生习惯不好，他们围在玛妮雅的身边，身上散发着一股不好闻的气味。他们中有一些是顽皮而愚笨的，能上学和写出这些别扭的字就是一种有意义的事了。看到这群愚昧无知、反应迟钝的孩子，她觉得自己的愿望遥远而无期，显得多么力不从心。

她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甜菜地，看着眼前这群邋遢的笨拙的村童，一股伤感油然而生。难道自己一辈子就与这些人和事打交道，难道一辈子就困死在这个偏远的乡村田野。这与放逐到西伯利亚又有什么区别。自然而然地想到索尔本、想到巴黎。那里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实验室，一流的教授，能够成为索尔本的成员，哪怕是学生也是一种幸福，一种光荣。她多么渴望能有那么一天的到来。

4 初恋苦果

每一年的主显节，这里也和波兰的其他农村一样，要举行盛大的舞会，女孩子们都要经过精心打扮，挑选最漂亮最鲜艳的衣裳，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去参加舞会。作为家庭教师除了教书辅导外，很多事情也是身不由己。常常她被叫去陪安西雅的教父下棋，聊天，女主人打牌人手不够时，也要拉上她去凑数，每次舞会，她会被生拉硬拖去参加。这一次，玛妮雅穿着一套墨绿色的紧身连衣裙，扎着柔软的腰带，一双墨绿色的皮靴，墨绿色的帽子上斜插着一枝鲜艳的玫瑰花儿。一头金色的卷发瀑布般泻于颈后，白细的皮肤，嫩滑的手腕，纤细的足踝，完美的脸上嵌着一张有自然曲线的嘴，长长的眉毛下是一双深深的灰色大眼睛，目光犀利而动人。当她滑进这热闹的舞场时，一种超凡脱俗的美紧紧抓住了舞池里的眼睛。邀她的舞伴排成长龙等着，无法空过一段舞曲。

她的主人——B先生的长子卡西密尔，是个相貌英俊、多才多艺，极有风度的青年。由华沙回到斯茨初基来度假，正赶上主显节，在舞会中他被这个美丽动人的家庭女教师迷住了。在此以前，从父母和妹妹的信中，已经多次听到过这个熟悉的名字，以及有关她的一些事情。

这次亲眼所见，大放异彩。心里叹道：多么高雅美丽的小姐。

这是一次漫长的暑假，卡西密尔与玛妮雅接触颇多，他们从初识，那腼腆的微笑；到认识，谈共同的爱好；到深夜，在一起谈文学、谈历史，从《再见苏松》到《耶稣传》；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波列斯拉夫·普鲁斯；从斯洛伐茨基的诗到密茨凯维支的诗；从诅咒保罗一世到亚历山大二世；时而俄文，时而德文、时而法语、时而英语、时而波兰语；从华尔兹舞到奥贝瑞克舞……无所不谈，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卡西密尔接触过不少家庭女教师，个个都是那样贫乏，那样短浅，毫无生气。而这个玛妮雅却一改他过去的印象。他仔细端详着这位与众不同的女教师，又粗又长的眉毛下面，深嵌着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光滑细嫩的皮肤像盛开的桃花；刚毅的嘴角挂着甜蜜的微笑；一头柔软的香发使之显得格外妩媚。他心里赞叹；难怪全家人都这样喜欢她，他怀着一种神秘感去接触这个不同凡响的女教师。

一天清晨，玛妮雅捧着一本波兰著名诗人、戏剧作家阿斯尼克的诗集，来到花园里，一边呼吸新鲜的空气，一边如醉如痴地朗读诗句。

找“真理”所发出来的清晰的光，
找那不知道的新路……
即使人们的眼光现在更敏锐
他们仍能看到神圣的奇迹……
每个时期都有它自己的梦想，
那你就抛弃昨天的空想吧！

此时，一个男青年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波兰语音，接着用英语往下念。

拿起知识的火炬，
在几世纪的工作中去作出一种新成绩

并且建筑一座未来的宫殿……

“卡西密尔！”

“我的小姐，你这样大声用波兰语朗诵诗句，不怕当局……”

“怕”！她顿了顿，忽然想到了什么；她摇摇头说：“波兰人，却没有权利说波兰语，真是波兰人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玛妮雅，别唉声叹气，历史是靠人们去写的，我们这一代血气方刚的学生，就该为复兴波兰，振兴民族作出努力！”

看他那一股激进样儿，玛妮雅笑了笑说：“又一个理想的实证主义者。”

“两个实证的理想主义者。”卡西密尔把手搭上玛妮雅的肩头。一对热血青年绕着花园尽情地笑，是那样开心畅快！

卡西密尔帮助玛妮雅分别给孩子们上课，为的是抽出下午的时间一同出去骑马和驾车，划船、滑冰。这宽阔的田野，茂盛的草场给他们提供了天然倾谈场地。

整整一个假期，他们形影不离。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题、人生、小说，中学里发生过的故事，大学里奇特的生活无不涉猎。卡西密尔的出现，改变了玛妮雅的一成不变的单调生活，也打乱了她假期中的学习计划。卡西密尔喜欢划船，玛妮雅为之荡桨；卡西密尔喜欢野炊，玛妮雅酷爱大自然；卡西密尔喜欢骑马，玛妮雅也骑术高超。几乎是整天整天，两个人一同在野外游玩。愉快的暑假生活很快过去了，卡西密尔竟热烈地爱上了这个聪明娴雅、漂亮能干的小姐。他发现这个年近19岁的女教师不仅能歌善舞，而且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超凡脱俗的谈吐，扎实的物理学和化学功底。她好像没有丝毫缺点，全身都是光彩……。从中学到大学这个英俊的大学生所接触和认识的众多门第高贵，美丽富有的青年女子中，没有一个女子能与眼前的女教师媲美，玛妮雅在他的脑子里显得特别的出奇特别的优秀。玛妮雅也感到卡西密尔青春焕发，思想进步，学业辉煌，可以寄托终身。她爱上了他，同样很热烈。

他们认为父母一定会支持，一定会同意，因为B先生和夫人以及家里所有的人对玛妮雅都很亲切，并特别恭敬。B夫人对玛妮雅十分关心和爱护，常常嘘寒问暖，给她做可口的食物，带她参加每一次聚会。比对她自己的孩子还温暖亲切。玛妮雅生日之时，全家人都会分别给她送鲜花和礼物。他们还经常把玛妮雅的父亲、哥哥和姐姐们邀请到家里作客，像招待贵宾一样。卡西密尔与玛妮雅的亲切交往也在父母的默许之中。两个青年准备报告父母，计划结婚事宜。他们商量好后，由卡西密尔正式向父母提出。

一天，卡西密尔怀着高兴的心情，十分自信地对父母说：

“我要与玛妮雅小姐结婚。”

“什么？”一向温和亲切的父母双双瞪大了惊恐的眼睛。父亲喷火的眼光里挤出一句刻薄的话语：“你这个混小子。”

母亲当场昏眩过去。醒来后嘴里喃喃地数落着：“卡西密尔……我最疼爱的孩子……怎么选中一个一文莫名的女子……一个不得不‘在别人家里’做事的女子……你应该娶到当地门第最好而且最有钱的女子……我的卡西密尔，你是疯了么！”母亲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宛如碰

上了最不幸的事情。

父亲拿出一副一家之主的架势，大为恼火地嚷着：“我们绝不会同意你娶一个卑微的家庭女教师。你瞧，这姑娘身无分文，我们的孩子，一个英俊的大学生要是娶一个和女仆一样的姑娘，你知道旁人会怎么笑话？简直有失体统！”

此时此刻，在这个一向自诩为把玛妮雅当作亲人和朋友的家里，终于现出了本来的面目——世俗的小农意识，卑俗的贫富界线在他们之间划开了一道鸿沟。

尽管这个女孩出生在华沙城内，父母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都是受人尊敬的中学教师，都做过校长，这个女孩又有修养、聪明，名誉极好。这种种事实，却都胜不过，无法打倒八个小小的字：不能娶家庭女教师。

这场风波首先是对卡西密尔的考验，卡西密尔虽真心爱着玛妮雅，但抵不住父母的阻挠、责备和训斥，没有敢作敢为的个性。不愿意惹父母生气，不愿违抗父母的意愿，于是与玛妮雅保持很僵的冷淡和一种过分的沉默。

玛妮雅内心受到极大的刺激。她看穿了，生活在偏见这堵高墙里的，决不会有高贵的动物。贫穷把一切虚情假意都一扫而光了。卡西密尔一家只是把她当作婢女一般，因为她家境贫寒而瞧不起她。

那时，欧洲的习俗是：姑娘结婚时，要花一大笔钱，备有像样的嫁妆带到男家。似乎嫁妆越多，姑娘越有身价，婚姻就越美满。要是与玛妮雅结婚的话，她仅有的嫁妆是她的聪明才智以及文雅娴静的性格，美丽漂亮的外表。而这些，远远不能满足卡西密尔一家的要求。

现实是残酷的。命运是如此不公道。玛妮雅毕竟还很年轻，不懂得社会如此复杂，不懂得怎样去选择终生伴侣，没有学会从本质上去认识人。

这次挫折和冷遇，加上上大学的愿望遥遥无期，使玛妮雅十分痛苦，伤心至极。

她在 1886 年写给亨利埃特的信上说：

“...你要问我的前途计划，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已没有了计划，或者不如说，我的计划太普通，也太简单、不值得说。或者说我过去的计划是空想是梦境，是没有希望达得到的。我只能得过且过，到了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就向尘世告别：这损失想必很小，而人们惋惜我的时间也一定很短，和惋惜许多别的人一样短。”

从这封信里流露出来的，对前途的悲观，对爱情的失望，是何等的深沉。幽暗的煤油灯下，晃动着她孤独而瘦削的身影；摊在台前的书本被成串的泪水滴湿了一卷又一卷。这个天才的小女孩，这个被贫穷打碎了美梦的小女孩，她的出路在哪.....

这个 19 岁的女孩真的就如此活活地葬送了一生的前途吗？不！不！她的心里是矛盾复杂的。她想到在巴黎的布罗妮雅需要资助；在华沙年迈的父亲需要照顾；她怎能如此惨痛萎靡，她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他们，也为自己。这次痛苦的磨练，使玛妮雅成熟了许多，她决心尽快忘掉这一切。寻找生命的辉煌之点。

玛妮雅伤心之下，曾经决意离开卡西密尔这个浅薄的家。但她又仔

细掂量：在华沙无处挣到这么多的工资，而且布罗妮雅正眼巴巴地等着她寄钱付学费呢？她计算着每个月要给布罗妮雅寄 15~20 卢布，在华沙这是一个月的工钱，而自己还得积攒钱准备深造呢！为了这，玛妮雅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和屈辱，把这颗失恋的苦果强吞下去。她没有与这一家人直接解释什么，好像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玛妮雅依然是活力充沛，精神旺盛。她继续自己的工作，辅导安霁亚，用心鼓励那个用一点脑力就会精神疲倦的朱列克；继续给村童们讲课；带着几个小孩子作游戏。照常自学物理化学；她跳舞，下棋，作游戏，散步……总之，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和淡然，还是以前那个玛妮雅。

但是，玛妮雅的心里总是牵挂着那年老体弱的父亲，为了布罗妮雅的学习，父亲仍然要硬撑着讲课，得到一些卢布，把自己起码的生活乐趣都丢掉了。她时时关注和关心着自己的哥哥、姐姐，几年来，她与亲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用书信传达她的爱意和思念，她希望自己的亲人都能过上很好的生活，都比自己愉快和潇洒。她频繁地给家里人写信，信写得更详细，更关心，更热情。她亲切地劝父亲不要为没有钱帮助女儿而愁苦。她安慰父亲，因为有很好的家庭教育而使她的哥哥姐姐们均学有所成。她规劝父亲坚强地生活、愉快地生活。至于她自己：“……将永远感激父亲为我作的一切。惟一使我难过的事，乃是我们不能报答父亲，不能尽到人力可能的范围去爱父亲，尊敬父亲。”她常常如此去爱别人，自己的痛苦压抑在心中，让自己承受，她不愿增加别人的烦恼。

初恋的结果令她痛苦不堪，经济状况愈益困难，她忍辱负重挣来的钱一部分寄给布罗妮雅，一部分帮助约瑟夫，还要考虑给父亲买点什么？留给自己所剩无几了？她想进巴黎深造的愿望十分渺茫，甚至几乎破灭。她觉得，自己上不了大学就算了，但一定要资助约瑟夫，布罗妮雅，让他们成功，于是她把所有的希望都转向家里的亲人，她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安慰和帮助她们，使她们能有所作为，能实现父亲梦寐以求的愿望。

从那以后，她的确在行动上是这样做的。她听说约瑟夫因为经济上的困难，毕业后而不能留在华沙做研究工作，发展自己的事业，竟要到一个穷乡僻壤去开诊所，她非常伤心，极力埋怨自己因没有能力帮助约瑟夫而懊恼。1887年3月9日，她在写给约瑟夫的信上说：

“……亲爱的哥哥。因为你的聪明才智，人人都说在小地方工作会妨碍你做研究工作。那样你就会把自己埋在穷乡僻壤，作不出什么轰动的事业来，即使你有最大的决心，而客观条件不允许，没有药房，没有医院，没有书籍，终究不能施展你的才华。若是你到了这种地步我会很痛苦；因为没有能力帮助你，我现在已经不再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出色人物，我的全部宏愿都寄托在布罗妮雅和你身上。我们有极聪明的父母，我们家天赋，必须使这种天赋由我们中的一个表现出来，不应该让它消失。我对于自己惋惜越深，对于你们希望就越大……”

玛妮雅表面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活泼开朗。而藏在内心深处里的仍有一种抹不开的忧伤。这位坚强的女性常常是在人前表现欢乐，而人后又伤心哭泣。1887年5月她接到约瑟夫的信，知道海拉与一个她深爱的青年解除婚约，一种同命相怜之心掀起她无名的怒火。很长一段时间她气愤得夜不能寐。她在给约瑟夫的回信中写道：

“我可以想像到海拉的自尊心受到多深的伤害……真的，这种浅薄的男子有什么值得留恋和爱慕！假如他们不愿意与贫寒的青年女子结婚，假如他们只看重金钱和物质，那就让他们滚开吧！穷苦人家的女孩有的是志气和生存能力。不会向他们索取什么。这些浅薄的男人不要给人以凌辱，添烦恼。”

海拉是个活泼而感情脆弱的女子，这次失恋，使她的精神和灵魂必定受到极大的伤害。她可怜姐姐，同时也要安慰自己。在远离家乡的乡村，没有谁能安慰照顾她，何况家里的亲人个个都很艰难。她只能自我解脱，要倍受心灵摧残地教课，以换回那些卢布去支持亲人的学业和生活，否则，她早就辞去了这份烦闷的工作。命运就是如此不公平。

这一时期，是玛妮雅一生中非常悲苦、困难、忧郁的时期。她的远大理想早已被无情的岁月冲淡，空余时间，她只有在写信中过日子，直到把最后一张邮票寄给约瑟夫。

5 脱逃

在客观条件恶劣的情况下，玛妮雅命运的神秘游戏发生了改变。她变得更加沉稳。她要坚强地生活下去，她要挺起身来帮助自己的亲人。她一再压抑自己痛苦的心境，继续在卡西密尔家工作。直到 1889 年，这家的小女儿安德西雅学习上不需要她时，她才离开。接着又被华沙大实业家之一的 P 家聘请。这总算是对她心灵上的一点安慰，在这个处境中，她惟一的愿望是到离华沙较近的地方找一份固定的工作。这一愿望得以实现。她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振。她亲切告别那些粗俗纯洁的农民，告别了卡西密尔一家，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微笑告辞，慢慢地走出了斯茨初基那些甜菜地。回过身来，对着送别她的主人家、农民和那 20 余个村童，对那个高大的、冒着滚滚浓烟的制糖厂烟囱，轻轻地挥着手，默默地说：“再见！朋友！”此时，她的心头掠过一些惆怅，第一次远离家乡，来到这偏远的乡村、惟一留在她记忆中的是：失败的初恋。

离开农艺师家，她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一路上她愉快地呼吸着新鲜空气，饱览着田园风光。高兴地回到华沙。回到父亲身边时，父亲已退休开始领养老金，为了多挣点卢布，他接受了一个既讨厌又麻烦的工作：管理离华沙不远的斯图德西尼茨地方的一个儿童感化院。那里的空气不好，周围有太多冒烟的工厂，环境污染，给人的感觉极不好。工作既琐碎又繁杂，没有人愿意去干。但工资比较高，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就冲这一点而来。他每个月要给布罗妮雅寄 40 卢布，还想一点一滴地为玛妮雅积攒点学费。不得已才找上这个倒霉的工作。

年迈的父亲为了孩子们的需要还要拖着疲倦的身体去找工作。玛妮雅很伤心，但是她又无能为力，只能一刻也不停留，马上接受了 P 先生的聘请。第二天她又登上了列车，到索坡特，波罗的海滨的一个宁静优美的城市。一路上，她风尘仆仆，历经五次换车，但是每次都遇到好心的旅伴，得到很好的照顾。有人主动帮助提包，有人热情指点车次，所以一路上都非常愉快顺利。

到索坡特车站，P 先生和夫人已在车站等她，他们热情亲切地接待了她，并和蔼地进行了交谈。

P 家很有钱，房子气派而美观，装修可属当时波兰第一流。由于家境富有，夫人拥有许多皮货珠宝，名牌流行服装，流行提袋等，应有尽有。这是玛妮雅一生不能拥有的东西，也是玛妮雅一生中最不看重的东西。

P 夫人对玛妮雅的智慧才能、美丽优雅特别着迷。她总是缠着玛妮雅陪她参加所有的茶会和舞会，富贵人家的太太几乎天天有各式各样的聚会，P 夫人总是热情高涨，精神焕发。而玛妮雅极不耐烦，并且十分讨厌。在那灯红酒绿的公开场合。P 夫人显得殷勤而拙劣，热烈又俗气。玛妮雅十分难受，但又无法拒绝。因此，情绪越来越低沉。当 P 夫人浓妆艳抹在人前夸她如何聪明漂亮之时，玛妮雅真是哭笑不得，几乎要钻到地底下去。

有一天早晨，温暖的阳光早早地挂上了天空，她的心情也显得舒畅一些。她起床，正在花园里散步、看书。这时，有人送来一封由巴黎寄来的信。这是布罗妮雅在解剖室里上两次课之间用四方纸草草写的。告诉她不久将和一个年轻的大夫卡西密尔·德卢斯基结婚。信里提议玛妮

雅明年就可以到巴黎读书住到她的新家庭里。信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的小玛妮雅，这几年，真是辛苦你了。若是你今年能筹划几百卢布，明年你就可以到巴黎来，住在我们家里，我们会为你准备住处和食物……”

“你必须决定，你已经等得太久了，我可怜的玛妮雅，以你的聪明学识，我敢担保你两年内就可以成为学士……”

这一消息无疑给玛妮雅注入一剂兴奋剂，她拿着这封信反复地读，反复地念，泪水模糊了她那双明亮的灰色眼睛，她等啊，盼啊，就希望能有这一天，她可以离开华沙，到巴黎求学，到第一流的大学去读书。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若是在几年前，她会即刻打点行装，奔向心目中的自由世界。可是，此刻的玛妮雅心情矛盾极了，如果自己走了。谁来帮助约瑟夫和海拉，谁来照顾父亲？自己怎么能撒手走呢？多年的客居他乡的辛酸与孤独，多年的挫折和困难，使这个青年女子养成了顾虑重重的毛病，她的自我牺牲精神差一点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差一点要埋没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她给布罗妮雅回复了一封很长的信，解释了她不能离开亲人，不能离开华沙去巴黎的种种理由。

玛妮雅的信使布罗妮雅十分惊讶，到巴黎求学是妹妹的最大心愿，为什么过了几年，她却变得如此犹豫，如此没有信心和理想了呢？布罗妮雅害怕这个极有天才的妹妹被埋没，她非常担心，在信里据理力争，并动员父亲、约瑟夫、海拉一起劝说玛妮雅。但是布罗妮雅的劝说苍白无力，因为她自己太穷，没有力量为妹妹付旅费和学费。斯科罗多夫斯基，几乎是流着泪水反复劝说，希望玛妮雅不要浪费时光，应树立抱负做一个有用的人才。约瑟夫、海拉也极力支持，动员玛妮雅去巴黎深造。为了不使父亲伤心，玛妮雅答应了亲人的要求，她要加倍工作来增加积蓄，有了一定的积蓄，才考虑求学的问题。

在 P 先生家完成家庭教师聘约之后。玛妮雅又回到父亲的身边，回到这个亲切的自由自在的环境里，她又可以听到父亲有兴趣的谈话。这是她很早之前的打算，在离开华沙之前，她一定要设法陪伴父亲一段时间。她已经不是十几岁的小女孩了，过几个星期她就 24 岁了。所以她要挑起家庭的重担，还要为自己的前途打好基础，在陪伴照顾父亲的同时，她一边教课增加收入，一边上流动大学，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在此之间，她还硬着头皮去向富有的朋友请求借款，帮助约瑟夫在华沙开了一个诊所。在华沙，借钱是极不体面的事，但为了约瑟夫，她也顾不了这些了。

这段时间，玛妮雅虽然没有去上巴黎大学，但她踏进流动大学这所神秘的大门时，一件愉快的事情使她激动不已。玛妮雅享受到了她生平以来第一次进实验室的快乐。

玛妮雅有个表兄——约瑟夫·柏古斯基，毕业于物理化学专业，也是一个地道的实证理想主义者，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梦。在他的倡议和领导下，办起了一个秘密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坐落于克拉科夫大道 66 号，这是一座绿荫掩映，整洁幽静的庭院。一座两层的小建筑，院子的尽头种着散发着清香的丁香花。因为房子窗户太少，室内阴暗，楼前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工农业博物馆”。这是个虚夸而且含糊的名称，是专为哄骗俄国当局的一个外表，因为“博物馆”是不在查禁之列的，也不会引

起人的怀疑。博物馆表面上陈列着一些历史的矿石，古代的犁头、斧头。这只是掩饰沙皇的道具，而实际上，每当夜间和周末，年轻的波兰知识分子就会陆续聚集到这里进行科学实验，传播民族文化。

在这里，玛妮雅把在当家庭教师时自学的许多知识尽量在这里用实验来验证。她爱上了这个实验室，爱上了实验室的蒸馏瓶、试管、静电器、测压表、天平等仪器。这是她一生百看不厌的宝贝。可是白天由于有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也因为要避开当局的眼光，她只能吃过晚饭后或星期日才能到实验室里去，在实验室里，她埋头工作，聚精会神，常常一做就是几个小时，直到实验室只留下她孤独的身影。

由于初学实验，又没人指导，她只能小心翼翼地根据书中描写的情形去作实验，有时得出的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常常是反复地做，毫无厌倦之意。由于缺乏经验，常常发生一些意外事故，或因此使试验失败。但她从不气馁，哪怕在实验中有一点点成功，她也会感到莫大的鼓舞和无比的欢快。

夜已很深很深了，人们已进入甜蜜的梦乡，周围漆黑漆黑的，只有秋虫的唧唧声。玛妮雅那有神的眼睛中仍然放出明亮的光芒。她静静地伫立在静电器、试管和精密天平旁，聚精会神地做她的试验，直到把一个实验做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回到家里，悄无声息地脱去衣服，在她的窄床上躺下。有时，她注意力因为全投进了实验中，往往辗转反侧，不能入眠。这种感觉是她有生以来不曾有过的，她总是感到迫不及待，感到一种神秘的东西在驱使她。她的脑子里常常浮现出一副情景，在她还未懂事的时候，住弗瑞达路父亲那间大工作室里，大大小小玻璃匣里，装着的各种试管，父亲说是物理仪器，她总是想拿来玩的东西，而现在成了她的生命线。这些试管终于拿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她的感觉得到了升华，她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使她感到更满足的了。她与这些瓶瓶罐罐似乎有着不解之缘。从自己的感觉中，玛妮雅已经认定自己要做一个科学家。

只有去巴黎求学，才能实现自己进实验室的愿望，她中学毕业已经8年，做了6年的家庭教师，人生的甜酸苦辣均已尝遍，用她自己的话说，经受了影响一生的残酷折磨。心里像滚油煎熬，她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不能就这样埋葬自己。巴黎，巴黎，那学子荟萃之地，她多么向往啊！24岁的玛妮雅真想立刻改变自己的环境。她终于坚定了去巴黎上大学的信心，终于向布罗妮雅发出求助信。

“……布罗妮雅，我已经想通了，我必须去巴黎求学，我现在请你给我一个确定的答复。我是否真能住在你家里，因为我已经能够支付自己的一切费用，如果供给我伙食不至于使你负担过重，就请你写信告诉我。”

布罗妮雅收到妹妹的信十分欣慰，倔强的妹妹终于有了明确的答复。她即刻详细作了回信。回信是令人满意的，玛妮雅下一步就是按照有经验的布罗妮雅的指点准备行装。首先她要把已有的卢布，加上父亲给的一笔很小的款项，全部拿出来摆在桌上，把它分成若干笔必不可少的开支。

除去办护照和交学费，然后就是车票和置办服装用品。在车票上她可以尽力节省一些，华沙到巴黎有四个等级的车，她选最便宜的，差不

多同货车一样的四等车。然后，把自己的日常用品全部带齐，免得到巴黎去再有额外的花销。巴黎的服装用品很昂贵，于是玛妮雅把被褥、床单、手巾等打成包裹。请好家庭裁缝，用结实的布料做好三套衣服，准备几年不买衣服鞋帽。一只朴素、坚固的棕色大木箱里塞得满满的。她在木箱上面自豪地写上自己的名字“M·S”，这是玛妮雅·斯科罗多夫斯基全名的缩写。箱子、包裹都交由慢车托运。最后，自己还有几个大包要带走的，洗漱用品包括在车上的三天食物和水果。

动身出发的那一天，她穿上那一件宽大而褪了色的大衣，白皙的脸蛋上布满了红晕，灰色的大眼睛闪着热烈的光辉，浑身透出一股躁动的青春活力。多少年来她一直沉浸在忧郁烦闷的日子中，直至今天，她才这么开心，这么爽朗和高兴。

老斯科罗多夫斯基迈着蹒跚的步伐，伸开着颤抖的臂膀，紧紧地搂着就要飞走的可爱的小女儿，玛妮雅也紧紧地拥在父亲的怀里。

“爸，我不会离开很久的，学业结束，就回来陪你，那时，我们永远不再分离……”

“是的，我的小玛妮希雅，我等你回来，祝你好运，祝你学业有成！”

1891年秋天，在金秋的阳光下，玛妮雅依依不舍地上了列车，老远还在挥着手，大声地喊“爸，你多保重。”随着长鸣的汽笛，奔驰的列车载着玛妮雅玫瑰色的梦，驶出波兰，穿过德国领地，奔向辉煌，奔向科学的峰巅。

玛妮雅蜷缩在四等车厢的折椅上，身旁的人流挤来攘去，她全然不顾，不少人主动向前问长问短，玛妮雅不予答理，人群的喧哗和谈话都与她无关。她在想自己的事情。她虽然牵挂着父亲，眷恋着祖国领土，但她的心情是那么愉快，那么轻松，她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火车经过三天三夜长途跋涉，终于度过长长的黑夜，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第三章巴黎学海

1 新生活

玛妮雅·斯科罗多夫斯卡就要意气风发地跨进自由之城巴黎，她从北火车站下车。前来迎接她的姐姐，带着她乘上了通向索尔本大学的双层公共马车。为了节省一点钱，也为了领略自由国度的新鲜空气和巴黎的市容风貌，玛妮雅爬上了露天的顶层，她贪婪地四处张望，不时发出兴奋的感叹。那宽敞闹腾的街道，那熙熙攘攘的人流，那古老而别致的建筑，霓虹灯晃照下的店铺，没有叶子的榆树，嗅着那充满灰尘的气息……这就是巴黎！

但是有一点使她特别兴奋，这里的人们可以自由谈论问题，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随心所欲地阅读各种书籍，书店里不受限制地卖着世界各地的书籍。

巴黎的新生活与过去的二十几年的单调枯燥的生活真有天壤之别！她那二十几年受压迫的奴隶感忽然烟消云散。那因金钱物质问题被人瞧不起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她的心胸舒展了，精神松弛了，心头觉得好舒服好舒服，像只飞出笼中的小鸟，在蓝天白云下尽情地翱翔。她真正地自由了。

这天，她就要去索尔本大学报名了。在姐姐的介绍和引领下，玛妮雅又坐着一辆古朴的四轮马车，由姐姐家的住地拉雅利特路，经过举世闻名的塞纳河，玛妮雅的心立即被那优美的景色吸引住了。那绯红色的朝霞，那灰蒙蒙的河面；河水欢快地奔流，绕过优美如画的岛屿，令人神往的古典建筑，宽阔的广场，巴黎圣母院的尖塔，翠绿平整的草地。

玛妮雅一直怀着新鲜而神往的心情，摄下了一路风光，留下了一路愉悦。这就是与她今后一生休戚相关的土地。

到了圣米雪尔大道的时候，马车渐渐放慢了步伐。玛妮雅瞪大了眼睛，在她的依稀朦胧中，她似乎看到了那座神圣的宫殿。到了！到了！就是那里！她拿起那个褪了色的皮包，提起裙子，不顾一切地匆匆地走下马车，忙乱之中撞了邻坐的人也来不及道歉匆匆地走下了马车。马车上的乘客用惊疑的目光审视着这个惊慌的外国姑娘。她顾不了这些，下车后，急急地向那座宫殿的铁栅跑去。映入眼帘的是“索尔本大学”几个醒目的大字。索尔本！我梦寐以求的知识宫殿，我一生向往的圣地。这是一座多么令人倾慕的大学啊！几世纪以前，人们就把它形容为宇宙的缩影，路德说道：“最著名，最杰出的学校在巴黎，它叫索尔本。”她的手在颤抖，她的视线渐渐模糊不清。她就要成为索尔本的一员了。

玛妮雅用她那牺牲自己美好的青春，靠作卑微的家庭教师一卢布、一卢布积攒起来的钱，入了学，注了册，取得了索尔本大学的听课权利。学校大门附近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张通知：法兰西共和国理学院——第一学期 1891 年 11 月 3 日在索尔本开课。她欣喜地凝视着，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她一路蹦跳着回到家里，余兴未尽。

“布罗妮雅，我已是索尔本的正式学生了。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的小马妮希雅，你的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姐妹俩亲热地拥抱着，兴奋之情无以言表。

“好了好了，我的太太，现在也该为玛妮雅庆贺一下了。”德卢斯基大夫把这一对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姐妹拥到饭堂里来。三个人一齐动手，黄油面包，巴兹基，波兰香肠，还有香槟，冰巧克力，满满地摆了一桌，他们边吃边喝边讲，一顿饭足足吃了两个小时。

玛妮雅新生注册的法文名字是玛丽·斯科罗多夫斯卡。玛妮雅是她的波兰文名字。大学里的新同学不习惯称呼“斯科罗多夫斯卡”这个长而难叫的名字，干脆叫她玛丽。自此以后，这位波兰姑娘就被人称为玛丽了。他们看到索尔本大学又出现了一名年轻的外国女子，她为了达到学习专注，舍掉了世上的快乐，牺牲了妇女中最美好的时光，不顾自己体力的消耗，以极大的热情在这座知识宫殿里贪婪地探索和追求。

玛丽对教授们十分崇拜。索尔本大学布告板上列出的教授有 23 个，他们均穿着清一色的黑礼服，白丝带，身上都沾有粉笔灰，庄重而神圣。在玛丽看来，那满身的粉笔灰象征着智慧和知识，那黑色礼服就是她顶礼膜拜的黑色金字塔，连同那灰色的胡须都是智慧的象征。对他们的每一堂课玛丽都听得津津有味。布提教授的课形象生动；古依教授的课深奥，富有哲理；阿佩尔教授的课讲解细致易听易懂，可把你带到遥远的领域，让你领略到星星月亮的奥秘。尤其是著名物理学家李普曼先生的课最使玛丽着迷。他的课凝练并极有条理。听了后，就有极其明朗的印象。李普曼先生是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从 1882 年起任索尔本大学教授，1908 年获得诺贝尔奖金。

这天是李普曼教授讲授物理学课，玛丽早早地来到教室，12 月幽暗的光线，照着那一行比一行高的梯形教室，庄重肃穆。她同样选择了离教授最近的一个座位，认真地摆好书和笔记本，端端正正地静候着。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接踵而至，带着一阵阵的闲谈声。这些丝毫没有干扰玛丽的注意力，她已经全神贯注地静下心来，等着教授的到来。

教授进来了，他的步伐是那样刚劲有力，他的神态是那样威武严肃。闲谈声戛然而止。大教室里静得只听见教授的呼吸声。

教授的课极有分量极有条理。论证极为明了，似乎能够避开各种险境，能够随意把世界缩小。他那像计算机似的大脑里储满了科学的数据，装满了科学的宝藏。同学们屏声静气地听着，生怕哪一句话哪一个字溜掉了。他们不约而同的低着头，刷刷地记录着。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显出紧张的神情。

玛丽的头脑里，满满地装着各个教授讲课的精髓，她的愿望就是要夺取最高学府教授们的知识秘密。记得阿佩尔教授用一口略带阿尔萨西亚地方话的声音说道：“我拿太阳来，再扔出去！”他神气而大胆地讲到极遥远的空间，仿佛地球就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的想像力，他的自信，他的形态，活脱脱地像一个救世主。而玛丽眼睛里放射着微笑的光芒，灵魂为之振奋，心头像波涛般澎湃。她暗暗发誓，一定要排除任何干扰和困难，朝着认准的目标拼搏！拼搏！

“我也要拿起太阳来，再扔出去！”这句潇洒诙谐富有深奥哲理的语言在玛丽的心中重复着一千遍一万遍，以至于鼓励着她的一生。

卡西密尔·德卢斯基先生是布罗妮雅在巴黎所有的波兰流亡者中，选上的最漂亮，最聪明，最活泼的小伙子，他身材高大，肤色黝黑，留着胡须，黑色的眼睛总是闪着愉快的光芒。他在彼得堡、敖德萨、华沙均上过学，满腹经纶，但因他有同谋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嫌疑而被当局追查，以后逃出俄罗斯，先在日内瓦当革命政论家，后来到巴黎就学于政治科学学院，接着又学医，现在开了诊所，同妻子一道当了大夫。在波兰他有一个富裕而幸福的家庭，但法国外交部的案卷里有一份沙皇警察的密文，这个文件阻碍着他，使他永远不能取得入籍和在巴黎定居的权利。他是一个令当局恼火，令父母担心的地地道道的激进分子。他喜欢娱乐，能歌善舞，常常举行家庭舞会。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把小女玛妮雅托付给她照顾。玛丽来到巴黎后，一直与姐姐姐夫住在一起，这位热情的青年认真履行职责，并且尽最大的努力去关心和照料这个聪明的妻妹，让她吃好，睡好，学习好。

布罗妮雅料理家务很有经验，她善于用较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恰到好处地给丈夫和妹妹创造一个愉悦的环境。布罗妮雅不仅是一位聪明伶俐的知识女性，她一直学业优秀；而且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家庭主妇。处理家务有条不紊，烹饪技术也十分高超，丈夫和妹妹每天都能吃上美味佳肴。

妹妹来到巴黎，房子应该宽敞一点，于是她便离开巴黎喧嚣闹腾的市中心，搬到布特萧公园附近的拉维垒路租了一套宽大一些的住房。这套住房周围是屋前小花园和干净的小院子。坐落在这个区没有什么大商店，只有一些小铺子。住在这儿的不是那些有钱人，而是靠自己微薄工资维持生活的阶层。这种安静的氛围，是妹妹读书和丈夫开诊所的最佳地方。她借了一笔很小的款子，独自到附近几个拍卖行跑了一圈，最后选定一家经过讨价还价仔细挑选使这所住房里摆满了雅致的威尼斯家具和一架立式钢琴。并挂上雅致的窗帘，铺上白色的桌布，瓶里插满了鲜花，给人耳目一新。

玛妮雅住房里有书架书桌，还配有一把转动的靠背皮椅。房间不大，但安排得井井有序，宁静而舒适。

一间大厅套小间作诊病室，给德卢斯基先生用，他在那里看外科病人；布罗妮雅在里间看妇科病人。夫妻俩忙忙碌碌，责任感又特别强，经常由一家跑到另一家，去看他们的病人，并常常深更半夜被叫起出诊。

卡西密尔·德卢斯基是个闲不住的青年，哪怕一天工作得精疲力竭，甚至不顾经济拮据亏空，也减弱不了他好活泼好热闹的脾气。每当一个辛苦的白天过去以后，到了晚上把一切忧虑统统抛开，尽情地享受生活。要么去看一场戏或听听音乐，那怕坐最便宜的位置。实在不行，就在家里轰轰烈烈地弹钢琴，唱流行歌曲。或者组织一批人高兴地聊天，举行舞会等。总之，每天夜晚都安排有各式各样的活动或聚会。

有一天晚上，玛丽正关在小屋子里，聚精会神地复习当天教授讲的高能物理课程并准备要把这些公式、定律计算一下，以至彻底弄懂弄透。这时门砰地被推开，德卢斯基兴冲冲地闯进来，不由分说地拉起玛丽。

“快，戴上帽子，穿上衣服，我们一起去听音乐会，我有几张招待券。”

“不行，我有功课要复习，不能耽误。”玛丽坚决拒绝。

“哎，忙里偷闲嘛？紧张了一天，晚上也该放松放松。这叫换脑筋，便于提高效率。”

“但是……但是……”她急得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好。

“没有什么但是，这是我曾经给你说过的那个波兰钢琴家，这个可怜的家伙，这次演出票卖得极少，我们必须去捧场，为他鼓掌，直到把手掌拍痛为止。无论如何，要让他的音乐会显得很成功，让他从中体会到一些成功的愉悦。”为了朋友，德卢斯基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真是个体面的男子。

德卢斯基边说边拉着玛丽，为她戴上帽子，披上大衣，急急忙忙地往外走。姐姐和另一对波兰夫妇在门口等着他们。

玛丽被领着穿过一条幽暗的长廊，来到一个阔大的唉哈堂，里边的位置空着四分之三，显得冷清空荡。台上轻柔的灯光下一个无名的艺术家用他灵巧的手指，演奏着一曲曲优美的旋律，使李斯特、舒曼、萧邦等一个个形象活灵活现，他弹得如醉如痴，听的人飘然如仙。尽管掌声稀疏，但仍是那么热烈，那么经久不息。艺术家的形象总是那么高傲而尊贵，像一尊天神……

几个小时音乐会夺走了玛丽的时间，也给了玛丽心灵的享受，她同情艺术家的处境，十分欣赏他的音乐。可是她时间太紧，她要争分夺秒抓紧学习。待姐夫姐姐就寝之后，她又一古脑儿投入学习，夜深人静正是她思维活跃之时。

德卢斯基夫妇为她提供了极好的生活场所，带来了较好的物质条件。她生活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着家庭生活的甜蜜温暖，毫无远离异国的孤独之感。在学校，她也感到十分愉快。并且发现大学学习带来的团结一致的愉快。她不愿与法国青年交往，她认为那是一种时间和精神上的浪费。因为波兰在巴黎求学的学生是有限的。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理想——民族梦。然而，他们都是住在拉丁区的贫穷的学生，在一起可以探讨救国救民的办法。他们经常组织一些聚会和圣诞夜餐会。一些好心的波兰厨子给这些聚会的贫穷学生做华沙菜：每次都离不开浅紫色的热巴尔什茨，蘑菇白菜，塞肉的白斑狗鱼，罌粟子糕，几瓶伏特加，很热的菜……配合着多形式的戏剧表演，热闹极了，戏剧都是由学生们自行创作，自行表演一些喜剧、话剧。一次，玛丽被选去在《波兰打破枷锁》中饰演主角。而且非常成功。得到了波兰学生的热烈称赞。并在以后的演出中，请玛丽作主要演员。

她把参加波兰青年活动和反沙皇斗争演出的事情用书信向父亲作了报告。老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非常惊奇和担心，并马上给玛妮雅回了一封信。

亲爱的玛妮雅，你信中提到的事情使我很忧虑，我惋惜你那样积极参加组织那些表演……你知道在巴黎一定有人很注意监视你们的行动，随时记录带头人的名字……

这也许会引起极大的麻烦。为你将来在华沙谋生带来极大的危险。你应该知道保持缄默。你的任务是学习知识，将来为波兰服务……

玛丽是个极听话极慈善的女孩，她不愿意父亲生气，在她的记忆中，父亲的话是极正确的，加上她本人对娱乐活动也缺乏热情，至此，她决

定隐退。用她自己的话说：要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用功读书。

毋庸否定，德意志路的生活带给了她许多甜蜜和温馨，姐夫和姐姐的热情给她带来了生活的乐趣。但是也不能否定，也给她刻苦用功带来了干扰和障碍。每当她想安定的关起门来读书时，或正在分解复杂的方程式时，就会有客人们的寒暄说笑声，或找布罗妮雅接生的敲门声，大声喧哗声传来，以至她无法阻止德卢斯基弹钢琴，无法拒绝姐姐请她参加热烈的家庭舞会，以及各种游戏玩牌，无法拒绝波兰青年邀请她参加的各式各样的聚会。因为这些活动又那样富有乐趣和吸引力；同时还经常有莽撞的病人找错房间，常常“呼”的一声吓得她心惊肉跳。深夜，常有急促的脚步声和尖叫的铃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而这些都是极难避免的，因为这是德卢斯基夫妇的工作。

最使玛丽头痛的是德意志路的拉维垒特住宅到索尔本大学，乘公共马车来回要花两个多小时。往返的公共马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不算，更重要的是耽误了时间。如果把这两个多小时用来学习，那要多看多少书籍。她为失去的时间感到痛惜。为了早日完成学业，取得学位，她必须离开姐姐家。这天，她正式向姐夫和姐姐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开始，布罗妮雅和德卢斯基坚决反对。因为，在玛丽来巴黎之前，德卢斯基就答应了岳父的请求，而且布罗妮雅还在很早以前就订立了君子协定。要让妹妹同自己一起住，以便照顾。住得好好的为什么玛丽要搬走？是我们照顾不好？是我们无能？

好说歹说，玛丽倾尽了所有的语言，在一场紧急的家庭争论会上，玛丽以种种理由占了上风，会议最后决定玛丽另寻住处。玛丽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对夫妇借给她极少的几法郎，作为搬家费用。

第二天一早，玛丽开始找房子，找了许多地方，不是嫌钱贵就是路太远。最后，她去拉丁区即靠近索尔本大学，租金又便宜的地方租了一个小阁楼。

布罗妮雅正怀有身孕，行动极不方便，她仍然拖着笨重的身体，亲自为妹妹捆扎那一点点少得可怜的行李。卡西密尔·德卢斯基夫妇一起把玛丽的行李搬送到那个小阁楼上。

3 每个月 40 卢布

这间小阁楼虽然极简陋，但极安静，没有人来打扰她。玛丽真正的学习开始了。再也没有娱乐的时间了。她的时间差不多完全在学习的静默中度过，没有谈话，没有喧嚣声。她要用一千倍的努力来弥补过去损失的时间。

离开姐姐家，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什么事情都得靠自己调理。玛丽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布置这个属于自己的小阁楼。这里没有水，没有灯，只有一个可以透进光线的天窗，每到冬天，极冷难耐，她把自己带的行李摆弄好，一张折叠铁床，上面铺着她由波兰带来的褥子；一个火炉，一张白木桌，一把厨房里用的椅子，一个脸盆；还有一盏煤油灯，上面罩着一个灯罩；一个冰箱，是她用来到平台那头装水并蓄水而用的；一个碟子大小的酒精炉。几年里她就是靠这个酒精炉做饭；两个碟子，一把刀一把叉，一个汤匙，一个杯子，一个有柄的锅；还有一把水壶和三

个玻璃杯。德卢斯基夫妇来看她时，她就用这两个杯子倒茶。

玛丽搬到新居以后，自动放弃了德卢斯基夫妇供给她的食宿。她只能自己支付一切开支。她把父亲每月付给她的40卢布，分成一小笔一小笔。首先是缴学费；然后是必须支付的房租、书籍，纸墨等费用，再考虑自己衣食。除此之外，就是伙食费，包括买煤球，买煤油点灯，衣服是无法买了。在巴黎，凭着这40卢布维持一个月的生活，简直不可思议。她只得精打细算掂斤播两，省吃俭用。但当时，像她这种贫困的波兰学生却为数不少。只不过他们有的是三四个同住一起，一同吃饭，这样可以减少租房开支，有的条件好一点的单独住，每天要花几小时自己搞家庭卫生和预备饭食，自己缝补衣服，凭借自己灵巧而能干的双手能吃上较好的饭食，能有不算破烂的衣服穿。事事自己动手也可节约一部分开支。

而玛丽对于这种灵巧和能干不屑一顾，她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料理家务上。事实上，她一直没搞过家务。小时候有仆人料理，17岁当了家庭教师，从没有时间学习料理家务，这部分开支她是无法节省了。同时，她喜欢安静，个人独居以便一心用功，根本没时间顾到自己过得怎样舒适，一人租一间阁楼的租金也无法省了。她宁愿艰苦，甚至饿着肚皮，也不愿意抽出时间搞生活。以至于在拉丁区这些波兰侨民中流传着“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不知道汤是用什么做的”的传闻。她有意把分心的事都从日程表里除去，不与别人接触，不参加朋友聚会，甚至舍不得花时间做饭。她每天用面包、黄油、茶水、水果来果腹。只有德卢斯基夫妇和极少数波兰青年偶尔来小阁楼看看她。只有姐姐、姐夫来了，她才表现出极大的勤快和热情。她认真地烧着那个小火炉，火炉的烟筒在屋子里复杂地迂迴着，炉子冒着火苗后，再由屋角把那只棕色大箱子拉出来当椅子，这个从波兰带来的箱子既是她的衣橱又是来客的凳子。

这个小阁楼到她的化学实验室只要一刻钟，到索尔本大学上课也只要20分钟，交通费是省下来了。不管刮风下雨，玛丽每天都是步行，她把这种步行当作户外散步和身体锻炼。

由于她的住房在顶楼之上，烧煤球就成了既费力又花钱的难事。煤球从街角的商人那里买来，自己一桶一桶地搬着爬上那很陡的楼梯到第七层楼。爬每一层楼都会感到很艰难，很吃力，每提一桶煤上来都要流一身大汗。寒冷漫长的冬天，她只用一两袋煤球；一是节约用费；二是节约时间。连煤油也需要节省，灯用得很少。每当天一黑，她就跑到“圣日内维埃尔图书馆”那个幸福的“收容所”去避难，那里有煤气灯和暖气，不用担心寒冷的煎熬。她端正地坐在一条长凳子上，贪婪地翻着一页又一页书刊，直到晚上10点钟图书馆关门。

“小姐，该回去了。”一个温和而熟悉的声音把她从思索中拉回来时。她才惊奇地发现，偌大的一个图书室，只留下她孤伶伶的身影。

在一片“对不起”的道歉声中，她仓促把书放回架上，夹着笔记本急急忙忙地跑出图书馆。回到家里，冰冷刺骨，毛巾和水都结成了冰，刺骨的寒风偏偏挤进这密封度差的小阁楼。冻得她牙齿咯咯作响。她点上煤油灯，躲到被窝里，继续畅游知识海洋。直到凌晨两点。硬是自己熬得两眼通红，疲惫得无法打起精神时才入睡。寒冷使她无法入眠。床上的被子不足以御寒，她便把身上的衣服压在被子上。还把箱子里所有

的衣服翻出来，盖在被子上保暖。然而，冬夜的巴黎，温度在零下几十摄氏度，寒冷仍然像幽灵一样缠着她。她只好把那个椅子也利用起来，椅子的腿朝上压在被子上面，来抵御寒冷的袭击，给自己一种重量和暖和的幻觉，挨到天亮。

在寒冷的冬天，玛丽的衣服和鞋帽仍是那么破旧。正值花一般的年龄，本应穿戴得漂亮一些，但她做不到，也不在乎。只有当她的旧衣服穿得不能再补时，她才不得已去买一块便宜的衣料，发挥她在西科尔斯卡寄宿学校手工课上学来的技术，自己动手缝制一件新衣服。她面临的最大窘境是鞋破烂得不能再补了，她得决定是买吃的还是买新鞋。如果买一双便宜的新鞋也需要几卢布，那就是半个月的伙食费啊！所以她总是一拖再拖，迟迟不作决定。她把硬纸板垫进磨穿了底的鞋里，凑合一天算一天。

玛丽对这种困苦生活一点也不在乎。她很清楚，如果要使自己的钱能花到争到学位的那一天，这些困苦，甚至更严重一点的困苦，都是值得的。

她再不能欺骗姐夫了。她告诉姐夫，从前一个晚上起，她只啃了一把小萝卜和半磅樱桃。晚上学习到凌晨3点钟，只睡了四个小时，又吃完剩下的小萝卜，就到索尔本上课去了，然后到图书馆找资料，不知不觉就昏过去了。

德卢斯基由生玛丽的气到生自己的气，他责备自己无能，他为没有照顾好斯可罗多夫斯基托付的事而懊恼，甚至悔恨自己不应该让玛丽搬到这个该死的拉丁区来。他没想到，这个聪明的妹妹，在对待自己身体和生活上竟如此马虎和愚蠢。

此时，他再不理睬玛丽的抗议和不情愿，拿上她的外衣、帽子及书籍和笔记本，强行把她拉进了四轮马车。玛丽在这个强悍的男子面前，没有反抗，只有默默地跟着，一直见到布罗妮雅，受到姐姐一阵怜爱的责备。

德卢斯基此时大肆渲染他的保护权威，命令玛丽吃药，吃补血的烤牛肉和油煎的脆马铃薯。布罗妮雅每晚为妹妹熬新鲜的肉片汤、猪蹄汤。为她铺好床褥。在德卢斯基夫妇的细心照料下，玛丽很快得到了恢复，脸上又有了红晕，身体又健壮了起来。然而，她牵挂着考试，以种种理由说服了关心她的姐夫姐姐，保证今后好好调理生活，再不出现过去的情况。一个星期后，她又重新回到了阁楼，又开始过上了她那吃了上顿没下餐的贫困生活。

4 亚历山大奖学金

在索尔本大学，玛丽知道自己的缺陷和距离，她只能用加倍的努力来弥补。她不仅上课期间注意力高度集中，而且连课间的每一分钟都不放过。课间20分钟休息时，她都会抓紧看书，她对数学、物理、化学几门课程有特别浓厚的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她的数学、物理、化学成绩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在法国长大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学生。她以自己的天赋和勤奋，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爱戴。

李普曼教授慧眼识珠，他对这位刻苦努力，专注于科学事业的波兰

女子有着特别的好感。每当玛丽向他提出问题，他都会停下工作或正在进行的谈话，耐心地向她解释，教会她一些方法。而且常常交给她做一些研究工作。她对教授交给她哪怕是极不重要的研究工作，都会专注而认真去完成，并把研究结果报告教授。

为了精确地完成研究工作，玛丽总是挤出每一分钟到实验室去。索尔本的物理实验室是一间宽大的屋子。她很快就爱上了这个一天到晚散发着化学药品气味的实验室，爱上了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做实验的专注、宁静的气氛。熟能生巧，她渐渐地学会了熟练地使用实验室里的精密仪器。当她罩着一件肥大的粗布工作服，往那张放着精密仪器的橡木桌子前面一站时，她就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只会做实验的机器，她的七情六欲，她的精神灵魂全部溶进了物理实验。常常是被人提醒之后才知道应该离开。

她为了搞好学习和实验，吝啬到不愿和同学多说一句话，不愿意浪费哪怕是对视一眼的时间。他对科学的专注，对实验的专注引起了班里男生的注目。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个波兰女子总是衣着朴素，穿着打了补丁的淡褐色衣服，脚踏一双极旧的鞋，但是这位姑娘自有一番动人的魅力，而且她还是那么美丽，当她与别人谈话时，一开口就是科学，对其它任何事情都缄口不谈。根本就谈不上与男青年们谈情说爱。对这个“苦学的人”，男同学极为倾慕，往往在每天下课之时，他们便三五成群地向这位漂亮的小姐发起爱的进攻，向她表示亲切的爱慕。玛丽总是匆匆地逃避。一天，又有几个疯狂的追随者来向玛丽表示善意的爱。她的朋友迪金斯卡小姐急忙来到玛丽的身边，撑开她的花伞，赶走那些围着玛丽献殷勤的爱慕者。这个自告奋勇作玛丽护卫的是个很可爱而且很热情的女子，她从心里佩服并喜欢这个勤奋而腼腆的波兰姑娘，所以她未经玛丽许可，常常主动抵御那些玛丽不感兴趣的男子的进攻。玛丽很感激她，日积月累，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玛丽早就看出这些道貌岸然的男子不会爱一个没有嫁妆的女学生的。她经受过的教训告诉她，他们所需要的不是诚实和聪明的姑娘，而是家庭有极多的钱财有丰富的嫁妆的女子。此时的玛丽心中装着的只有学习和实验室，只有学习和实验室需要灵巧的双手和敏捷的头脑。她与这些崇拜者通常是保持学术上的友谊。她的全部身心，都交给了她所热爱的数学和物理学。

这样，玛丽终于弥合了她与索尔本大学所需基础知识的差距。她不仅在这所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站稳了脚跟，而且渐渐地把许多人甩在后面，成了佼佼者。

1893年7月，屋子里开始燥热，玛丽的心也激动得躁动不安。她已与同学们一道，进入紧张的复习阶段。学校的毕业考试一步步逼近了。在那折磨人的日子里，玛丽复习到很晚才精疲力竭地躺到床上。每天早晨，她的生物钟又总是提醒她按时起床。匆匆忙忙吃完简单的早餐，就往学校里赶。这些日子，玛丽身边总是围着一大堆的同学，他们向玛丽询问疑难问题，借她的课堂笔记去补充自己的笔记。大家盼望已久的考试这天终于来了。玛丽同三十几个同学关在考场里，觉得神经高度紧张，那些平时熟悉的公式和方程在眼前跳跃晃动，握笔的手还在颤抖不已，有好几分钟工夫她无法静下来看那与命运有关的题目，认不清一般考题

和“讲义考题”的词句。于是她放下笔，闭目一阵，然后安慰自己：“不要怕，要沉着，这些题目十分容易。”大概过了一分钟或是两分钟，她回过神来，振作起精神，忽然拿起笔，不假思索地读下去，写下去……一连几天都是这样紧张地过去了，考试终于结束。接下来是等候宣布成绩的日子，这种等待比考试更紧张，更难熬。玛丽虽然心中有数，但紧张的心理始终没有平静下来。宣布结果那个庄严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参加考试的学生的名字，要按照成绩优秀的先后顺序宣读公布。这一天，学生、学生的家长和亲友都从四面八方赶来，挤在宽敞的梯形教室里。玛丽早早地来到了索尔本，躲在梯形教室的角落里。她是只身一人来的。教室里，大家拥挤着，推攘着，细声的议论着，伸长脖子焦急地等待主考官的到来。这时，身着黑色教授服，头戴黑色礼帽的主考人进入讲台。霎时，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着主考人用纯正的法语，洪亮的声音宣读名单。第一名是玛丽·斯科罗多夫斯卡。

听见了，听见了！第一个名字就是玛丽。还没有等主考人念完，玛丽就挤出了教室，她身边跟着一大群同伴，大家用各种语言各种形式向她表示祝贺！玛丽的心像灌足蜜，再没有什么来形容她此时的激动。若干年来，她都没有这么激动过。她无心听同伴们的贺喜，无法听下面任何一个名字。她第一件事是要赶快跑回德意志路，向关心和支持她的德卢斯基夫妇报喜。然后是回华沙去，让父亲与她同享这种快乐。她是一天也不能等了，她要赶回到父亲身边。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四百多个艰苦勤奋的日子，终于换来了第一名，换来了物理学大学学位，她太高兴了，在科学的漫长道路上，她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她急急忙忙退掉了小阁楼，把那简单的一点行李放在朋友家里，把身上所有的钱拿出来，计算一下，给父亲、约瑟夫，海拉买什么礼物。除了带上火车上吃的一点面包和水果，她是个身无分文，囊中羞涩的穷乞丐了。这是波兰人民最伟大的习惯，最崇高的气节，所有波兰人从国外归来，是不能带钱回家的，否则是一种耻辱。

华沙，斯科罗多夫斯基这个可爱的家，已张开热情的双臂，拥抱这位胜利归来的学子。斯科罗多夫斯基听到小女儿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考试，被授予物理学学士学位，激动得老泪纵横，紧紧地搂着女儿说：“我知道我的小玛妮希雅，总会有出息的。”

在三个多月的暑假里，她过得十分愉快和幸福。波兰各地亲戚们争相宴请她，用各种美味款待她。儿时的朋友约她去爬山，划船，游泳，骑马，她畅快极了，高兴极了。整个身心彻底得到放松。约瑟夫、海拉都有一个温馨的小家，她可以随时到那里去玩。饿了可以任意吃。然而她的大部分时间是陪着父亲过的，给父亲以温顺的孝心补偿两年来父亲的孤寂，同时她要为下学期攻读数学学位作好准备。此时的玛丽，已极不满足拿到物理学学士学位的要求，她已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她要获取物理学和数学两个学位，而且还有更高的标准。她在家那个女裁缝的帮助下，花几个格罗齐就剪裁并且缝制好了衬衣和厚毛料衣服，足够到巴黎一年的穿戴。3个月很快就要过去了。可是她心里总有一股莫名的忧伤。她要继续学习，而自己的积蓄已彻底分割完了。而且她想到年老的父亲为了支持她而省吃俭用，连喝酒，看一场戏或电影这些起码的享受都放弃了，心里非常难过。她盘算着：如果实在弄不出钱来，就暂

时放弃，等自己教课积攒钱后再去巴黎。或者干脆在波兰找个工作，陪父亲度过安详愉快的晚年。想到这，玛丽不禁感到惭愧，感到凄然。

夏去秋又来。正在玛丽为即将开学又筹不到钱而苦恼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从天而降，玛丽被授予一笔她从未申请过的亚历山大奖学金。这是那个在索尔本大学主动出来用花伞保护玛丽不受爱慕者包围的迪金斯卡小姐，得知玛丽为学费所困扰。出面找了华沙的一些朋友，并用种种理由说服了社会上、政界和科学界的一些要人，并动员自己的亲友四处奔走，极力替玛丽请求“亚历山大奖学金”。这种奖金是供给成绩好的学生在国外深造的，但是，没有过硬的关系，即使成绩再好，也难以得到这笔奖学金。迪金斯卡小姐极聪明且极富远见，她确信聪明的玛丽前途无量，相信玛丽有极大的发展和创造才能。她认为不能因为没有学费而把这块金子埋没。

这真是喜从天降。玛丽怀着惊喜和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笔数目确实可观的奖学金。啊！600 卢布！够用 15 个月了。她高兴极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她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在她走过的二十几年岁月里，总是她替别人想办法，出主意，帮助别人，却很少想到自己，更从未希望有人来帮助她。这位朋友对她的关心使她感到莫大的振奋。她暗暗地打定主意，暂时接受这笔钱，完成自己的学业，待我挣到第一笔钱时，我一定返还回去。的确在几年之后，全国工业促进会约她研究一项技术，她从这笔收入中节省出 600 卢布，送交亚历山大奖学金委员会的秘书，她恳切地说：这钱留着帮助更加贫困的学生深造用吧！也许这笔钱又是另一名求学的贫困女子的救命圈。这是在亚历山大委员会里从来没有过的事。

她筹划着如何把这笔不少的款子用在点子上，发挥出最大的效能。首先她要改善一下住房条件，过去的阁楼实在不利于身体健康，她要租一间比过去宽大一点而且迎风的住房。她按照父亲的嘱咐，在一条干净而且宁静的街道上，以年租价 180 法郎租了一间房子，还铺着陈旧的褪了色的地板，有一个可以打开的窗户，随时可以让阳光照进房间。她把自己有限的行李整齐地摆设好，这些行李合起来还不到 20 法郎。虽然简陋寒碜，但对她说来，这个房间与过去的小阁楼比，简直是一座宫殿。

4 年，整整 4 年的大学生活，是艰苦的 4 年，也是出成果的 4 年。是玛丽从平凡通往辉煌的 4 年。她在这个时期自己很欣赏的一张照片上题上了一首诗，这首诗洋溢着幸福和愉悦：“……啊！这个青年女子活泼得何等顽强，她美好青春即将消逝，而她躁动的热情有增无减。”

别的青年热烈地寻求快乐，
她却贪婪地埋头书桌。
在寂静中努力探索，
在那冰冷的阁楼里，
理想的烈焰熊熊燃起，
找到了希望寻到了真理。
人生的坐标在眼前高高架起，
但幸福的时光不能永驻，
她必须告别圣地，

踏上荆棘满布的人生之旅……

这个26岁的波兰女子这么热情地赞扬和留恋她那困苦而又艰难的学生时代，把此作为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而留在记忆中。因为她在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事业，这种事业将使自己的生命放出最大的热量，将使自己的智力得到极大的开发，将使自己为攀上科学的峰巅而打下深厚的基础。

正如她日后在日记里写的：“对我来说，那段专心致志地攻读的孤独岁月，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最美好的回忆。”

在1894年玛丽念大学最后的一段时间里，经过一个废寝忘食，刻苦钻研的寒暑，她由学物理学开始，继而迷醉于数学。她从小就在父亲那里听到了“方圆法”、“无限”、“渐进线”。父亲传授的知识，催化着幼小的玛丽对科学的景仰。科学是高深的，神秘的，它能够把人带入一个对普通人来说尚是封闭的奇妙世界。数学吸引了她，她认为数学是一门能发现新的知识，开阔眼界的科学。可以提高思维能力，养成分析问题的逻辑习惯。在学习所谓高等超越函数、阿贝尔函数以及在应用中的特别椭圆函数和超椭圆函数的理论时，她如同天生就知道，对讲义她似乎一看就懂，以致指导她的导师非常赞赏地说：“判断的合理和可靠，论证的正确和有力，论据的安排合理而有顺序及理解的深刻程度都使我吃惊……”她以惊人的成绩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

年轻的玛丽，以她的聪明才智和品学兼优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引起了法国学术界的关注。她作为在校学生，不断受到各种科学研究机构的邀请，撰写论文，从事研究。她的老师李普曼教授已察觉到这个波兰女子身上有股巨大的热情和潜在的科学因子，她的聪明和刻苦将使她在科学事业上取得重大的贡献。李普曼教授帮助她从全国工业促进协会获得了一个研究项目，让玛丽对不同钢种的磁性进行研究。这是一项既有实际意义，又能提高科学试验水平的试验。她兴致勃勃地在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了工作。这种有神秘趣味的科学试验，必须分析各种矿物，并且收集各种金属样品。还要用一种复杂的设备。可是教授的实验室太小，摆不下她所需要的所有仪器，实验进行了一半被迫中断，她非常着急。这是第一次单独接受研究任务，她要尽善尽美地完成它。怎么办呢？她急得夜不安寐，食不甘味。正在这时，玛丽以前熟悉的波兰籍物理学家科瓦斯基博士和他的新婚妻子正在巴黎访问。既是度蜜月，也是作学术研究。既要作学术报告，又要参加物理学会议。然而，他们从百忙中抽时间来看望玛丽，并亲切地询问她的情况。玛丽向这位亲切的同胞诉说了自己遇到的困难。博士很热情，但他人地生疏帮不了她的忙。

过了一阵，他面带喜色地说：“玛妮雅，我有一个朋友叫皮埃尔·居里，是物理化学学院的教授，他也许能帮助你。据我所知，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工作室，明天我把居里先生请来，你也到我这里来，你们可当面谈谈这件事！”

“谢谢！明天我一定来！”玛丽紧皱的眉头舒展了。在她的心头，已经出现了希望的曙光。

第四章美满婚姻

1 初次印象

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玛丽经科瓦爾斯基教授的点拨，绷得紧紧的心情已经舒展开来。她要去见那位叫皮埃尔·居里的教授。她简单地吃完了晚饭，换了一件长裙，金色的头发随便在头上盘成了一个发髻，显得自然大方，青春焕发，匆匆地搭上四轮马车来到科瓦爾斯基住的寓所。年轻的教授夫妇热情地引她来到一间宽阔的客厅。当她迈进这间客厅的门，就看见对着阳台的落地窗前站着一个人材颀长显得十分洒脱的男青年。科瓦爾斯基教授非常热情地作了介绍。

皮埃尔那富于表情的炯炯目光与玛丽那双灰色眼睛相碰，立即撞出无以言表的好感。出现在皮埃尔眼前的女子有饱满的前额，娴雅的举止，柔软的金发，匀称的身段，优美的体态，显得特别可爱，他的心为之一颤。这是他35年来未曾有过的颤动。这位爱科学，好动脑的物理学家，对女性有一种很强烈的偏见。这也是因为他曾尝试过一次恋爱的痛苦有关。

今天，这位伟人在见到这个女子的第一眼时，却情感颤动，立即表现出惊奇的好感。这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收获。

两个人开始的谈话就直入主题，科学研究。就是科学这根红线紧紧拴住了两颗被爱而冷淡过的心。皮埃尔亲切而耐心地倾听玛丽讲述她从事的工作。玛丽尊敬地向皮埃尔请教一些问题，虚心地听取皮埃尔的意见。皮埃尔也热心地向玛丽叙述他的计划，热情洋溢地介绍他正在探索的结晶学的现象，他用一些旁人听来枯燥而又深不可测的学术术语和复杂的公式津津乐道地讲着：“正压电效应”，“逆压电效应”，“磁质或磁化率”。

玛丽听得入神，常常为他复杂讲述而兴奋，同时还能敏锐而正确地讨论磁化规律的细节。他们的谈话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科学讨论，这使皮埃尔更为惊奇，更为快乐。皮埃尔认真地看着她那宽广的前额，兴奋的脸庞，看着那双被化学药品灼伤的手，那种优雅端庄对皮埃尔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35年来，他心中的女子都是为生活而热爱生命，有天才的妇女实在太少。此时，面前这个女子，竟把他过去的观点砸得粉碎。竟把他心目中的女子形象重新地树立起来。她不就是一个天才的女子吗？这不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女子吗？他终于遇到了一个像他一样热衷于科学的女子。

一开始，皮埃尔就觉得这位灰眼睛浅头发，年轻漂亮不大说话的年轻女子颇有吸引力，还夹杂着一种强烈的好奇心。谈话中，他了解到她是一个波兰女子，在索尔本大学深造，去年以第一名的成绩得到了物理学学士学位；正在准备考数学学士学位。她在来巴黎之前已工作了好几年。她没有钱，曾独自在巴黎的一个阁楼住过……

“你能永远留在法国么？”问这句话时，皮埃尔也揣摸不透自己的心理。只是感到有点不同寻常的面红耳热。

经过多少艰难困苦和一次失恋打击的玛丽，对婚姻和幸福已失去一种敏感。此时，她并未猜出皮埃尔的心理。她对皮埃尔只有一种崇拜和

尊敬。所以她脱口而出：

“当然不，我考上数学学士学位，就可以回华沙了。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要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授给波兰的青年一代，让知识武装起波兰人民，让我们的民族振奋起来。波兰人有权利保卫和爱护自己的祖国。”玛丽那种热切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好极了！我们波兰是个坚韧不拔的民族，我们应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科瓦尔斯基夫妇加入谈话，话题自然转入俄国压迫使波兰造成的极度痛苦情况。三个背井离乡的青年，谈起祖国的沦陷，人民受压迫，无不激愤，都决心报效祖国，推翻沙皇重建波兰。

皮埃尔·居里惊讶地听着玛丽谈她的爱国责任和热情，他有点莫名其妙。在他看来，科学是应该不分国界，不讲政治的。他很担心，这位具有天赋的青年女子，有卷入政治旋涡的危险性。她应该致力于她的科学研究，而不应该去想或者去干科学以外的事情。这是皮埃尔一贯的观点，他是一个醉心于科学事业的学者。他暗下决心，要为科学的巴黎保护这位女性天才。

这次谈话，在仓促的时间中结束了，皮埃尔很遗憾，嫌时间太短，并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同玛丽交谈。他小心翼翼地问她，我能不能再次见到你。玛丽报以羞涩的一笑。“当然，我还要向您请教呢！”

当皮埃尔提出要去看望她时，玛丽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这是来巴黎三年来第一次答应一个男子单独去她的独居小房间。眼前的这个男人与别的男人不一样，这个男人感兴趣的是她的智慧，是她对科学事业的追求，他像她一样热爱科学，并决心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科学事业。

这次会面叩开了两个高傲的天才的爱情大门，并播下了一颗纯洁的爱情种子。

皮埃尔·居里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这种力量来自他对科学的严谨和温雅的举止，洒脱的风度。他颀长的个头，套着宽松的衣服，显得自然朴素；他的手长过膝，显出他与众不同的智慧和天才；他那很少变化的脸长着粗硬的胡须，端正而严肃，使人总有一种深不可测之感；他温和的表情，深沉的眼睛，给人一种镇静，一种神秘，一种无可比拟的好感。

玛丽后来用一种单纯而略带羞涩的语句，描写他们在 1894 年年初第一次会面的情景，那是她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时刻。

“我走进的时候，皮埃尔·居里正站在一扇对着阳台的落地窗前。虽然那时候他已经 35 岁，但仍显示出知识青年的优雅和青春活力，他那富于表情的炯炯目光和他那颀长身材的洒脱风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而他那略显迟缓而且审慎的言谈，他的质朴，他那既庄重而又活泼的微笑，让人信任。我们开始谈话，不久就很投缘；谈话的题目是一些科学问题；我乐于征询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皮埃尔那洒脱自如的风度，聪颖出众的智慧，高尚大度的精神，深深地印在玛丽的心里。而且这种好感一直在升华，陪伴着她的一生。

几天以后，皮埃尔真的来到拉丁区爬上楼上那间简陋的小房间。看见玛丽几件破旧简单得几乎不能再简单了的家具，桌子上床上到处是科学书籍，整个房子没有任何装饰。皮埃尔非常感动，这真是位奇女子，在这种条件下生活和学习还要从事研究是多么不容易啊！这在他接触的

人当中是从未有过的，这位女子的坚信和勇敢以及吃苦耐劳精神，令他无限敬佩。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加，玛丽对皮埃尔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他们在一起讨论工作，憧憬未来，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科学，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健康，是皮埃尔的终身理想，也是玛丽的终身理想。科学把两个天才溶化在一起。频繁的接触，加深了他们的相互理解。皮埃尔向玛丽谈到了他从未跟任何女子透露过的事情，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自己的成长过程……

2 皮埃尔·居里

皮埃尔·居里是一个有天才的法国学者，此时已深为国内外同行所推崇。

皮埃尔祖籍阿尔萨西亚新教徒，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资产阶级人家，到祖父时，已经成为知识分子和学者宗族。祖父因学医而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然而家境并不宽裕。父亲非常热爱科学研究，做过巴黎博物馆实验室里的助手，而且写过一些内科、传染科方面的科学著作。但是为了生活他不得不行医治病，在作医生期间，研究了大量医学理论，并且成功地发明了一种防结核病的疫苗。居里大夫品格高尚，行医治病，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还在学生时期，就参加法国革命中的救护队，英勇顽强，被授予“可钦敬精神及英勇行为”金质奖章。皮埃尔父亲与玛丽父亲经历有惊人的相似，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也酷爱科学，对科学研究始终有浓厚的兴趣。曾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然而在家境十分贫寒的情况下，一直忙于生计，不得不放弃科学研究工作。出于生活所迫，操起了教书育人的行当。两个人的父亲都十分热爱科学，一生追求科学，他们的愿望都没有实现，便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皮埃尔和玛丽却也不负父望，刻苦努力，攀登了科学顶峰，实现了父亲的遗愿。

皮埃尔·居里的母亲德布叶·克莱尔，是巴黎附近一名著名企业家的长女，她生长在富有安逸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婚后，家庭经济拮据也毫无怨言。她心地慈善，与丈夫恩爱互助，患难与共。夫妻俩相敬如宾，和睦相处。

皮埃尔·居里 1859 年 5 月 15 日，生于巴黎的居维埃路。排行老二，哥哥皮埃尔·雅克后来也做研究工作，成为青年物理学家，在索尔本做助手。皮埃尔和他的哥哥一样，由童年起就倾慕科学，酷爱科学。且有独立思考和爱幻想的性格。遇事总要深挖细究，思考若干个为什么，然后千方百计去证实。常常为一个问题几天几夜寝食不安。居里大夫知道自己的次子头脑独特，善于思考，不适应正规学校系统的教育和训练。不能成为学校全面发展的出色的学生，所以没有让他上正规学校。而是亲自执教儿子，他确信这样皮埃尔可以多学习一些东西，可以更好地发挥他的特长。居里大夫教皮埃尔几门功课，其余的课程由他那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担任。

居里大夫发现自己的儿子具有奇特的天才成份，并且特别爱好物理，非常高兴，便倾其所能让其自由发展。平时，居里大夫经常带着两个儿子到乡间田野去搜集动物植物标本，一边旅游，一边向他讲解一些有关动植物的有趣的故事。回到家里做各种试验。潜移默化地向他们传

授一些物理和医学方面的知识。哥儿俩渐渐爱上了户外活动，常常结伴去乡间漫步聊天，总是不知疲倦地在田野和树林中游玩，观察研究自己周围的动植物的生活规律，有时坐在草地上看书甚至留连忘返。

到皮埃尔 14 岁时，居里大夫便请了杰出的数学教师巴齐耶先生指导他。巴齐耶先生十分喜欢这个与众不同的学生。他发现皮埃尔喜欢数学，并富有几何思维和立体想像力，便从拉丁文教起，训练他的文字理解能力，慢慢锻炼他的自行从事研究观察能力。一步步地推进，一步步地引导，充分发掘皮埃尔的爱好和潜力。

这种自由教育对皮埃尔很起作用，他的智力得到了很好的开发，他的特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取得了很大成果。16 岁就成了理科学士，18 岁获得了理科学士。本来还可以继续深造，但受家庭经济状况的约束，所以在 19 岁时就被任为巴黎大学理学院德山教授的助手，一直作了 5 年。平时他与他博学多才的哥哥雅克一起做研究工作。雅克思维敏捷，什么东西都是一学就会；皮埃尔善于周密思考，干起事来从容谨慎，常常可以发现和纠正雅克的差错；雅克敏捷的思维能力常常给皮埃尔以新的启示。哥儿俩配合十分默契。还在 1880 年，皮埃尔 21 岁时，兄弟俩就一起发现了一种重要现象——压电性。他们观察到，对某些晶体加压时，它们就带有电荷。如果将这些晶体充电的话，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and 现象呢？他们探索着，要运用这一新的原理造福于人类。

经过兄弟俩大量的追索实验和研究探讨，他们发明了一种称为静电计的仪器。静电计的理论基础就是他们新发现的压电性。这种仪器能够准确无误地测量出很微小的电量。静电计对后来的科学家们也具有重大的价值。可以说这是皮埃尔兄弟俩对科学界一项杰出的贡献。

发明静电计之后不久，兄弟俩就分开了。他们卓有成就的合作结束了。他们到不同的城市工作，也许这是一种命运的巧合，或是一种遗憾，也或许是一种动力。雅克被任命为法国南部的工商业城市蒙培利埃大学的教授，皮埃尔被聘任为巴黎市立物理化学学院实验室主任。当科学家们认识到这兄弟俩发明静电计的重大意义之后，居里兄弟被授予朴朗泰奖。这是法国给予科学家的最高荣誉。

虽然给学院里的学生作“实验教学”要占去不少时间，确实影响了皮埃尔在学术方面的发展，那时实验室刚刚建立，一无所有，皮埃尔亲自参加实验室的筹建和准备工作。实验室交付使用后，当时的工作人员只有皮埃尔一个人，指导学生，购置仪器，打扫卫生，以及各种组织工作和杂事。使皮埃尔疲于奔命。科学研究是无法进行了。一直到理学院实验室工作就绪后，学校增加了一名新助手，这时，他才得以忙里偷闲，另辟蹊径，从事结晶学与物理学关系的理论研究。皮埃尔把晶体作为他研究的重要对象。越来越清楚的发现，晶体是一种固体，外缘是若干个平面，平面与平面相交成角，这种晶体反映出物质成分的特征。很多物质可形成晶体，例如矿物中的石英和花石，金刚石和红宝石也都是晶体，雪花也是晶体。盐，糖和其化合物在一定条件下也形成晶体。晶体有的是四面体，有的是六面体。很多结晶体具有对称的特点，如果将它从中间切成两半，两半的形状一模一样。这是因为晶体的原子是按一定的顺序排列的，就像士兵列队一样。

他对晶体的研究细致入微，几乎是夜不安寐。常常为想起一个问题从床上爬起来去实验室做试验或做记录。这种工作的最后结果是晶体的对称性原理。同行们称之为经世原理。这种原理成为近代科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晶体在工业上已广泛应用。现在已用到无线电发报机和许多科学仪器中。此时的皮埃尔还十分年轻。

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皮埃尔又进行他的实验研究。发明并且制造了一种最精确的天平。它可以既迅速又准确地称出极少量物质的重量。这也是科学家们必备的仪器之一。为了表示对皮埃尔的尊重，科学家们称之为“居里天平”。

不同物质的磁性是皮埃尔感兴趣的又一个课题。许多物质都可以磁化，这种磁性使物质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皮埃尔决定对几种物质的磁性进行研究。经过大量的分析和认真的思考，刻苦的钻研，他又有了一个新发现。“物体的磁化系数与其绝对温度成反比”。这一发现后来被称为居里定律，在某一特定温度时，物质的磁性会发生变化。该温度称作居里点。这一发现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可与哥吕萨克定律之说相媲美。1905年朗元万教授发表的著名“磁性学说”，就是依据居里定律再从理论方面求证出反磁性与顺磁性二者不同起因。在当代电话、电报、无线电和电视器材工业中利用不同物质的磁性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皮埃尔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既没有专门的实验室，也没有必需的经费。只有校长理解他，给他以微小的支持，每年从学校科研经费中支持极少的补助金。实验地点常有变动，有时去楼梯拐角处的走廊上，或者实验室里未占用的小块角落。时间就更要靠他自己挤了。除完成日常本职工作外，才是他支配的研究时间。这样残酷的环境和条件，却产生出了伟大的成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信心是无法办到的。

这些课堂以外得来的辉煌成就，使他已经享有盛名了。然而，皮埃尔从没想过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到了1894年，皮埃尔还只从法国国家得到每月300法郎的工资——几乎与工厂里的专门技术工人的工资差不多。他不在乎经济问题，他从没有想过或者说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在与玛丽的接触中，玛丽很快就发现皮埃尔在荣誉金钱方面十分腼腆，不愿要求晋级和获得较高的地位，也不愿企求什么荣誉和奖赏。而在皮埃尔看来，科学家真正的乐趣不在于请求荣誉和奖赏，而应该全力从事有意义的研究工作，为科学服务，为人类服务。

1893年时，不少人为他的卓越贡献而倾慕，劝他去请求候补一个教授位置。而他却回答说：

“我认为无论请求何种地位，都是不名誉的，我不习惯做这种事，尤其是不习惯做这种败坏道德的事。”

然而，科学界的朋友们却为他愤愤不平。大家认为他对科学作出贡献与得到的待遇极不相称，一定申请一个名誉。

有一次，他就职的理化学院院长提请授他一种勋章，他不假思索地严肃拒绝。

“校长先生：……请您不必提议；我已经决意永远不接受任何勋章，若是您替我请求到这种勋章，您反倒使我费事去拒绝接受。敬请不必费神，以免我不得不采取人们觉得可笑的步骤。你对我的关心我已十分感

激。”

几个月过去了，皮埃尔和玛丽随着彼此的尊崇，钦慕和信任的增长，友谊越来越深，感情越来越亲密。这天，他们又一次气喘吁吁地爬上佛扬替纳路 11 号 5 层楼上，玛丽的小阁楼。他怀着一种热情洋溢的心情。把自己新近出版的单行本《论物理现象中的对称性原理：电场和磁场的对称性原理》一书送给玛丽，并在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道：“著者皮埃尔·居里谨以尊敬和友谊赠斯可罗多夫斯卡小姐。”以表示他对玛丽的亲切敬意。

玛丽仍旧是一身半旧的衣服，不施脂粉，仍旧一副热烈固执的神气，屈着身子拨弄着酒精炉，为皮埃尔烧水泡茶。在这个空无所有的陋室里，只有玛丽显得更有生气，更为柔美。此时的皮埃尔已经成为这个极聪明，极颖悟的波兰女子的俘虏，他服从她，他爱她，他听从她的所有劝告。

“论你的聪明才智和已取得的成就，你应该去申请博士学位。”她微笑着说。这句话如果出自他人之口，又会被倔强而任性的皮埃尔顶回去。可是现在他哑然了。他已知道，这位女性不是在毁灭他，而是在挖掘和启发他，他不得不承认他已经成了玛丽的俘虏。并很快点点头，接着又从他那不多的语言的口中挤出：“好的，我试试看。”

在玛丽的支持和鼓励下，皮埃尔很快写出有关磁性方面的著作，并且向索尔本大学的教授们提交他在磁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举行博士论文答辩会那天，他邀请玛丽出席，皮埃尔的父亲和许多亲朋好友们都出席，听取他向主考教授们阐述他的科研工作。皮埃尔沉着冷静，回答主考者的提问，语言之流畅，逻辑之严密，令教授们频频点头，令旁听者为之钦佩。教授们因他杰出的成就向皮埃尔颁发博士学位。皮埃尔和知名的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交情很深。皮埃尔获博士学位后，开尔文、玛丽和另一位法国物理学家说服皮埃尔的上司给皮埃尔晋级，结果皮埃尔被任命为物理化学学院的物理学教授。玛丽感到由衷的骄傲，并在她那简陋的顶楼里为他举行庆祝。

那时，正是 6 月，阳光明媚，气候很好。玛丽把桌子上堆放的书籍整理码好，桌子的右角上摆着一盆鲜活的白雏菊花，酒精炉上热茶的清香飘满一屋。桌子破例摆了一盆汤和四个碟子，全是这个波兰女子亲手做的华沙茶，紫色的巴尔什茨，塞肉的白斑狗鱼，罌粟子糕，蘑菇白菜，巴兹基。还有一瓶伏特加酒。这是玛丽第一次自己做这么多菜，也是到巴黎 3 年来第一次这么有雅兴做菜。她感到荣幸，一种由衷的荣幸。她为皮埃尔祝贺，为皮埃尔高兴。

皮埃尔对玛丽所做的华沙菜吃得津津有味，一种新鲜，一种幸福萦绕在他的心头。

“为你取得博士学位干杯！”

“为我们的幸福干杯！”

“干杯！干杯！”

几杯伏特加下去，皮埃尔终于说出了几个月来压在心头的心里话。

“玛丽，你留在巴黎，对你的科学研究会有前途的，玛丽……”虽是转弯抹角，但给人的感觉是迫不及待。

“不，皮埃尔，我是波兰人，我要回华沙，那里有需要我的工作。尤其是有我年迈的父亲，我答应过他，陪他度过晚年……”玛丽似乎没

有理会。

皮埃尔很失望，露出极其忧郁的神色。赌气地说：“你没有权利抛弃科学。”

玛丽心里很明白，她已经爱上了皮埃尔，并且断定，只有跟皮埃尔在一起，她的一生才有幸福。但是她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跟一个法国人结婚，今后可能要留在巴黎。她感到这等于背弃了波兰和自己的家庭。但是，她又舍不得放弃皮埃尔。种种矛盾，种种顾虑交织。此时，她已经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数学学士学位。于是，她决定，先返回华沙度假，在那里她可以同父亲商量，也可以静静地思考自己的问题。

她见皮埃尔一副哭丧着的脸，便说：

“我已经考取了数学学位，我得回华沙度假，陪父亲几个月，并取得父亲的许可。”玛丽缓了口气，低声地说道。

皮埃尔有了一线希望，松开了绷着的脸，站起身拉着玛丽的手。

“玛丽，你一定要回来，今年10月份，我等着你。”

“你应该自信，我很愿意回来！”

两双散发着化学药品的，两双摘取科学桂冠的手紧紧地、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3 婚礼

这是一个令人烦扰而又多虑的夏天。玛丽回华沙度假，没有了往日的欢歌笑语，一直保持着一种缄默。特别是对今后怎么办想得更多。

自从卡西密尔的父母极力反对儿子娶一个贫苦的女子之后，她就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会爱一个贫困的女子。初恋给她带来的是深深的伤害与屈辱。她发誓不爱任何一个男人，在友谊与爱情之间划开一道鸿沟。直到26岁，她仍然遵循着这一原则。皮埃尔的出现，无疑对她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她不能不相信自己已经爱上了皮埃尔。但是皮埃尔的家庭，父母的态度呢！如果父母反对，皮埃尔又会成为第二个卡西密尔吗？另外，嫁给皮埃尔就意味着留在巴黎，父亲由谁照顾呢？她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她决定应该跟父亲谈谈她跟皮埃尔的事，并告诉父亲，她非常爱那个青年人。

“爸爸，我该怎么办呢？”玛丽一脸愁容。

“我的玛妮雅，你自己作主吧！”父亲的爱是伟大而纯洁的。“不管我的要求是多么自私，父母最衷心的愿望是儿女获得幸福。如果你很爱他，觉得跟他在一起会很幸福，那就跟他结婚吧！”

在以后的岁月里，父亲的这席话时常在耳边回响。

“爸爸！你真是我的好爸爸。”

从这时起，玛丽她心里就有了底，也预示着将与皮埃尔度过终生。

在华沙的几个月中，玛丽过得非常开心，她游遍了整个华沙，以及乡下亲戚家。不论玛丽在什么地方——克瑞塔兹、勒姆堡，克拉科夫，华沙，皮埃尔·居里都会有信跟踪到那。每封信里均是言辞恳切地说服她，引导她回法国。并痴心地告诉她，皮埃尔·居里在焦急地等着她。

“……我希望你好好休息，储蓄精神，在10月里回来。至于我，不会到任何地方去，我留在乡间，整天消磨在我那开着的窗户前和花园里。

整天在焦急的盼望中”。

“您不给我写信，我非常悲哀，我每天都在等着您，我盼望日子快快流去。”

这位伟大的学者对恋人的爱慕含蓄而深沉，封封情书里充满对爱情的渴望和热烈，但字里行间却没有一个爱字。

三个月在人生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但对玛丽和居里来说是漫长的。暑假终于在居里和玛丽的书信交往中和焦急的盼望中结束。皮埃尔急迫的心情终于得到了报偿，玛丽如约回到了巴黎。

但是由于玛丽在恋爱上受伤害的心还未完全得到缝合，尽管皮埃尔是诚挚而热情的，但无法使她尽快决定是否作皮埃尔的妻子。回到巴黎后，玛丽照样过着孤独清苦而求学的日子。布罗妮雅在沙透敦路 39 号开设了一个诊所，玛丽住进了布罗妮雅办公室隔壁的一个小房间里。因为德卢斯基一家在拉维垒特路租了一套公寓，布罗妮雅只是白天到这里来给病人看病，到夜晚，就剩下玛丽一个人，她就可以不受干扰地埋头学习和工作。

皮埃尔对玛丽的爱慕与日俱增。这所阴暗而且有点闷闷的房间，成了皮埃尔和玛丽频频约会的场所。皮埃尔经常重复地提出他那含情脉脉的要求。

“玛丽，答应我，嫁给我好吗？”

玛丽的倔强并不亚于皮埃尔。每当皮埃尔提出这个问题时，她要么静默，要么扯到某一科学的问题上，转移皮埃尔的注意力，而只要谈起科学，皮埃尔便眉飞色舞。皮埃尔滔滔不绝地谈起来，那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几乎忘却了世间无数烦恼。

沉稳而倔强的玛丽，这一次是决不肯轻易答应这件终身大事的。

“玛丽，我希望你认识我的父母，我同他们一起住在梭镇一所小房子里，他们和蔼善良，待人好极了。父亲是一个高大龙钟的老人。就是有时候有点性格暴躁，但极端仁慈；母亲操持家务，身体有病，非常善良，勇敢而且愉快。哥哥雅克聪明潇洒，他看到你的照片，他很赞美您，并且说你是个很倔强的姑娘。”

玛丽同意了。丑媳妇也得见公婆面，她也想见见这两个老人，听听他们的意见。听皮埃尔的介绍，她已知道他们两个家庭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大概是神灵的驱使吧！

居里夫妇很热情地赞扬这位未来的媳妇，他们没有被儿子的选择所惊讶和恐慌。这位有身份有地位的双亲与几年前卡西密尔那蛮横、势利、固执的父母形成强烈的反差。玛丽心潮起伏，几乎觉得她已是居里家的一分子，她已经爱上了他的父母，爱上了他的家庭。

皮埃尔不厌其烦地说服玛丽作他的妻子，是因为他与玛丽有一种天生的缘分，有同样的信念，那就是科学是生命中的惟一目标。这种信念此时更加完整，更加纯洁，毫无虚假沾染。这位学者倾向玛丽是受到爱情的驱使，但更是出于对科学追求的需要。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皮埃尔见玛丽总是缄默不语，不明确答应他的请求。便认为她是害怕留在巴黎。于是他用了激将法。表示愿意放弃在巴黎从事的科学工作，随同玛丽去波兰。他说他可以先教法文，然后再尽力量所及和她一起从事科学研究……

同时他还提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而又荒唐的建议。他说：“即使玛丽你不爱我，不愿意同我结婚；我们可以考虑一个保持纯友谊的安排。”

“什么！纯友谊的安排？”玛丽迷惑不解。“在模佛达路我有一所房子，窗户高大而且明亮，窗户外面有一个四季花香、绿荫掩映的花园。环境好极了，房子可分成独立的两部分，我们可以各自住一部分，以便我们合作搞研究工作”。

看到皮埃尔那严肃认真的样子，玛丽笑了起来，一个劲地说：“荒唐，荒唐极了。”

这位具有天才的青年物理学家，这位立誓永不结婚的男子汉，此时却在一个从前受一家波兰小地主轻视的家庭女教师面前，谦卑地恳求着。他已经完完全全被玛丽所融化，被玛丽的魅力所吸引。

玛丽对德卢斯基夫妇说到了她的顾虑，说到了皮埃尔竟有牺牲自己对科学的追求而跟玛丽移居国外的打算。布罗妮雅也为妹妹的忧虑而大为不安。

皮埃尔知道德卢斯基夫妇是玛丽在巴黎的惟一亲戚，他们对玛丽的心思十分清楚。便试图以此来打开缺口。他几次去找布罗妮雅夫妇，并表明了自己的恳求和诚意。希望布罗妮雅支持他。

真诚所至，金石为开。皮埃尔用这些激动人心的行动，充满柔情蜜意的语言，不可抗拒的深厚魅力，叩开了玛丽的爱情大门。10个月，整整10个月过去了，这个同样固执的玛丽经过千思万虑，终于答应了皮埃尔的请求，同意与皮埃尔·居里先生结婚。

1895年7月26日，凉风轻拂，旭日冉冉升起，蔚蓝色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玛丽在沙透敦路屋子里很早就起了床，这是她在这个房间里住的最后一天，今天就要成为皮埃尔·居里夫人了。这间房子她住了10个月，是她生活学习以及与皮埃尔频频约会的场所。她的重大决定就是在这所房子里作出来的。一种恋恋不舍之感油然而生。但是，她没有遗憾，做居里夫人是她一生的幸福。她有一种自豪感和荣誉感。她怀着极其愉快的心情为自己成为新娘子精心地打扮着。把那一头柔软而可爱的金发梳好盘成一个髻，高高地束于脑后，穿上那套海军蓝的毛料裙子和一件浅蓝条纹的上衣，显得既年轻又高雅。

皮埃尔比约定的时间还早半个小时就赶到了。见修饰后的玛丽尤为妩媚动人。白皙的脸蛋上露出两朵红云，真是玉唇未启笑先起。她那秀丽的眼睛无论如何也不敢对准皮埃尔那含情脉脉的目光，只是一味地盯着脚趾尖。皮埃尔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激动，他轻轻地搂着她，吻她的前额，她的脸蛋。玛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温柔和顺从。慢慢地他们静下来了，互相看着，似乎都觉得眼前人儿的可爱和伟大。时间不允许他们多留，他们须在卢森堡车站乘车到梭镇，他们的父母亲属在等着他们。这对青年夫妇告别了这所独居小屋，迎着灿烂的阳光，手拉着手，坐上奔驰而来的公共马车。走过圣米雪尔大道，经过他们熟识的地方，他们眼神对视着，是那么明亮，那么热烈。

中午，在西奥镇行政总署的小礼堂里，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婚礼。皮埃尔的父母，专程从华沙赶来的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和玛丽的姐姐海拉，德卢斯基与布罗妮雅，还有一些十分亲近的朋友——大学里的教授，教师，出席了他们的婚礼。大家亲热地为他们祝福，分享他们的幸福和

快乐。之后他们来到皮埃尔父母住房的花园里，一边吃着喜糖，喝着热茶，一边笑侃着皮埃尔。皮埃尔那快乐幸福之情流露得淋漓尽致。他认真地说：“我一生中就是这件事没有迟疑，并自信十分正确。”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激动地用法语同居里大夫说出了他发自内心的话：

“你老真是好福气，玛丽是个值得疼爱的女孩子。从小她就十分懂事，十分聪明。”

居里大夫很高兴，他为自己的儿子美满的婚姻而感到高兴。

婚礼议程非常简单而庄重，没有婚纱，没有结婚戒指，没有“喜筵”，没有宗教仪式，没有公证人。结婚用品只有用亲属的礼金买的两辆崭新的自行车，此外就一无所有了。然而这对婚姻却是人类婚姻史上一个伟大动人的佳话。

4 青年夫妇

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共同的爱好和兴趣给他们婚后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甜蜜和浪漫。

婚后不几天，他们便决定旅行。没有私人小汽车，也不购买车船票，更不预定旅馆房间，而是骑着崭新的自行车，逍遥自在，随心所欲，带上几件衣服。因为是夏天，是巴黎的雨水季节，不得不买了两件胶布长斗篷，漫游在法兰西的乡村路上。他们漫无目标，走到哪就睡在哪，吃在哪。有时他们在树林里空坪的苔藓上一边听鸟儿唱歌，一边欣赏奇花异草，一边吃午餐：面包、干酪、梨、樱桃。虽然简单，而他们总是兴致勃勃，津津有味。晚上，随便到一所客店里投宿，喝店主给他们煮得很浓的汤、睡一间墙纸褪了色的房间，双双坐在蜡烛灯下谈一天的发现和趣闻，时而大声说笑，时而窃窃私语。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远离喧嚣城市的乡野之夜，沉寂得只听到远处的犬吠，猫的狂叫，鸟的低鸣。第二天一早，他们喝过咖啡，吃过早点，带上那简单的行李，骑上心爱的自行车，在另一条路的林荫下继续前行。

简陋的乡村房间住一晚只付几法郎，踩几千下自行车的脚蹬，就可以过几天几夜的逍遥日子，就可以享受旅游的宁静和快乐。

皮埃尔极爱乡村，他想考察丛林和岩石时，就暂时中止自行车旅行而去散步。

有一天，雾散雨停，晴空万里，皮埃尔和玛丽把自行车寄在农夫家里，离开大道，走进一条弯曲泥泞的小径。因为他这一计划已告诉过他的新婚妻子，玛丽剪短了裙子，穿一双厚实的平底鞋，以便走路。她还去掉了头上的帽子，打破欧洲妇女出门必须戴帽子的习惯。穿一件清新的白上衣，腰间束一条很适用而粗糙的皮带，带子上的小口袋里藏了一把刀，一点钱和一块表……皮埃尔带着指南针和一点果子，大步前行，玛丽不知疲倦地在后面跟着。

皮埃尔高声地谈着小时候他父亲带着哥哥和他到乡村抓动物做试验的故事。他说：有一次我们跟着父亲到田野去捉青蛙，父亲讲青蛙与人有很多器官十分类似，用它作药品试验和解剖研究很有用处。开始我父亲抓青蛙，抓了一只不经意放到雅克手掌中，吓得雅克大叫大喊，结果挨了父亲一顿批评，说他太胆小，搞物理学的不能不喜欢动物。

他边说边走进周围都是芦苇的池塘，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高兴，他抓了不少蜻蜓、蝌蚪，一边抓，一边不停地讲这些小动物的活动场所、习惯、特征，爱好，说蜻蜓、青蛙等都是庄稼的保护神，是除害能手。玛丽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发出一些疑问，让皮埃尔不知疲倦地讲下去。她一面听丈夫没完没了地讲解，一面看白云飘动的天空，慢慢地就睡着了。

皮埃尔没听见妻子的回音，他灵巧地采来一把黄色的鸢尾花和浮在水面的浅色睡莲，轻轻地放在妻子身边，并编扎了一个美丽的花冠。轻轻地赶走爬在妻子身旁的小虫子，然后俯下身去，在妻子那向上翘着的玫瑰红嘴上吻下去……。

歇够了，玛丽叫皮埃尔把那些小动物放回池塘，让它们去享受自由生活的快乐，然后他们又走上小径。玛丽捧着丈夫为她采的野生稀品——睡莲和鸢尾花，还有一些新鲜的草莓和蘑菇，戴着丈夫为他编织的花冠。紧紧地跟在丈夫身边。这一段时间的乡村的漫游，在草原上远足，在山丘间的攀登，在树林中散步，那绵绵情意，仿佛他们是世界上最无忧无虑的人，最幸福美满的人。

一路上，皮埃尔把内心的思考告诉自己的妻子，研究工作上的困难很多，结晶体成长的奥秘需要寻找新试验所要装备的仪器。当他谈到结晶学上的一种困难工作时，脸上露出严肃而忧郁的神色。玛丽认真地听着，而且总是有一种聪明而新颖的答复，她常常激励丈夫去排除困难，开拓新的研究项目。

在这些悠闲而幸福的日子，两颗心的共同跳动，两颗天才的脑袋紧密结合。使他们体味到了无穷的乐趣。他们是那样和谐，那样默契，并留下了许多甜蜜而幸福的回忆。

夏天，在愉悦的旅行中送走了，迎来了风和日丽的秋天。这时，布罗妮雅夫妇邀请皮埃尔和玛丽到他在法国北部城市的别墅里去聚会。

卡西密尔一家在商提宣附近租了一个叫做“鹿”的别墅，这是一座幽静的住房，房子深藏在树林中，周围由森林包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屏障。大有与世隔绝之感。树林里到处有野鸡和野兔，还有小松鼠，各色小鸟。地上满是绿绿绒绒的小草和铃兰花的叶子，宽敞的房子装饰得和谐而雅致，犹如一座富有诗情画意的仙境。别墅里住着两个民族，老少三代人。老德卢斯基夫人，卡西密尔、布罗妮雅，她们的女儿艾兰娜——绰号“绿”。斯科罗多夫斯基教师和海拉来巴黎参加玛丽的婚礼，已经延长了留在法国的期限，也住在这里。玛丽和皮埃尔也加入了这个庞大而热闹的家庭。他们相处得非常和睦，谈话十分投机。情谊愈益浓厚。

1895年10月，这对新婚夫妇回到了期待着他们的工作中。他们住进了格拉西埃尔路24号，这是一套空空的三个房间的小套间，这套住处的后面有一个别致的大花园，花园里有葱绿的树木和蔷薇，草地上有盛开的铃兰花。他们几乎没有花钱装饰房子和添置家具，甚至谢绝了皮埃尔父亲送给他们的几把椅子和一张沙发。他们认为：还是少一点家具用具好，免得擦灰尘，搞卫生。他们也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搞家务、擦桌椅擦灰尘上。夫妻俩一致表示不在家里聚会和接待宾客。所以在他们的工作室里，只有一个大书橱，一张白木桌的工作室。桌子的一头是玛丽坐的椅子，另一头是皮埃尔的椅子，书橱里全是一些物理化学等科学书籍，

桌子上堆的是他所正在学习的物理学专门书籍，一盏供他们照明的煤油灯。房间里只有一盆鲜花，为其增添鲜活和美感。如果哪个客人不请自到，踏进这高高在上的5楼，看见这空空如也连他们的座椅都不具备的房间，马上会溜之大吉。

现在有两个人生活，有了一个小家庭，玛丽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地安排生活，胡乱地填一下肚子就了事。幸好皮埃尔跟她一样，对生活的要求很低。但无论怎样马虎，他们还是要吃饭的。这个小家庭的进款是每个月皮埃尔在理化学院领回来的500法郎工资。为了做到收支平衡，玛丽买回一个黑色账簿。作好支出项目。因为玛丽在未考得大学毕业生在中等教育界任职文凭之前，是无法找到适合她自己的工作。这笔钱只能使他们勉强度日。

组成家庭，对于一心从事科学研究的玛丽来说，最大的困难和付出便是时间和精力，每天天色朦胧，她要出去买菜，等皮埃尔起床洗漱之时，她已经弄好了早点，与皮埃尔一起进餐。

每天，玛丽得用8小时进行科学研究，3小时料理家务，有时还不够，每当晚上，她做完家务，在白木桌的另一把椅上坐下后，先是要拿出那个账簿记下当日的支出，计算总支出，还剩多少，以便后面的日子不至于窘迫。然后才专心预备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考试。皮埃尔在煤油灯的那一头，埋头制定在理化学校新课程的教学大纲。不时用两双深邃的眼睛互传他们的爱恋和赞美的信息。屋子里只听见书页的翻动和沙沙的写字声。

当许多年轻夫妻沉浸在甜蜜的安逸中时，皮埃尔、玛丽却面对着的是实验室，工作台和科学书籍。他们从中而取得乐趣。这段时间，玛丽又有一段十分紧张又愉快的日子。从1896年7月至8月，玛丽要参加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考试。家务和研究工作并未给玛丽的学业带来丝毫影响。玛丽再次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大学毕业生中等教育界任职考试第一名。很快，她被批准在皮埃尔的实验室工作。

皮埃尔望着永远第一的妻子，并未表现出疯狂的热情，而是一言不发地擦好了两辆自行车，打足了气，装满了行囊，伸出他那自豪的双臂，紧紧搂住那引以自豪的妻子，两个人紧紧地臂挽着臂，走到格拉西埃尔路，骑上自行车，启程到奥佛尼作考察旅行。皮埃尔认为，这是对妻子长时期疲劳的最好奖赏。他们攀上奥布拉高原，在凉爽的绿草地上数星星，看浮云；在特卢耶尔爽谷中手拉着手，闲悠徘徊，驾着顺流而下的小舟听两岸传来的悠扬的民歌声；在大片耕田里穿行；沉浸于朦胧的月光山色。他们的精力是那样充沛，他们的情趣是那样美好，他们的度假方式也如此独特。只有玛丽，这位智力过人的女物理学家才能适应皮埃尔那独特的生活方式。

1897年3月，玛丽写信给她的朋友卡霏雅，告诉她一件兴奋的消息。她怀孕了。她希望有个小孩，因为这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但埋怨妊娠反应给她带来苦恼。倒不是因为这使她身体感到不舒服，而是因为这不能使她继续工作。她现在正在研究钢铁的磁化作用。也就在此时，皮埃尔的母亲又患了癌症，全家人都沉浸在哀伤之中，玛丽想尽力帮助婆婆干点事，给婆婆以安慰。但她头晕呕吐，心中很是懊恼。

居里先生和夫人也能谅解，总是劝她好好休息，不要累垮了身体。

这时，最辛苦的是皮埃尔，他既要埋头工作，又要照顾妻子，还要关照患病的母亲，每天奔忙于实验室，妻子身边和西奥镇母亲身旁，忙得不可开交。玛丽十分担心。害怕累垮了丈夫的身体。所以，她总是强忍着妊娠的反应，支撑着做家务，以减轻皮埃尔的负担。

恰在这时，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从波兰到法国度假，住在布朗港的豪士·格林斯旅馆。皮埃尔为了让妻子好好休息。把妊娠的妻子托付给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照料，自己继续做研究和教学工作，以及照顾母亲。

这对相亲相爱的小夫妻从结婚以来，从没分开一天，这次迫不得已的分离真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没过两天就去一封信。一次皮埃尔用生疏的波兰文写了一封信给玛丽，用以表达自己的爱心。

我极端喜爱的如此亲切和温柔的小姑娘：我今天收到你的信，觉得很快乐。此地没有什么新鲜事，只有我爱你，我的魂已经随着你飞去了……

玛丽用初学的人能懂的波兰语写道：

亲爱的丈夫：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气候热了。你不在这里使我很愁闷，快来吧，我从早到晚等着你，可是总看不见你来……

一向随便而且粗心的皮埃尔在快做父亲的时候，也表现出了特别的耐心和仔细。他跑到市场上，买了两件针织的婴儿长袖衬衣，一件是最小的尺寸，一件是大一号尺寸，并由邮局寄给玛丽。

玛丽看着精美的婴儿服装，一股幸福的热浪从心中涌起，她对皮埃尔的爱更加炽烈，更加深沉。举笔写道：“我亲爱的丈夫，我多么想你！你不在我身边，我感到愁闷，寂寞，你快来吧！”

信为他们联络信息和感情。皮埃尔出自对妻子强烈的爱，毅然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从百忙中抽出时间迫不及待地跑到布朗港，看望他已怀孕 8 个月的妻子。这对学者不知是疯了还是特性，竟不假思索地骑上自行车到布勒斯特那个大军港上去玩，看无边无际的蔚蓝色的海，让轻柔的海风梳理自己的思绪。他们毫无顾虑跑这跑那，皮埃尔看见妻子笨重的身体，便问她感觉如何，而玛丽坚持说一点也不觉得累，皮埃尔也相信她的话，相信自己的妻子是超自然规律的，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是与众不同的，她的一切是不受自然规律约束的。他们对大自然的酷爱，使他们近似疯狂。

这次旅行后他们回到了巴黎，玛丽的身子越来越沉重，于 1897 年的 9 月 12 日，一个美丽的婴儿，一个像她妈妈一样出类拔萃的女科学家，一个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诞生了。居里大夫亲自担任助产。玛丽和皮埃尔十分高兴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伊雷娜·居里。这是他们生命的延续，这是他们真正爱情的结晶。这次分娩也没有什么声张，只是增加了 70 法郎 50 生丁的医药和看护费，致使 9 月份中的总支出为 430 法郎 40 生丁。

第五章 共同理想

1 两个新元素

女儿的出生，给小家庭增添了喜气和快乐，也给皮埃尔和玛丽增加了不少活计。这就需要玛丽在家庭生活和科学事业之间作出抉择。而玛丽则认为事业和家庭两者都重要，二者都不可丢。单薄而坚强的玛丽决心把爱情、母职、家务、科学一肩挑起来。她有热情、有决心，而且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

她身体刚恢复便投入了科学工作，并坚持自己为孩子哺乳。可是不久，医生说她的左肺有结核病变。因玛丽的母亲是患肺病去世的，怕有遗传，要她立即终止哺乳，并劝她到疗养院去治疗。为了孩子的健康，喂奶是中断了，但去疗养院却被她坚决拒绝了。她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有实验室、有家、有丈夫、有女儿……她怎么能丢开这一切而去疗养院呢？

她的公公居里大夫给了玛丽很大的帮助。还在伊雷娜生下来之后的几天，老居里夫人就因病去世了。从此这位善良的老人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刚出生的小孙女身上了。他细心地照料这个小女孩，经常把她带到花园里享受新鲜空气。孩子被公公看着，玛丽可以更加放心地从事自己的事业。

玛丽的下一个目标是攻取博士学位！要想获得索尔本的博士学位，没有新课题新发现是很难通过考试的。茫茫宇宙，众多的未知现象，玛丽如何确定她的研究课题呢？

还在玛丽分娩期间，国际科学界就有了新的发现。那是 1896 年，亨利·贝克勒尔博士向法国科学院提出了一篇论文，涉及了他正在探讨的一种新现象。贝克勒尔不知道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甚至他还没有给这种奇怪的现象命名。

玛丽和皮埃尔已经获悉了贝克勒尔所进行的这一研究，同时也了解到他是用一种叫做铀的神秘元素进行试验的。玛丽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认真阅读了贝克勒尔关于铀能发射特殊“辐射”的论述。知道贝克勒尔是受某种带光的物体在光照作用下产生放射性的现象所启发，并经过大量实践和观察，发现了一种新的奇怪现象：铀盐在不与任何光线的接触下，自己能发出光线来。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他便一无所知了。

玛丽曾经读过他的有关研究报告和论文，觉得很有启发；这次她又细心地研读这些报告文集，越读越有兴趣，越读越大开眼界。于是她迅速搜寻有关资料，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巴黎所有的图书馆和资料情报部门，查阅最近的各种实验报告。但涉及这个课题的全部资料，只是亨利·贝克勒尔在 1896 年提交法国科学院的几篇学术报告。

玛丽正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与皮埃尔商量。在讨论有关重大问题时，皮埃尔的意见很重要，因为他既是一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物理学家，又是玛丽所在的实验室主任。现在玛丽年少时那种冒险家的好奇心和勇气又冒了出来。她必须要选择一个有重大影响的课题，哪怕上刀山下火海。贝克勒尔的研究论文是个吸引人的课题，是个全新的课题。

是迄今为止，谁也未曾涉足过的领域。她可以抓住这个放射性现象，去寻根究底，揭出真相。铀化合物以轴射形式发出来的极小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这种轴射现象的性质是什么？……所有欧洲的实验室还没有人深入研究过轴射线。玛丽可以从零开始，如果在研究中能获得重大发现，她将对科学作出重大的贡献。她要大胆地去从事一种科学冒险，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皮埃尔听完玛丽的想法之后，兴奋不已，他积极支持妻子去开垦这块处女地。

有了这种思想，还必须要有一套的装备。要做实验，必须要有一个放置精密仪器的实验室。这是横亘在她面前的第一个难题。皮埃尔正设法替她四处寻找，向朋友打听，可答复都令人失望。最后皮埃尔向理化学学校校长求助，才在教学大楼底层找到一间储藏室。假如说这是一间贮藏室或机器房，还不如说这是蜘蛛、昆虫之家，破烂阴暗，潮湿得冒水。夏天，室内像个闷罐，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冬天，潮湿的墙壁几乎结成冰块，没有暖气，更没有电气设备。玛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在没有任何可供参考资料和专家教授指导的情况下，靠崇高的理想和顽强的意志支撑着，开始了她的研究工作。

玛丽过惯了艰苦生活，对这种极端的处境满不在乎，只是她的精密仪器敏感性太强，在室温低到 6 度时，往往失去准确性，导致研究出现误差。玛丽在计算时不得不考虑误差的干扰，这影响了她的研究进程。

她要找出从各种不同的铀化合物中发射的射线有多强。这样，她必须测出现有的样品在电器中所引起的漏电时间的长短，在试验中，皮埃尔和雅克前几年共同研究发明的静电计帮了她的大忙。

玛丽的验电器是一个金属盒子，旁边有两个小孔。盒子里有一条垂直的铜片 B，连接在盒盖内一块绝缘体硫磺 SS 上，与铜片连接在一起的是一根横着的导线。导线的一端是个小铁珠，另一端是电容器极 P¹，连接铜片的还有一条金箔。金属盒子和地相连，要把测试的物质放在连接盒外的电容板 P² 上，接通电源后，那个新物质就使电容器板 P¹ 和 P² 之间的空气导电，这时，验电器的电荷就开始流走，金箔就逐渐落了下来。

1898 年 2 月，一连几个星期，玛丽都把自己关在那间冰冷潮湿的贮藏室里做这种实验，常常几个小时瞪大着双眼，通过显微镜和电器盒上的小孔来观察所发生的现象。她发现金箔落下来的时间与轴射线成正比。她不放心，重复地做了几遍，反复细致地观察后认为：铀元素的放射性强度，即射线的强度或力量，与它放在电容板上的样品所含的纯铀量成正比；而这种放射线竟不受样品的化学结构的影响，也不受光、温度和它本身以外的任何东西的影响，这是一种性质很独特的射线。但是这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

这天晚上，玛丽回到家中，一边吃饭，一边兴奋地告诉皮埃尔，她经反复试验和观测，铀化合物中含铀量最大的具有最强的放射性。不管用什么化学试剂处理铀，其放射性强度都不会增强或减弱，并且不受任何光、热、电流和气温变化的影响。

皮埃尔很赞赏妻子这一细致的观察和发现。他知道，物理学上常有一种不可解的现象。学者们常对一些现象进行追踪试探性研究，但经过多次研究后，却归入以前已知的定律。研究者们也就慢慢对这些新奇现象失去了兴趣。皮埃尔当时的心里，也是把妻子归入这种情况，微笑着

点头，而并未发表意见。

可这个倔强而好奇的玛丽，却不就此罢休，仍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继续研究下去。巴黎的冬天寒气逼人，常有大雪普降，陋室里那仪器瓶里常常结成冰块。玛丽的手指常常冻得不听使唤，拿不稳仪器。她搓搓手，跺跺脚，又埋头工作。越深入研究，玛丽越发现这个物质不同寻常，具有一种未知的性质。实验中虽然证明铀有这种现象，但是她没有理由证明铀是惟一能发出射线的化学元素。她认为，除铀之外，一定还有别的化学元素也能发出射线。她决定，对所有化学元素进行检查。

皮埃尔知道妻子的性格，她想到的事，必须去做，任何劝阻或困难都不会使她退下阵来。皮埃尔支持她，鼓励她，虽然这种支持是口头上的，但这是玛丽的精神力量，有了丈夫的支持，她的决心更坚定，她的勇气增强了。

到 1897 年，科学家们已发现有 80 种元素存在，玛丽要对这已知的 80 种元素一一进行测试，这是一个多么有胆量的决定，是一项多么巨大的工程！玛丽决心在那广袤的荆棘中辟出一条光明的大道。

放射性迷住了这个女学者，她放弃了对铀的研究，不知疲倦地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各种极不相同的物质。不久就有了结果。一种叫做钷的化合物，像铀一样，能自发地放射出同样强度的射线。玛丽很高兴，她的研究已经证实，这种惊奇的现象决不只是铀的独具特性。玛丽将这种特殊的性质称作“放射性”，从此时开始，“放射性现象”这一专有名字便成立了。她把铀和钷这些有特殊“辐射强度”的物质，就叫做“放射性元素”。

放射性现象使玛丽非常兴奋，她非凡的好奇心和探险精神已使她不满足于对盐类、氧化物这些简单化合物的研究实验，因为这些研究结果仍然不能解释放射线的神秘来源，她要马不停蹄地去寻找。她想，铀和钷可以从许多矿物中找到，然而，矿物中除了科学家所需要的物质外，还含有许多其它物质，如果要获得一种纯样品，那就必须从矿物中分离别的物质。玛丽决定抛开那些不含铀和钷的矿物质，而从含有铀和钷的矿石入手，逐一进行研究。

玛丽按照自己的假想立即付诸行动。把理化学校采集的矿物加工做成各种标本，然后用静电计一一进行检查。皮埃尔很赞成，并帮助玛丽从矿物中挑选硬的，容易碎的，奇形怪状的矿脉碎片。

玛丽知道，检查的结果应该是：不含铀或钷的标本，肯定不具有放射性；而含铀或钷的，一定有放射性。结果与预料是一致的。

于是，她对所能获得的矿物都进行了试验，并将具有放射性的区分出来。抛开那些不放射的矿物，专心研究其余的矿物。研究时她像着了魔似的废寝忘食。常常是皮埃尔把饭送到那又小又潮的实验室，她一边吃一边观察，整个身心都投入了研究中。在对一种矿石的测量时，她发现了一个十分惊奇的现象，有些矿物的放射性比纯铀或纯钷样品强二三倍。

玛丽感到奇怪，根据经验，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试验中的样品出了差错。学者们对于出乎意料的现象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怀疑的。

玛丽毫不犹豫地作第二次、第三次试验，这种放射性强度仍然大得多。她对此迷惑不解。过去，她一直认为矿物中的放射性元素和其它许

多非放射性元素是混在一起的。因此，矿物的放射性强度应当比纯放射性元素小。玛丽心想，是不是精密仪器受潮湿干扰出了差错，于是，她不厌其烦地用同样的矿物，重复测量了10次、20次，而所得的结果仍然相同：矿物的放射性强度比纯放射性元素化合物的放射强度大。

玛丽细心地一次又一次地用静电计反复测量，把样品重复称准，将仪器上的读数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最后，她断定这个反常结果不可能是因工作中的差错引起的。这不可能是由已知矿物中所含的铀和钍产生的，因为她对已知元素进行试验后排除了这种可能，她确信没有一个已知元素会引起这种极强的放射性现象。那么这种放射性是由什么物质发出的呢？

玛丽放下手中的仪器，蹲在堆放在这潮湿玻璃屋的矿物旁，抬起那双充满血丝的灰色眼睛，静静地注视着那令人迷惑、令人惊奇、令人捉摸不透的三种矿物——乌黑易碎的沥青铀矿、绿色闪亮的辉铜矿和黄色的铀云母矿晶体。隐藏在这其中的秘密是什么呢？她把试验的情景一遍遍地在大脑中过滤，翻开她那麻麻密密的记录本，反复推敲，反复思考。玛丽得出了一个在科学上有重大突破的结论：这些矿物中，肯定隐藏着某些未知的新元素，这种未知元素的放射性肯定比铀和钍的放射性强。这是还不知道的一种化学元素，一种新物质。

一种新物质！这是一个诱人的假定，到目前，它仍是一个假定而已。不少化学家已经对这类矿物进行过分析和探索而并未发现什么，而玛丽却从中发现了奇迹，可以推断，这种新物质一定存在，但含量是极其微小的。

玛丽站在仪器前，没有激动，没有喜悦。科学研究是极为精细的，成功要经过许多意想不到的艰难和曲折，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的成功和胜利必须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以至付出生命。

晚上，玛丽认真地向皮埃尔讲述自己的发现和设想。皮埃尔一直关注着玛丽的研究，并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忠告和建议，他也被妻子所取得的惊人成果及其远大前景所吸引。其实，妻子的这种假说已经在他心里成立了。皮埃尔知道，要从这些物质中寻找玛丽的假说和新物质，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是一项艰巨而遥遥无期的工作，但是前景辉煌，意义深远。这位伟大而有远见的学者决定中止自己对晶体的研究来协助玛丽。

玛丽喜出望外，这真是雪中送炭。在她面临大量工作而迫切需要合作者时，她的身边就出现了一个大物理学家，而且这个人就是她最崇拜的师长，最爱慕的终身伴侣，她的丈夫皮埃尔。3年前，魂牵梦绕的爱神已把他俩召在一起，让他们携手共进，攀登科学高峰。那是一种神秘的征兆，一种伟大的预见。上帝，真是神明。后来，玛丽在谈到他们的结合时写道：“在我们结合的时候，就感到他是我梦寐以求的人。他是世上最好的丈夫，谁也不能梦想找到比他更好的丈夫，这真是上帝的恩典。”

现在，玛丽不再是孤军作战，在那间简陋的工作室里，有两个天才的大脑，两双眼睛四只手共同思考和工作。这对玛丽来说，岂止是增加一半的力量，而是增加无可比拟的力量。皮埃尔不仅是她深深爱着的丈夫，而且是一个难得的合作伙伴，是她的精神力量和希望所在，有了皮

埃尔的参与，玛丽更加信心十足，勇气倍增。

他们俩密切配合，希望能尽快从玛丽所试验过的矿物中找出那隐藏着的新元素。经俩人研究后决定，应集中力量在 3 个强放射性矿物中选择一个进行试验，他们选择了沥青铀矿，因为它的放射性强度是纯铀的 4 倍，即使从其中分离出铀以后也仍然如此！他们估计要寻找的新元素可能只占这一矿物的百分之一。在他们看来，百分之一的含量已十分微小。可那时他们未曾料到，所要寻找的新元素含量竟不到沥青铀矿的百万分之一。与他们当时估计的距离多大啊！如果当时知道此项工作的难度有如此之大，又会出现何种情况呢？那么，至少他们心理上的准备工作要充分一些。

他们开始耐心而漫长的探索，并制定了分析沥青铀矿的新方法。他们已知的新元素能发出射线，于是，惟一跟踪的就是射线。沥青铀矿是由许许多多元素组成的，他们决定从中除去其他部分，直到最后剩下新元素为止。

他们要把沥青铀矿中所含非常小量的铝、银、铜、钡、镍、铋和钴等元素一个个地分离出来，然后逐一测量每一种元素的放射性，连续淘汰几次之后，他们渐渐能够看出那种“反常的”放射性是隐藏在这种矿石的某几部分中，这样就找出了那个仍具有放射性的部分就是新元素的藏身之处。他们的工作愈向前，探索的范围就愈小，他们运用的是警察抓罪犯，包围圈越缩越小的方法。

为了将不同元素分离开，居里夫妇将沥青铀矿装进几个大桶里，加入化学试剂及酸一起煮沸，再进行分离。这些沸腾的混合液需用一根沉重的铁棒不停地搅拌，而这混合溶液又是十分粘稠的。化学试剂在蒸发过程中逸出有毒的烟雾，因此，加热煮沸只能在户外的泥石地上进行，让这些烟雾随风飘走。不是学者不知道实验的艰辛，何况他们当时的实验场所是何等的简陋，设施粗糙得令人不敢想像。玛丽每天拿着那根笨重的铁棒几百次，几千次地搅拌，常常是一双手臂疼痛得无法抬举。更何况还有极费脑力的计算和研究。每天他们累得腰酸背疼。然而他们谁也不叫一声疼，坚持不懈，并肩奋斗。每分离出一种元素，就朝解开这个神秘之谜迈进了一步。

沥青铀矿终于斗不过居里夫妇坚韧不拔的意志，它的所有成份都被玛丽和皮埃尔分离出来了。奇迹出现了，实验的结果不是发现了一个放射性部分，而是发现了两个具有放射性的部分。玛丽和皮埃尔确切地认为，新的放射性元素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元素隐藏在沥青铀矿中的含钡的部分中，另一个则躲在含铋的这部分里。此时，他们艰苦的工作出现了一线曙光。

有了成功的第一步，就证实了他们的假说是真的。他们毫不松懈地继续探寻。首先他们从含铋这部分中鉴定出新的元素。他们又进行若干次分离淘汰。于是包含新物质的物质越来越小，试管里终于留下了仅有的一点溶液。试管里这点溶液经过试验，放射性是铀的 400 倍，其中含有铋和另外一种新元素。混合物中所含的新元素足够让玛丽和皮埃尔去探讨它的部分化学性质了。

1898 年 7 月，胜利终于向他们绽开了笑容。玛丽和皮埃尔正式宣布发现了两种未知元素之一的一种新元素。

皮埃尔舒展眉头，深情地对玛丽说：“亲爱的，你给这个新元素起个名字吧！”

这个原叫斯科罗多夫斯基的波兰小姐面对丈夫热情诚恳的眼神，微笑着点点头，默默地踱到窗前，注视着远方，她的心已经飞到了当时在世界地图上消失了的祖国，她没有忘记生她育她的祖国，那里有她的父亲、哥哥、姐姐，还有那么多的亲人，有她童年的记忆。她青年时期报效祖国的热情，曾经希望用知识去推翻沙皇压迫的誓言历历在目。波兰虽已千疮百孔，倍受践踏。但那总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呀。她要用她受压迫的祖国名字“波兰”来命名。她轻轻地拉着丈夫的手：“皮埃尔，我们叫它‘钋’行吗？”她的心里很激动，当波兰的侵略者听到这个新元素名字时，他们就会明白，波兰人民是永远征服不了的。

皮埃尔慎重地点点头，热烈地拥着妻子，他理解玛丽的一片爱国之心。

1898年7月，玛丽向科学院提交了《论沥青铀矿中所含的放射性新物质》的论文，它被立即在科学院的《论文汇编》中刊载。玛丽满含激情地在论文中写道：

“……我们相信自已从沥青铀矿中提取的这种新物质，含有一种尚未被人注意的金属。它的分解特性近似铋。我们证实这种新元素的确藏于沥青铀矿中，我们提议定名为钋，这个名字来源于我们之一的祖国的国名。”

当这篇极有价值的论文在巴黎发表之前，玛丽已把原稿寄回祖国一份，交给她以前作初步试验的工农业博物馆的实验室主任约瑟夫·柏古斯基。这篇文章差不多在巴黎发表的同时，华沙的一个叫做《斯维特罗》的画报月刊上也发表了。

长时期的埋头研究，玛丽已疏忽了对家庭的照料，这时她决定要给丈夫和孩子补偿一下。玛丽提着篮子，挽着丈夫的手臂，双双上街买了几篮子果子煮好，收藏到果酱罐里，供冬天食用。

而皮埃尔却决定去休假一次，以此作为对妻子艰苦紧张生活的一次回报。皮埃尔在奥佛尼的奥户租了一所农家房屋。玛丽在娄蒙路实验室的毒气中过了许多日子，觉得这乡村的空气新鲜极了，这山这水这庄稼都是那样清爽，充满生机。他们带着女儿在这乡村野外尽情地放松。他们游满特、逛勒普、进克勒蒙、游多雷山。他们不知疲倦的爬山，兴致勃勃地看山洞、下河游泳。玛丽这几个月的艰辛和忙碌，全在与丈夫和孩子的郊游中得到了满足的补偿。

真是人各有志。奢侈豪华是一种享受，在玛丽和皮埃尔看来，他们更喜欢自然，更喜欢乡村，更喜欢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在那里，他们可以开怀地谈天谈地，但更多的是谈论“新金属”钋和另外尚待发现的一种新元素。这广阔宁静的乡村风光，给他们以智慧和信心。伊雷娜似懂非懂地听着父母的谈论。那幼小的心灵里灌满了钋、钷等元素名字。她觉得父母不是来旅游的，而是来讨论什么钋和钷的。小小的伊雷娜哪里知道，就是这些钋、钷元素什么的，将与她的一生紧紧地连在一起。

在他们度假回来投入工作时，一件使玛丽极为伤心的事扰乱了她的热情。她在巴黎的惟一亲人，最亲密的姐姐就要随丈夫离开巴黎，回到奥属波兰去住。他们决定在喀尔巴阡山科巴纳地方修建一个结核病疗养

院。这是布罗妮雅的心愿，她要为改善波兰人民的生活贡献力量。姐妹俩依依不舍。布罗妮雅走了，玛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思念。想起与姐姐在巴黎相依为命的日子，玛丽就免不了惆怅莫名。

为了尽快摆脱思念之情，她埋头于研究工作。夜晚，一边作针线，为孩子缝制衣裙，一面与丈夫谈研究进展。十分忙碌，也很充实。她常在家庭记事本上记载着伊雷娜的成长过程：“伊雷娜会笑了”；“伊雷娜会用手势‘道谢了’”；“伊雷娜长了第三颗牙，第四颗牙”；“伊雷娜会走路了，她再也不在地上乱爬了；”“伊雷娜有 15 颗牙了！”

这个温柔的妻子、年轻的母亲没有因艰苦的研究工作忘记自己的职责。

“钋”元素的问世之后的第五个月，玛丽和皮埃尔在那个又潮又小的实验室里又有了新的喜悦。他们循着射线一直跟踪它进入最后一道试管，藏在钷中的新元素出现了。这是玛丽和皮埃尔经过千辛万苦获得的光灿烂的第二个宝贝。

1898 年 12 月，玛丽和皮埃尔在给科学院的报告中，十分有把握地宣布：在沥青铀矿中，有第二种放射性元素存在。在该月 26 日科学院的《论文汇编》中又增加了一篇有深远影响和重大价值的报告。

“……上述各种理由使我们相信，这种放射性的新物质里含有一种新元素，我们提议给它定名为镭。”

钋和镭两个新元素的问世揭开科学界的新纪元，展现出一副新画卷。令科学界神往，为世界所瞩目。

2 镭

镭，拉丁文即“射线”的意思。经测定，这个元素的放射性是铀的900倍。

镭混合物和钋混合物一样，是不纯的。此时的玛丽和皮埃尔还无法确定它们的所有化学性质。具有顽强拼搏精神的玛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要在下步工作中获得一种镭多钋少的化合物。

这项工作的巨大和艰苦是可想而知的，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不仅仅是困难，而且可能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因为钋和镭这两个元素的特性推翻了几世纪以来学者们相信的基本理论，这些概念已经动摇和基本推翻了已得的概念，并且与根深蒂固的物质成分的观念相反。索尔本大学以及巴黎科学界的物理学家们对皮埃尔和玛丽的工作极感兴趣，他们虽看到了它的发展前途，但是他们必须在得到决定性的结果之后才肯相信。

这时，各地科学家纷纷对皮埃尔和玛丽说：“只要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并称出他们的重量时，我们就会相信你们的元素存在。”

的确，这种神秘的，未被人们了解的放射性物质，虽然有了“镭”的名字，但仍然神秘莫测。它不像已经被发现的实实在在的物质那样，可以被人触摸，称重和看见。这些对科学家来说，更为重要，因为这才是物质存在的证明。

为了把钋和镭指给不相信的人看，为了向人类证实他们的“孩子”的存在，也为了使自己完全有把握，皮埃尔和玛丽又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镭物质的存在，这是肯定的。要获得肉眼看得见的纯镭，就要从大量的沥青铀矿中去提取。然而到哪里弄到这大量的沥青铀矿呢？摆在他们面前最严重的困难是资金的缺乏。沥青铀矿是一种昂贵的矿石，他们那有限的薪金全部用来买矿石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而他们又不愿向政府、科学协会或巴黎大学那里去申请经费。往往在求援和荣誉面前，他们就会显得局促和腼腆。

怎么办？只有依靠他们那灵巧的大脑和智力。他们分头翻阅资料，并四处打听，得知奥地利盛产沥青铀矿，是波希米亚的圣约阿希姆斯塔矿炼制的，主要是用于提取工业用的工艺玻璃用的铀盐。

皮埃尔和玛丽推测：既然镭和钋不存在铀中，那么它一定原封不动地留在残渣中。因此，在他们提取铀后的残渣中一定能找出钋和镭。他们已经得知，该厂把矿物里经过提炼之后的残渣全部作废品扔在邻近矿山松林里的一个大废渣堆中。矿工们认为这些废渣已毫无价值了，也许用极低廉的价格可以买进这些废弃的矿物，只要付运费就行了。这比用昂贵的价格买沥青铀矿要合算得多。

皮埃尔夫妇豁然开朗，并马上写信向维也纳询问，得到的结果令人欣喜。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封装有官方硬信封的复信。信中说，只要皮埃尔夫妇肯付运费，几乎只花极少量的钱就能买到一吨沥青铀矿。而事实上，以后运来的矿渣除了运费，几乎没有付钱。

维也纳科学院的绪斯教授十分热心，极力向政府推介，并代表皮埃尔代办交涉。奥地利政府那个国有矿山的所有者，决定把一吨残渣惠赠

两个声称需要它的学者使用，并声明，如果这两个怪人将来还需要更大量的这种材料，他们可以最优惠的条件出让。

尽管这笔运费不少，给当时的皮埃尔拮据的经济增加不少负担，但毕竟节省了一笔极大的原材料开支。

原材料解决了，卸下了他们一个沉重的包袱，但还有一块心病未能解决。要进行大量的沥青铀矿的提炼，就要有一个摆放矿渣的地方，还要有大大小小的溶液桶，锅炉。那个又潮又小的工作室是无论如何也搁置不下，找一间大一点的工作室已迫在眉睫。

夫妻俩使出浑身解数，满世界地找。然而，这对夫妇在社会活动能力方面远远不如在科学研究方面有成就。索尔本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建筑群，无数空着作摆设的大大小的实验室，可这对痴狂的学者就是弄不到一间迫切需要作研究的实验室。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广，尽管居里夫妇磨破嘴唇跑断腿，都是徒劳无用。他们在求人时的笨嘴笨舌与他们在科学问题讨论上的伶牙俐齿形成了强大的反差。也许在他们心目中，科学是神圣的，人格是神圣的，是不能受到任何玷污的。

皮埃尔和玛丽一无所获地回到出发地，回到皮埃尔任教的理化学校，回到玛丽作初步试验的又潮又小的工作室。他们来回地踱着，思考着，沉默着，谁也不吭声，没有谁打破这份寂静。玛丽踱出工作室，来到对门的院子，她想放松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这时她忽然发现院子不远处有一个破旧的木板屋。她常在这里出出进进，却没有发现，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她好奇地紧走几步。一股霉腐气扑鼻而来，她捏了捏鼻子，继续往里走，发现这是一间长期没有人用的棚屋，玻璃屋顶残缺不全。地面只铺着一层沥青，几张破旧的桌子，一块残缺不全的黑板，一个生了锈的炉子。屋内潮乎乎、脏兮兮的，到处是灰尘，蛛网密布。虽然它是那么破旧，那么缺乏吸引力，但玛丽仍很高兴，正因为这是一间破烂不堪的屋子，就不会有人干涉他们，不会有人不准他们自由使用。

她怀着兴奋的心情一溜小跑，把这个新发现告诉皮埃尔。

“皮埃尔，我找到房子了，我找到了……”她气喘吁吁地说。

“找到房子了，在哪？我去看看。”皮埃尔半信半疑，希望能出现奇迹。

不一会，玛丽领着他来到屋子面前，皮埃尔一见，表情骤然严肃而冰冷。他在这所理化学校工作了多年，知道这是以前医学系用来作解剖室的。很久以来，人们认为这个地方连搁死尸都不合用，没有一个工人愿在这个地方工作。他当然没有把这些告诉玛丽，怕影响玛丽的情绪。但事实上皮埃尔也毫无能耐找到任何别的地方，他拍拍妻子的肩膀：“好的，不错，我去向校长报告一下。”

校长舒曾伯格一向待皮埃尔很优厚，他那复杂的面部表现出十分抱歉的表情，他为不能给皮埃尔提供较好的地方而遗憾，而这一对为科学而痴狂的学者已很为校长没有把他们撵到街上去而满意。

无论屋子多么简陋，条件多么差，环境多么恶劣，他们还是迫不及待地拿起清扫工具自己动手清扫收拾棚屋，换上几块玻璃，铲除周围的杂草，开通一条小路。从此，漫长而艰难的实验工作就在这个棚屋里进行了。

一个宁静的早晨，柔和的阳光洒在娄蒙路的理化学校，一辆像运煤

的四轮马车停在了门前。忽然有人喊，“皮埃尔先生，你的矿渣运来了”。听到喊声，皮埃尔夫妇欢呼着跑了出来，玛丽连帽子也忘了戴，工作服也忘了脱。两匹高大膘肥的役马拉着装得满满的，沉重的棕色口袋，工人们正满头大汗地将这些沉重的口袋随便地卸在人行道上。玛丽迫不及待地解开一个麻袋，双手捧起一把夹杂着波西米亚松针的褐色矿渣，脸上堆满了激动和兴奋，“啊！我的宝贝，我的沥青铀矿终于运到了！”这就是她朝思暮想的沥青铀矿，急切等待的宝贝啊，她要找的镭和钋就藏在这其中。

玛丽留恋她的学生生活，那是在又冷又小的顶楼中的4年苦读，她获得了物理学士考试第一，数学学士考试第二，中等教育就业考试第一。虽然受着寒冷饥饿的双重压迫，加上繁重的学习任务，可那是她过得最充实、最幸福的阶段。她的姐夫卡西米尔·德卢斯基曾经形容她的学生生活是“我的姨妹一生中的英勇岁月”。那么这棚屋中的漫长4年可以说是在玛丽和皮埃尔共同生活中的英勇时期。

早已被人忘却的娄蒙路棚屋，从现在开始，又恢复了它的功能，冒出了缕缕浓烟。它将为人类史上作出巨大的贡献，永远载入史册。

纤弱的玛丽，每天从事的是强壮男子汉也要叫苦的重体力劳动。她把大桶大桶的沥青铀矿倒进锅里煮沸，操起那根几乎与她一般高的沉重的铁棒长时间地、不断地在锅里搅拌着。人们随时可以看见她穿着满是尘污和酸迹的旧工作服，头发被风吹得又散又乱，周围的烟刺激着她的眼睛和咽喉，满嘴满脸都是黑色的尘垢。

这本该是粗壮男子干的活计，不应该落在一个学者身上，更不应该落在这位纤弱女子身上。她在记事本上写道：“我一次炼制20公斤材料，棚屋里放满了装有沉淀物和溶液的大瓶子。搬运容器、移注溶液，连续几小时的搅动熔化锅里沸腾着的溶液，累得我喘不过气来。”

实验室环境的艰苦程度令常人难以想象。冬天里，寒冷的北风使劲地敲打棚屋的玻璃板。若遇下雨，外面大雨滂沱，屋内小雨嘀嗒。地上，工作台上满是泥水和混合溶液。这时他们便穿上雨衣，手忙脚乱地挪动仪器，用各种盆子来接漏水。讨厌的漏水常常淋湿了他们作实验记录的笔记本，他们会十分愤慨地立即拿到炉子边烤干。若遇下雪，所有的仪器液体都结了冰，连常用的铁棒也成了冰棒。实在冻得无法忍受之时，他们便挨着火炉去感受一点暖气。为了要找到他们的“宝贝”，他们必须强迫自己适应这种残酷而恶劣的环境。

他们的惟一本钱是身体，只有拿两条血肉之躯去抵御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为了节约时间，中午玛丽便在炉子上做饭，吃极其简单的小萝卜、香肠、面包，没有时间做巴兹基，更没有时间熬那可口而营养的热汤。棚子里到处是盛着溶液的各种不同组分的桶和盆，玛丽和皮埃尔随便坐在它们中间，吃饭成了他们休息和探讨问题的时间。皮埃尔总是在这种时间深情地注视着妻子那沾满沥青的衣服，满手满脸的尘污，常常羞得玛丽低下头去。夫妻俩长时间里只能用这种眼光交换着情感，交换着那彼此爱恋着的心。

玛丽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程序：把一袋袋沉重的废渣倒进锅里，连续几小时不停地搅拌，把溶化好的溶液倒进一个罐子里；然后再

搬起另一个沉重的大罐子，把沉淀物倒掉……手磨出了血泡，长出了厚厚的老茧，滚烫的溶液烧伤了双手，以至疤痕累累……

这间十分可怜的棚屋只有搅拌溶液和化学溶液煮沸时发出的嗤嗤声。有时，夫妻俩来回地踱着步，一面密切注视着某种实验的进行；一面谈论着目前和将来的工作。实在太累了，就歇一会儿，在实验室的炉子上煮壶茶。一杯热茶会使他们舒服，使他们精力充沛。

工作日变成了工作月，工作月变成了工作年。漫长而辛劳的两年过去了，他们连一种放射性的影子也没找到，但他们并不灰心，互相安慰着，鼓励着。没有人光顾这间破烂的棚屋，没有人打扰他们的独特而专心的生活。两年来，只有极少几个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来请教皮埃尔一些问题。在此之前，皮埃尔在物理学领域的许多部门的学问是很出名的。这时，皮埃尔就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站在那块极破旧的黑板前谈一些旁人听不懂的枯燥的物理学知识。讲完了，这些人便一刻也不愿多留地迅速逃离。

凡是到过棚屋的学者们，都为皮埃尔和玛丽这种大浪淘沙的顽强精神所叹服；也有的旁观者对这对怪人的吃苦和献身精神大惑不解，有的竟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可理喻，不敢想象啊！”

法国大革命创造了米制，建立了师范学校，并且在许多情况下鼓励科学，推崇科学，使科学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然而过了一个多世纪，法国政府似乎只保留了孚基埃——丹维尔在判处拉瓦锡上断头台的法庭中所说的那句令人伤心的话，“共和国不需要学者”。这是何其愚昧，令科学家何等寒心的恶言冷语啊！

法国政府砌高楼，建别墅，办其它事情是那样大方，而用于科学研究方面又是那样吝啬。这两位物理学者每天的生活收入和支出还不如一个干粗活的壮工，而工作量却是一个壮工的几倍。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何其悲壮！

对这种苦行僧的生活，皮埃尔和玛丽并未感到特别的委屈，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已高度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镭。一次，玛丽像个孩子似的。怀着热切的心情对皮埃尔说：“皮埃尔，我们要找的那个镭，会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

皮埃尔含着微笑平静地答道：“我还说不清楚，不过，我希望它有很美丽的颜色。”

没有人明白玛丽的忧虑和目标，没有人了解她的使命和追求。只有她的伴侣皮埃尔最知心，能承受她的假说和梦想，能与她并肩战斗，同尝甜酸苦辣。不管困难多大，只要皮埃尔在她的身边，她就会觉得非常幸福。

在这段艰苦而紧张的工作中，玛丽的心情是愉快的。两年多时间，她和丈夫一面搞实验，一面整理观察到的现象，撰写并发表了《论镭引起来的“诱导放射性”的发现》和《论放射线的效能》、《论放射性负载电荷》等等学术论文。1900年，他们为物理学大会起草一篇概括性的报告，《论放射性的诸物质》，引起学者们极大的兴趣。

这些论文的发表充分证明了对镭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由于工作量的庞大和复杂，他们认为必须分头解决不同的问题，工作进度便会快些。

玛丽自告奋勇承担寻找纯镭工作，皮埃尔则考虑研究此元素的射

线，解决有关射线的一切问题。如：射线是由什么组成的？它们有什么性质？

于是他们分头战斗，各自在一个领域里埋头干自己的工作。遇到问题和奇异现象时，他们就会凑在一起研究讨论，直到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为止。

皮埃尔的问题比玛丽的问题解决得快一些。皮埃尔发现，这种元素发出的不只是一种射线，而是三种不同的射线。于是，他采用希腊字母表中的前三个字母，将这些射线称为阿尔法射线，贝塔射线和伽玛射线。他在一篇论文中把这些射线阐述得十分细致具体，给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感觉。

阿尔法射线和贝塔射线看来是由原子内部发出的具有很大力量的粒子组成的，它们像高速飞行的子弹。这些粒子带有电荷，阿尔法射线是由带正电荷的粒子组成的，伽玛射线不含粒子，它们跟波光和 X 射线相似。

皮埃尔认为，这些射线是由元素的原子内部产生的，而不是像通常的 X 射线那样由原子外部产生的。伽玛射线好像是能量的一种爆发，是作为阿尔法粒子和贝塔粒子发射的“副产品”产生的；阿尔法射线用一张纸就可以挡住，不会烧伤皮肤，贝塔射线则需有 1 英寸厚的木板才能挡住，它能引起严重的烧伤；伽玛射线几乎可以穿透所有的固体物质，只有厚厚的铝板才能挡住它，它造成的灼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

至此，这种放射性的新科学在这个破烂的棚屋里成立了。各地物理学家纷纷写信询问。其中一个青年物理学家乔治·萨尼亚，也着手研究各种 X 射线，他常常跑来与皮埃尔·居里讨论，他们一起研究各种次级射线所带电荷。他成了居里夫妇的亲密朋友，后来也成了他们孩子们的挚友。

马车不断运来装满沥青铀矿的麻袋。玛丽仍 1 公斤 1 公斤地炼制沥青铀矿的残渣。她的耐性，体力和智慧是一般女性无法比拟和超越的。

那深藏着的、神秘的镭似乎有意与他们捉迷藏，始终不见踪影。

皮埃尔见玛丽用尽力量所得到的结果极为有限，加上长时间没完没了的奋斗，他已极度疲倦，有点灰心了，他想终止这项工作，或者暂时放弃这项特殊的工序。先集中精力研究镭和放射能的其他性质问题，尽快完成博士论文，等条件改善了一些，再继续进行提取纯镭的工作。因为残酷的条件使他常常生病，玛丽更是日渐消瘦，皮埃尔的心里很苦、很懊恼。

可是玛丽没同意，这是她在丈夫面前第一次提出反对意见。皮埃尔没有想到，妻子的意志和性格竟如此坚强。她藐视困难，藐视疲倦，更藐视懦弱和退却，她的坚韧不拔使皮埃尔自愧不如。

玛丽坚强地说：“我们必须坚持下去，一定要坚持到底。”

在她那饱满的前额下，闪射着顽强的目光，她坚持在仪器旁、在火炉边。

但玛丽也有气恼的时候，那是懊恼自己在知识方面的缺乏。这种欠缺使得她的工作更艰辛，更复杂。每每遇到难题，她便跑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查阅文献、边学习边实验。她像对皮埃尔又像对自己说：“也许在我们希望最小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必须相信，既然我们

有做某种事情的天赋，那么，就无论如何要把这种事情做好。”

他们终于坚持下来了，常常是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经过将近 4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玛丽的工作接近成功了。现在，她可不必在露天地里任凭风吹雨打蒸煮矿物了，她的工作开始进入到细致的阶段。可以在室内采用分级结晶法来处理少量的镭——钡混合物。这是整个过程中最细致的过程。

每当她全神贯注做精密实验的时候，刮进棚子里的煤尘和铁屑落在这些仪器上，混杂到经过精心纯化的产品中去，使数学产生误差，给实验带来麻烦。于是她只得重复做一遍，常常是一次两次甚至十次重复地作一种实验。她的心绪往往被这种事情搞得烦乱极了。然而她仍要在这艰苦的条件、简陋的设备和烦乱的心境下，坚强地工作着。

1902 年，在居里夫妇宣布镭存在的 45 个月后，玛丽终于打赢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她成功地提炼出了 1 分克纯镭盐。

那些不肯相信的化学家，那些需要看得见、摸得着才肯承认的人们，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不得不在一个女科学家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面前低头。玛丽，这个女物理学家，为人类的发现填补了一项空白。

现在，玛丽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她发现了新元素镭！这时，玛丽通过对镭的研究，测定镭的原子量为 225。

原子量是一个元素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有的元素轻，如氢和氧；有的元素重，如铁和锌；有的很重，如铀和镭。

原子极其微小，科学家在称原子量时不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称土豆，科学家使用的是一个不同的单位。他们是用最轻的氢元素为原子重量作为一个重量单位，其他各种元素的原子量是由它相当于多少个氢原子的重量来决定的。镭的原子量是 225，也就是说，它的原子重量是氢原子的 225 倍。

在 4 年的研究过程中，玛丽把工作进程像记流水账一样记录下来，为她今后作学术报告准备了扎实的原始资料。她的细致、认真和沉着，为她成为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后来，玛丽在谈到这段英勇岁月的时候，总是有一份伤感和遗憾。“要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实验室和所需要的全部材料和设备的话，我和皮埃尔在一年里就可以做完 4 年的工作。在那个借来的，缺少必需的仪器，破烂不堪的实验室里，把我们搞得精疲力尽。最伤感的是，延误了我们获得成功的时间”。

3 沉重的打击

曾令他们吃尽苦头，又无限向往的镭，不仅有美丽的颜色，而且还能自动发光，真使他们兴奋不已。

此时，玛丽第一件事便是向父亲报告这一重大喜讯。斯克罗多夫斯基先生时刻关注着女儿 4 年漫长的探索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老人一生向往科学，并一直期望从事科学工作。可在沙皇的统治压迫下，始终未能如愿。他常常为此感到悲哀，希望自己的夙愿能在下一代得以实现。他的智慧和满腹知识使他毫不费力地理解玛丽信中所写的内容。虽然他不能像女儿在做家庭教师时那样，在信中给予指导和解答，但他总是给玛丽以鞭策和鼓励。他庆幸女儿成为科学家，自己那一生不煊赫的沧桑，被女儿炫耀地挽回来了。他能不高兴吗？他的高兴程度远超过玛丽几倍。

斯克罗多夫斯基先生提起那搁置一旁的笔，十分激动地给玛丽写了一封祝贺加鞭策的信。

玛丽读着父亲的来信，看到父亲颤抖的笔迹，眼前浮现了父亲衰老的身姿。她想，父亲一定非常高兴，一定盼望她迅速回到他的身边。很久没看见父亲了，她必须设法回波兰去看看父亲。

1902 年 5 月，正在她准备动身回波兰之时，她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一刻也无法等了，急忙办好护照手续，乘火车赶回波兰华沙。

就在她风尘仆仆赶到父亲居住的约瑟夫的家时，已经晚了，她的父亲来不及看他最喜爱的小女儿一眼，便匆匆而去了。

她再也没有看见父亲的脸，她悲恸，痛哭不已，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走向灵堂——实际上是跌撞着被人搀进灵堂，看见了棺木和鲜花。她坚持要打开棺木，谁也拗不过她倔强的个性。棺木打开了，父亲安详地躺着，她看见了父亲那张温和慈祥，饱经风霜的脸。她哭得更伤心，更悲恸。

她对着父亲默默告别，请求父亲宽恕原谅，责备自己留在法国，而没有陪父亲度过晚年，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要是父亲能多活一段时间，能看见女儿研究的镭在世界引起的巨大震动，那该多好，该会给历尽沧桑的父亲多么巨大的喜悦和安慰啊！

父亲的去世，给她带来极大的悲伤。回巴黎后，玛丽又遭到一次精神和肉体上的打击。她的第二个孩子刚出生时就夭折了，夫妻俩十分伤心和难过。

父亲的去世，孩子的夭折，玛丽极为哀伤，几乎被痛苦碾碎。她在信中向布罗妮雅哭诉：“这些从天而降的事故使我很难过，使我没有勇气向任何人申诉，我失去了敬爱的父亲，夭折了心爱的骨肉，我极想要这个孩子，觉得无法安慰自己。”

但是，玛丽有她当作精神力量的科学研究，有她那破烂不堪的棚屋，更有她朝夕相处的丈夫，这就是她的精神动力，她会不顾一切地坚持下去，奋斗下去。

放射学是玛丽选择的博士论文课题，她通过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不仅使她完成了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而且又围绕这一发现，和皮埃尔一起进行了许多实验，写出了许多有见地、有影响的科学论文。

然而，终因长久以来，玛丽所安排的是又苦又累的生活方式，紧张的工作和心理压力埋下了祸根，她的身体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反应。经医生诊断，她患上了轻微的梦游症，每每在夜间，毫无知觉地爬起来在房子里走动。

这段时间，玛丽虚弱到了极点，每天晚上从实验室出来，都是倚在皮埃尔的臂膀上，由皮埃尔扶着，一步一步地挪回家的。这种病对她的压迫极大，常常使她萎靡不振，食不甘味，对任何事物都缺乏兴趣，这可怕的征兆使皮埃尔倍感苦恼，给他们的精神和生活带来严重的忧虑。

困难总是列着队向他们袭来。皮埃尔那点微薄的积蓄早已支付了研究材料的运费，经济上早已亮出了赤字。自从老居里夫人去世后，老居里大夫就同他们住在一起，加上女儿、女仆共五口人。由于人口增加，玛丽便在克勒曼大道租了一所房子，每年租金 1400 法郎，家庭开支也逐渐增大。过去两人靠皮埃尔每年付出 120 课时，获得月薪 500 法郎过日子的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这时他们必须寻找新的进款，以贴家用。

其实，按照皮埃尔在科学上的贡献和声望，完全可以作索尔本大学教授。他的科学成就充分证明他适于这种职位。如果这样，他就可以得到 1 万法郎的年薪，教课钟点可以比在理化学校少得多。只有这样，才不辱没他的科学才干，才有利于发挥他的天才作用。

然而，天才总能引起别人的嫉妒。在政治上、在手段上、在耍阴谋上，他太外行了。1898 年，索尔本有个教席空缺，皮埃尔想谋取这个职位，就因为他没有上过师范学校或工艺学校，他的申请被否决，他的竞争者十分顺利地捞到了这个教席。

皮埃尔一如既往地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和研究。为生计所迫，他不得不申请到工艺学校当辅导教师，每年薪金 2500 法郎。

皮埃尔一面要承担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一面要担任工艺学校的繁重课程，晚上备课阅卷，每天工作达 14 小时以上。玛丽一面继续进行她的研究工作，撰写论文，一面照顾丈夫孩子，挑起家务重担。

命运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本来有一个意外收获，却被现实搅得粉碎。他们发现的镭虽然没有流传到群众中去，但物理学家已经知道其价值和成绩。

瑞士的日内瓦大学作了特殊的努力，把他们认为是欧洲第一流学者的皮埃尔夫妇邀请去。该校校长十分诚恳地邀请皮埃尔担任物理学教授职务，每年薪金 1 万法郎，并供给房租；最使皮埃尔欣慰的是，有一个实验室供他指导，实验室可以增加经费，物理仪器可以齐全。还可以增添两名助手，玛丽可以在该实验室有一个正式的职位。

皮埃尔答应了，并准备夏季动身去瑞士。

然而，摆在皮埃尔夫妇面前的这封热情而慷慨的信，竟给他们带来棘手的麻烦。如果把瑞士日内瓦改为“索尔本”，那就什么都事迎刃而解了。

因为收到这封信的当时，正是他们如痴如迷地研究镭的关键时刻。到瑞士的日内瓦去，从搬家到准备新的课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无法从事研究工作；其次是研究镭需要的物品、仪器搬运极不方便。这就意味着中止对镭的深入研究。

不行，坚决不行。尽管他们最需要改变境遇，尽管日内瓦大学提供

的条件比较优厚，但再大的诱惑，也无法动摇两个对镭着迷，为镭痴狂的学者的决心和信心。

皮埃尔非常遗憾地向日内瓦发出了一封道歉信，日内瓦的教授们大为惊叹和惋惜。他们在优厚的条件和艰苦的环境上选择了后者，继续留在巴黎，留在那充满诱惑的镭研究中。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们研究镭进入困境之时，皮埃尔受聘于索尔本自然科学学校任讲师，这里报酬较高。玛丽也得到一个好消息：她收到赛福尔女子高等学校寄来的聘书：“夫人，赛福尔师范学校荣幸地聘请您在1900—1901学年内讲授一二年级物理学。”对他们来说，这是雪中送炭。有了这两项进款，他们的家庭收支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但这又是怎样一种负担啊！上帝吝啬索尔本教授职位，却交给皮埃尔两个无关紧要的，占去他大量时间的教师职务。他要担任两处教职，指导两组实验工作，批阅近80余个学生的作业，备两种不同内容的课，十分疲倦，精神高度紧张。

而玛丽也是“初次登名”的法国教师，强烈的事业心强迫她极其用心备课，安排学生实验，同样花去了大量精力。

两个大学者，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计，为了想得到他们每年所需的两三千法郎，作了极为不幸的牺牲。

玛丽每星期要去赛福尔学校几次，拿着一个装满作业本的皮包，坐一辆极慢的电车，常常要站在路旁，迎着刺骨的冰雪寒风等半个小时。皮埃尔每天由娄蒙路到居维埃路，再由居维埃路跑回娄蒙路，才来到棚屋。他们常常是刚开始一个实验，正投入精力的时候，又要放下手里的仪器，跑去讲课。

皮埃尔夫妇常为这些不得不做的工作而烦恼，而叹息。这些工作影响了研究效率、也影响了他们的健康。尤其是皮埃尔，他太疲倦了，减少他的课时，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这时，也就是1902年5月，巴黎科学院要进行院士竞选，增设一名科学院院士。皮埃尔的朋友们鼓励他参加竞选。然而皮埃尔因两年前申请索尔本理化教席失败，他心有余悸。

法国文学家蒙田曾经说过：“有大才干而过于谦虚的人，往往长久不被人所知。”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皮埃尔犹豫不决。

然而，他的朋友们想方设法极力鼓励他去争取，特别是马斯卡教授坚持要皮埃尔参选，并用种种理由说服他，相信他一定可以入选，这样将来很有利于改善他们家的物质状况。

朋友们的鼓励，研究工作之所需，家庭经济之逼迫，特别是玛丽也积极支持。皮埃尔又一次鼓起了勇气。

成为科学院院士是皮埃尔长期以来的愿望。一旦成为院士，他就可以集中精力投入研究工作，就会拥有一个实验室和齐全的设备，对他下一步开展镭学研究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皮埃尔确实希望得到科学院院士这一任命，于是向科学院提出了申请。在进行这些活动时，皮埃尔把他认为是“卑鄙”的做法都用上了。他耐着性子拜访了科学院的院士们。当谈到正题时，皮埃尔又羞于为自己评功摆好，却极力称赞他的竞争者阿麻加先生是如何才华出众。而阿麻加先生则摇唇鼓舌和极力的自我推销，阿麻加先生的支持者也大肆鼓

噪，说阿麻加比皮埃尔合格多了，应该当选。这样，虽然科学院物理学部一致支持和赞成皮埃尔，在三个候选人当中把皮埃尔的名单列于首位，但皮埃尔却以 3 票之差落选。这一结果使皮埃尔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极其痛苦的伤疤。他后悔自己做了一件愚蠢的事，那就是极不情愿的登门拜访，浪费了时间和唇舌。

保罗·阿佩尔院长对此深表遗憾。他认为皮埃尔是一个在工作上有出色表现和科学上极有价值的人，是科学院院士最合格的人选。便试图通过其他办法为皮埃尔解决理应属于他那个职位的认可。阿佩尔建议提请部长授予皮埃尔荣誉勋位勋章。在法国，这是人人向往的勋章。阿佩尔知道皮埃尔轻视荣誉和倔强的个性，惟恐他予以拒绝，便给玛丽写了封信，希望玛丽能说服皮埃尔接受这种勋章。因为有了这个勋位，就有了实验室和补助金，这对改变他们目前的处境是很有用处的。他请求皮埃尔为科学和科学院的最大利益着想去接受它。

但皮埃尔那不妥协的秉性决定了他不受人摆布，他一如既往地荣誉不感兴趣，对勋位极为反感。

本来索尔本大学那个教授职位以及科学院院士使他有机会对科学作出更大贡献，又可使自己的家庭有所获益，他内心真正关注的是这两件事。他认为不肯把工作所需给一个科学家，却给他一条别有一个珧琅质十字章的红丝带，以作为对他成绩的鼓励，真是滑稽得可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在给阿佩尔的信上说：

“院长先生，请代我向部长致谢，并转告他，我本人丝毫没感到需要勋章，我最需要的是一个实验室，以便能很好地加快我的研究进程。”

实验室才是他所关注，所期待的。他们是地道的现实主义者，荣誉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皮埃尔所希望的索尔本大学的职位未能如愿；科学院院士被人所夺；所盼望的实验室遥遥无期。这真是人力难回天哪！

然而他们有的是坚强的意志，不知疲倦的身体，还有两颗为科学跳动的心。他和玛丽仍像过去一样继续任教，继续在那破烂阴冷的棚子里，在有损健康的环境里坚持奋斗，度过那艰苦而永远难忘的奋斗时光。

长期从事一件十分费力的工作，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就是再健壮的人也会累垮，皮埃尔多次因四肢剧痛不能忍受，而不得不卧床休息，玛丽常常因头昏目眩而不得不躺下。他们的朋友乔治·萨尼亚写给皮埃尔的信上说：“我在物理学会看见居里夫人，她孱弱消瘦得令我吃惊，我深知她是由于长期的劳累过度造成的。你们两个不能再过那种纯智力和苦行僧的生活了。如果你夫人失去健康，就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和苦恼。你们应该留有一定的时间吃饭和休息，千万要注意身体。”

皮埃尔十分内疚，他爱妻子，似乎近于疯狂。但环境如此，他们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促使他们如此，这又有什么办法。就在此时，皮埃尔真正病倒了。他常感腹部剧痛，就是查不出明确症状，医生们叫他风湿症，这种残酷折磨使皮埃尔痛苦不堪，整夜呻吟。皮埃尔的病使玛丽惊慌失措，玛丽拖着瘦弱的身体日夜守护在他身边，细心地照料着他。

两个伟大的学者，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相依为命，英勇拼搏。一次，皮埃尔看着正在喂他药水的妻子，双眼失去了往日的光泽，疲倦的脸上爬上缕缕皱纹，他的泪水盈满了眼眶。这个刚强的汉子哽咽地抱

着妻子瘦削的肩膀说：“玛丽，亲爱的，我们选择的生活太苦了。”

对苦，玛丽一点也不在乎。她担心的是皮埃尔的身体。这时，她见自己的丈夫如此悲观气馁，如此意志消沉，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栗着。长时间来，他们都在与疾病抗争，与恶劣环境拼搏。此时，皮埃尔的话钻进她的耳朵，一种可怕的死亡念头涌上她的心头。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悲哀，忽然喊出：“皮埃尔！”她的声音令人恐惧、令人吃惊。

“怎么啦，亲爱的，你怎么啦？”听到妻子的喊叫，皮埃尔却理智了起来，这是丈夫的责任感驱使他。

“皮埃尔……如果我们俩死了一个，剩下的一个也活不了，我们永远也不能分开，是不是？”她一时忘了自己的使命，忘了自己的科学目标，她痛苦地哭着，她嘶哑地喊着，一种哀愁，一种郁忧填满房间。

皮埃尔搂着颤抖着的妻子，慢慢地摇着头，拿出毛巾，擦干那忧伤的泪水，坚定地说：“玛丽，你错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一个人即使成了没有灵魂的身体，还应该照常工作，学者没有权利背弃科学这个终生目标。”

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紧紧地拥抱着，互相鼓励着，既执着又悲壮。

4 诺贝尔物理学奖

学者生来就是为了研究和发现。他们要工作，要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止。他们不能与他们的使命对抗，即使觉得厌烦，觉得疲倦，但为了他们的使命，他们的脚步依然会走到属于他们的实验室，属于他们的仪器边来。

玛丽和皮埃尔经历了千辛万苦，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使新兴的放射学在成长，在壮大，然而，它却一点一滴地把一对物理学家的精力耗尽。

在 1899 年和 1904 年之间，皮埃尔和玛丽合作发表了 32 篇科学报告，字里行间全是图解和公式以及数据。《论镭射线的化学作用》、《论放射性钍的原子量》、《论镭射线的生理作用》等等，这些在外行人看来粗糙难懂的论文，包含着多少天才、多少毅力和汗水。每一篇论文都代表着一次成功，每一次成功都引起一场轰动与震惊。镭发射的特异功能很快征服了国内外同行。从 1900 年起，很多科学界的知名人物，从不同的国籍，用不同的文字纷纷写信到娄蒙路。一时间，娄蒙路这个极不起眼，甚至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迎来送往，一改往日的萧条和寂寞。正如玛丽在 1900 年预料的假定，一个惊人的“放射嬗变学说”就要诞生了，他们肯定放射元素虽然看似没有变化，实际上处于自动演变状态，变化越快，其“活动”越有力量。现在，每过 1 秒钟，镭的粒子就由本身逐出氦子的原子，并且把它们用极大的力量放射到外面去。这种极小而惊人的爆发，正是“原子嬗变的激变”。爆发后的残渣是镭射气的一种气体原子，这种原子本身又变成另外一种放射性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又再起变化！这些放射性元素组成一些奇异的家族，每一个成员都是母质自动嬗变而产生的。镭是铀的“子孙”，钋是镭的“子孙”。这些物质每刻都产生又自行消亡，在永远相同的时间内，每一种放射元素均要失掉它的实质的一半。铀需几十万万，镭需 1600 年，镭射气是 4 天，镭射气的子孙只需几秒钟。在镭射线的问题上，他们弄清楚了，当镭是一种纯元素时，其放射性要比钋强两百万倍，把它提成氯化物，就是一种灰暗的白色粉末，往往会被当作厨房用的普通的盐。镭还有它的幻影：它能自动产生一种特殊的气体——镭射气。这种射气极其活泼，即使把它封闭在玻璃管里，它也依照规律自行毁灭，很多温泉的水里就有这种射线。同时它蕴含一种天然的本能，不用燃烧，也不需要燃烧，其本身能自动发热，而它的外观并不发生变化。镭的这种射线能使玻璃变成紫罗兰色，还能穿透纸张。更离奇的是，镭射线可以使本身不能发光的物质发光。任何物质只要接近镭，在短时间内都会发出射线。镭真是无所不能，它能穿过黑纸在照相底版上留影；它能使空气导电，并使远处的验电器放电；能一点点地腐蚀包裹它的纸或棉花，使它们成为粉末；能发光，在黑暗中，一点儿镭的光就足够照读之用……

镭！不可思议的镭，神奇的镭。简直是无所不能，无其不能。

但是镭也有对人类带来坏处的一面：镭的放射性是能“传染”的，它像强烈的气味或疾病一样地传染。若把一件物品放在装镭的玻璃管旁边，一定立刻得到一种可以看得出来的“活动”，其结果具有极强的杀伤力。

玛丽在研究放射性很强的物质时，如要作精细测量，就必须采取特

殊的预防措施。实验室里的各种仪器只要接近镭的，就变得有放射性。灰尘、屋里的空气，衣服、都有了放射性，屋里的空气便成了导体。在她的工作实验室里，尤显特别。致使玛丽和皮埃尔无法隔离这种放射性而深受其害，他们的身体渐渐衰弱。

镭还可以引起严重的灼伤。镭射线对病变组织的破坏比对健康组织的破坏更快更严重。这样，镭便可以在医学上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夫妻俩对这一发现极感兴趣。为了准确证实镭在医学上的作用，皮埃尔更是不顾危险，立刻用镭在自己臂膀上作试验，擦有丁点儿镭的地方，渐渐地有了伤痕，慢慢地有 6 公分见方的皮肤发红，像烫伤伤疤，不感痛楚。过些时间，红色并未扩大，只是颜色转深，到 20 天，结了痂，便可以用绷带包扎，到 42 天时，边上开始生出表皮，伤口开始愈合。等到射线作用后 52 天，疮疤只剩下一点，颜色发灰。

根据这一现象的观察，皮埃尔夫妇认为：镭的杀伤力特别大，辐射力特别强，是世上任何物质无可比拟的。

一次，玛丽在移动一个封了口的小试管时，里面只有几毫克放射性强度的材料，小试管上沾着一粒晶体，却把玛丽的手指尖烫伤了。持续 15 天以后才开始脱皮，痛感过了两个月才消失。玛丽那双饱经风霜的手在实验时，累累遭到镭的侵袭而疤痕累累。

镭的杀伤力太大了。

一次，他的朋友，著名科学家亨利·贝克勒尔来实验室看望他们，皮埃尔夫妇送给他一个装有镭的试管，他准备带回家去。但他知道镭的厉害，不敢用手去拿。他就用布层层包好玻璃管，放到上衣的口袋里，以为这样便万事大吉了。结果，靠近镭试管的那片肉被烧伤了。他感到十分惊喜又愤怒。跑到皮埃尔夫妇面前告状了：“你们看，你们的‘孩子’把我灼成这样。这个镭。真是神奇，真是绝妙，我爱它，也恨它！”接着是一阵激动而欣喜的笑声。

镭射线这惊人的力量，使皮埃尔夫妇信心倍增。于是他们在医学上挖掘其潜力。用镭在动物身上作试验，那些猫、兔子、老鼠成了镭的牺牲品。

高级医生布沙尔和巴尔塔沙与他们合作。经过认真细致的试验和观察，终于得出了辉煌的结论。镭能破坏有病的细胞，可以烧掉肿瘤，治疗狼疮瘤和某几种癌肿。这种治疗法定名为放射疗法。从此，这种放射疗法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医院。这种发现在医学界引起了轰动，许多医院利用这种方法对肿瘤和癌症进行试验，均获成功。

玛丽在她的论文中写道：“圣路易医院的兜娄大夫已经研究了镭对皮肤的作用。它所毁坏的部分表皮，新的健康组织很快就能生长出来。”

镭的用处大极了。它能成为人类必需的用品，成为保护人类健康和幸福不可少的重要工具。这是他们在 1900 年时所料不及的。这些作用的发现引起的最直接现象，是争先恐后提取这种新元素。至此，制镭这个新兴工业诞生了。

开始，是在化学产品总公司的安德烈·德比尔纳领导下进行的，他们愿意进行这项工作而不从中牟利。该公司组织力量处理大批矿物，提取纯镭。

1902 年，法国科学院终于拨给居里夫妇两万法郎经费，用以提炼放

放射性材料。这虽是一笔迟来的资金，但带给他们的仍是喜悦。皮埃尔和玛丽只要是对研究有利的事，总是容易乐观和满足。他们立即投入全部精力，精炼 5 吨矿物。

1904 年，具有商业意识，且聪明能干的法国实业家阿尔麦·德·李斯罗大胆地创设第一个制镭工厂，生产镭制品，以繁荣医学业，为人类作贡献。他给居里夫妇提供一个与工厂毗邻的实验室。并派欧得班和雅克·达纳与之合作，以帮助他们顺利地在那狭小、破烂的棚屋里无法进行的实验。

玛丽经过千辛万苦炼制出来的那一克镭，其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那是她 4 年棚屋艰苦生活的象征；是他们对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的象征。后来，也就是镭学研究院修建后，她把这一克镭赠给了实验室。

镭的价值是任何物品都不能比拟的。它比金子更有价值，正式出售的镭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一克值 75 万金法郎。不久，出现了“镭盐—放射性物质”的出版物。他们无不称赞“镭”的父母的品德和奉献精神。

这种举世闻名的成功，使居里夫妇的名字传遍五洲四海，走进寻常百姓家，掀起了世界性科学热潮。

不久，各地科学家纷纷要求用镭来做实验，各国有许多人想提炼镭。可是镭的提炼法只有皮埃尔和玛丽知道。

作为镭的发明者和提取纯镭技术的发明家，玛丽和皮埃尔是这一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他们可以在公布如何从沥青铀矿中提炼纯镭方法之前，取得技术上的专利权，以确保他们在世界各地制镭业中的特权。这是对玛丽和皮埃尔一个重大的考验。如果申请专利，他们将可以获得巨额财富，成为大富豪。可以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实验室，添置所有需要的设备，他们的孩子将拥有大量的钱财，可以做他们任何想做的事情，完全可以补偿一下长时期的艰苦生活。

而另一种做法是，将他们的知识无偿地献给全世界，对他们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不取分文报酬。

两种决定，得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他们应选择哪一种呢？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居里夫妇在克勒曼大道的小房间里，平心静气地讨论着这个严肃的问题。皮埃尔把邮递员刚送来的一封由美国发出的信放在桌上，认真地说：“玛丽，你看，这是布发罗寄来的信，还有巴黎，比利时，日内瓦等等的求援信，不少要在美国创立制镭业的工程师请求我们提供资料。”

“你说怎么办？皮埃尔！”其实不用讨论，玛丽已成竹在胸，她只想听听丈夫的意见。

“我们必须在两种决定中选择一个”。皮埃尔顿了顿，看看妻子那疲乏的脸上有何表情，然后接着说：“一种是毫无保留地献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包括提取纯镭方法……”

“是的，当然如此，这符合科学精神”。玛丽作了一个赞成的手势。扬了扬眉毛，自豪地说：“这是惟一的办法，如果获取专利将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皮埃尔虽然同意妻子的观点，但他还是提醒玛丽：“玛丽，不要这么快就作决定，还是先考虑一下。我们的生活太清苦，我们的身体因长

年累月的艰难困苦而渐渐衰弱。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将来还会有孩子，不能让孩子们跟我们吃一辈子苦。如果我们有了专利权，就可以免除很多额外工作的困扰。就会拥有一个完善的实验室，有了钱，什么问题就解决了。”

善解人意的玛丽完全能理解丈夫的心情。皮埃尔一生不忍放弃的东西，就是一个能很好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实验室。这是他一生的追求和梦想。

玛丽沉思着，她的眼前出巴斯德、伦琴等著名科学家的高大形象，他们那淡泊荣誉、鄙视财富的高尚品德，又一次震动了玛丽的心，使原本视财富和名利为身外之物的玛丽更坚定了决心。她静静地注视着窗外，缓慢地说：“我们不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去谋取私利。”

她来到丈夫身边，紧紧地挨着丈夫温柔地说：“我们自己有个实验室固然是好事。但我们发现的镭将用于治疗疾病，用它可以救活濒临死亡的病人并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和目的。如谋取专利，而且是从病人急需用来治病的东西上赚钱是不光彩的行为。”她反复地重述那句：“申请专利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皮埃尔的心里被玛丽看得十分透彻。皮埃尔并非见利忘义之人，他只是出自慎重而已。见玛丽态度如此坚决，他的心里豁然开朗。镭能用来为人类谋福利是对他们这一发现的最大褒奖，是对他们付出代价的最好报答。他们在贫苦和财富之间作了永久性的选择。

就这样，居里夫妇将他们所知道的有关镭的知识无偿地传授给所有向她们求教的人。并且他们为了提取纯镭的方便，发明了一种专门技术，首创了一种制造法，为制镭业的人们减轻了许多困难和挫折。这个制造法他们也毫无保留地传播了出去。不久，制镭业先在法国、美国，以后在各种不同肤色的国家自由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形成庞大的制镭群体，以源源不断的产品供应给需要的学者和医生。这种比金子还贵重得多的产品很快就风靡全球。

1903年6月，玛丽正式向索尔本大学的教授们呈递了她的研究成果——博士论文。

她的论文题目已研究了五年多，因为镭的发现和放射性的研究，她没有时间整理材料，所以一拖再拖，直至现在她胸有成竹地去接受博士学位的考试了。

这是6月25日的早晨，明媚的阳光洒遍大地，使人心格外舒坦。居里夫人的住宅里，宁静中透出一种热烈。她拿出那件黑丝混纺的崭新长裙，这是早几天从华沙专程赶来参加玛丽的博士答辩会的布罗妮雅，看见妹妹那些磨得发亮的衣服，不适合这种庄重肃穆的场合，这些衣服与她那满腹经纶的才学反差太大，于是强拉玛丽去买来的。

玛丽把那浅色的金发挽成一个髻子，完全露出了她与皮埃尔结婚时的愉悦和清丽。那苍白的脸和饱满的前额体现出她仍是那么年轻，那么优雅。

索尔本那间叫“学生课堂”的小教室里，不得不加了许多椅子。玛丽的论文课题吸引了不少科学家，许多物理学和化学家都不愿错过这个机会。三个穿大礼服的主考者威严地坐在一张沉重的橡木桌子后面。老居里大夫、皮埃尔·居里、布罗妮雅等均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一群叽

叽喳喳的青年女学生坐在前面，她们是赛福尔女子师范学校玛丽的学生，她们是来为自己的教师喝彩的。

玛丽落落大方地站在答辩席的讲台上，信心十足，目光炯炯有神。

布提先生、李普曼先生和穆瓦松先生面带鼓励的微笑。答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开始了。教授们一个个向这个应试者提出许多问题，虽然尖锐，复杂，但教授们总投以平静而信任的目光。

玛丽递交的《关于放射性物质的研究》的论文，是她5年的心血，历尽千辛万苦，做了几千次实验，最后整理完成的。所以她的回答是极有信心和力量的。

玛丽用一种轻松柔和的语气认真地回答着。时而用一种枯燥的专业术语来阐述她的观点，时而用形象生动的大众语言来解析她的研究成果，时而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一一种仪器的图形，或写出一种基本公式的符号。她用极冷静、平缓的声调，描绘出一幅令人激动、神往和亢奋的图景，那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玛丽那灵巧的嘴，抑扬顿挫的语句、潇洒自如的手势完全抓住了在场人的心，无论是教授、学者和听众以及学生都为之振奋和鼓舞，都感到一种思潮在翻腾。这个非凡的玛丽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辉煌灿烂的前景，完美无缺的答辩结果。

答辩在人们的赞叹声中结束，主考者站起来，满面堆笑地说：“考试成绩非常优秀，巴黎大学荣幸地授予你为物理学博士学位。”

考场里响起热烈而长久的掌声和喝彩声。这时，李普曼教授以诚挚友善的态度对玛丽说：“夫人，我代表主考人向你致贺。”

这简短朴实的语言，蕴含着老一辈科学家对这位女性天才多么深切的爱戴和祝福。

5年的艰苦，5年的奋斗，对玛丽个人的收获，惟有这个博士学位。这是玛丽的愿望，也是斯科罗多夫斯基全家人的愿望，是居里一家的光荣，更是斯科罗多夫斯基家的光荣。

皮埃尔为妻子得到这一殊荣而高兴，他又一次擦亮他们那心爱的自行车，作一次短途旅行，表示对妻子的祝贺。

镭的神奇作用已经被世界所接受，人类开始认识到居里夫妇所从事的工作的重大价值。最先是瑞士的日内瓦大学聘请皮埃尔和玛丽为专职教授，接着是法国先后授予他们好几枚勋章，玛丽接连获得了三次若涅奖金。而真正在最高学术研究领域肯定皮埃尔和玛丽的地位，并使他们名声大震的是英国。1903年6月，著名英国皇家科学协会正式邀请皮埃尔·居里先生前往，并举行镭的讲座。

皮埃尔接受了邀请，并偕同玛丽出席了这次隆重的盛会。

接待他们的是老熟人，一位德高望重而又仁慈的长者克尔文勋爵。他一直十分关注居里夫妇的研究进展，并把有这样的朋友引以自豪。他带居里夫妇参观他的实验室。这位长者虽然声望极高，知识老成，但动作常像个小孩子，走路时，常用一只手臂搂着皮埃尔的肩膀，并十分幼稚地把居里夫妇送给他封在玻璃安瓿里的一毫克贵重的镭指给他的同行们看，那种炫耀的笑眯眯的神色，仿佛镭就是他发现的。

皮埃尔举行讲座的那个晚上，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英国的高级学者、科学家都聚在讲课礼堂。最著名的威廉·克鲁克斯爵士、瑞利勋

爵、艾福伯瑞勋爵，杜瓦尔·艾尔艾文、汤姆生等物理学家都在那里，玛丽坐在皮埃尔身边，特别引人注目。她不仅是众多学者中的惟一女性，也是被允许参加皇家科学协会的第一个妇女。她的衣服是黑色的，领口开得极小，脖子上、耳朵上都没有任何饰物，那被酸液烧坏的手指结婚指环都没有。但是那平静中露出的辉煌，那暗淡中显出的光彩是任何女性所无法比拟的。她的出现给人的惊奇，不亚于英国女王在公众中的亮相。

皮埃尔以科学家深沉严谨的姿态，用缓慢的语调，有条不紊地叙述镭的特性，并且像作魔术般地当场作了试验。他叫人把屋子遮黑，用镭的魔力使远处一个金箔验电器放电；使一个硫化锌的屏蔽放磷光；使放在它旁边的冰块融化，在黑纸包裹的照相底板上留影。他用这些现场试验证明镭能自动发光放热。

“真是惊奇，惊人的神奇！”群情激奋，欢呼雀跃。

这些一贯以庄严肃穆著称的学者不得不为镭的神奇所倾倒，为皮埃尔的演讲叫绝。大家热烈地讨论着，赞叹着，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晚上激起的热烈情绪在第二天掀起了轩然大波，全伦敦的人们都要拜访他们，哪怕是看一眼也行。各种邀请雪片似的飞来。在每次宴会上，人们对着这个惊奇的妇人，卓越的女物理学家频频举杯，恭维和称赞不绝于耳。

这种应酬和热闹，这些盛大的排场，是居里夫妇极不情愿的。尽管皮埃尔极力表示出客气和热情，但给人的感觉仍不免心不在焉。玛丽极力躲开那一双双灼人的目光，常常表现出十分不安的情绪。

几天之后，他们回到了巴黎，回到了棚屋那一片宁静而简陋的土地，使他们倍感亲切。后来在他们那简便的晚宴上，皮埃尔若有所思地说：“在英国科学协会为我们举办的晚宴上，面对那众多的眼睛和人们，我不知所措，就想出一种游戏来，我在计算每个妇人戴在脖子上的宝石，可以建多少座实验室。我简直没有想到，世界上有如此美丽的珠宝。”

“是的，那些宝石真是太美妙，太可爱了。”玛丽天真地附和着。

在迷恋科学的人眼中，不是为妇人脖子上的珠宝和钻石如何美丽而赞赏，而想到的是设备完好的实验室和精密的实验仪器，有什么东西比这些更使人向往呢？

那次英国伦敦之行，使居里夫妇同英国的科学界有了广泛的接触，建立起了更加深厚的友谊，并与英国同行们制定了合作计划和研究项目。回到巴黎后，皮埃尔就与英国的著名物理学家杜瓦尔教授一起，发表了关于镭的溴化物所发气体的研究成果。也就在这一年的11月，英国的皇家协会把该会的最高奖戴维奖章赠给他们，以表推崇。这是英国的最高奖赏之一。

皮埃尔单独赴英国领奖，带回一枚很重的金奖章，上面刻着他们两个的名字。一向对勋章毫不感兴趣的皮埃尔认为这是个无用的东西，他把奖章交给小伊雷娜，让她拿着玩。当科学界的朋友来访，问起他们的勋章时，皮埃尔就把伊雷娜叫来，让他们看正被伊雷娜玩着的那枚金质奖章。

紧接着，1903年12月10日，这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这一天之后，居里夫妇的名字被推向了科学顶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科学

院为了奖励皮埃尔和玛丽在放射学方面的种种发现，决定把本年度的物理学诺贝尔奖金赠予居里夫妇和亨利·贝克勒尔。对于科学家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诺贝尔奖金，是根据素有“炸药之王”称号的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的遗嘱和资产设立的。诺贝尔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劳动，与父亲和哥哥一起先后发明了名为“硝化甘油”、“大力神”、“爆炸胶”、“无烟炸药”等一系列适于不同爆炸目标和用途的强有力的烈性炸药，极大地减轻了爆炸工人们的劳动强度，缩短了工程时间。

诺贝尔将他遗产的 900 万美元作为基金，用以奖励每年在和平、文学、物理、化学和医学五个学科中取得重大成果的人，不分其种族、国籍和性别。诺贝尔奖金迄今为止，是世界上最高权威的奖赏。每一奖项包括一个铸有诺贝尔浮雕像的金质奖章，约 4 万美元的奖金和荣誉证书。并且规定，获奖者必须在授奖仪式举行后的 6 个月内，在斯德哥尔摩作一次以获奖工作为主题的公开演讲。

此时，玛丽成为科学界获得此项殊荣的第一位女性。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惟一最负盛名的女科学家。

欧利维里乌斯教授代表科学院写信邀请居里夫妇参加这次盛会，以便亲自从国王手中接受奖金。可是由于实在太忙，加之夫妇俩身体都不太好，不宜作隆冬长途旅行。皮埃尔请求推迟他们的演讲。

这些享誉世界的成就，给居里夫妇带来了一些具体利益。他们获得了一枚奖章和 7 万金法郎的奖金。皮埃尔终于不用为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了。他们可以减少教课钟点，让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工作，这是挽救他健康的惟一条件。皮埃尔终于辞去了他在理化学校的教职，并自费雇用一个私人助手。

玛丽把这张幸福的支票存入戈卜兰路支行，并提取一部分给亲友们买一些礼物赠送亲朋，让大家来分享他们成功的喜悦。玛丽以借款名义给德卢斯基寄了两万奥币，以帮助他们创立疗养院。

一向不为财富所动的玛丽认为，这笔奖金是瑞典科学界对他们工作的推崇，是不违反科学精神的。不久，他们的镭又迎来了 5 万法郎奥西利奖金。这笔奖金的另一半是给埃都亚·布朗利的。玛丽把属于自己的那一半平分为两半，一半买法国公债，一半买华沙城债券，以此作为对祖国建设的支援。

居里夫妇把得来的奖金的大部分用于支援和捐献，他们的赠款项目中有这样的记载：送给波兰学生、赛福尔女学生，以支持她们继续深造；给实验室工人，以改善他们的贫困生活。玛丽还为她的一位老师提供了从波兰返回家乡巴黎的旅费……

对这些捐赠，玛丽从不张扬，从不炫耀。对任何事，她总是习惯于默默无闻。

对自己的生活，他们仍是那样吝啬，那样节省，除照顾皮埃尔的工作和身体，减轻课程之外，他们在克勒曼那套贫寒的住房没有丝毫变化。玛丽继续在赛福尔教课，她爱她的学生，同时也觉得自己的体力可以坚持下去。

荣誉没有使玛丽陶醉。她由衷感到高兴的是，她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同行的承认，她的辛劳换回的是为人类的贡献。但是他们的使命并

未完成，他们的好奇心并未满足，他们的智力潜能还十分丰富，也许他们的年岁正是天才得到经验的帮助可以发展到最高度的时候。他们需要工作。

有一些宴会他们无论如何是推脱不了的。在一个热闹的夜晚，居里夫妇到爱丽舍去赴卢贝总统的晚宴，出席这种场合，是出于礼节，当作任务来完成的。他们平静地坐在那里思考自己的问题。这时，一位珠光宝气的贵夫人来到玛丽跟前，十分热情地对玛丽说：“夫人，我引你去见希腊国王好吗？”接着她又加了一句：“我们非常崇拜夫人的智慧。”

玛丽却报之以温和友善的微笑，轻轻地说：“谢谢夫人，我看没什么必要。”

这位夫人出乎意料地大吃一惊，也许在她所接触人中，还没有遇到不愿结识国王的女人。待玛丽定睛看这位夫人时，才认出就是卢贝总统夫人。

5 新职位

1904年，36岁的玛丽又怀上了孩子，强烈的反应和疲倦使她不得不向赛福尔学校请了假，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请求照顾。到了快分娩的时候，玛丽虚弱到了极点，她不让丈夫离开她半步。她感到体力和脑力十分疲倦，她的精力消耗得太多。她担心孩子能否生下来。

布罗妮雅知道妹妹长期过着极其艰苦而繁忙的生活，长期的营养不良而造成身体极度虚弱，现在又面临生产，是多么需要亲人的照顾和抚慰。所以不用妹妹通知，就千里迢迢来到了玛丽的身边。

玛丽既感动又懊悔，感动的是在她最艰难的时候姐姐像从天上掉到自己身边；懊恼的是，偏偏遇到这个时候，身体极度不好，会对小生命带来什么结果。她喃喃地说：“人生太艰苦，太乏味，我们不应该把无辜的生命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受折磨。”

不管她是否情愿，1904年12月6日，经过一段痛苦的折磨之后，一个长着黑头发，大眼睛的婴儿生下来了。皮埃尔高兴地给她取名叫艾芜。

布罗妮雅竭尽全力，细心照料玛丽、孩子和一家人，同时兼任这个家庭的保姆和保健医生。她不仅精心调理，安排玛丽母女的饮食、起居，而且还认真检查研究皮埃尔的病情，采取各种办法为皮埃尔解除痛苦。布罗妮雅有一颗豁达善良的心灵，沉着稳重的外表，热烈亲密的手足之情。

在姐姐的精心照料下，加之新生儿的嬉戏和微笑，很快驱散了玛丽的愁云。在布罗妮雅离开巴黎的时候，玛丽的情绪平静多了。

寒冷的冬季过去了，迎来了百花盛开，风和日丽的春天。玛丽和皮埃尔决定履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专题讲座义务。

1905年6月6日，在斯德哥尔摩科学院的报告厅内，皮埃尔代表妻子和本人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回顾了镭的发现引起的各方面的影响：在物理学方面，镭的发现大大修改了过去许多机械学的基本原则；在化学方面，引起了一些大胆的假设，这些假设解释了造成放射性现象的力量来源；在地质学和气象学方面。它打开了以往复杂而又迷惑的现象的大门；在生物学方面，镭对于癌细胞的作用，已经充分证明是极为有效的。

演讲结束时，皮埃尔意味深长地说：“人们也许能想像得到，在罪犯手里，镭可能成为极危险的东西而危害人类。诺贝尔的发明和发现已有先例，那些烈性炸药为人类作出了惊人的贡献；但是在那些战争罪犯手中，它们也是一种可怕的具有毁灭性的工具。因此，我赞成诺贝尔的观点，即人类从新的科学发现中所得到的益处，要比所受危害大得多。”

他的演讲深受瑞典学者欢迎，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热烈的赞扬声。

这次游历使居里夫妇十分尽兴，没有群众，没有官方人员，只与一些科学家畅谈，十分合他们的心愿。他们在瑞典学者的引领下，畅游了瑞典的湖泊和海湾，森林和山川。在周围被海水包围的一点陆地上，长着翠绿的松林，红色木头房子像星星点缀着蓝色的海湾，秋天的阳光柔和地洒在他们身上，使人们倍感温暖和亲切。

这次游历使他们疲惫的身心得到良好的调整和休息，使他们的生活

增添了不少色彩；同时也同瑞典科学界的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畅谈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

回到克勒曼大道的房子，居里夫人仍然是拒绝闲人闯入，过着隐遁的生活。晚间，他们总是穿着室内便衣和拖鞋，翻阅科学资料，谈论着他们的研究工作。科学使他们如痴如醉。

一次，他们的女佣很认真地做了烤肉，煎牛排和马铃薯泥。她见皮埃尔吃了很多煎牛排，就认为味道一定很好，希望能得到皮埃尔的夸奖。这个女佣大胆地问：“先生，煎牛排做得怎样？好吃吗？”

皮埃尔竟不知所措地回答：“我吃了煎牛排了吗？”然后又喃喃地加了一句：“我可能吃了吧……”

镭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居里夫妇的大名如日中天之后，他们所居的法国才肯承认他们的价值。

首先是要把皮埃尔选为科学院院士。支持他的学者和朋友害怕他又一次拒绝，给他以极其关心的劝慰。而皮埃尔对科学院却不甚钦佩，他甚至问自己，进入科学院到底为什么？然而不管他是否愿意，科学院院士的“黑色金字塔”还是戴在了他的头上。他的信条是：不与任何成员发生关系，对那些例行公事的行政会议一概没有兴趣，他认为科学院不是自己去的地方，他讨厌人事上的纠葛与恩怨。

皮埃尔真正关心的是巴黎大学为他决定的事项。校长李亚尔已经在1904年为他设立了一个物理学教授教席。这是皮埃尔梦寐以求的事情。在接受这个晋升之前，皮埃尔向校长提出：他的职务附有的实验室在哪里？

回答令他失望，没有实验室，等于这个教席是空设的，等于要中断他们的研究工作。这时，皮埃尔只有发挥他那美妙文字的作用，向上司写了一封极其诚恳的信，他表示：“如果新职位不供给工作室、不供给研究经费，他宁愿辞职。”他想，这样他仍可以在那破烂的棚屋里与妻子共同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巴黎大学的决策者们收到这封措词严谨的信，立即有了警觉。也许是顾及到巴黎大学在国际科学界的影响，也许是皮埃尔不妥协的精神。经过多次商议，巴黎大学采取了一种伟大的姿态。他们以学校的名义，请求众议院为皮埃尔创设一个实验室，并拨款5万法郎。这个计划基本被采纳。索尔本大学校内已没有空地，就在居维埃路修建两间屋子，每年拨给1200法郎经费，外加34000法郎设备费。皮埃尔基本接受。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局在计划这一财政费用时，把建筑费和设备费当作一件事，那么建两间房子的建筑费是两万法郎，这笔钱就只能从买仪器的经费里支付，给皮埃尔增加了不少负担。

偌大的法国政府对科学，对一个天才的学者竟如此的吝啬，如此的不公平！

这次任命居里夫妇感到欣慰的是：部长决定给皮埃尔配备三个合作者，一个实验室主任，一个助手，一个工人。实验室主任由玛丽担任。

一纸公文送到玛丽手中：“从1904年11月1日起，任命理学博士居里夫人为巴黎大学理学院物理实验室（隶属居里先生教职）主任。”

多少年的辛苦，多少年的汗水，直到此时，才给玛丽一个固定的薪金和职位，年薪2400法郎。

“再见了，棚屋！”当工人们把仪器从棚屋搬移到居维埃路之时，居里夫妇像辞别朝夕相处的老朋友一样，久久地伫立在棚屋前，注视着曾经为他们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棚屋而感慨万端。他们总想找一个机会，感谢理化学校对他们的支持。机会终于来了。

一次，巴黎大学请他作一次关于镭的讲座，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礼堂里，他热情地讲到了理化学校，讲到了这个简陋的棚屋。

“我们的全部研究和发明，是在巴黎市立理化学校完成的……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理化学校工作，这所学校的第一任校长舒尔勃格先生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当我还是助手的时候，他就为我提供了许多工作上的方便和帮助；后来，他又允许我的夫人在我身边工作，从事研究。想到这些，我就十分感激。现任校长娄特先生和加利埃先生对我也是恩重如山，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皮埃尔和玛丽手挽着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棚屋，来到了居维埃路实验室，开始了他们新的合作。

每天，他们在实验室里低头做那些极其细微的工作。相互之间要提出一大堆问题。有热烈的争论，有亲切的责备，有细心的探讨。他们中有互相鼓励的工作关系，有和睦相处的同志关系；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配合默契。这种轻松愉快是人类高尚的爱情表现。

一次，他们的助手阿尔伯·拉伯德在实验室里用一个水银仪作实验，皮埃尔正指导着，玛丽走过来，认真察看了机械上的一些细节。她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提出了一些疑问，皮埃尔极耐心地解释给她听。玛丽竟毫不放松地予以反驳，各陈述各的理由。玛丽在科学上的倔强充分地体现了出来。还是皮埃尔让了步，他用极其柔和又气愤的语气说：“啊！得了吧……玛丽。”

又有一次，有几个同伴被一个数学公式难住了，他们来找居里夫妇，这时居里夫妇因事未到。皮埃尔的助手同他们争论来争论去，运用各种方式进行计算，一直没有准确的结果。见皮埃尔进来，他们一齐来请先生解答。皮埃尔看了看递给他们，平静地说：“等一等，居里夫人马上就来。她能用积分解决你们的困难。”不久，居里夫人来了，果然用极快的速度求出了难题的答案。

如果说没有“互相让步”，任何婚姻都难于长久；可是他们结婚11年来，并不是靠让步来维持的。皮埃尔比较深沉平静，富于幻想；玛丽比较热烈，近人情；他们均有极强的个性，并且是两个不同性格的人。他们的婚姻如此甜蜜幸福，主要靠的是精神上的依靠，工作上的合作，生活上的关心，小问题上的让步以及对科学事业的追求。

在家务问题上，皮埃尔常常顺从玛丽。他们最好的朋友佩韩夫人到他们家作客，便想带伊雷娜出去玩。她对皮埃尔说：“我可以带伊雷娜出去玩一会儿吗？”

皮埃尔却毫无主张地说：“我不知道……玛丽没回来，不问玛丽我不能答复你。对不起，夫人。”

然而，在公开场合的演讲中，或者出席学者招待会时，玛丽总是十分腼腆地跟在丈夫身边，当有的人向她问起提取纯镭的过程时，她就会羞涩地把眼睛转向丈夫。她认为：在丈夫面前，自己的知识太贫乏。她深信皮埃尔的意见比自己宝贵一千倍。

1906年复活节，他们举家郊游得到了一次美好的享受。

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在舍夫律——圣瑞住了几天。这是个温暖的季节，巴黎的乡村漫山遍野的紫罗兰散发着迷人的芳香，各色鲜花竞相开放，姹紫嫣红，把山川河流点缀得美丽耀眼。

一天早晨，他们来到树林里野游。皮埃尔懒洋洋地躺在松软的草地上，任由阳光的撒播。14个月的艾芜爬在为她铺开的毯子上乱喊乱叫，非要抢姐姐手中的绿网罩。伊雷娜一边逗引着不会走路的小妹妹，一边回过头去拿着那个绿色的小网追捕蝴蝶。她把捕来的“猎物”交给艾芜，艾芜不知所以，拿着便乱撕乱捏，一个劲往脸上抹，往嘴里塞，搞得满身污秽。抱着一大捆水毛茛的玛丽兴致勃勃地跑来，看见艾芜这副模样，惊叫起来：“艾芜，这傻孩子。”回头对着躺在草地上正哈哈大笑的丈夫，嗔怪地说：“你看你，连孩子也不管一下。”玛丽边说边用毛巾把艾芜擦弄干净，皮埃尔仍笑得直打滚。

夫妻俩躺在明媚的春光里，望着天空中飘浮的白云；看着满山满坡的树木花草，吮吸着阵阵清香；欣赏着他们的伊雷娜捕蝴蝶的滑稽动作和艾芜吱吱呀呀的叫唤。皮埃尔侧过身来，抚摸着妻子那一头被微风吹乱的金发，亲吻着那丰满的前额，灵巧的嘴，纤细的脖子，充满柔情地说：“玛丽，有你在身边，我们的生活永远是甜蜜快乐的。”

第六章 奋斗到底

1 考验

这天清晨，天气突然变了，天昏地暗，电闪雷鸣，狂风大作，豆大的雨点不断地打着玻璃门窗。人们或是撑着雨伞，或是披着雨衣，匆匆而过，不时喷出一句“这鬼天气”。居维埃路居里住的小院子里，呈现出一阵紧张匆忙的情形。

皮埃尔的时间表堆满了这一天的工作。首先要到科学院去参加研究论文的评定，然后要到出版商高替叶·维亚尔那里去看自己即将出版的一本最新著作清样，还要参加理学院教授联合会的聚餐。诸事办完之后还要去实验室。晚上，由于这太多的事搁在大脑里，使他无法入眠。他早早地起床后，简单地梳洗着，然后吃女佣给他准备的早餐，自己整理好公文袋。

玛丽也要去赛福尔上课。由于大雨滂沱，7点钟时，屋内还十分黑暗，她点上灯，早早地起床后，除履行妻职之外，还要履行母职。叫伊雷娜起床，给艾芜穿衣服，替她们梳头发，扎丝带，然后是整理床铺，还要为自己梳洗。皮埃尔在窗前看了看天气，倾盆大雨仍下个不停，他拿好雨伞临出门时，大声叫喊：“玛丽，你今天去实验室吗？”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

玛丽一边忙乎着，一边回答丈夫：“我今天没有工夫去。”家里一片嘈杂声，外面又是特大的风声雨声，夫妻俩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玛丽又一边干活，也不知皮埃尔听清楚了没有。因为时间关系，皮埃尔急着要走，只听见“砰”的一声，大门关上了。这天早晨，这对夫妻面也没碰上，话也没说一句，就匆匆分开了。

午餐聚会是在一种和谐、亲切的交谈中进行的。这次聚餐都是一些志趣相投的学者、教授。饭店为他们选择了一间安静、无人打扰的餐厅。他和他钦佩的同事们亲切地谈索尔本，谈科研、谈职业。进餐时皮埃尔与坐在他旁边的亨利·普安加瑞教授谈笑风生，津津乐道。皮埃尔告诉他此刻他正专心研究的一些问题：镭射气的定量；镭射气的生理作用；他最近参加的招魂术实验；还有一些关于女子教育的独特见解。他谈他的新奇理论。谈他的新发现，滔滔不绝，眉飞色舞。皮埃尔平时一脸的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然而，当他谈到科学时，便是那样神气活现，精神焕发。亨利教授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称赞，间或提出一些问题。皮埃尔此时的心里，只有科学，只有放射学，只有镭和镭射气。他是那样专注，那样投入。他的宏论、他的假说、他那伟大的天才使他的同行们不得不折服，不得不惊叹。

教授们这次聚会主要是讨论科学职业上的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烈攀谈之后，谈话转到实验室里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大家都是搞科学的，都有自己的实验室，化学物理学的杀伤力多大，造成的危害性多大，大家心里均有数。皮埃尔立刻赞成拟订一个减少研究者所冒危险的规则。在皮埃尔长期的艰苦的研究中，他和夫人的手上脚上身上，都留下化学酸液烫伤的疤痕。

这种平静的聚会是皮埃尔很欣赏的，没有俗套，不带政治色彩。皮

埃尔很轻松愉快。大致两点半钟时，他突然想起还有别的工作要做，不顾大家都未退席，余兴未尽，他便微笑着站起来向朋友们告辞，并且与当天晚上还需见面的让·佩韩教授握手，互相祝福着：“晚上见！”

皮埃尔匆匆来到门口，一阵冷风扑来，他浑身打了个寒颤。大雨仍是倾盆而泻，热烈的心情顿时被冷落了下去。他不经意地望着天空，紧蹙着眉头，表示对这种天气的愤怒，然后撑开他的大雨伞，顷刻间，消失在茫茫雨帘中。

他挤进川流不息的人流，走进塞纳区，周围都是嘈杂声，电车喇叭声，烤香肠、烤面包浓郁的香味，他充耳不闻，目不斜视。他的脑子里装着物理实验，放射学、镭射气……有时想到一个新奇的问题，他会露出一丝微笑，算是对大脑的赞赏。

到了！高替叶·维亚尔出版印刷厂。他抬头看了看，大门紧闭。他感到纳闷，因为他是不太关心政治和战争的。一打听，工人罢工了。“倒霉！”他苦笑着摇了摇头。表示对工人罢工不理解。他在门前徘徊了一阵，总希望会出现奇迹。在他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便又转身往多非纳路走去。这是巴黎旧区一条十分喧哗热闹的道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行人摩肩接踵，马蹄得得，车夫叫喊，呼呼的电车声刺入耳膜。马路上挤满了奔驰的车辆，人行道上拥挤不堪，这条原本狭窄的道路，更是负荷沉重，喘不过气来。

皮埃尔本能地选行人稀疏的路面走，有时走在马路栏石牙上，时而又来到马路上，颠颠簸簸，步伐极不稳。由于天气太冷，他把手插进口袋，本能地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叠稿纸，看了看，又塞进口袋。这是他的朋友余班提交科学院的论文，请皮埃尔修改。于是皮埃尔的脑子里又增加一个新问题。我应该赶快看看，不能耽误人家，老是装在口袋里，怎么行呢？今天不行，明天一定得看。这时他又想到实验室，今天还没去实验室呢！玛丽是否去了实验室？如果她去了，没看见我，她又着急……也许她已经在做实验了。他想的事情太多，眼神集中，脸色凝重，大脑不停地转动。想到这，他加快了脚步，跟在一辆向诺夫桥驶去的轿式出租马车后面，走上了柏油马路。到了波恩纽夫路与滨河路的叉路口，喧哗声更大，穿梭而过的电车，马车筑成了屏障，大有挡住行人通过之势。皮埃尔正想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去，全然没有注意一辆满载货物的四轮马车正向他奔来。他突然抬头发现后，一惊，正欲转身快步避开，可是已来不及了，马儿惊得前蹄腾空起来。皮埃尔慌忙之中脚下一滑，一声大喊，引起了周围惊恐的呼喊，马车轮子飞驰电掣般地在他身上辗压过去。霎那间，一颗天才的头脑被轧得粉碎，当即脑浆迸裂、血水、泥水、雨水混成了一条黑色的河……风在呼、雨在吼、行人在大喊；“停车、快停车！”然而晚了，晚了！一个伟大的生命瞬间被夺走，巨星陨落了！

有人抬来了一副担架，几个警察抬起那个鲜血淋漓，却还有体温的躯体，一连拦了好几辆陆续驶过的马车，但是没有一个是车夫肯用自己的车来运那满是污泥，尚在流血的尸体。最后还是警察硬性拦截一辆马车，才把尸体送到附近的医院。医生用海绵洗净那张泥泞的脸，看看已经压碎的颅骨时，轻轻地摇了摇头，表示已经无回天之力了。无可奈何，警察只好将尸体抬回警察局。人们根据死者那极旧的衣着，不整理的发须，

被化学药品灼伤的手，判定他是工人或搬运夫。当警察打开他的钱包，检查他的证件时，发现牺牲者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皮埃尔·居里，索尔本大学物理系教授，一个著名科学家，风靡世界的“镭”的父亲！惊讶使他们张开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消息传开。行人骚动着，越挤越多，并发出怒号，不少人举起拳头朝车夫路易·马南打去，并怒喊着要用路易·马南换回皮埃尔的再生，有的人抓住马南就往门外拖。警察怕出危险，不得不出面干涉。路易·马南无意反抗，他愁丧着脸，痛苦地抽泣：“你们打吧！打死我，我该死啊！”他是无心造成这次惨案的。多少人围过来，挤在一起，多少人想看看这位科学巨星，多少人悲泣恸哭。一时间，满街的人都停止了脚步，悲号痛哭充斥着这一方阴霾的天空。车辆停了。交通堵了，几个警察不得不分头疏通交通，迅速安放好尸首。

这飞来的横祸突然降临到居里这老少三代和睦的家。风声、雨声、雷声骤然停了下来，只留下一片血污，一片哀寂。居里家的门前，破天荒停下了不少汽车和出租马车。连共和国总统府那令人炫目的汽车也停在门前。门铃呜呜地响着，大门缓缓地拉开一条线。传话说：“居里夫人没回来”，又慢慢地关上。

门铃又响了，理学院院长保罗·阿佩尔和让·佩韩教授来到了这所阴冷的住宅。他们接到通知，迅速赶来了。他们的任务是先把这个噩耗告诉玛丽，得知玛丽不在家，他们只好保持一种尴尬的缄默。

这所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居里大夫和女仆，显得特别的孤寂和冷清。见了客人，女仆惊慌失措，连茶水也不知道送上。老居里大夫见面前的客人表情严肃，情绪低沉，蕴含着一种忧郁的心情，心里极慌乱，瞪大着惊讶的眼睛。保罗·阿佩尔不愿在玛丽知道之前把消息告诉她的公公，所以保持一种困窘。然而，这个头脑清醒敏锐的老人，在客人痛苦的表情，疑虑的脸上，找出了一个他不想知道的可怕的结果，他似乎自言自语地道：“我儿子死了？！”

他希望这不是事实，希望有人出来否定，他的潜意识里，根本就没有把事情想得如此坏。

到此时，保罗·阿佩尔才把这件憋在心里的不幸的事情向老人叙述着。慢慢地，他那皱纹巴巴的脸上滚满了泪珠，佝偻的身子显得更加瘦小。他喃喃地重复着：“我儿子怎么了，他当时在想什么？”有什么比老年丧子更为悲痛？皮埃尔是他一手教育和培养出来的，他对儿子充满无限的希望。早晨出门时，雨伞还是老人递给他的，他说中午不回来吃饭，晚上会早点回来，怎么会不回来呢？儿子向来是说话算数的。可是他，他怎么会走了。“他当时在想什么呢？”老人那枯皱的眼眶里泪水不断线地往下流。

大约晚上6点多钟，锁孔有被钥匙启动的声音，门开了，玛丽愉快又欣喜地出现在客厅里：“爸，皮埃尔回来了吗？给你买了……”

当他抬头看见客厅里出现不少朋友时，话语打住了，并惊奇而客气地打了招呼。这时老居里大夫的哭声越来越响，朋友们脸上极其哀伤和忧郁，此时的玛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一下子掉到了冰窖里，她想可能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故了，但是她没有想到皮埃尔会出现如此不幸。她的耳边响起保罗·阿佩尔哀惋的声调，隐约听到皮埃尔被车撞倒，当即死亡……

玛丽僵直了，她手中的皮包、食品啪地掉到地上。她认为是耳朵有问题，没听清楚，又急促地问：“什么？皮埃尔死了？这不可能，不可能。……”

她渴望听到相反的结果，渴望听到否认的语言。保罗·阿佩尔院长只得再次安慰她：

“夫人，你要冷静，这是真的，真的……”

玛丽像木头一样僵直着，毫无生气，毫无感觉，喃喃地说：

“真的，皮埃尔死了，这是真的……”有如晴天霹雳，有如万箭穿心，她无法适应，无法转过弯来。她完全痴呆着，一动不动。教授们非常着急，紧紧地扶住她的手臂。

此时，也许是几分钟内，她眼前浮现出多少美妙的画面：皮埃尔那坚决固执的求爱；他们那美妙的郊游；臂挽着臂在去实验室的路上；那艰难的岁月；那苦度的四年中相依为命，艰苦奋斗，并肩研究；如今，荣誉、教席都来了，经济也好转了。索尔本大学教授教席是皮埃尔的目标，他刚上任，刚开展工作。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许多课题等着他去研究。他的助手，他的学生，他的孩子，他的父亲，还有他相亲相爱的妻子，他的合作伙伴都需要他，都离不开他。他怎么会撒手不管？他是个责任感极强的学者、丈夫、父亲、儿子。他怎么会死呢……她内心的纷扰，思想的纷乱，心灵的碎裂都在她那悲惧的脸上显示出来。

“皮埃尔死了，”这个她连想都不敢想的字眼传入她的意识中，立刻就涌上一种落寞，一种凄凉。从现在开始，她就要成为遗孀，一个孤苦无助的妇人。他们合作的事业就要告一个终结了？她的脸色苍白如纸，浑身颤抖，嘴里喃喃地说些什么，只有她自己才能听懂。

“夫人，别太难过，要坚强一点。”人们表示哀痛和安慰的话，她什么也听不见，只是神情专注地盯住前方，当大家问她必须要她回答的一些问题时，她丝毫没有反应。她在等着、盼着她亲爱的丈夫。

有人把从皮埃尔衣服口袋里找着的几件遗物送来：一支自来水笔，几把钥匙，一个皮夹，一只表。接着一辆救护车停在这所房子的前面。玛丽像触电一样立刻有了反应，她迅速地跑出去。爬上车。是他，她的丈夫，她的师长，她最崇拜的工作伙伴，她最熟悉的平静和蔼的脸。她俯下身去，泪水像打开的闸门，哗哗地滚落下来。她哭着，喊着，不停地吻他那满是血污泥污的脸，吻他那还有热气而柔软的身体，吻他那还能屈伸的手。这种炽烈的爱，这种痛苦、这种惨像，使周围的人为之悲伤，发出沉重的哀号。

大家强拉她到房间里去，把皮埃尔的躯体慢慢地抬进屋里，准备入殓。玛丽使劲地挣脱出去，再一次扑向皮埃尔的身体，紧紧地抱着那渐渐僵硬的躯体嚎啕大哭，任凭别人好说歹说就是不放，直到她疲倦地晕倒之后……

命运真会捉弄人，竟把一对“天配良缘”的恩爱夫妻，一对天才合作者生生地拆散分离。玛丽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是1906年4月19日，皮埃尔46岁，而他们的女儿一个8岁，一个仅16个月。

第二天一早，雅克·居里来到玛丽的面前，他本想对这个十分悲痛的弟妹安慰几句，然而当他们面对着的时候，双方什么话也说不出。只看见眼睛里，闪动着伤心的泪花。还是玛丽坚强地站起来，在屋子里

踱着步子。她用嘶哑的声音，安排女仆为艾芜梳洗，安排一对女儿的早餐，以此来冲淡这忧郁的气氛。

玛丽失去了丈夫，居里一家失去了亲人，世界失去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舆论界哗然，各地报纸纷纷刊载这一噩耗，报道着多非纳路的悲惨事件。许多表示同情和悲哀的函件雪片般地飞到克勒曼大道的居里宅第。国王、部长、诗人、学者，各个国家各个阶层，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崇拜者。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克尔文勋爵，法国著名化学家，曾任教育部长、外交部长的马斯兰·伯特娄，巴黎大学校长李普曼教授等都发来了十分沉痛的唁电。皮埃尔的助手舍纳弗代表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发表了极其沉痛的悼念文章：“皮埃尔先生是我们最敬爱的人。他对任何人都十分友善，品德高尚，精神伟大。就是对于一个卑微的合作者，都是那样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就是地位最低下的工友、仆役，他也十分同情和友善。他在我们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噩耗传来，实验室的所有人员均嚎陶大哭，其伤心至极，是前所未有的。”

法国和世界科学团体，纷纷以各种方式哀悼和赞扬这位伟大的学者。

法国科学院院长，著名物理学家亨利·普安加瑞教授，代表他的同事们在悼文中给皮埃尔一个准确而崇高的评价：“所有认识皮埃尔·居里先生的人，都会感到与他交往的愉快和轻松。他谦虚大度，正直善良，聪慧敏锐。他那众多的非凡发明，显示他非凡的才能和神妙的智力。”

皮埃尔这个十分温和而善良的人，有一颗如此高洁和顽强的心灵。他所奉行的道德行为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皮埃尔的灵柩被送回梭镇，将以最简单的仪式安葬在他母亲的墓地里。玛丽挽着她的公公居里大夫手臂，缓缓地跟在后头，最后一动不动地站在灵柩前。当人们把一束鲜花放在墓前时，她忽然拿起花来，一朵朵摘下，一瓣一瓣地撒在墓穴里。她旁若无人，静静地把花瓣撒完，然后扔下枝干，默默地回到居里大夫的身边。

处理完了后事，玛丽的一切也随之而去了。她要把这一切告诉皮埃尔，她木讷地打开那个灰色的笔记本，刷刷地写着，涂改着，每天都有，写满了一张又一张。

“我们在星期六早上装殓了你，抬你进棺材的时候，我捧着你的头，最后一次吻了你的脸，然后在棺材里放了一些长春花和我的一张照片，是你叫做‘很聪明的小学生’那张你喜欢的照片……我们把你送回梭镇，看着你下到那个大洞里去，然后就是人们庄严地列队走过……他们填满墓穴，放上花束，诸事完毕，你在地下长眠。完了，一切全完了，我亲爱的皮埃尔，你安息吧！”除了在日记本上一张一张地写着之外，她不与任何人说话，呆呆地对着从皮埃尔身上口袋里找到的那些遗物。

布罗妮雅守护在妹妹的身边。她十分理解和同情妹妹的境况。这个可怜的妹妹，磨难太多，一生的颠沛流离，一生的艰难困苦，生活才向她展开一点微笑，却又遭受一场沉重的灾难。她安慰妹妹，怜悯妹妹，总希望能有灵丹妙药解救妹妹。她的能耐和浑身解数只能是劝慰，妹妹的精神受刺激太大了。

皮埃尔葬礼举行后的第二天，部里和学校里的代表接踵来到克勒曼大道。法国政府正式提议向玛丽和她的子女提供抚恤金。当雅克来征求

玛丽意见的时候，她坚定地说：“我坚决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可以自己挣钱抚养孩子们”。她那虽微弱的声音却充满了勇气和信心，她那坚强的意志又一次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讨论玛丽工作时，当局犹豫不定，他们有意留玛丽在学院工作，又不知道给什么头衔，继续任实验室主任又不好安排在哪个教席之下，到哪里去找一个能够领导居里实验室的教授？问题集中在谁来接替皮埃尔在索尔本大学的职务。他们征求玛丽的意见。沉浸在痛苦之中的玛丽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回答……”。像这些重大的问题，她总是要听皮埃尔的，而现在，她的皮埃尔在哪里呢？

这时雅克·居里，约瑟夫认为：他们应该替玛丽作出这个决定：没有谁比玛丽对皮埃尔的工作了解得更深透了，玛丽是惟一能够继续皮埃尔工作的法国物理学家，是惟一能够得上皮埃尔的继任教席，惟一能代替皮埃尔领导实验室的人。为了法国的科学事业，也为了玛丽的前途，当局应该打破传统习惯，任命居里夫人为索尔本教授。

按照惯例，巴黎大学的教席，必须是有教授资格的学者担任，而玛丽暂不具备；况且这所世界著名大学，还从未有任何女性获得这种资格。经过一番详细的讨论和考虑，乔治·古依，马斯兰·伯特娄，保罗·阿佩尔，李普曼等代替玛丽提出建议，并报告部里。当局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开明的行动。1906年5月13日，理学院会议一致决定保留皮埃尔的教席，邀请玛丽接替皮埃尔的工作，教授物理学。在索尔本大学的校史上，终于出现了一位妇女位居全校教职员之首。

聘书上写着：“聘请巴黎大学理学院实验室主任，理学博士皮埃尔·居里夫人代授该学院物理课。年薪1万法郎，由1906年5月1日起薪。”

皮埃尔生前总希望玛丽能站在巴黎大学的讲坛上，以破除世俗对女性的偏见。而今天，他的玛丽不仅是可走上讲坛，而且几乎是接替了他的全部工作。皮埃尔，你应该高兴吧！

老居里大夫是一个有见识且对科学有独特见解的人。他见玛丽还沉浸在悲哀之中不能自拔，当局又任命她继任皮埃尔教席，非常担心。他一方面劝玛丽赶快振作精神，一面认真谨慎地向玛丽叙述接受这个重大任务的细节。而玛丽也知道这个责任的重大，但她在痛苦的深渊中还未爬起来，她心不在焉地回答说：“我试试看。”

这时皮埃尔那条遗训又在她耳边响起：

“无论发生什么事，即使一个人成了没有灵魂的躯体，他还应该照常工作……”

皮埃尔的话，给玛丽以极大的勇气和力量，也成了她的精神支柱。她决心振作起来，把烦恼和忧伤丢得远远的。她要以最大的努力，使自己的讲座与皮埃尔的讲座具有同样的水平，以至不辱没皮埃尔的形象。

雅克·居里，约瑟夫，布罗妮雅相继离开巴黎，回到他们的事业中去。布罗妮雅明天也要走了。玛丽带着姐姐走进自己的卧室。炎热的夏天，壁炉里的火却燃得很旺。玛丽从壁柜里拿出一包满是血污的衣服，用剪刀剪碎，扔进熊熊的火焰之中。她呜咽地哭着，向姐姐诉说着自己的痛苦。布罗妮雅实在放心不下这个凄凉的妹妹，但她不能久留。玛丽抱住姐姐哭得声泪俱下：“我知道我必须活下去，但是怎么办呢？我怎样活下去呢？”布罗妮雅抱着她，安慰她，好不容易使她平静下来。布

罗妮雅走后不久，她便安排海拉一面到法国旅游，一面照顾玛丽，希望她不被孤寂击倒。

一个辛酸而悲怆的夏季终于苦度完了。到了秋季，瓜熟蒂落，一派丰收景象。玛丽开始调整自己的情绪，她意识到了一种责任和义务，她要挑起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的双重担子，她必须振作起来，至少外表不能露出任何忧伤的样子。她不能再在克勒曼大道住下去了。这里给她的痛苦太大了。她决定搬到梭镇，那是皮埃尔与她初识初恋的地方，是他们艰苦努力取得辉煌成果的地方。那里的一草一木，可以勾起她美好的回忆，而且皮埃尔的墓穴就在梭镇，她可以非常方便地去看他，给他送花，同他说话。

玛丽提议移居时，居里大夫倒觉得不安起来，这种心情是他与玛丽住在一起之后的第一次。他说：

“玛丽，现在皮埃尔死了，你没有必要与一个老人同住，我单独去住，或者搬到雅克那里去。”

玛丽非常伤心，泪水一下盛满了眼睛。多少年来，她把那个慈祥的老人当作身边依赖的最信任的亲人。现在提出要离开她，无论如何她是无法接受的。然而这个玛丽，常常是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她认为是不是老人有什么苦衷。所以她依然平静地说：

“您老自己决定吧！您若离开我们，我们会感到难过和不安，但是您应该选择您快乐幸福的安排。”

她的声音含着忧伤，甚至带着抽泣着的沙哑。

居里大夫非常喜欢这个贤淑又能干的媳妇，儿子去世了，他本应留下来帮助她，可是他怕给媳妇带来麻烦。此时听玛丽一讲便激动地说：

“玛丽，我留下来，我永远不离开你们母女。”他转过身去，拿出他的手绢揉着满是泪水的眼睛。

从此，在梭镇这个小院子里，住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寡妇，一个79岁的老人，一个小女孩子，一个婴儿，加一个照看婴儿的保姆。

2 教授

玛丽没有倒下去，她坚强地站起来了，并且雄心勃勃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她已经被授予索尔本大学教授，继任她丈夫的教席。她认为，这是一件伟大而神圣的工作，是一项光荣的职责，她要继承丈夫的事业，并且使之发扬光大。过去在丈夫身边，天塌下来有丈夫顶着，遇有科学上的难题，可以请教丈夫，丈夫会放下手中的工作，与自己一道研究探讨；遇到困难，有丈夫解决。在她的心目中，丈夫的观点和知识比自己宝贵一千倍，一万倍，在丈夫面前，自己是何等的平乏和初浅。她崇拜丈夫已到了意乱神迷的地步。

现在她只能单独奋斗，但她要奋斗到底。每天她要看大量的书籍和资料。她要认真准备教案。在赛福尔女子学校她创造出来的新奇教法，倍受校长和学生的欢迎，她在任皮埃尔实验室主任时，为助手们解答各种各样的难题。但那只是代表玛丽自己，而今天，她代表的是皮埃尔，她面对世界各地的天之骄子，索尔本大学教授，她的讲课要达到皮埃尔

的水平。这不能不使她严肃认真地对待。

1906年11月，巴黎大学开学了。5日下午，受聘继任丈夫在索尔本教席的物理学教授居里夫人将第一次授课。舆论哗然，新闻媒体纷纷刊出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个“著名遗孀”第一次在公开场所露面，且是继任丈夫教席，又是索尔本大学前所未有的女教授。新闻记者、上流社会人士、美丽的妇女、高贵的夫人、艺术家、著名的学者，纷纷赶来，潮水般地涌向理学院。一时间理学院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大家纷纷地议论着，比划着。得到“请帖”的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没有得到的愤愤不平，怨天尤人。这些人并不是为吸取知识，也不在意玛丽的讲课内容，对“关于气体中的离子的学说”没有兴趣，根本搞不懂什么叫“放射学”，也不是为了理解和同情，而是出于一种好奇。他们是对索尔本开天辟地有一个妇人讲课，并且是一个著名学者的遗孀，而感兴趣。

这一天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的一天，而对玛丽来说，却是残酷的痛苦，如果没有那次车祸，站在讲坛上的该是他的丈夫。这世上，连悲哀都引人注目。

这天中午，沉重的太阳懒洋洋地将那微弱的光线洒向墓地，玛丽来到坟前，低声地对着墓地里的人说话：“皮埃尔，今天我就要继承你的事业，到索尔本大学讲课了，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使讲课效果达到你的同等水平。可是，我的头很疼，都是为了想你，我怕万一在课堂上失态，让你失望……”

听课的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梯形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堵塞了理学院的走廊，甚至因为无法挤进去而站在索尔本的广场上。整个理学院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潮。在这拥挤不堪的人流中，伟大的人与平凡的人同在，平凡的人与满腹经纶的人并存，听课求学的人与看热闹的人混杂，玛丽的亲友与不相干的人一道，汇聚成一支嘈杂的人流。这可真苦煞了那些真正听课的学生，他们不得不使劲抓住椅子，以免被涌进来的人挤下去。

1时25分，人群喧哗了，人们驻足搜寻，伸长脖子张望。惟恐这位伟大的女学者从眼皮底下溜过去；有的议论纷纷：这位遗孀，索尔本大学的惟一女教授的第一堂课，第一句话会讲什么？她会按照惯例，感谢政府，向部长致谢吗？她会赞颂她的前任教授，痛惜她丈夫的不幸去世吗？她的表情是忧伤，是凝重还是快乐？也有极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等着她失态的窘相，甚至盼望她失败。她会穿什么衣服？据说在生活上她不大讲究，多么新奇而粗俗的问题，多么壮观而又热烈的场面。

1时30分，这个庄重的时刻，这个群情激奋的时刻到了。梯形教室的后门慢慢地拉开，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玛丽迈着平静的步伐，缓缓走进教室。她表情严肃，双唇紧闭，目光平视，一套黑丝绒衣服套在那略显瘦弱的身上。

玛丽走到教授座席前，冷静地点了一下头，没有套话、没有致谢、没有忧伤，也没有颂扬。她坚挺地站在那里，两手有力地撑着那张放满了仪器的长桌子，默默地等着掌声静下来。过了几秒钟，掌声嘎然而止，教室死一般地寂静，大家屏息静气地看着，等待着她的第一句话。玛丽那灰色的眼睛又恢复了昔日的神采，一口流利的法语，平静而柔和地送

进听众的耳朵。

“在回顾近十年来物理学上取得的进步的时候，人们对于我们在电气和物质方面的认识的进展表示出极大的惊异……”她把这句富于启发和哲理性的话说作为开场白，是有极深刻含义的。这句话，正是皮埃尔最后一堂课的最后一句话。从这一句话引申开来，既是表示这门学科的延续，也蕴含着她深沉的哀痛。听过皮埃尔讲课的学生们，笔记本上清楚地记着这一行字，这是对皮埃尔的哀悼，也是皮埃尔科学事业的延伸。许多学生们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一直流到课本上。

玛丽以流畅优美的语言，深刻地阐述电气结构原子蜕变、放射物质的新学说。她一会儿用公式，图表在黑板上表示，一会儿由仪器实验来表现，深入浅出，脉络分明，有理有据，逻辑严密，庞大的听众席上鸦雀无声。她从容不迫地讲完了一堂令人满意的课，然后由进来的那道小门飞快地退回去，很快消失在人海之中。

人们不得不为这个妇人的知识和坚强的品质所折服。玛丽的首次讲课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此后一连几天的报纸中，都刊载醒目的文章，介绍第一位登上巴黎大学讲台的女性教授讲课的情景。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位索尔本大学的女教授的光辉形象牢牢地树立了起来。

3 母亲

现在，居里夫人不仅要伴着创伤、凭着超人的毅力去完成皮埃尔的教学工作，继续他的事业，还要供养两个孩子。在家里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活，她所担负的责任，实实在在会把一个健壮而且勇敢的男子吓倒。

玛丽十分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她希望公公和孩子们能过上健康而舒适的生活。第一件事，就是在梭镇租了一所较宁静雅致的住房，该住房旁有一个小花园，为公公和孩子们提供一个较好的娱乐场所。花园里有草地，有榛树、苹果、葡萄。一到秋季，这里丰富极了。伊雷娜得到一小块地，她十分快乐地种上自己喜欢的花草。艾芜由保姆照看，常常由保姆或居里大夫带着在草地里找龟，在窄道里追黑兔或虎斑猫。玛丽稍有闲憩，便带着孩子陪着公公到花园散步，常常自己为花木浇水，剪枝，一家人和睦、轻松、愉快极了。

玛丽培养教育孩子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她希望孩子们既懂得科学，还要懂得文学和艺术。送到学校去当然可以学到更多的科目，但她又觉得许多学校总是让孩子们埋头做功课，采取灌输法教育的多，不利于孩子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她需要孩子参加户外活动。这一点，居里大夫帮了她的大忙。她认为每课都应该安排适当，宁让孩子学得少些，学得好些，学得专些，而不让他们学得太多，却什么都一知半解。于是她一方面找到了能满足这些要求的学校，另一方面，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家庭教师。她把这些烦恼告诉布罗妮雅，希望姐姐能为她想个好办法。

布罗妮雅理解玛丽的苦心。她设法在华沙为她物色合适的保姆，找来找去，发现约瑟夫的妻妹玛丽亚·卡米安斯卡最合适。她是一个娇美而温柔的妇人，知识素养较好，经布罗妮雅请求，应允在居里家里当家庭女教师和管家。她给玛丽以极大的安慰，在她身上，玛丽感到与波兰

靠得近些，感到了祖国的温暖，这是一个远离祖国的人的特有感受。这段时间，玛丽活得比较轻松，也很高兴，她把很多时间都用在了研究和教学上了。后来，这个妇人因为身体不好，不得不回华沙，玛丽又失去了一个极好的家庭助手。

在教育孩子方面，居里大夫给予玛丽极大的帮助。皮埃尔的惨死，对这个年迈的老人无疑是一场大灾难，但是他严格的理性主义使之变得极为坚强，他轻视悔恨，轻视痛苦。他那坚韧的意志、宁静的性格，给儿媳妇以有益的影响。他带给玛丽母女一种轻松和愉悦，减除了两个小女孩童年的烦恼。她的母亲因为工作常常要留在实验室，居里大夫就成了她们的游戏伙伴。艾芜当时还小，不能反映她的性格，而伊雷娜的性格却极像那个动作迟缓且好奇怕陌生的皮埃尔。于是，他像教皮埃尔一样教伊雷娜一些博物学和植物学知识，读一些优秀的文章，用极明确的方式引导她的智力活动。他给孩子们读维克多·雨果的文章，还常常自己写出一些幽默而滑稽的诗给孩子们念，培养她们的文学情趣。他帮助伊雷娜在庭园种植植物，带着她们到公园散步，一边给伊雷娜讲许多关于植物和动物的趣事。例如，种子是怎样在花里长成的，它为什么可以开花结果；小老鼠和鼯鼠是怎样打洞的；哪里能找到兔子窝，等等。居里大夫用自己的方法去教授孩子，让她们了解到周围的一切，从小溪到大湖泊，从花圃、花园里的土壤到可耕地的不同土壤，从找鹅卵石到宝石，从家禽到偶然看到的野兽，从他们居住的小院子到村镇和大城市。他要培养孩子们开阔的眼界，博大的心境，渊博的学识，聪颖的智力。居里大夫帮助玛丽管教孩子，玛丽也尽心尽力地照料这个极善良的老人。1909年，也就是皮埃尔去世后的第三年，这位老人患肺充血之后，卧床整整一年，玛丽忙里忙外，全部空闲时间用在老人的床边，设法安慰和照顾这个因病而急躁的老人。

1910年2月25日，这个老人带着对玛丽母女的眷念与世长辞了。梭镇的冬季北风凛冽，雪花飘舞，十分寒冷。而沉浸在痛苦中的玛丽却要掘墓人从墓穴中把皮埃尔的棺木移出来，把居里大夫的棺木放底下，再放皮埃尔的棺木；皮埃尔的棺木上面留下一个空地方，那是为她自己预备的，她愿意永远是居里家的一份子，永远与她的丈夫在一起，生生死死不分离。

现在玛丽身边没有谁能帮助她了，孩子的教育全落在她一人肩上。对于任何困难，玛丽均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办法，从来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为了孩子们能健康地生活、学习、成长，她把孩子的教育写成计划，按星期排课，每天做什么事情，学什么课目，然后交给家庭教师和保姆，让他们按计划施教。每天早晨，孩子们要先作一小时智力工作或一小时的读书和手工，然后是她们觉得有趣的游戏和选学喜欢的课目。玛丽把她们的爱好和特长在笔记本上详细地记录下来，并因势利导地任其爱好特长自由发展。那时，她已经发现伊雷娜在数学上的天赋，艾芜在音乐上的早熟。

玛丽在屋后那个小花园里设了一个横架，挂了一个吊杆和一副吊环，一条滑绳。每天功课一完，就把两个小孩带到户外活动。让她们四肢不断受到锻炼。除此之外，她还把两个女孩子送到体操学校去锻炼，既可强身健体，又可进行艺术熏陶。两个热心学习的女孩子常常拿到令

人高兴的头等奖。

4 诺贝尔化学奖

人们对玛丽钦佩和叹服，是因为她在一个天才的人帮助她之时，既能料理好家务，又能够完成伟大的研究工作；而当她成为遗孀的居里夫人时，她仍能完成皮埃尔生前担负的伟大事业，还能管理好家务，培养好孩子，并且做得很完美，很出色。

一次，她上午到索尔本讲课，下午来到实验室，助手们向她提出了几个难解的题目，她给他们认真地作了讲解。忽然，她感到头晕，极度疲倦，便早一点回到家里，当她推开房门时，竟“卜通”一声摔倒在地，昏了过去。她的孩子们见她那苍白的脸，奄奄一息毫不动弹的样子，急得哭了起来。保姆急忙请来了家庭医生，医生诊断她为疲劳过度，营养不良，让她躺下，不许任何人打扰她，以致她的朋友卡霁雅介绍从华沙来的客人约好来玩，都被推辞了。医生认为，这种病不能见客人，不能谈话，否则会更加疲倦。后来玛丽在写给好友卡霁雅的信中说：“……我的生活已经觉得太乱了，无法再安排好。……我只能尽可能把孩子们好好抚养大。她们两个都可爱且很美。她们还需 20 年才能长大成人，我恐怕不能支持那么久，因为我的生活太劳苦，悲哀也损害我的健康。”

为了抚养孩子，玛丽必须拼命工作。她继续在赛福尔教课，因为那里每月有固定的收入。

玛丽十分热爱索尔本的教学工作，希望她教的放射学课能使学员们无限惊奇。她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惟一教放射学科目的人。她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把课讲得尽善尽美，以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基本理论和实际操作，不久，便着手编她的讲义。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 1910 年出版一本杰出的巨著《放射学论》，共 971 页。这是她与皮埃尔潜心研究 5 年所取得的放射学方面的知识，是她向科学界，向人类贡献的一份宝贵财富。这本书的著者是皮埃尔·居里，照片是皮埃尔·居里，而实际编者是玛丽。玛丽为这本书写了序，她热情地追述了皮埃尔的一生，忧伤地悼念皮埃尔的不幸遇难，字里行间渗透着他们无限的爱恋，无限的深情。序言里有下面一段敬仰和爱慕的语言：

“皮埃尔·居里在去世之前的几年，创造力极丰富，他的智力已经充分发展，实验技巧也已经十分熟练……他的一生正要展开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应该成为惊人的科学事业发展的高峰，但命运不愿如此，我们也就不得不在命运的令人不解的决定之前低头。”

在索尔本大学，玛丽继续研究她的镭元素，并且第二次确定这种物质的分子量。1907 年，她与法国著名化学家安德烈·德比尔纳合作，成功地完成了空前的实验，提炼出了闪闪发光的金属镭。它能耐受大气因素的作用而不变质。在此期间，玛丽又对钋进行了研究，发现钋表现出的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元素，而且比镭的科学价值小。通过反复实验和研究，她掌握了利用钋的放射性衰变来制取氦的方法。

居里夫人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名声越来越高，慕名而来的学生与日俱增。到此时，她的实验室已经有十来个研究人员，他们均是自愿来此工作的。1907 年，美国金融家、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向玛丽的实

实验室赠送了一笔钱；卡内基先生告诉玛丽，她每年都可以得到同样多的款项。玛丽非常感激，她用这笔钱向有培养前途的爱好科学的青年学生提供奖学金。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有一个叫莫利斯·居里，他是皮埃尔的哥哥雅克的孩子。这是一个天赋极好、身体很高的男孩，玛丽一向喜欢他，以母亲般的慈爱关怀她。使她特别高兴的是莫利斯要求在她的实验室工作。当他成为最有才能，并取得成功的学者之时，玛丽更是喜出望外。

她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发明了一种准确地测定镭和其他放射性元素的方法。居里疗法成功与否就取决于能否精确地测定这些元素；玛丽利用镭发出的射线，而不是称出它的重量的方法来测定镭的量。借此，她测定了一种新的可靠的标准，使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可以用此来测定镭。

由于放射疗法的普遍发展，迫切要把这种贵重的金属材料分成极小的部分，但要定一毫克的千分之一时，天平就用不上了。玛丽成功地根据放射性物质发出来的射线来给这类物质定量。她在实验室设一个“测量组”，向各行各业开放，为其测量各种矿物质的含镭量。学生们、医生们及所有的人们都可以把他们的产物拿到这里检验，领取一份指明镭的含量证书。

这项重要成果的问世，是应工业和医药及理化研究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她将 21 毫克纯镭氧化物封存在一个薄玻璃管内，郑重地交给科学家联合委员会，经过测定审核后，批准这一成果。并按这个原始标准，复制出几个副样后，把原始标准封存于巴黎附近赛福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这就是被后来五大洲一致采用的计量单位的标准。

到此时，居里夫人的荣誉如日中天。各种名誉博士学位的文凭和外国科学院通讯院士证书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学院不断地飞到梭镇玛丽的住所。这些荣誉并没有引起玛丽的重视，她很随意地塞进抽屉，有的还未来得及看。

1910 年法国部长向玛丽颁发荣誉勋章。这是法国为了表彰健在的伟大人物而设立的。这就是几年前皮埃尔谢绝的那种勋章。对这类荣誉的看法，玛丽深受其丈夫的影响，于是她也谢绝了。

然而，1911 年 12 月，由瑞典首都传出了一个令全世界轰动的消息。斯德哥尔摩科学院为了确认居里夫人在她丈夫去世后所完成的出色工作——制备了金属镭，授予她诺贝尔化学奖。在这之前，还没有任何人两次获得这一殊荣，更令人叹服的是她在物理和化学两个不同领域内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这一殊荣使玛丽异常高兴，她决定去瑞典参加这次光荣而庄严的盛会。她请布罗妮雅陪她去，并且把大女儿伊雷娜也带去，让她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在瑞典科学院的大礼堂里，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她觉得这一次和第一次的诺贝尔奖一样，是由她和皮埃尔共同获得的，在她的心里，装满着皮埃尔的音容笑貌。也表明了你对皮埃尔的爱恋和崇敬。她说：“……我希望提醒诸位，是皮埃尔·居里和我一起发现镭和钋的。在放射学方面的一些基本研究是由皮埃尔·居里单独完成的，有的是和我一起，或者和他的学生合作共同进行的，因此，这个成就应该归功于他。”

“我进行了分离纯镭和探讨这一新元素特性的化学研究工作。但是这与我们俩人工作是密切相联的。因此，我是这样理解的：贵院授予我的崇高荣誉也是对已故的皮埃尔·居里表示崇敬和纪念，我希望我的这一解释是符合贵院意图。”

14岁的伊雷娜陪同她有名望的母亲到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她与她的父母一样，具有极好的天赋和对科学的追求。她怀着自豪的心情，用欣赏的眼光注视着母亲站在庄严肃穆的大礼堂台上，向一大群有名望的学者作讲演，满脸荡漾着骄傲的微笑。在这个女孩的心灵中，铭刻下了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科学是值得尊崇的，她要像父母一样献身于科学事业。的确，在母亲的教诲和引导下，她受到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教育。加之她对科学的热爱，使这个少女在各科学习上，特别是理科方面展示了她辉煌的才华。在24年后的今天，伊雷娜也在这个大礼堂里接受了这种奖赏。

第七章不朽功绩

1 镭学研究院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终于过去。巴黎的上空仍然是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这时，出现如日中天的“玛丽热”的高峰时期。各类邀请接踵而至。玛丽先后接受伦敦、布鲁塞尔等地的邀请，前往参加隆重的科学聚会，出席名誉博士授衔仪式。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的欢迎。连玛丽自己也未曾意识到，在她生命这个阴郁时期里，她的容貌却达到了她生命史上的最完美的时期。一种沉稳和阴郁的坚强神态和越来越明显的成熟和丰满，高贵的气质，优雅的风度，构成了玛丽独特的风采。

用不着鲜艳华丽的装饰，她的外表与她那惊人的意志，坚强的个性十分和谐；她的智慧和精力也达到了人生的峰巅。她要抓住这个黄金时期，为人类、为科学多作一点贡献。

1911年，她的祖国波兰要创建一所研究放射性的实验室，并聘任她为实验室主任。这使玛丽十分兴奋，她欣然表示愿意组织这一实验室，并在巴黎给予指导。

每天，玛丽的日程表上都是排得满满的，教课、做实验、指导学生、教导孩子，没有一刻闲功夫。但皮埃尔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她的眼前，常常激起她一种无限的思恋。她朝思暮想要为皮埃尔建造一座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不是常用的雕文刻字石碑。她知道皮埃尔生前的最大愿望是有一个出色的实验室。玛丽决定要建造一所皮埃尔曾经向往的、设备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实验室，作为对他的纪念。一旦这个理想实现，她要让那些热衷于科学事业的青年，在这个实验室里研究放射现象，不希望这些科学家遭遇皮埃尔和自己那样的痛苦和折腾。

尽管玛丽是个闻名世界，声誉极高的科学家，但这个计划的进行，仍不十分遂意。当玛丽提出要建一个镭学研究院时，当局并未直接答允，一拖再拖。有人建议，发动全国捐助。而玛丽坚决不允，她知道皮埃尔是不愿看到用人们的施舍来建立实验室的。

可是，因为玛丽的声誉为世界人民所瞩目，为科学界所推崇，不少深明大义，眼光远大的人物都在关注这颗科学明星，她提出建实验室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久，巴斯德研究院院长罗大夫十分慷慨地提出，愿意给玛丽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为她建设一个规模较大、设施齐全的实验室，并要求玛丽离开索尔本，做巴斯德研究院的科学明星。

消息传进索尔本，立即掀起了波浪。索尔本大学校长十分惊奇，气愤地嚷着：谁也休想让居里夫人离开索尔本，无论代价多大，该大学教职员当中必须有她。”

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经过激烈的唇枪舌战，索尔本和巴斯德研究院彼此商量，互作让步。双方各出40万法郎，共同创设一个镭研究院。经玛丽同意，研究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放射学的实验室，由玛丽领导；一部分是研究生物学和放射疗法实验室，由著名学者兼医生克娄德·瑞果教授领导，专门研究癌瘤和治疗方法，研究镭在医学上的卓越贡献。这两部分均是镭的研究机构，彼此合作，共同发展镭学。他

他们还尊重玛丽的意见，在研究院里设居里楼；研究院前面的大道叫皮埃尔·居里路。

玛丽亲自参与计划及设计蓝图工作。施工期间，玛丽常由居维埃路跑到建筑工地去，与工程师一起讨论，帮助设计建筑物，指导仪器的安置工作，在研究院大楼周围栽花种草。她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把镭学研究院建设得尽善尽美。

这个精力充沛的妇人，常常有一些最新、最现代化的意见，她的超前意识，她的专业化水平使工程师们不得不叹服。

玛丽考虑的是尽量长远一点的设计。她希望这座建筑可以用三五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让子孙后代都能使用。她要求房子宽大通气，要求有落地大窗户，以便让阳光照射，以便能极目远眺；还要建一个升降梯，以便装载运送仪器。她不管这种费钱的新设施让政府派来的工程师们十分恼怒，坚持按自己的意见力求完美。

在研究院的后侧，玛丽要求建设一个极大的花园，花园里要种植各种名贵的树木、花草。还要有池塘。她像鉴赏家一样亲自选来一棵棵小树，一株株花草，看着把它们栽下去。还亲自挥动铲子，亲手栽种著名的梧桐和椴树，攀援的蔷薇。为没有盖成的墙角堆土、铲土。只要能抽出一段时间，她都愿同工人们一道，为研究院洒一把热汗，添一块砖瓦。

一天，她正在居维埃路实验室搞试验，她和皮埃尔昔日的实验室工友伯第来找她。这个朴实忠厚的人哭丧着脸，一副十分难过的样子。他告诉玛丽，理化学校要建筑梯形教室，那个曾经为他们作出巨大贡献的棚屋，那上记录着他们英勇岁月的又潮又湿的破木板屋就要被铲平了。

玛丽立起身，一片忧伤爬满了脸庞。她一句话也未说，平静地随着这个旧日朋友来到娄蒙路。几年来，这间破烂的棚屋依然如故。人们不知是为了纪念这间棚屋为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还是恋怀皮埃尔·居里，屋子里依然破烂、漏水，潮湿，那块陈旧的黑板上依稀可见皮埃尔留下的笔迹，那是他向求学的学生们解答问题时写下的公式。

玛丽静静地伫立在棚屋前，一片依恋，一片凄然……永别了，棚屋！棚屋即将在地球上消失，但它的丰功伟绩，它的荣誉和辉煌将载入史册，流芳千秋。

娄蒙路、居维埃路，皮埃尔·居里路，三个不同的地址，象征着三个不同的经历。

娄蒙路的破棚屋里记述着皮埃尔和玛丽的艰难困苦；居维埃路则装载着他们的欢乐和甜蜜；皮埃尔·居里路将给她艰辛的人生展开新的画卷。

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和劳累，玛丽的心血换来了成果。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镭研究院终于于1914年7月竣工。在那个雅致的白色建筑群的大门口，用石头刻着几个醒目的大字，镭研究院——居里楼。它是“前途的庙宇”，辉煌的象征。

在居里楼前，玛丽想起了巴斯德所说的名言：“它们是前途、财富和福利的庙宇。人类在里面成长、壮大而且进步。”

夕阳西下，红色的余辉洒遍了大地，“居里楼”几个大字在夕阳的辉映下，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玛丽就要离开居维埃路，离开P.C.N学部，搬进居里楼，一种思恋

之情油然而生。如果皮埃尔健在，看到这个现代化的研究院，夫妻双双在这里研究和工作的话，他会何等高兴和幸福啊！

由于皮埃尔猝然去世，玛丽来不及同他商量如何处置在棚屋分离出来的那 1 分克镭。皮埃尔死后，居里大夫及家庭的大部分成员要将它卖掉，因为这 1 分克镭价值 100 万法郎。玛丽知道卖得的钱足以使她的孩子过上舒适的生活，她也可以不到赛福尔兼任课程，减轻不少负担，家庭生活可以马上改善。

该不该将镭卖掉呢？玛丽举棋不定。这是她和皮埃尔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奋斗四年的结果，是他们共同奋斗的全部心血象征；这 1 分克镭是不能用价值来形容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卖掉。

玛丽认为：她可以还多做一份工作，因为她已经是索尔本的教授了，完全有能力养活孩子们。至于孩子们长大之后，应该让她们自食其力，她相信伊雷娜和艾芙不会贪图荣华富贵的。何况，镭学研究院已经竣工，“居里楼”急需作实验的镭，吝啬的法国当局决不会轻易答应拿出 100 万法郎为他们购买作试验的镭。为了实验室，为了皮埃尔的心愿，玛丽决定将镭献给她的实验室，让这一点镭发挥它的巨大潜能，为人类创造幸福。

2 放射学与战争

就在镭学研究院竣工的 1914 年，正当玛丽满怀热情地把物理仪器搬进居里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玛丽痛恨战争。还在她幼小的时候，每天夜里围在父亲身边，听父亲讲波兰英勇的过去，讲波兰伟大的儿女；以后又讲述了祖国新的苦难，以及 1830 年起义的男女青年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和英雄气概。她喜欢西格蒙德·克拉辛基写的诗《不妙的悲剧》，这个贵族诗人用幽默的诗句通过起义者的领袖潘克拉季的嘴，揭露了大贵族阶级的卑鄙下流。诗歌曾激起玛丽内心对非正义和暴力的抗议。她同情祖国的命运，一心一意用知识报效祖国。她痛恨战争，她要用自己的行动去抗议；她痛恨沙皇，要为恢复祖国的自由而出力。

波兰的苦难如今又要在法国重演，德国军队张牙舞爪的大举进攻，使巴黎的上空蒙上了一层阴霾。法国人民摩拳擦掌，争先恐后应征入伍，抗德保国。

研究院的职工都动员起来了，纷纷应征入伍。他们都是一些年轻有为的中青年，意气风发的爱国者。她的身边只剩了患有心脏病的机械师路易·拉果和一个身材极矮小的女仆。

在此之前，伊雷娜和艾芜带着一个保姆和厨娘在布列塔尼租了一所别墅，准备同母亲一起在那幽静的地方度夏。每当学年终了时，玛丽都会为女儿准备一个僻静之所，以对她们一年艰辛的学生生活的报偿。

玛丽已经习惯了一种单调寂静的生活，她的大部分光阴在实验室里度过，连照料她的使女都没有，只有一个看门的妇人草草帮助料理。在她的女儿急催她去别墅度夏之时，女儿们收到了母亲的信：“亲爱的女儿们：战争似乎要爆发，我们随时等着动员令。你们不要紧张，应该镇静而且勇敢。伊雷娜已经长大了，应该和我尽力为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尽管当时玛丽由于肾脏开刀，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但是这个曾在被压迫，被奴役下长大的波兰女子放弃了同女儿们一起去过悠然安逸的日子。她只有一个念头，为她的第二祖国做些贡献，她要利用放射学为和平，为祖国出力。

当巴黎受到入侵的威胁时，她首先想到的不是她和女儿们的生命，不是她们的财产，而是那一分克镭。虽然只有一分克镭，它却极其贵重，当时整个法国就只有那么一丁点镭，她不愿它落在侵略者手中，所以她要把它藏起来。她不敢把它交给任何人，便亲自把它送到波尔多去。

残酷的战争搅得社会混乱，人心惶惶，大批的法国人挤在水泄不通的车厢里，逃往波尔多。清雅宁静的波尔多，刹那间像要爆炸的闷罐，到处是熙来攘去的人流。玛丽提着装着许多小试管的、包了铅皮的沉重匣子，随人流挤下车，望着渐渐黑下来的天空，任凭匆匆而过的人流的撞击，无能为力地守着这个价值 100 万金法郎的匣子不知所措。这个伟大的科学家被找住房的问题难住了。这时，法国政府某部的一个雇员认出了她，才为她解了难，帮助她找到了住房。第二天，她妥当地把镭存到了银行。之后，她又挤在如潮的人流中上了火车，赶回巴黎。

战争需要武器，购买武器需要资金。法国政府只好向公民发行债券，

要求所有公民购买战争公债。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玛丽很理解政府的困难。她给住在布列塔尼的女儿伊雷娜写信说：“我们应该为祖国尽一份心意，作一份贡献，将我的诺贝尔化学奖金全部献给政府。如果国家沦陷了，这些钱也就没什么价值了。所以，我要把它献出去，希望你能同意。”

伊雷娜向来崇拜母亲的品德，她认为母亲作出决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也一定是对的。所以，她马上回信说：“亲爱的妈妈，我同意你的决定，应该把它献出来，如果国家沦陷了，这些钱对我们不会有什么用处。”

于是，玛丽将诺贝尔化学奖金全部献给法国政府。收款的职员接受这一笔数额如此之大的捐款，感到惊奇。而他却极愤慨地拒绝接收那些光荣的奖章，把这些奖章拿去销毁实在是太可惜。玛丽无可奈何地把奖章带了回来。就这样，瑞典币换成了法郎，接着就变成了“国民公债”。尽管玛丽已经是快 50 岁的人了，但她仍然作出了只有青年人才适合的决定。

她要关上实验室的门，把她当作生命中至高无上的研究工作放下来，像许多法国女子一样，应征入伍，去作一名穿着白大褂的战地医务工作者。她的请求立刻取得了卫生服务机关的同意。她拿到了一张写着“居里夫人、X 射线服务指导员”的身份证，一张法国妇女联合会委任十来个“特殊职务”的命令，还有一张军需次长签字的“允许居里夫人使用军用汽车”的文件。

在前线工作中，她发现了一个不幸的问题，所有前线和后方的医院差不多都没有 X 光检查设备。外科医生寻找伤口深处的子弹和弹片需要很长时间，往往延误了抢救机会，使无辜的生命被死神夺走。

玛丽知道，自从 1895 年伦琴发现 X 射线以来，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检查人体内部，可以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并且可以照出照片来。医生用 X 射线来透视人体，可以借助这些射线看清骨折部位，直接找到射入人体内的子弹和弹片，便于医生矫正骨折或取出子弹；可以借助 X 射线察看内伤，观察伤口愈合的速度。这样，既可以减轻伤员的痛苦，又可以加快治疗速度。

在 1914 年，法国只有为数有限的几套伦琴仪器，供放射科医生使用，而军用卫生服务机构尚未应用 X 光射线。

玛丽没有搞过 X 射线工作，但她每年要在索尔本大学作几次关于 X 射线的演讲，对射线的作用知道得很多。她决意把在科学方面的研究运用到实践上去。她知道，开展 X 射线的照片工作，急需制造更多的 X 光设备。

她把这种想法立即变为行动，着手列出大学中各实验室的仪器清单，连她自己的实验室也列入其内。她还亲自到各制造厂去联系，加工制造。她建议，集中所有可供使用的 X 光材料，由教授、工程师、学者中募集一些自愿去做这种工作的人，让他们到前线战地去发挥更大的作用。

玛丽上下奔波，左右联络，终于解决了一部分材料、仪器和操作 X 光射线的工作人员。可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前线阵地是经常变动的，而受伤的病人却源源不断地运进这些尚无 X 光设备的战地医院。看到那

些满身血污、奄奄一息的大批伤员，玛丽的心像针扎般难受。她急得来回踱步，搓揉着手掌。

怎么办？玛丽那睿智的大脑又有了新的办法。她建议将 X 光射线机装在汽车上，随时开到战地上去抢救伤员。

她的意见立即得到了法国妇女联合会的响应和支持，并为她拨出专款。于是，玛丽便创造出了世界有史以来的第一辆“X 光射线汽车”。

她在一辆普通的汽车里放了一架伦琴仪器和一个发电机，用汽车自身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供给 X 射线所需电流。这种发明很受法国政府赞赏。很快，她用这种方法装备了 20 辆汽车，使这种汽车能够迅速地开往前线的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随时对战场上下来的伤员进行检查。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X 光汽车”从 1914 年 8 月起巡回各医院，发挥了巨大作用。

德国军队在猛烈推进，战斗甚为激烈，伤亡极重。战争越来越离不开 X 射线汽车。玛丽的工作是如此重要，X 光汽车有如此重大的价值，她也就更离不开工作，离不开伤员。

伊雷娜和艾芜深受其母亲影响，也参加给前方战士织毛衣的工作，她们把小旗插在饭厅墙上的一张大地图上，标出战略要地，密切注视战争动向，关注着母亲的去处。当德机在头上轰炸之时，她们记住母亲的教导，决不躲到被窝里发抖，而是加入布列塔尼收获队，代替男子捆麦子，打谷。玛丽喜欢女儿的勇敢坚强。喜欢女儿加入有意义的工作。后来玛丽又把 17 岁的伊雷娜带上前线。

伊雷娜从小就跟着母亲搞科研，已初步学会了 X 光照相术。这时，前线各战地医院里正需要大批外科医生和放射科医生。伊雷娜是研究放射学的，到前线医院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

玛丽千辛万苦装成了 20 辆载有 X 光机的汽车，而会操纵 X 光机的人却极少。为了让每一台 X 光机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人才是关键。为解决这一燃眉之急，玛丽就地取材，在前线开办一所临时学校，对学员进行放射学方面的培训。她亲自讲课，用她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给学员讲授放射学原理，X 光机的运用和操作。学员们一边听课，一边实践，很快就掌握了 X 光机的诊断和对伤病员的治疗方法。在这关键时刻，伊雷娜表现得出类拔萃，成为玛丽的得力助手。

护士和 X 光射线操作员都被玛丽训练出来了。然而在硝烟弥漫的法国，什么人才都缺乏，连驾驶员也极为有限。为了争取时间，玛丽常常自己驱车赶往前线，伊雷娜随同前往。不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母女俩常常吃在车上，睡在车上，冒着生命危险，巡行各战地医院。

为了救死扶伤，一向不愿在金钱和物资上求助于人的玛丽，竟大胆地向亲朋好友索借汽车。朋友们为了支持玛丽的事业慷慨解囊。玛丽把捐献的汽车全改成“X 光射线汽车”她热情地对捐献者说：“谢谢夫人，谢谢小姐，你们为战争作出的贡献，人们不会忘记的，如果战争结束了，汽车还能用，我一定还给你们。”

这些车辆上面都有一个红十字作装饰，并且画了一面法国国旗，穿梭在各个战场。人们称它为“小居里”或“放射车”。每到一处，都受到部队官兵的普遍欢迎，伤病员则把它当作“救星”。

在残酷的战争中，玛丽和伊雷娜过着颠沛流离的冒险家生活，战斗

在腥风血雨的枪林弹雨之中进行。她们没有片刻停留，常常有电报电话通知她们：某某战地医院里住满了伤员，急需 X 光射线设备。军令如山倒，没有受过军队正规化训练的医生执行的却是军队的任务。任务一到，玛丽便亲自驾驶着那辆车像送货的卡车，车厢按规则漆成灰色的平头雷诺牌汽车，甚至忘记了拿外衣和帽子，以平均时速 50 公里急驶……

一到目的地，玛丽便马不停蹄地工作。她以行家的眼光很快选定一间房子作 X 光照相室，并与同行一道，有条不紊地把汽车里那些匣子搬进去，迅速打开用具，拼合拆散的零件，拉开连着仪器和车里的发动机电线；调节电流强度，预备好“透视屏”，把防护手套、眼镜，作记号用的特制铅笔、定子弹位置的垂铅等放在旁边，用黑帐幔或普通被褥厚厚地遮住窗户，作为暗室；另外把冲洗感光片用的“药水”放在旁边一个临时预备的照相暗室里。她熟练地在极短的时间里作好了一切预备工作后，便开始检查伤员。

伤员们有的缠着纱布，有的痛苦地呻吟，有的血迹未干，一支悲壮而哀伤的队伍排在 X 光室门前。玛丽、外科医生、伊雷娜在那间闭塞的暗室里紧张地工作着。玛丽把仪器对准受伤部位，很快就显示出骨骼和器官的轮廓，子弹或弹片便现出了原形。伊雷娜迅速记下检查的结果。玛丽或照相或把图像描下来，指引外科医生取出子弹或弹片。遇有特殊情况就在“射线”之下施行手术，医生可以在透视屏上看见钳子刺入伤口，绕过骨骼障碍，夹住弹片，使手术成功。

为了抢救伤员，玛丽有时连续工作二十多个小时，甚至若干天，直到十分困乏之时，才休息一下，填填饿极了的肚子，常常累得腰酸背痛，头昏眼花。她认为自己少休息一下，就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甚至挽回他们的生命。她的心太慈祥，她容不得别人受痛苦的折磨。

战争在紧张进行，伤病员在急剧增加，各战地医院人满为患。单靠这 20 辆“射线车”远远满足不了需要。热心的玛丽又有了新想法，要求朋友赞助。聚集了一笔资金，在各战地医院设置了 200 个 X 光射线站。这些固定和活动的 X 光设备成功地抢救了一百多万伤员。

她还为战地医院培训了 150 名放射科护士。

她日夜奔波操劳，整个身心都献给了战斗中负伤的伤员。只有在肾病发生剧烈疼痛时，她才不得不躺到床上，服药治疗。只要肾不发生疼痛，她必定出现在苏意普、里姆或波朴韩格的医院里。战争期间，这些医院都留下了她匆忙的足迹，留下了她的音容笑貌。

有几次她几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15 年 4 月中旬的一天，她接到新的任务，那时，肾痛刚刚好转，身体仍很虚弱和疲惫。当局便派了司机和助手随同她到佛耳芝医院抢救病人。佛耳芝医院离巴黎较远，且翻山越岭，道路弯曲狭窄，医院设施较差。那列队而来痛苦呻吟的伤员使玛丽感到特别的痛心，特别紧张，而且有的病人由于时间太长、伤口化脓，那撕心裂肺的叫喊，使玛丽肝肠寸断。玛丽连续工作了二十多个小时。大家极度疲惫，本该留下来歇息一天，但玛丽想到她还有别的任务，还有更多的伤员等着他们去抢救，想起那一张张被痛苦折磨得变形的脸，心里就十分难受，便决定迅速离开。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疾速前进。4 月的法国东部，雨水不停。道路泥泞，天气寒冷，司机一不小心，汽车呼地翻到沟里去了。

万幸的是，玛丽原是凑合着坐在车里，周围都是仪器，车子翻过来时，一堆倒下来的仪器匣子把玛丽掩埋起来了。那个年轻的司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地围着车子跑：“夫人！夫人！你在哪啊，你怎么样了。”

玛丽听到这惊奇的喊声，便拨开仪器爬起身，伸出头来。看到自己这副狼狈样子，竟自笑了起来。

这时司机赶忙把玛丽从仪器堆里拉出来。玛丽爬出来第一句话就问：“仪器，我的仪器损坏了没有？”她又爬进车里，从那堆放的仪器中拿出一把碎片时，她非常气愤：“我的 X 光照片全打碎了，X 光照片……”她喃喃地说，十分伤心地蹲在那些碎片前。

玛丽的助手和司机一齐劝她：“夫人，只要人没受伤就是幸事。”他们扶起玛丽，看见玛丽的右边脸上、臂上、腿上均擦出了一道道血印。

那天晚上，她很晚才回家，没有惊动已熟睡的女儿们。女仆望着她那苍白脸上的血印，吓得惊叫起来：“夫人，出了什么事？”玛丽连连摆手，示意她不要喧哗。

她在仆人的帮助下，脱下那套留有血迹的衣裤，慢慢地包扎好伤口。第二天，她破天荒在床上躺了半天。

然而，记者的嗅觉是敏感的，新闻传媒连篇刊载报导这位伟大的女性在战地上出现的这次车祸，连玛丽的动作，语言受伤等细微之处都淋漓尽致地上了报刊。女儿们极为惊异，她生活在母亲身边，竟未知道这次重大事故的发生。当她们来看母亲的伤疤时，已慢慢长出了新皮肤。

玛丽很忙很累，但她的心仍牵挂着实验室。因为，她要更好地发挥镭的神奇作用。她有“钉子”一样的钻劲，在百忙的战地医疗中，她挤出时间把居维埃路的仪器移到了皮埃尔·居里路的镭研究院，还常常开着那辆极不听话的装有 X 光射线的车往返于实验室和战地医院。

她知道，镭与射线一样，对人体有各种疗效。玛丽在十分繁忙的战争救护工作中，挤出时间向需要治疗的战士采用镭的居里疗法。

玛丽把镭“加工”后放出来的射气，装在管子里，送到大宫医院和其他卫生机构，用以治疗恶性伤疤和各种类型的皮肤病。

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X 射线和居里疗法为战争解决了极大的困难，这些新发现在战争前并未被人们了解和试验过，是玛丽用智慧的冒险办法救活了许多无辜的生命。如果在和平时期，这些方法要经过论证和试验阶段，不预先试验是不会贸然采用的。而在战争急需时期，冒些风险是值得的，因为它对某种濒临死亡的病人是惟一的救命方法。

法国盟友的各种求助信件雪片似的飞往镭学研究院。从 1914 年起，她就经常出入比利时等各大医院去讲学和指导，讲学内容包括电学和 X 射线理论、实习和解剖学。

面对大量的工作和实践以及镭的广泛应用，提炼纯镭已达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为了争取更多的矿物提炼纯镭，1918 年，她不管身体的极度虚弱和疲乏，到意大利北方去了一趟，研究当地放射性物质资源。

这次远行，使她极度疲乏，她病倒了，起床行走都感困难。但她仍接受美国远征军约 20 名战士到她的实验室来实习和听课。除伊雷娜讲授一些初级课程外，关键科目仍是玛丽强撑着病弱的身体来讲授，美国学生感激不已。课堂上玛丽实在撑不住了时，伊雷娜代替母亲进行指导和

讲授。战争中，年轻的伊雷娜也像母亲一样，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吃苦耐劳的精神，令人们夸赞不已。战争结束时，法国政府向伊雷娜·居里颁发了一枚勋章，对这位年轻姑娘来说，这是莫大的荣誉。

玛丽的 X 射线使她与各大医院的外科医生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他们称之为“伟大的同事”，“可贵的合作者”。玛丽平时虽然态度冷淡显得难于接近，但是对她的合作者和伤病员却极为和蔼亲切。在 X 光射线室，玛丽指出哪个部位，医生的解剖刀就会跟到哪个部位。医生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相信玛丽的话。玛丽对她的同事和病人，总是极其耐心和亲切，与玛丽合作过的医生和经玛丽治疗过的病人无不被玛丽的崇高精神所感动。

1918 年 11 月 11 日，公布了停战宣言，战争终告结束。

又是一个 4 年，这是玛丽生命史上第几个 4 年啊！这 4 年，她遭受了多少困苦和危险。那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情景；那 X 射线对她身体的伤害，她从来没有想过，她那双灰色眼睛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脸上总挂着无忧无虑的微笑，在人前她总具有一副美丽而勇敢的神态。

同时，这也是她心目中极其悲苦的 4 年，在这繁忙而紧张的 4 年中，她已经中断了与波兰亲人的联系，那千疮百孔的华沙至今如何？这 4 年也中断了她的研究工作……战争是有罪的。

当她在实验室听到宣布停战的炮声，十分高兴，吩咐她的合作者玛特·克兰到附近各铺子里去购买国旗。可当时，因停战而疯狂了的法国人把所有商店里国旗都买光了。她便亲自去商店买来三块布料，一块红的，一块白的，一块蓝的，亲自裁剪，由她的女仆巴的内夫人匆匆地将它缝制成旗帜，挂在实验室的窗前。玛丽高兴地同克兰小姐登上那辆出入各战场，已七凸八凹、十分破旧的 X 光射线车，无目的地开往拥挤的街道上。它是 4 年战争的象征。人们疯狂地拥住这辆载誉归来的破车，又是欢呼，又是跳跃，整个巴黎被潮水般的人流淹没了。

一个胜利使玛丽如此兴奋，又一个胜利更使玛丽欣喜若狂。遭受了 150 年侵略者的统治和蹂躏的波兰终于获得了自由！她的“爱国梦”曾经几乎牺牲了她的事业，甚至于牺牲皮埃尔的爱，今天却变成了现实。她的愿望实现了。她极其高兴地给哥哥约瑟夫写了一封信，表示心中的快慰。

“我们生不逢时，从小就套上了受奴役的枷锁。我们一直梦想祖国的复兴和繁荣，这一天终于盼到了。过去，没有指望我们这一代能亲眼见到，甚至认为无法见到这一天。然而，胜利的消息终于来了。我和你一样，确信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强大兴旺。

战争使人沉痛，胜利使人兴奋。世界又恢复了平静，人心又恢复了安宁。玛丽又带着女儿和女仆过上了安静的生活。索尔本大学，镭学研究院又出现了玛丽那纤弱而庄重的身影。

3 美国之行

尽管因镭的作用之威力，各种荣誉列着队向玛丽走来，而玛丽仍然过着平淡而宁静的生活。在战争中幸存的实验室里，她带着助手们聚精会神地从事她一生中最热心的物理学工作。

同时，她还继续完成她的战时职务，继续接待放射科学生到镭研究院上课。为了让放射学能发挥极有价值的作用，她接受邀请，从百忙中抽时间写一本《论放射学与战争》的著作。玛丽从悲惨的战争经验中得出一些热爱科学的新论据。“战争中应用放射学的经过，提供了一个惊人的论证，证明在某些条件下，属于新科学的发现，能够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广泛用途。特别是在战争中有挽救生命的作用。”

玛丽在那洋洋几十万字的专著里，没有提到个人的发现和贡献，镭的发现也在她的论著里成为“科学在 19 世纪末把种种新发现揭示给我们”这句话里了。无论在她的讲话或著作中，她总是自谦地把自己列入普通大众之中。

“像许多人一样，因为我要在刚刚过去的几年中，为保卫国家服务，我就立刻被引向放射学。”

1920 年 5 月的一个早晨。玛丽同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镭学研究院，聚精会神地投入研究工作。这时，助手悄悄地来到她的身边，告诉她那个叫威廉·布朗·马洛尼夫人的美国记者已在小会客室恭候。玛丽微微点头，她要把这道工序完成之后才能放下手中的仪器。

这次会晤，马洛尼夫人已经等了好多年了。还在两年前，她就多次恳求，但都遭到拒绝。最后一封信是她请让·佩韩教授转交玛丽的。信的末尾有一段至真至诚的话：“小猫可以看看皇后吗？”

玛丽迈着轻快平缓的步子跨进会客室，出现在眼前的这位女人与她心目中的名女记者差距太大。她矮小、瘦弱，简直是残废。曾经因为年轻时一次车祸而使他几乎有点跛。但那苍白的脸上，一双有神的黑色大眼睛，显出智慧的光芒。

映入马洛尼夫人眼睛里的玛丽，与她想像中的闻名于世的伟人也相去甚远。她穿一件极旧的黑棉布衣服，有一张平静而温和的脸，带着专心做学问的那种心不在焉的表情。忧郁的神色，见人就有一种腼腆神态。

一阵寒暄，拉近了两人的感情。马洛尼夫人同许多崇拜者一样，颇为玛丽的生活、工作和卓越才华所倾倒。像所有被玛丽的工作和成就所倾倒的崇拜者一样，马洛尼夫人把玛丽看作人类社会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和女性的崇高形象。

马洛尼夫人告诉玛丽，美国妇女对她的伟大工作极感兴趣，很想了解她目前的情况。玛丽对马洛尼夫人提出的其他问题不感兴趣，只是谈到镭，她才兴致勃勃起来。玛丽对镭十分关注，对美国制镭业的飞跃发展极感钦佩和羡慕。她们俩的谈话自然转到美国的制镭业上了。

玛丽饶有兴致地说：“到目前为止，美国约有 50 克镭，4 克在巴尔的摩，6 克在丹佛，7 克在纽约……”她一口气列举着，1 克不漏地数着每一点零星的镭所在的地方。

她的眉毛扬了扬，赞赏地说：“美国是多么富有啊！”

玛丽对美国的镭的所处地方了如指掌，使马洛尼夫人极为感动。

马洛尼夫人问玛丽：“法国有多少镭？”

“法国的镭全在我实验室里，不超过一克。”她不无遗憾地站起来望着窗外。

马洛尼夫人问玛丽为什么不申请专利，专利可以使她成为巨富。玛丽的回答一如既往，她平静地说：“镭是一种元素，它是属于全世界的。因发现了镭申请专利致富是不道德的。”

“夫人，你真是高尚的人。”马洛尼夫人试探地问：“若是让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任你选择，你最需要什么？”

玛丽毫不隐讳地答道：“我需要镭作实验，但镭的价格太昂贵，我买不起。”

她对马洛尼夫人说，她的实验室虽是新建，规模不错，但设备并不充足，那里仅有的1分克镭还是她4年研制的结果。这点镭只能用来制备镭射气管，供医疗之用。现在急需镭作实验。她所有的钱包括第二次诺贝尔奖金，全部献给了法国的抗德战争。若要买1克镭，需付出3万英镑，这对她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马洛尼夫人是位见多识广的大记者，她参观过美国大多数和世界各地不少的实验室。它们都是资金雄厚，设备先进。这位功劳卓著的女物理学家的实验室却缺少资金和必备的研究原料，她甚为不解。美国制镭业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居里夫妇的发现和无私帮助，它已为美国创造出了巨大财富。马洛尼夫人怀着对玛丽爱科学之情的赞赏，表示愿意出力帮助玛丽。她要向美国人民介绍这个全世界妇女最完美的典型，同时她钦佩玛丽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妇女不仅可以是贤妻良母，而且还可以攀登科学高峰。

她作出了一个伟大计划：玛丽为人类作贡献，我要发动同胞们支持玛丽，让美国的妇女为这位杰出的女性作一份贡献。

马洛尼夫人回国后，迅速发起了一个募捐活动。开始，工作遇到了一点障碍。后来，她干脆发动人们组织一个募捐委员会。许多慈善机构的负责人、科学团体中的学术保护人成为委员会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宣传鼓动者。顷刻间，整个北美大陆的每一个城市里都发起了筹集玛丽·居里镭基金的全国性活动。

第一位捐赠大量款项的人是已故著名诗人及戏剧家莫狄先生的遗孀；第二位则是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胡佛先生。紧接着无论贫富、贵贱的人们纷纷捐赠。

马洛尼夫人发现美国所有的妇女都为有机会能向玛丽的工作表示敬意而感到光荣和高兴。在她拜访玛丽不到一年，马洛尼夫人写信告诉玛丽：“钱已筹齐，这1克镭是属于你的了。”

“向居里夫人献敬意”的捐款活动使美国妇女极为振奋。这些美国妇女有一个恳切的要求，希望能亲眼见见这个世界伟人、妇女的楷模，希望玛丽能到美国来一趟。

想到要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玛丽就犹豫起来。美国是世界上舆论自由、最喜欢公开宣传、思想最活跃的国度，到那里去会有很多排场，将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和折腾。玛丽便以种种理由为借口，拒绝接受邀请。

马洛尼夫人仍像约会玛丽一样至真至诚，她努力排除玛丽的种种顾

虑。为了玛丽不放心女儿，便把她的女儿一并请去；为了玛丽不愿意繁文缛节，便拟定最合理、最简单的接待日程。并且告诉她：“合众国总统将在白宫里亲自把那1克镭赠给你。”

居里夫人被真诚所打动，她的顾虑打消了。54岁的她将作一生中第一次重大的正式旅行。

听说到美国去，天真烂漫的两个女儿兴奋得把母亲抬了起来。她们商量并作主为母亲买了两件端庄而美观的服装，她们要把母亲认真地装扮一下。

多少年来，母亲都是在实验室中度过，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生活，从没有想过要打扮一下，她的女性特征全藏在那件宽大的白大褂里边。

居里夫人要去美国，各种报刊纷纷披载，大西洋彼岸的人们在等待着一个伟大的妇人到来的种种仪式。美国当局也在讨论该给这个伟大的女学者什么样的头衔，才能与她那盛名的荣誉相配套。在此之前，他们没有料到这位震惊世界的学者竟会没有荣誉勋位，竟不是巴黎科学院院士。这太不公平。美国政府很快决定，赠给玛丽骑士勋章。玛丽也像第一次一样予以拒绝，并诚恳地请求当局把这种骑士勋章授予马洛尼夫人。

玛丽的朋友和同事及亲属，均为之高兴、奔走相告。1921年4月27日，巴黎大剧院沸腾了，《我都知道》杂志发起为居里夫人美国之行召开欢送会。不少名流都出席欢送晚会，法国政界重要人物莱昂·贝哈尔，索尔本大学让·佩韩教授，克娄德·瑞果大夫等都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说，然后是晚会演出。由著名剧作家萨沙·吉特利组织著名演员和音乐家联袂演出，使晚会掀起了阵阵高潮。这次晚会得到的一笔不少的收入，全部捐给了镭学研究院。

几天以后，正是一个阳光明媚，百花争艳的日子。居里夫人携带着两个美丽活泼的女儿上了奥林匹克号轮船。马洛尼夫人为她预定了船上最华贵的包厢，吃的是最精美的食品，用的是十分讲究的餐具。她摇摇头说：太奢侈，太浪费。女儿们特别是艾芜十分欣赏地受用着这一切，尽情地享受这美好的时光。玛丽心情却沉重起来。她想起了自己来巴黎求学时坐四等车厢，啃干面包的凄楚情景，一种伤感涌遍全身，她甚至拒绝吃高档复杂的食品。

经过漫长的航行，终于到了目的地。笼罩在薄雾迷蒙中的美国是多么美观和气派。随着一声长鸣的汽笛。“奥林匹克号”缓缓靠岸。

马洛尼夫人抢先跳上轮船。她告诉玛丽，新闻、摄影、电影等各类记者来了不少。他们聚在码头，还有一些好奇的人们，足足等了5个小时。

玛丽在马洛尼夫人的陪同下，来到甲板上，远远看去，人山人海，一条条“造福人类的大学者”的醒目横幅映入眼帘，她那苍白的脸上刹时涌满红云，羞涩地笑了笑。

蓝蓝的天空下，摩天大厦鳞次栉比，五颜六色的鲜艳玫瑰眩目耀眼。迎风招展的美国国旗，法国国旗和波兰国旗，成群的和平鸽，飞向远方。

玛丽万万没有想到，她的镭在合众国里受到这么多人们的推崇和爱戴。

船靠岸后，众多的人们把玛丽团团围住。玛丽被记者们拉到甲板上

一张预先安排好的圈椅上坐下，帽子和手提包统统被马洛尼夫人拿走。一些摄影记者急迫地喊着：“夫人，朝这边，夫人，请把头转向右边，”“夫人，请转向左边！”几十架照相机和摄影机对准玛丽，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

美国因玛丽的到来，想尽一切办法和方式欢迎。各地都来人来函，希望玛丽去演讲，疯狂的美国人们，几乎要把玛丽淹没了。

几个星期内，玛丽一直身不由己，受人摆布，沉浸在热烈的应酬之中。伊雷娜和艾芜充当护卫，一左一右，挡住汹涌而来的人潮。

在 500 人参加的宴会上，每个人都争先恐后为玛丽敬酒。伊雷娜出于礼节，只能勉为其难地替母亲代酒，在大众欢呼之中，伊雷娜和艾芜替母亲挥手致谢。

玛丽十分疲劳，要求隐退。但这种要求是徒劳的。每到一地或参加一次活动，都要发表演说，每一次演说，都有一大群记者跟着，提一大堆问题。

由于马洛尼夫人的宣传和镭的作用，使美国人对她有一种真诚的崇拜，并把她列为美国当代第一流人物。他们欣赏这个“十分疲倦，十分简朴的客人的迷人魅力。”美国就像一锅煮沸的水。

玛丽无论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掀起滔天巨浪。各大报纸纷纷刊载这个“羞怯的纤弱妇人”、“这个装束朴素的学者”、“这个与众不同的大物理学家”的大幅照片，各种报道更是连篇累牍。

在马洛尼夫人的一再邀请下，玛丽来到了她的住处。哟，简直是花的世界、花的海洋，一股沁人心脾的花香飘满一屋。

马洛尼夫人告诉玛丽，有个园艺师因为镭治好了那使他痛苦不堪的癌肿，使他获得了新生。他十分激动。为了表示感谢，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亲手培植了这些美好的玫瑰花，从下种、发芽到开花，他日夜守着。故此这些花格外美丽，格外鲜艳。那如火如荼的红玫瑰，那高洁素雅的白玫瑰，有的含苞待放，有的盛开怒绽，有的娇艳，有的羞涩。玛丽静静地立着，久久地凝视着、欣赏着。她摘下一朵盛开的白玫瑰，由衷地赞叹着：“多美的鲜花，人世间真是值得留恋。镭拯救了人的生命，生命可以创造世界，装点世界！”

玛丽穿上马洛尼夫人为她缝制的黑罗缎教授长袍，觉得舒服，她感到“黑色的金字塔似有它永久的魔力”。在周围的人流中，显示出她特有的、天然的、高贵的美。

两个天仙般的女儿陪着她参加各种仪式，接受各种学位、奖金、奖章以及一种特殊荣誉：“纽约市民特权”。

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为玛丽举行了一次极其壮观的盛大集会。那天，在阳光普照的宽阔大道两旁，排列着一队队整齐的不计其数的穿白色衣服的少女，她们微笑着摇动手里的旗帜和鲜花，欢呼着，歌唱着，迎接她们伟大的同性，英勇而坚强的女性代表。玛丽在这些女学者女学生当中，显得格外亲切，格外自由。她拥抱着这些女孩子，一种愉悦涌上心头。

女学生们簇拥着她，一路歌声一路欢笑。热烈跳跃的人流把她拥进了纽约卡内基会堂，不计其数的人依次向玛丽鞠躬，一排排女学生列队向她敬献号称“美国美人”的玫瑰和“月月红”。在鲜艳娇嫩的花丛中，

一向矜持和端庄的玛丽显得异常激动。她笑了，笑得那样爽朗，那样开心。

美国科学团体 573 名代表在瓦尔道夫·阿斯多利亚为她举行欢迎仪式。玛丽已经很疲倦，为不辜负这些名科学家，大学者们的盛情，她由女儿搀扶着出席仪式。当她来到会场，很快被狂热的人流淹没了，大家蜂拥而来与她握手。一个狂热的崇拜者在与她握手时因过于兴奋和冲动竟忘了用力过猛，把玛丽被镭烧伤的手指和手臂握伤了。剧烈的疼痛涌遍她的全身，加上强烈掌声、嘈杂声，使玛丽头昏目眩、站立不稳。在人们的扶拥下，玛丽被让进了休息室。由医生进行紧急包扎后，她又出现在喧哗的人潮中。

马上就要举行赠镭盛典。前一天晚上，马洛尼夫人十分高兴地把赠镭证书送给玛丽审阅，并激动地说：“祝贺你，夫人，明天这 1 克镭就属于你的了。这是美国妇女对您尊崇的心意。”

玛丽认真看完了这份重要证件，发现证书的抬头处竟写明玛丽是这克镭的主人时，感到很不是滋味，她依然平静地对马洛尼夫人说：“对不起，夫人，这个文件必须修改，美国赠给我的这克镭，应该永远属于科学，而不应该属于我个人。如果按照文件上的写法，它完全成了我的私有财产，那么我死后就成了我的遗产，成了我孩子的财产。不行，这是万万不行的。”

她坚持要把证书重写一下，镭理应合法地属于她的实验室，而不能属于她的私有财产。否则，她将拒绝接受这份礼物。

马洛尼夫人万万没有想到，完全以玛丽个人名义募捐而购买的镭，竟变成了研究院的财产。这时已经很晚了，到哪去找律师，又怎么改呢？

马洛尼夫人十分为难地说：既然你执意这样，我们可以在赠镭典礼结束后再办正式手续。

“不行，马上就改，这个赠与证要马上生效。仪式可以推迟举行。”玛丽固执地说。

马洛尼夫人在玛丽坚决的要求面前，无可奈何地答应马上改。她连夜找来律师，按玛丽的要求，签署了一份附属说明书，证明这克镭属于玛丽的实验室。这时玛丽才微笑着签了字。

5 月 20 日下午 4 点钟，美国政界、科学界杰出的人士、外交使官云集白宫，他们怀着极其崇拜的心情向这个知名的女学者致敬，向天才和智慧致敬。

庄重而肃穆的会议室，一个厚厚的大门渐渐启开，令人瞩目的队列依次走来。走在前面的是美国大使朱塞昂先生挽着哈丁夫人，接着是哈丁总统挽着居里夫人；再就是马洛尼夫人、伊雷娜·居里、艾芙·居里，接后的是“玛丽·居里委员会”的女士们。

雄浑的音乐声伴随着铿锵的脚步声，迎来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新闻记者们摄下了这永久的辉煌。

倏忽间，乐声，掌声嘎然而止，会场上出现瞬间的宁静。大家都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极怕溜走每一秒幸福的时光。

玛丽面色淡红，精神灿然，微笑着向欢呼的人群点头致意。

来自各界的代表发表了真诚而赞美的讲演。他们用发自肺腑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表达着美国人民对这位伟大的女性的赞美。

“智慧的化身”，“造福人类的最伟大的学者”，“最受欢迎的贵宾”。他们要让全世界看到：科学家是最伟大的人，美国人民的心已经被这位天才女性所征服。她的精神是对科学的体现，为世界所推崇。

玛丽的演说在参加仪式的人们高呼“镭的发明者请接受美国朋友赠送的无价之宝”的欢声中开始了。

她的演说十分简短，明朗，恰到好处。正当人们竖着耳朵认真听取时，她那柔和的声音已结束了。她不善于表示谦卑，也不愿太露锋芒，除了讲她的专业术语和科学研究之外，她的言辞库里的其他语言少得可怜了。

最后是合众国总统哈丁讲话。他的讲话热情洋溢，言辞诚恳挚热，句句流露出对玛丽的赞美和褒扬。“居里夫人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学者，忠诚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除了完成那极其艰辛的工作并做出辉煌的成就之外，还尽到了妇女的全部天职。她是世界妇女最优秀的代表。”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哈丁总统把一卷用三色丝带扎好的文件慎重地交给玛丽，并且把一个用水纹绸带系着的极小的金钥匙亲手挂在她的领上。这是那个装着镭的铅皮匣子的钥匙，这个钥匙价值一千万金法郎。

有幸参加这次仪式的人们——外交人员，政府高级行政官员，陆海军代表，各大学的学者代表在一片愉悦声中进入蓝厅，然后列队从玛丽面前走过。玛丽一语不发，微笑着点头，她的女儿们代她握手，哈丁夫人亲自在一旁介绍玛丽的国籍。她们用英语、法语、波兰语互相致谢，然后在哈丁夫人的陪同下退出会场。玛丽一行来到门前的石阶上，一大群摄影记者正等在那里，一阵咔嚓咔嚓声，留下了玛丽和哈丁夫人的永久纪念。

客人赠予的奖章和名誉头衔以及名誉博士学位丰富和武装了玛丽，使她和美国科学界，实业界著名人士结下了更深的友谊。在费城，玛丽不但接受了大学授予她的博士学位，而且还出席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著名人士为她举行的欢迎宴会。一位公司总裁，著名的实业家欣喜地赠送玛丽 50 毫克新钷；著名的美国哲学学会授予她约翰·斯考特奖章。对这些荣誉和支持，玛丽十分感谢，她给哲学学会赠送一个“有深远意义”的压电石英静电计，这是她在最初几年研究工作中自己制造并且使用过的。除此之外，她无论如何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表示感谢。

欢迎仪式和旅游参观还在继续进行。到了匹兹堡，她欣然接受了参观那里的制镭工厂。因为美国总统亲自赠送她的那克镭就是这个工厂炼制出来的。厂长代表职工发表了诚挚的演讲，他们十分感谢居里夫妇的无私援助。在展览厅里，还陈列着当年皮埃尔写给他们的亲笔信和制镭的有关资料；这个厂保留了许多活动影片的拷贝，真实地记录了工人们在科罗拉多州的矿床中觅拾矿石的情景，还记录了工人们提炼镭的全过程。看到皮埃尔的亲笔信和工人制镭工作情景，玛丽热泪夺眶而出，昔日她与皮埃尔在棚屋里艰苦的情景跃然眼前：今天的匹兹堡制镭工厂，已经设备齐全，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型制镭工厂。该工厂的员工，把为居里夫人制造镭当作最大的幸福和荣耀。这使玛丽激动不已。她兴致勃勃地同该厂的厂长，工程师漫谈，谈他们的共同话题，“镭的炼制”，内行人说内行话，句句都是那样轻松自如。她赞扬他们的创业精神，他们崇拜这位开天辟地的镭的母亲；是这位伟大的母亲缔造了制镭业，向

人类献出了这个财富和宝贝。工人们听说是镭的母亲来了，更是兴高采烈，簇拥着她，欢呼声震撼着车间。她接受鲜花，接受各种滔滔不绝的赞美词。来到车间，她亲切地与一线生产工人交谈，鼓励他们为制镭业作贡献。

马不停蹄的旅行，喧闹的人群，接二连三的仪式，使这个虚弱的妇人头昏目眩，心灵惊悸……

第二天早晨，布罗妮雅代为宣布，居里夫人太虚弱，不能继续旅行。至此美国西部各城市为她举行的招待会不得不遗憾地取消。

消息传开，美国极开放的新闻界的记者们又大作文章。有的报纸竟公开对邀请者和举行仪式者提出苛刻的批评：“我们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竟然要居里夫人以她的血肉来偿还我们所赠送的礼物。”有的报纸更直截了当，读来使人触目惊心：“无论哪一个实业家或音乐厅的经理，都愿为居里夫人赠一笔比1克镭大得多的款，而不要这么劳累奔波，这么受罪。”“我们已用我们的过度热情差不多害死了“霞飞”元帅，难道又要害死居里夫人么。”在这个新闻完全自由的国度，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令人惊诧的观点。每个记者都采访居里夫人，听听她对这次美国之行的感受，结果是毫无所得，居里夫人的平静和缄默，使新闻记者们大失所望。

震惊世界的美国之行就要结束了。6月28日，像两个多月前迎接玛丽来美国时一样，纽约码头上早就挤满了热烈的人们，彩旗、鲜花在微风中飘荡。老园艺师把精心扎制玫瑰花的大花环戴在玛丽的脖子上。不能赶来为玛丽送行的人们纷纷打来电报，祝愿她归途平安！

这次旅行，虽使玛丽极其疲乏，但也令她十分高兴和满意。因为她“在美国对于法国和波兰的友谊上作了一份巨大的贡献。”这是哈丁总统和柯立芝副总统在讲话中对于她们两国所表示的亲切态度。同时，她也感到自己这次旅行在合众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是她的智慧和品德征服了几百万美国人们的心，赢得了所有认识和接近她的人的真挚友谊。

后来，玛丽写道：“我带着那份代表美国人民友谊的珍贵礼物，怀着对美国妇女的无限感激之情，怀着对合众国的敬仰之心，回到了法国，相互间的友谊同情把我们两国以及波兰连在一起，这种友谊和同情，使人类对和平的未来充满信心。”真挚的友谊和爱戴，是任何高贵卑贱的人所不敢奢望的。

4 为科学服务

玛丽经历了一次成功的美国之行以后，她的名字震撼了全球。

几百种慈善事业，几百个联合会和团体请求她入会，她都婉言拒绝，只接受其中几个她认为有特殊意义的邀请。1922年，接受了国际联盟理事会中的一个职位，这是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致力于维护和平事业的组织。

玛丽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对人类生活极为尊重的人，她希望国际联盟通过促进各国了解，防止再次爆发战争。玛丽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流血的磨难，热烈渴望维护和平，因此，她寄希望于国联，相信国联。她认为参加这样的组织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帮助国联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同时，她希望为科学家和学者们制造一个和平和稳定的环境，摆脱物质和环境的忧虑，专心致志地投入研究。玛丽还是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并于1930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上当选为主席。她希望通过这些工作，进一步为科学事业服务。

她出身贫寒的家境，对一些交不起学费的优秀学生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感情。她的一生常有一个念头萦绕脑际：有多少天才埋没于命运不佳的阶层中，在那些贫寒的工人农民家庭中，也许就藏有作家、学者、音乐家和天才……她要尽最大的努力，借助于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发展国家科学助学金，以帮助和支持这些出身贫穷的学生。

1933年，她硬是放下手头繁忙的研究工作，到马德里去主持一个由法国象征派诗人及哲学家瓦勒里组织举办的国际性的讨论“文化前途”的辩论会。许多国家的作家，艺术家纷纷云集此地。他们均认为，当前的文化陷入了一种世界性的危机，在分析产生这种危机的同时，有人公开提出，科学的发展，对文化的危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数落种种科学发明的罪过。玛丽参加讨论，发表了不少意见。使沸腾的争吵立即平静下来。玛丽那谦逊的态度，极高的威望，独到的见解，优雅的谈吐，惊倒了“专门化”和“标准化”的与会者。她的发言带有她科学家的独到见解和权威，被与会者所推崇。

“我认为科学属于追求尽善尽美的人们。一个在实验中专心致志的学者，不只是一个技术员，他也是文学家，他眼前出现的自然现象像神话一样演绎，给她一幅美妙的画面。我们不应该认为科学可以简单认为是机械结构、机器、齿轮装置，这是不实际的……我不相信世界上冒险精神已经到了将近消失的边缘。在这个世界上，假如丧失了冒险精神和好奇心，人类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科学的振兴更无从谈起。”

玛丽和与会者的关系是那样融洽，以至于人们不把她当作尊敬的外宾，而把她当作老朋友、老邻居，无话不谈。与这些人在一起，玛丽感到十分愉快。大家认真地讨论着各种科学发现，科学发明和新的理论问题，制定新的远景规划。

玛丽参加这些组织活动，完全出于爱国、爱和平、爱人才的博大爱心。玛丽专心从事的事业就是：“为尊重民族文化和国际文化而奋斗，保护随处发现的个性和天才，为加强世界科学的伟大精神力量而奋斗。”

玛丽在这些组织工作的同时，还挤出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在筹

办国际科学出版物书目过程中，她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支持，正如她的威望一样，只要她提议或出面，她所关心的任何一个计划都会获得成功。各国各地科学界纷纷向她提供资料。这份书目录完整地列出了有关科学课题的书目；学者们已经取得的成果；最新研究方向及动态；每个科研人员阅读了它就可以了解世界各地出版的各种科学书籍。科研人员在研究工作中，遇到难题，很快就会从书目上查到要找的资料。她还努力使世界各国采用统一的科学符号和术语，为科学事业尽力作出她的伟大贡献。

后来，经玛丽的努力和筹集，硬是帮助建立了国际科学奖学金。联系自己因困苦而辍学的少年时代，玛丽感到一个有培养前途的科学工作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继续求学是国家的损失，是本人的悲哀。她千方百计地为出身贫穷而又有才华的学生谋求助学金。为了保护未来的科学家，她不惜牺牲时间和精力，一直找到最高机关。用她个人名义争来的资金，培养大批有名望有贡献的学者。

在从事所有这些工作的同时，玛丽继续指导着镭学研究所全部的工作。

玛丽对科学的忘我奉献精神，对科学高度负责的态度得到了科学界的一致敬佩和景仰。1922年，巴黎医学科学院的领导们收到了一个由该院35个院士联合签名的请求书，极力推举居里夫人为该院院士。他们认为居里夫人成为该院院士，可使医学科学院增光。并借此表达对居里夫人在发现镭和新的医疗方法——“放射性”疗法等方面作出贡献的敬意。这个请求书在该院引起了轰动效应。64位德高望重的院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没有玛丽自己的请求，没有选举，曾经报名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宣布自动放弃。这个曾经被拒绝于科学院以外的妇人，竟打破投票惯例，跻身于男人世界的神圣领域。玛丽进入科学院转变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特的问题，一个有关允许妇女被送入科学院权利的问题。

2月7日，选举结果公布，医学科学院院长晓发尔在受勋仪式上，热情地对玛丽说：“夫人，您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献身科学的伟大妇女；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法兰西人民的楷模。你为我们医学科学院增添了光辉。我代表全院教职员向您致敬！”

玛丽是第一个选为这样有名望机构的当之无愧的妇女。又是一个第一，在玛丽的一生中，永远是第一，永远是开人之先河，创世之先例。第一，意味着一种勇敢的超越，意味着天才的智慧。她是世界妇女的杰出代表，还令世界男人顶礼膜拜。正如晓发尔院长说得好：“我们可以从您的榜样和您的命名得到精神上的益处。您在我们中间，我们倍感自豪。”

法国人民和学术界没有忘记玛丽为她的第二祖国所作出的成就与贡献，各种荣誉不断地飞向玛丽。

1923年，居里基金会举行盛大集会。郑重庆祝镭发现25周年。法国政府决定向玛丽为她的第二祖国创造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议会一致通过一项提案，授予居里夫人4万法郎年金作为“国家酬劳”，并规定伊雷娜·艾芙·居里有继承权。

自从1898年12月26日科学院的聚会上宣读了皮埃尔·居里，居里

夫人，乔治·贝蒙的历史性论文《论沥青铀矿中含有的一种放射性很强的新物质》，至今，整整25年，25年中，这个新物质——镭，为多少企业和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为人类作过多少巨大的贡献啊！人们纪念它，尊崇它，都取决于它产生价值的巨大威力。

这天，索尔本大学云集着法国总统亚历山大·米勒兰以及各大学，外国各大学，学者团体，政府当局，军队当局等高官名流。还有从华沙赶来参加玛丽仪式的约瑟夫，海拉和布罗妮雅。斯克罗可夫斯基家里的小妹妹的显赫声誉和光荣，更增添他们的自豪和骄傲，更增强这一家人的团结和友爱。索尔本大礼堂彩灯闪烁，座无虚席。

庆祝会上，居里夫妇的合作者和朋友安德烈·德比尔纳宣读了他们从前宣布关于发现放射性物质的那些科学报告。镭研究院的业务主任费南·荷子威克，在伊雷娜·居里的帮助下，用镭作了几种实验。接着是最慎重的仪式：米勒兰总统亲自把国家年金赠给玛丽，并说：“这是法国人民一致对您表示热诚的敬仰和感激的真挚的证明。”

教育部长莱昂·贝哈尔先生作了补充说明。“这是经过法国全体议员签名的决议案，居里夫人的谦虚和无私是不起作用的，她无权更改议会的决议案。”

疯狂的人们向玛丽热烈鼓掌致敬。欢呼声，赞颂声，掌声，铺天盖地。面对这种热烈沸腾的场面，这位永远平静朴素的玛丽显得十分不安，她毫不稀罕这些鱼贯而来的荣誉，特别是政府强加于她的养老金。她满脑子装着的是皮埃尔，浮现着与皮埃尔共同奋斗的艰苦岁月。那些成功与失败的酸甜苦辣。而皮埃尔却英年早逝，留下他们这孤儿寡母。如果皮埃尔健在，看到这热烈的场面，玛丽该是另一番心情。她在欢呼声中站起来，用细微而颤抖的声音向议会表示感谢。语言少得几乎苛刻，就是在她极短小的答谢词中，她也仍然不忘记赞颂那个使她极其悲痛的人——皮埃尔，同时她希望政府和社会继续帮助和支持镭学的发展。

然而，用这笔养老金使自己过得幸福和舒适不是玛丽的性格。她根本没有动过养老金。而是把大部分钱用于资助各种科学事业，设立奖学金；一部分为她的实验室购买仪器，添置设备。她自己仍然靠索尔本大学的薪金过着简朴的生活，连个女佣人也舍不得请。伊雷娜和艾芜看着劳累大半生，身体极度虚弱的母亲，十分伤心，常常苦劝母亲保重身体，多注意休息，过得安乐一点。然而这些劝说根本不起作用。工作是这一伟大的女性的惟一乐趣，如果放弃了工作，她的生命就会终结。她认为，继续不断地在实验室工作是她最大的幸福，只有这样，她才感到生命的可贵。

巴黎的镭学研究院是玛丽遵照皮埃尔的遗愿也是自己的第一夙愿已经实现了。并且筹备了供研究用的足够的镭，研究院的工作正红红火火，人才辈出。她十分高兴，足可以告慰亡灵。然而，现在的玛丽一种怀乡病在折磨着她，实现自己的另一个夙愿。她要用自己的知识与影响，为千疮百孔的祖国作一份贡献，使波兰尽快富裕起来。便决定在自己的国度波兰建立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型镭学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和癌肿治疗的中心。她希望在新建的大楼里设置设备精良的实验室。实现和扩展1912年她在华沙制定的研究院计划。玛丽决心将这个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作为献给自己的祖国波兰的礼物。

理想归理想，现实是现实。那个折磨了她一辈子的问题又横亘在她的面前，钱从何处来？

波兰沉浸在长期的奴役之中，刚刚摆脱沙皇的压迫，挣脱枷锁，还像个虚弱的病人。十分贫乏。财力，技术，学者一切都是空白，要建立一个高质量的镭学研究院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而玛丽又是个身兼数职，负担十分沉重的名人。现在又添了副重担，筹齐波兰镭学研究院的建设资金。

玛丽的倔强足以使她克服重重困难，她的一生就是冲破阻力而挺过来的，而且走出了坎坷走向了辉煌。所以她不管再忙，仍然抽出时间从事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她的主张立即得到她的同盟，姐姐布罗妮雅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布罗妮雅也是一个热心肠的爱国者。玛丽不断往返于华沙和巴黎之间，一切具体事宜由布罗妮雅承担。姐妹俩把她们那有限的存款全部捐出作为活动基金。在波兰广泛发动捐款活动。

布罗妮雅既是经理、工程师，又是财务管理人员。她们在发往各地的明信片上贴着印有玛丽头像的邮票。明信片上用玛丽诚恳的语言印着：“我热切希望在华沙建一座镭学研究院。请为建筑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居里研究院买一块砖！”这个运动获得波兰政府、华沙市和波兰各重要学会的慷慨支援，在波兰人们中掀起了募捐热潮。

玛丽想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成功的。不久，建设资金基本筹齐。在1925年，玛丽回到华沙，参加镭研究院奠基仪式。

这次旅行，不同以往的回家探亲。她的心情十分复杂，有幼年的回忆，有痛苦的留恋，有未来的展望……这次回国，引起波兰国度的高度重视。举国上下对这位腼腆深沉的、闻名世界的女科学家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尊重。毕苏斯基元帅亲切地接见了她，他们谈得十分投机，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一致的见解，几天工夫，他们就建立了极真挚的友好关系。

在一个明朗的早晨，在鲜花与人潮的欢呼声中，波兰共和国总统为研究院铺下了第一块砖，玛丽铺第二块砖，华沙市长铺了第三块砖……

微风轻拂，掌声阵阵，玛丽用纯正的华沙口音作了简短的奠基演讲。充分流露出她对祖国的依恋，对人民的爱戴，每一个字都充满真情实感，在场的人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宴会上，玛丽用纯正的波兰话与波兰元首对话，元首非常感动，离开祖国几十年的玛妮雅竟乡音未改，更增添了几分亲切和友谊。

玛丽每次返回波兰，总觉得她自己又是30年前离开祖国的热情的女学生，总有一种依依不舍之情。这次回国，给她的感觉更是回味无穷。

研究院的墙壁在增高。几年之后，雄伟气魄的大楼矗立在维斯杜拉河畔。玛丽的心理负担又在加重，她的工作还没有完结。购买治疗癌肿所必需的镭的款项还是个空白，而这又是研究院建设中花钱最多的项目。

怎么办？深夜，阴暗的煤油灯下，晃动着玛丽来回踱步的略显弯曲的身影。这是她思考疑难问题时的习惯动作。自己的财产已在战争中献给了第二祖国，哥哥姐姐已倾其所有；波兰处于困难阶段，已经募捐了一次，再不能增添负担。怎么办？忽然她眼前一亮，停止了脚步。对，向她求援，她又一次想起了美国朋友马洛尼夫人。以前，在她处于困境之中时，马洛尼夫人向她伸出热情的双手，把1克珍贵的镭送到她手中，

这个慷慨而颇有号召力的美国妇人会理解玛丽那颗爱国之心，她一定会帮助的。

玛丽信心倍增，马上把煤油灯拧到最亮处，铺开纸笔唰唰地写信向马洛尼夫人求援。她与马洛尼夫人虽是至交，但仍是礼貌而婉转试探的口气，向马洛尼夫人打听，美国能否再帮她一次忙。最了解和崇拜玛丽的马洛尼夫人接到信后，马上行动起来，她最崇尚和热爱人道主义事业，她知道，玛丽是为了一种伟大的事业才向她求助的。她理解玛丽的心。便马上回信说一定尽全力帮助。这个好心的慈善家在美国又募集了购买第2克镭的资金。

为表示对支援和关心她的美国朋友的感谢，玛丽再次横渡大西洋去接受礼物，并代表波兰向美国致谢。这次又像在8年前的1921年一样，又一次掀起了欢迎热潮，到处是鲜花和彩旗，到处是欢呼和赞美。合众国人们给了她许多荣誉头衔，举行了各种欢迎仪式。美国妇女为她举行了盛大的62岁生日宴会，许多不相识的朋友送来了成堆的鲜花、工艺品、各种书籍，一些实业家为她的实验室送来捐赠支票。电报、电话，慰问语成捆地堆砌。由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在白宫亲自向玛丽授礼，并邀请她作白宫高贵的客人。这是美国接待国家元首级的仪式，玛丽已享受到至高无上的荣誉。这次来美，正好赶上爱迪生诞生50周年纪念大会，站在那富丽堂皇的实验室里，玛丽感到由衷地高兴，感到科学的伟大和价值。她还参观不少大学，大学里挂着自己的画像，并把“像居里夫人那样奋斗生活”作为校训。这使她感到面红耳赤，在自己的画像前，她迅速逃避。这又是一次光荣而成功的旅行，她为美国与波兰人民搭上了一座友谊桥。

1932年5月29日，华沙镭学研究院举行开幕典礼。玛丽细心地亲自检查了实验室的每一件仪器。每一个设备，她觉得很满意。典礼活动安排得庄严而热烈，在华沙甚至在波兰的每个角落，都是鲜花和掌声，都是赞美和欢呼。一个演说者称玛丽为“我们温雅的女王——波兰共和国的第一个神女”。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在疯狂的崇拜者面前，她总是谦虚和腼腆。甚至不可思议地逃出欢呼的人群和欢腾的仪式。她反复地说道：“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而不应该注意人。”

共和国总统出席了开幕式，玛丽的老同事端学教授，佩韩夫妇等专程从巴黎赶来祝贺。望着美观庄重的高楼，看着这一流的设备，设施，玛丽十分感慨地说：“祖国，这是少小离家的赤子献上的一份礼物。”

这位卓著的女科学家，怀着极为满意的心情离开了波兰，离开了生她养她的祖国。这是她最后一次返回祖国，也是她极为心满意足的一次旅行。她在心里再次喊出了那句亲切的波兰语：“再见了！祖国！”

第八章晚年

1 简朴的生活

在法国西北哥太县蒙什边上靠近巴安波旁有一个美丽宁静的村落。一片荒野对着那片广阔无垠的蓝色海洋，海上散布着无数大小岛屿和礁石。挡住外海汹涌而来的波涛。使这片海域格外平静，格外柔和。村落里散居着水手、居民，只有几户人家，显得零落、孤寂。1895年，作野外考察的历史学家查理·塞伯斯和生物学家路易·拉比克一行来到这里，立即被这绝妙的景色所吸引，像哥伦布发现航海船那样欣喜若狂，立即向大学人员通报，老教授们对这个发现极为欣赏，纷纷赶来租下民房作别墅。从此，这里的居民群里又增加了索尔本大学教授。每年夏季，索尔本大学的教授们或单独或举家来此度假，一住就是好几个月，他们在这里租房盖别墅，栽花种草，种蔬菜、水果，捕鱼捞虾，完完全全过一种地道的农民生活。新闻记者们嗅觉十分灵敏，他们跟踪采访后，把这个幽雅而美丽的村落叫“学者殖民地”，又叫做“科学堡”。从此，“科学堡”“学者殖民地”便声名远扬了。

玛丽是最迟来“科学堡”的一个。起初她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但是觉得太嘈杂了一点，后来租了一座别墅，久而久之，便干脆把别墅买了下来，以便她的女儿们休假时也来此旅游。这所别墅坐落于最荒僻最多风的地方。这是很多学者不太喜欢的选择。因为她喜欢宁静，又喜欢清新空气，特别喜欢阳光的照射，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是喜欢灯塔。她所租过的住房以及她建筑的镭学研究院似乎都具有同样的特点，一个不甚宽敞的别墅矗立在一大片田野上，房间里只有几件破旧的家具，十分简陋的布置，更谈不上装饰。但别墅的四周有花有草有树，海风轻柔地吹，海水静静地流，阳光无遮无拦地照，举目北望，无边无际，风景优美极了，真不愧为一个赏心悦目的最佳度假地。

每天早晨，玛丽就早早地起来，她要欣赏那背着沉重负荷的太阳从海的边际艰难爬出来的情景。有时，她真想伸出双臂为太阳助一臂之力。她慢慢地散步，任凭海风吹散那一头淡白的头发。一路上她碰上一些下地干活的驼背妇女，下海捕鱼的青年小伙，动作迟缓的老农，以及流着鼻涕的儿童。这些人总是拖着布列塔尼口音亲切而热情地与玛丽打招呼：“早安，居里夫人。”玛丽从没想过要避开他们，相反，她更喜欢他们的朴实和勤劳。但遇到擦身而过的农民，她总是平静而温和地回答“早安！”过了几个夏季，玛丽与这里的人们结下了极深厚的友谊。这里的居民并不是因为她是镭的父母、著名的科学家，受到很多国家总统和元首的接见而尊重她。因为他们是极少看报纸听广播的，这一些对他们每天捕鱼种菜，田间劳作，并不相干。他们是在与玛丽的接触中，觉得她很多生活方式与他们十分接近：穿着朴素的衣裳，甚至与他们一样的农妇服装；过着极简单的生活，住房布置也与农家穿着一样极其简陋；说话和气，态度和蔼还常常为他们解决疑难问题。不少农民不懂的技术问题，邻里纠纷，学生学习上的难题都来找她，而玛丽总是不厌其烦，耐心解答。还给他们讲一些新奇的故事，带给他们很多的新信息，新知识。他们敬重她，亲近她，他们把她当作布列塔尼妇人之一，同时也是

他们最信任的人之一。

晚年的玛丽，几乎每年都要在索尔本大学教授们的怂恿下，来到这所僻静的别墅，加入那支学者殖民地，度过美好的夏天。

每当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的时候，科学堡里的学者，教授们也结束了悠闲自在的生活，告别了他们的自由王国，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去。

按说，玛丽的晚年应该过得十分幸福和富裕。法国政府给的国家年金和美国慷慨赠予的年金，对于过惯了简朴生活的玛丽来说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了。

然而，玛丽的住房仍是 22 年前白杜码头那所住宅。这是一座 17 世纪的古老建筑。房子设置不太合理，楼梯分布屋内和走廊，宽大又不好使用。宽敞的客厅可以容纳五十多人，但事实上，难得一次有 4 个以上的人在里面。客厅里杂乱地摆放着旧式桃花心木家具，还是老居里大夫遗留下来的，使客厅显得空荡而寂寞。光滑的地板踩上去，发出哼哼唧唧的声响，整个屋子几乎没有地毯，没有窗帘，没有装饰。高大的百叶窗只挡着一层薄薄的网丝帘子，阳光可以无遮无拦地射进屋内。

玛丽喜欢大自然，这栋房子为她创造了条件，她可以不出家门，隔着窗户眺望着那悠悠流淌着的塞纳河水，听河上拖船工的不断吼声。她还时常把女儿吸引到窗边来，母女俩把脑门贴着玻璃，辨认那些穿梭往来的汽船和快艇。她十分天真地同女儿数着这些船只，把那些大型而笨重的分成火枪组：阿脱斯，波尔脱斯等；把那快艇，捕鱼船分为飞鸟组：雨燕，朱顶雀、燕子……她那科学家的想像力和新奇的字眼，常引来女儿那一阵阵开怀的笑声。

屋子的另一边是一个美妙的斯德岛。岛上有连绵不断的花圃、橄榄树、柠檬树树林，优美的景致可以尽收眼底。

玛丽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希望在自己繁忙的枯燥的研究工作注入一些生机和活力，增添些色彩，她所住过的庭院，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房前屋后栽满了五颜六色的长春花、金雀花、蔷薇和含羞草；院有密布的树丛，爬满着牵牛花，常青藤；墙院覆盖着五叶地锦。爱花爱草爱树成为她生活中一大嗜好。

玛丽很少逛街，特别是从不进珠宝店和时装店，那些东西离她太遥远，太陌生。每逢她小女儿艾芜缠着她上街买物品时，她从不问价格，也不看价格，她把研究中的推测能力运用到购买物品上。在柜台上，她总是挑选最简单，最便宜的衣服和帽。她只喜欢这样的物品。而艾芜不满足母亲的欣赏水平，只要有一点钱，就要买各种饰品，把自己的房间装饰一番，服装更新一下。她是这个家庭里的潮流派。

艾芜自小酷爱音乐，崇尚艺术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气质。她是当代最著名的传记作家，著有《雪莱传》《拜伦传》、《雨果传》。她是一风姿绰约的美人。她的物饰十分高贵优雅。她喜欢冷色调的黑色服装、气质高雅、平静端庄，坚定中透出温柔，稳重中蕴含妩媚，敏锐中更兼细腻。是一个现代美与古典美兼而有之的绝代佳人。每每当她买来一套满意的服装，让母亲参观和评价时，而玛丽总是淡然一笑：“我不知道。”令艾芜十分失望。

但艾芜深受其母的影响，有着诚恳、正直、宁静、淡泊的高尚品质，

在法国音乐界和社会界享有极高的声望。她的丈夫亨利·拉布佩斯由于热心社会慈善、福利事业，以其出色的成绩，成为196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玛丽不反对女儿爱美，她希望女儿尽情地享受生活，事业上也要有所成就。她自己是性格决定了的，不愿在吃穿上多花钱。但是她也有一个愿意花钱的去处，那就是到乡下建别墅。她晚年时期，分别在拉古埃斯特、地中海海滨建了两处别墅。她极愿意到南方去找更强烈的阳光和温暖的海水。休假时，她会到拉古斯特的别墅阳台上睡露天觉，整夜听海水呼啸，看耶尔群岛的迷人风景。白天她会爬到山坡上的花园里，亲自栽种桉树、含羞草、扁柏。有时天气好的傍晚，她会与伊雷娜、艾芜三人手挽着手，到花园散步，听小鸟鸣叫，看晚霞隐退，吮鲜花芬芳，母亲的情，母女的爱，溶化在绚丽的夜幕之中。

玛丽爱好颇多，兴趣广泛，但心灵深处有一个隐隐的痛处，那就是爱情。她忌讳任何人谈及这个话题。甚至对自己的姐姐和女儿，也紧紧地关闭这扇隐秘的窗口。

1926年的一个早晨，伊雷娜忽然向母亲和妹妹宣布，她要订婚了。她将和镭学研究院里一个玛丽的学生，弗雷德里克·约里奥结婚。伊雷娜完全承袭了母亲不关心物质的脾气。她是“科学皇族的公主”，后来成为了一名著名的科学家。她总是沉默寡言，羞于见人，谦虚谨慎，没有丝毫优越感。她最大的特点是不注意服装和外表，从不修饰打扮，衣着十分朴素简便。如果有人硬拉她到店里去买衣服，她会让店员到储存库里去找一条过了时的，附有宽背带的衣裙。她认为宽大一点有利于今后长胖了时穿。店员大为惊奇，年轻女孩子怎么会喜欢过时的服装。她给店员解释说：“我穿衣服只是为了舒服，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别人认为美不美与我没什么关系。”

伊雷娜从小酷爱科学，还是17岁时，就已经是玛丽的助手了，她和母亲形影相随，寸步不离。白杜码头这所房子二十几年来，完完全全是清一色的女人住宅，除了极个别要好的朋友偶尔出现一下之外，很少有男人来过。这时，这所住宅突然有一个青年男子出出进进，彻底搅乱了平时的生活程序。

约里奥虽然是玛丽的学生，但她从未专注过这个青年人，她只是对他及所有学生的功课和研究发生兴趣，并未注意到约里奥其人的品德、智慧。约里奥出生在巴黎一个富有的棉布批发商家庭，是六姐妹中的最小一个。他的两个哥哥因病相继去世，他是幸存的惟一男孩，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就写诗绘画，与喜欢打猎、游泳的父亲出入森林，涉足江河，对大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考取了皮埃尔曾经工作过的巴黎工业理化学校。当时的教务长、著名的化学家郎之万十分喜欢这个聪明好学的青年，认为他具有科学家的素质，大有培养前途。在玛丽的实验室需要一名研究员时，郎之万便推荐了他。在实验室里，约里奥不仅刻苦学习，而且十分勤快。3年内，便以优异成绩获得了两个学士学位和理科硕士学位。

经过接触和观察，玛丽发现了他的特殊才干，并对未来的女婿有一种好感。加之小伙子既热情又爱说话，既漂亮又有才干，很逗人喜欢。现在有两个助手替她分忧，有两个有才华的同盟与她讨论问题，她感到

很高兴。

弗雷德里克为自己成为居里家的一员感到十分自豪，他甚至把伊雷娜的姓加在自己姓的后边。从此，人们称呼这对年轻的夫妇为约里奥·居里先生和夫人。

伊雷娜结婚时，玛丽十分难过，她害怕失去女儿的陪伴和协助。可是这对善解人意的年轻夫妇一周有好几次回来陪伴母亲吃午饭，同母亲讨论科学上的问题。

玛丽见伊雷娜小两口形影相随，在实验室并肩工作，勾起了她心灵深处的苦楚。她常常无可奈何的说：“哎，我老了。”

她的心境极为复杂。她有一颗悲惨而受过伤害的心，初恋失败，流落异国，后来孀居，两次失掉了她极感甜蜜的家。她的心千疮百孔，她的情感世界长了老茧。如今是 65 岁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她的感情库里除了悲哀还是悲哀。

她对正在热恋中的艾芜的愉快心情常常是表现得极为冷淡。她说：“恋爱不是一种可资荣耀的情操。……如果把生活中的兴趣和追求，都放在爱情上，则犹如在沙滩上建造楼房，是完全靠不住的。必须从一种理想主义中寻找精神力量。”

她的观点与思想，与她那挫折的爱情和苦难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她的女儿和朋友们都说她：“不会生活的工作狂。”

2 指导实验室

“唉，我疲倦极了！……”

这是玛丽每晚回来必说的第一句话。她苍白的脸庞因疲劳而显得极度憔悴和衰老。

每天早晨 8 点，就有一辆旧式轿车停在她的房子前面的码头上。车上的喇叭响了两声，玛丽会火急火燎地戴上帽子，穿好外衣，匆匆地走下楼梯。她不愿意让司机等她，否则，她会觉得极不安。

在实验室里，她十分投入。每天都会有一大堆工作等着她去处理。一直工作到晚上 7 点半钟时，甚至更长一些。她的车送她回去，她似乎觉得眼前的四层楼房犹如一座险峻的高山，爬得十分吃力和艰难。到了房间，她得坐下来喘息一阵，直到女仆请她吃饭。

艾芜见日渐衰老的母亲仍像年轻时一样玩命的干，于心不忍。总是怪嗔地说：“妈，你工作太多了，你忘了你已是 65 岁的老太太了。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是不行的。再这样下去，你会累垮的。”

“我知道，艾芜，我老了，身体不好，机会不多了，更应该抓紧时间多做点事。”她抚摸着女儿的头发，轻柔地说。

艾芜知道，对母亲说这些话是毫无用处的。她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母亲不能离开工作，更不能停下工作，那样只能是加速她的衰老。艾芜甚至希望她的母亲能有精力每天工作 14 小时以上。

自从伊雷娜搬出白杜码头之后，玛丽就与艾芜相依为命。每天，母女俩一边闲谈一边吃饭。玛丽总也改变不了一边吃饭一边讨论科学、研究的习惯，她克制不了研究中发现的新现象的兴趣。这是几十年来开始与皮埃尔合作，后来与伊雷娜研讨养成的习惯。

现在只有艾芜这个听众，只有她一人高谈阔论，而她仍是那样津津有味。虽然她已经工作了十几个小时。

一晚接着一晚，一遍接着一遍，艾芜常常被母亲全神贯注的神色所感染，常常被实验室的热烈活动所吸引。久而久之，艾芜也像母亲的合作伙伴一样，熟悉了她没有见到过的仪器，没有看见过的一张张面孔，熟悉了那枯燥的公式。

来镭学研究院工作的学生都是玛丽亲自挑选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材生。中国的郑大章是1921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20年代后期进入玛丽的实验室，由她亲自指导，进行钋族元素和钋的放射学研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施士元是玛丽的研究生，很受导师的重视。玛丽十分喜欢这个聪明好学、坚强谦虚的留学生。

有一次，玛丽同她的女儿艾芜说：“今天，我在物理室与我的中国学生用英文交谈了很久。我曾经肯定过一个假说理论，而这个青年刚刚用实验证明了这个假设不准确，但当我说这个假设的推理应该准确时，他始终认真地听，并客气地点头同意。当时，我简直猜不出他是否有不同意见，他又没有向我公布他的实验结果。在这些中国学生面前，我总觉得自己态度生硬霸道，自惭形秽，他们远比我们文明多了。”

玛丽说的留学生就是施士元，他学成回国后，曾著文回忆说：“居里夫人领导的实验室，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放射性研究中心之一。……她工作扎实，待人和气，态度诚恳，没有主仆尊卑，在她面前，只有平等相待、互相尊重。”

对这些来自世界各国、各种不同肤色的学生，玛丽总是亲自督促，她经常用自己的钱为贫穷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每年都要安排一个波兰学生到实验室工作，以示对祖国的贡献。她极为高兴地看到，在她实验室的所有学生中，她女儿伊雷娜是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这对一个终身为科学事业而奋斗的玛丽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安慰。她的伊雷娜好像当年的皮埃尔，总是与玛丽形影不离。而玛丽加上弗雷德里克，她的力量又增加了许多。

进了实验室就犹如上了战场，她的精力特别充沛，注意力特别集中，她常常同时应付五个或十个青年学生的提问。

每天早晨，当玛丽出现在实验室，这群穿着实验室白工作服的青年学者就快乐地挤在她的周围，一个接一个地叙述刚刚得到的某种“测量”的结果；报告她关于钋的溶解的消息；或者请教某一道计算题的结果。

玛丽看着这一张张满含热望的脸，一双双满含尊敬和羞怯的眼光，总是投之以善良的微笑，然后平静地回答一个个问题。

“福尼埃先生，你对我说的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你的意见很好，但你所提议的方法是不能用的。我想了另外一种方法，应该可以成功，等一会儿我来找你。科泰罗夫人，你得到的那个数字，你认为对么，昨晚我重新算过，我得出来的结果略有不同，你看一看吧！……”接着，她又和另外一个学生谈另外一种工作。她的大脑犹如一架精密仪器，特别适用于作这种深奥的智力工作，就像下棋的国手，不必看棋盘，就能够同时下30至40盘棋一样。

真使人无法想像，一个身体虚弱的老太太，能领导一个庞大的智力充沛的青年学者群，并树有崇高的威望。

也难怪，这个白发苍苍的学者整整作了 40 年的科学工作，翻阅了大量的科学书籍，只要与这个研究院进行的实验有关的资料和书籍，她都认真地研读过。加之若干年的研究实践，积累了极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她在各种现象中发现新的进展，研究新的技术。至使她具备极雄厚的知识功底，加上她极准确的判断力和睿智的大脑，在解决假设和知识被搞乱的难题方面有所向披靡的作用。如果哪个学生跟她说含糊不清的理论和武断的假定时，都会遭到她难以反驳的理由的拒绝。

实验室的学生们在这位知识渊博又勇敢谨慎的导师指导下工作，真是一种幸运，一种光荣。

聚在身边的那群青年学者带着从导师那里获取来的战利品渐渐地满意地离去。这时，玛丽才罩上那件黑色的工作服，走进自己的专用实验室去，专心做自己的实验。

玛丽爱她的实验室胜过自己的一切。为了使实验室一年比一年富裕，常常同让·佩韩教授一起，跑到政府各部去请求补助费和奖学金。以“居里夫人”的执着和声誉，1930 年她的研究院得到一笔特别研究补助费 50 万法郎。有时她觉得这些请求使她疲倦而且屈辱。但为了研究院的发展前途和镭学事业，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玛丽对科学的严谨和追求深深地影响着她的大女儿伊雷娜。多少年来，伊雷娜与她形影相随，与母亲一道全力投入科学事业之中。

现在伊雷娜虽然作了母亲，但她仍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有一套娴熟的操持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办法。她能合理地安排好孩子，调理好家务，并继续在实验室工作。弗雷德里克总是在她的身边，又像当年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共同奋斗的情景。

他们在母亲的指导下，集中精力从事核物理学的研究。这时，他们开始对英国科学家索第的最新研究产生了兴趣。因直至那时，科学家一直认为同一元素的所有原子都是一模一样的。它们的外观及它们与其他原子结合的方式也是相同的，而且它们的原子量也是相等的。但是索第认为这些结论不正确。他认为，同一元素中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原子。有时其不同点表现在原子量方面，在另一些情况下，一种元素的某几种原子具有放射性，而别的原子不是具有这种特性。索第将同一元素的不同原子称为“同位素”，将具有放射性的同位素称为“放射性同位素”。

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放射性同位素是非常有用的。可将某一元素的一丁点放射性元素掺进大量的该元素的非放射性同位素中。那么这个元素就可通过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来鉴别。可令人遗憾的是，只有少量元素具有天然放射性同位素。不过科学家们已提出了一些质疑：为什么不可以发明一种方法来制造普遍存在于动植物活组织里的元素的放射性同位素呢？如果能够制成，把这些元素施于植物中或喂给动物之后，就能鉴别出来，然后可以循着透过活组织放射出来的射线对该元素进行追踪观察。如果这个设想成立，科学家们就极有把握地掌握有关细胞的活动组织。

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知道镭的放射性在探索人的生命过程中，没什么价值和作用，因为镭无论在动物还是植物细胞中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如铁、磷、硫在活细胞中可以经常见到。这些元素没有放射性同位素，但放射性原子和稳定原子都是由同样的粒子——质子、中子、电

子组成的。要是想办法使一些稳定元素变为放射性元素，并且开始放射出一些这类的粒子，就好了。许多科学家进入过这个领域，经过一番试验探索，没能如愿以偿，便不了了之，至今尚未有人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

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从研究原子的嬗变开始，使一种化学元素转变成另外一种元素。英国的两位科学家卢瑟福和索第已经发现，并确定在自然界里原子的嬗变是自然产生的。约里奥·居里夫妇曾经读到一篇报告，其中谈到：1919年卢瑟福在实验室里成功地使一种元素变成了另一种元素。

这些报告和发现给约里奥·居里夫妇以极大的启迪。他们经过反复细致的实验，用阿尔法粒子作为原子的炮弹轰击铝原子。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大胆的创新。在这次试验中发现，制造出的新物质含有15个质子，其原子量为30，比一般的铝多2个质子，并且轻于普通的磷。经过反复试验，成功地解决了人工制造放射性同位素的难题。

玛丽对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的研究成就感到高兴和骄傲。她在与同行们闲谈时，总是要谈到她的女儿伊雷娜。她说：“我们又过上了老实验室时代的美好日子。我相信，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会因发现人造同位素而获得诺贝尔奖的。”

玛丽的预料千真万确。但遗憾的是，她没有亲眼看到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登上领奖台。

此后，她在“闲暇时间”里，写了一部有关同位素学和同位素的专著，为科学界又增添了一页灿烂的篇章。

玛丽对学生的关心远远胜过关心自己。在她从事镭及放射性研究时，从不顾个人安危，甚至用手去拿装镭试管，以致让镭烧伤了双手。可当学生们研究镭时，她却严格要求做好预防工作。如取镭试管时，一定要用夹子；或事先戴好防护罩。在科学研究上，她对学生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在做完试验时，一定要把仪器及一切什物擦洗干净。然而，在商讨问题时又温和细致、谦虚诚恳。居里实验室里的青年学者，在这个负责又可靠的舵手的引领下，把放射学这种学说中各种神秘莫测的部分逐一加以探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从1919年到1934年之间，镭研究院里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共发表了近500项科学报告，其中有34篇是论文；在这五百余项研究之中，有31项是居里夫人个人完成的。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在她的指导下学习，受到了很大的教益。

这个数目十分惊人，它开创了所有研究院的新纪元。这是居里夫人风烛残年时期，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以极高的智慧和伟大的牺牲精神换来的。同时，她的大部分精力还用在指导学生和讲课上。如果能像年轻时期那样，把主要精力用在研究上，那她的成就可以想象会达到怎样的峰巅。

这些成果累累的灿烂岁月，占据了玛丽的大半生。她的最大愿望“镭学研究院”已日见兴旺、声名远播。她能不为之欢欣和高兴吗！

3 与疾病抗争

过度的紧张和繁忙使她的健康每况愈下。还在1920年玛丽54岁时，

经医生检查，双眼患了双层白内障，而且有失明的危险；她的听力在逐渐下降。每天总感到体力不支，疲惫不堪，给工作、看书带来极大的困难。可是玛丽总不愿让她实验室里的同事们知道，也不愿让别人帮忙，如果要占用别人做实验的时间，她便更不愿意求助他们。

当眼睛视力一天天减退的时候，她假装什么都能看得清楚，并且极力在她的同事面前装成一个健康的人。

她把自己的不幸压在心里，只有女儿们知道，那是无法隐瞒的。有时，她把心中的痛苦用书信向姐姐诉说：“我的眼疾和耳朵给我的工作带来极大的痛苦，我很焦急，这会妨碍我做科学研究。”

为了不给学生的学习情绪带来不良影响，也不给外界造成因眼疾不能工作的印象，玛丽叮嘱女儿和姐姐，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她的疾病。她的医生也成了同谋者。在漫长的3年里，玛丽的世界里笼罩着厚厚的雾霭，使之模糊不清，给她的行动带来极大的不便。女儿成了她的拐杖，然而，这根拐杖还要暗暗施行。每当行走时，由女儿扶着，遇有障碍物，就重重地捏一下手臂；在餐桌上，女儿会跟着母亲的手势把要找的物品递她的手上。在实验室的楼道里，玛丽经常碰到障碍物或墙壁，弄得身上青一片紫一块。

配眼镜时，医生用加瑞夫人这个假名字替代双层白内障的玛丽。

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这位百折不挠的坚强妇人，她以顽强的意志与疾病抗争，一刻也没放下手中的工作。为了能适应工作，她发明了一种“盲人技术”。用高倍数放大镜来观测实验变化；用色彩鲜明的颜色在仪器的标盘上作标记；用极大的字写出讲课时参考的笔记。多少次在索尔本的梯形教室极微弱的光线下，她仍能辨认所写的字迹。

她动用所有的智慧和计策来掩饰自己的病情。一次，有个学生不得不请导师看一个摄有很细线条的试验底片，这可是个大难题。无论如何玛丽也无法辨认，她灵机一动，异常巧妙地向她提一些问题，得到明确的说明后，脑子里就形成了底片上的图像，然后装出看得见的样子，拿起那块玻璃来研究，给学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满意的解答。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多么勇敢坚强的学者。疾病啊！你为什么偏偏责难一个无私奉献的杰出科学家！

实在太疲倦了，这样的日子无论如何也撑不下去了。3年了，整整3年，她带着眼疾继续领导实验室，指导学生；到索尔本大学讲学，竟瞒了她的同事和学生。

1923年，玛丽的眼睛终于动了手术。那是炎热的7月，脸上的手术伤口很大，缠着绷带。玛丽极其疲倦地躺在盖有十字的被子里。艾芜用小匙给这个“加瑞夫人”喂汤。几个星期过去了，玛丽的体力尚未恢复。但她慢慢练习走路，每天坚持看一点书，她要用精神战胜疾病。

但是疾病并非人愿，一年之后，玛丽又经受了两次痛苦的手术；1930年，她又接受了第四次手术。为了工作，为了不懈的追求，她忍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

病榻上的玛丽，每天要听伊雷娜汇报研究室的工作进展情况，把学生的疑难问题说给她听，以听取她的意见和看法；还要伊雷娜为她阅读最新世界放射科学的成果和动态。她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不停地工作、工作。这段时间，她还在撰写《大百科全书》的书稿，自己口授，艾芜

代笔。

每次手术后，玛丽并未遵医嘱让眼睛休息一段时间，而往 246 往是绷带解除，就回到了实验室。

由于玛丽的勇敢和坚强，终于战胜了阻挡她工作的顽固敌人。不多久，她借助很厚的眼镜，几乎恢复了正常视力，后来她又慢慢练习不戴眼镜工作和学习。奇迹出现了，玛丽又以极其饱满的精神出现在她的学生面前。学生们见导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一个个欢呼雀跃信心百倍，研究院又恢复了昔日的紧张和繁忙。

玛丽特别珍惜这第二次光明的到来，她的工作更专注，责任感更强。每天除指导学生外，便开始自己的研究。她端正地坐在那间半明不暗的工作室的仪器前测量，神情十分专注。为了避免温度变化而干扰实验结果，屋子里没有生火，冷冰冰的。玛丽以科学家那娴熟的动作，进行一系列操作。她打开机器，开动马表，拿起砝码，只有在此时，她那双被灼伤的手才显得比钢琴家的手更为灵活。通过这些完美的技术，使人为的误差率减到零。这时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就会显出愉快的笑容。那双动过多次手术的眼睛会显得更为明亮。

每次成功都会使她显得轻松愉快，这时她会迈开轻松的步伐，愉快地来到花园的小径，长长吮吸一口新鲜空气，她会兴奋地来到榭树底下，品尝蔷薇花的芬芳，沐浴着温暖的阳光，静静地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和奇特。这时的玛丽真正与科学和解了，与实验溶化在一起了，她笑了，笑得如此灿然。

成功与失败是一对孪生姊妹，没有失败的苦果便没有成功的喜悦。在试验中，玛丽也有失败的时候。

在制备钒 X 射线时，玛丽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没有得到她希望的结果。玛丽惊呆了，她瘫坐在椅子上，背弓着，两臂抱在胸前，眼神发直，样子比皮埃尔去世时遭受的痛苦还要巨大。她的助手十分紧张，担心她会突然倒下去，焦急地围着她嘘寒问暖，沉默了一阵后，玛丽回过神来，凄然地说：“没有使钒 X 沉淀，这是钒跟我作对。”有时，她也会幼稚地责备她的公开敌人。

每次试验的结果不如人意都会使玛丽的精神遭到一次崩溃性的打击，然而也是给玛丽一次很好的教训。

玛丽忘我工作，一直未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她多年来低烧不退，极度疲乏。然而她总认为是工作紧张所致，毫不在意。医生曾多次提醒她血液成份不正常，建议她全面检查、抓紧治疗，她总是淡然一笑。直到这一次，疾病不得不使她离开她心爱的事业。

她的胆脏疼痛难忍，实在挺不下去才去找医生，而大夫对她的病也说不出所以然。经反复检查，诊断为劳累过度，除此，得不出一致的诊断结果。在玛丽身上反映出来的全部症状是：持续发烧、体质虚弱、寒颤、极度贫血，所有的内科大夫都被这一症状难住了。他们只能用最好的药物给她调治。但是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渐渐加重。

玛丽面对疾病的折磨，仍然十分平静。她常常念叨着：“我的日子不多了，那没什么，人总是要死的，我担心的是镭研究院，在我去世后，它的命运将会如何？”

死对玛丽来说，无足轻重，她极担心的是留下的工作由谁来完成。

人工制造放射性同位素的研究，她相信伊雷娜和弗雷德里克会研究成功；不久前才在阿各依等地设了一大批炼制放射性矿物的工厂，她极需要的工厂，她要在那里组织试验，这些工厂以后还能继续发展么；她正在编写的《放射学》，有些科学上的研究试验过程，只有她知道，别人怎么写得出来；镭族的研究进展不快，阿尔发射线的“精细结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玛丽要做的事情太多，她怎么能放下手中的工作撒手而去呢？

在玛丽的心目中始终没有死的字眼，她相信自己一定会好起来，她要回到实验室去。在她坚强的精神支柱下，她的病时好时坏，觉得眩晕软弱之时，就留在家中写书。

一天，她觉得身体舒服一些，就来到实验室。这是一个霪雨过后的艳阳天，她与实验室的研究者们亲切打过招呼，就来到自己的实验室，专心作镭族试验。工作到下午 3 点半时，她觉得极度疲倦，便起身把整个实验台上收拾得整齐干净，仪器、搅动棒等洗好放回原处，然后抚摸着蒸发皿和仪器，这是她几十年的忠实伴侣。那种留念，那种依依不舍，就像在与亲人告别。

突然她心跳加快，浑身颤抖，额头冒汗。这时，她抬起那双疲倦的眼睛，对她的助手说：“我不太舒服，你陪我去花园走走吧！”

助手扶着她在花园慢慢地转着，对着那些她亲手栽种的如今已清翠欲滴的椴树、梧桐树，那一片片柔软的草地，那灿烂耀眼的长春花，金雀花、西粉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忽然她在一棵憔悴的蔷薇花前站住了，一种怜悯和忧郁油然而生。她立即叫来园工说：“乔治，这棵蔷薇快枯萎了，你要赶快照料它，多可怜的蔷薇。”园工点点头，一连串地答应着。

天渐渐黑下来，阵阵微风带来新鲜小草的清香和盛开的玫瑰花那浓郁的芬芳。太阳洒出一片明亮的光，渐渐地隐去它那猛烈的余威，天边布满了一片红色的晚霞，这片美丽的晚霞正在逐渐消失，消失在那细嫩的梧桐树上。天空中飞来一只鹏鸟，传来一声恐惧的惊叫，给人带来一股莫名的感伤。

扶着玛丽的助手见她越来越没有精神，全身滚烫，步伐已不听使唤，便劝她回家歇息。她同意了，在上汽车之前，她向那株孱弱的植物投去不安的一瞥，然后凝视着这座与她命运攸关的研究院，“居里楼”几个大字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放出夺目的光辉。她心里说：“我一定要回来。”

4 生命终结

玛丽的病突然加重。医院为她作全面检查，经两次 X 光照相和专家们的多次会诊，仍困惑不解。玛丽似乎没有一个器官有病，看不出明显的症状，只有肺的 X 光照片上有她旧有的病灶和一点发炎的阴影。大夫们给她用湿包疗法和拔罐疗法医治，仍不见好转、疼痛依旧，高烧不退。

内科专家面面相觑，无可奈何。最后决定，让玛丽变换一下环境，目的是让她离实验室远一点。

玛丽同意这一决定，她相信大自然有力量调养好她的疾病。

玛丽就要被送往山区。她私下把她的镭族合作者科泰罗夫人请到卧

室来，再三叮嘱说：“在我回来之前，你一定要把钢小心封藏起来。疗养假期过完，我们就重新做这个研究，请你把准备工作做好等着我。”

科泰罗夫人紧紧握着玛丽的手，泪水盈眶地说：“夫人，我一定照你的话去做，等着你回来，你好好疗养。”

玛丽一行即刻动身，严重的眩晕和疼痛使玛丽痛苦不堪，几次昏晕过去。医生护士急忙对她施行冷、热敷，否则，在火车上就会发生重大事故。

终于到桑塞罗疗养院，等在那里的医生急忙安顿玛丽进行抢救，经检查和照相，病情十分危急。持续高烧40℃，嘴唇干裂，脉搏微弱；血液中的红白血球数目急剧减少。而肺病则无病兆。原以为换个清新的环境治好玛丽的病的希望破灭了。

为了对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生命负责，疗养院从瑞士的日内瓦请来罗斯教授，经仔细诊断，确诊为恶性贫血。

这是一种极恶劣而很少见的血液系统疾病，这种疾病严重妨碍人体吸收制造血细胞所需要的物质。即使在患者的食物中加进这些物质，也会有一种“东西”阻碍这些物质被吸收。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玛丽体内作怪呢？对此，谁也无法断定。当时医学上对这种恶性贫血也没有什么治疗办法。

用最好的药物治疗也为时已晚，玛丽自己十分明白。玛丽又得经受一场人们称之为“缓慢的死”那折磨人的残酷的战斗。

艾芜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她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寻找一些开心的话题，安慰母亲。每当玛丽清醒过来时，她总是喃喃地说：“赶快根除这个祸根吧，我得赶快回实验室去，我的新研究还未完成……”

玛丽一直没有想到自己得了绝症，所以艾芜必须设法让母亲保持这个精神支柱。这是战胜疾病，延续生命的最好支撑点。艾芜常强作笑脸，轻松自如地安慰母亲，设法为母亲减轻肉体上的痛苦。正因为这个，在她病情十分危急的时候，也没有通知亲属到疗养院来，以免给她带来恐怖。

伊雷娜·约里奥来医院陪伴母亲，常常给她讲实验的工作进程；谈梭镇和白杜码头的屋子；谈玛丽刚写完的一本书的校对。为了让母亲宽心，常常表现出十分愉快的样子。有几次，玛丽看见女儿的轻松和活泼，十分气愤地说：“也许我们来到这里是极大的失误，是浪费了时光，在市内，我的病也会很快好起来。”伊雷娜要帮助母亲处理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不能久留，又换来了艾芜。经过一个月的储备，艾芜收集了不少故事和笑话来安慰母亲。她在不得不闲着的母亲身边度过了一段亲密的时光。玛丽也一直克制着自发的冲动和懦弱，坚持不在女儿面前表现出痛苦和无奈，不向医生护士求援。她同女儿们的谈话，主要是实验室的前途；华沙研究院的希望；也谈自己的研究课题，她要强迫自己愉快。

7月3日早晨，东方的红日冉冉升起，给大地撒上一片金辉。玛丽一觉醒来，便迅速从腋下拿出温度计，看见水银柱上的指示线下来了，她高兴得像个孩子，快乐地看着身边的艾芜，笑着说：“退下来了，我的病就要好了。孩子，我们马上就要回家了，我可以马上回实验室了。”

她要艾芜把窗户打开，一线温暖的阳光射进来。她在艾芜和护士的帮助下坐起来。窗外绿荫叠彩，连绵的群山，挺拔的树林，盛开的鲜花

尽收眼底，她深深地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平静地说：“治好我的病不是药物，而是这美好的环境和新鲜的空气。”玛丽多么希望能活下去啊！似乎现在她的病全然好了。这也许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玛丽怀着憧憬，怀着求生的欲望，多么愿意继续留在这个美妙的世界里，继续从事她那未竟的事业。

疗养院的院长涛贝大夫，皮埃尔·卢依大夫，为玛丽的病日夜不安。他们用尽智慧和学识给她治疗，用最好的药物和器械，派最好的护士，让玛丽住最好的病房。然而死神是不讲仁慈的。当居里夫人病危的可怕消息传出之后，全疗养院的生活几乎停顿。大家极为尊崇和热爱这个卓著的科学家，为了不影响玛丽的休息，全院的人都不大声说话，不大步行走，以保持安静。

每时每刻都有两个医生和护士守在玛丽的房子里，不等艾芜请求，就使用催眠剂或注射，使玛丽不感到病入膏肓的种种痛苦。然而在最后的阶段里，药物也无法为玛丽减轻痛苦。

临终之时，玛丽发出痛苦的呻吟和一些断断续续的叹息。她不是为自己的亲人，为自己的生命而叹息，而是为她那比生命还重要的科学。旁边的人隐约听见：“……各章的分段，应根据其内容……书名……放射……”

当她睁开眼睛看到一个茶杯时，误当作仪器：“这是镭试管……钷试管……”

尽管这个女科学家不愿离开人世，不愿放弃她心爱的研究工作，但死神还是无情地夺走了那宝贵的生命。

1937年7月4日玛丽在法国的萨瓦与世长辞。

窗外渐渐透进一丝丝晨光，照着躺在印有红十字的白被子里那张瘦削而苍白的脸和失去知觉的僵硬的躯体。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这位闻名世界的卓著女物理学家，带着太多的遗憾走了……

一颗科学巨星陨落，由疗养院传出去，很快传遍了全世界，震撼着所有知道居里夫人名字的人们的心。

“居里夫人逝世了”，多么不幸的消息！在巴黎、在华沙，在蒙彼利埃，在伦敦，均引起了深深的悲痛。

布罗妮雅，海拉，约瑟夫，雅克，马洛尼夫人，还有一些忠诚的朋友，一些关心、尊崇、追随她的学者、学生，他们在各自的地方大放悲声，并急忙朝巴黎赶来……

镭研究院更是悲天恻地，青年学者们嚎啕大哭。乔治·福尼埃等学生更是悲痛欲绝，痛苦地喊着：“我们失去了一切。”

索尔本大学，赛福尔女子高等学校都笼罩在极度悲哀之中。学生自动停止了上课，停止了工作。寝室里、课堂上，操场里，走廊上到处是三五成群，抱成一团，哀伤地哭泣。他们自发地戴上了白花，自发地默哀。不少学生，青年学者，科学家潮水般地朝疗养院涌来。

雪片般的唁电，悼念文章，从地球的各个角落，飞向巴黎。有国家元首，各国科学界同行，镭制造业实业家，还有用镭疗法获得新生的患者。

中国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发出了唁电。他曾因出国考察，途经巴

黎，与玛丽有过长时间的交谈，并邀请玛丽来中国讲学，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而成千古遗憾。

中国当时的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所长严济慈先生撰写了《悼居里夫人》的纪念文章，并发表在《大公报》上。文章沉痛地悼念了这位有伟大人格和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著名科学家。

玛丽躲过了这些悲哀，她静静地躺在桑塞罗谋那张床上，身着素妆，一头白发整齐地梳向脑后，露出那宽大而智慧的前额，那平和的面容显出她的高贵和庄严；那双粗糙而结了老茧的手囊括了她的贡献和成就。那是一双多么灵活而充满智慧的手；一双勤劳而饱经风霜的手。就是这双手，创造出了令世人震惊的成就。

1937年7月6日下午，玛丽去世的第三天下午，追悼会在极其简朴的形式中进行。没有演说，没有仪仗，没有一个政治家和官员。只有爱她的亲人、朋友和合作者。这是玛丽的心愿，她不喜欢喧哗，不喜欢繁文缛节。若用政府给大人物们那样喧嚣隆重的葬仪，是违背玛丽的人生哲学的，也是对她高洁的灵魂的亵渎。

玛丽静静地到了她该去的地方——梭镇的居里墓地。人们按照她的遗愿，把她的棺木放在皮埃尔·居里的棺木上面，布罗妮雅和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向墓地洒下一把从波兰带来的泥土。在一片寂静声中，亲人和朋友向墓地投放了玛丽生前喜欢的白色山茶花，红色玫瑰花，朴实的桂叶花，还有一把水毛茛。

她永远与心爱的丈夫在一起了。她的生命停止了，但她创建的丰功伟绩永远不会磨灭，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如同爱因斯坦说的：“在所有名人当中，玛丽·居里是惟一没有被荣誉所损毁的人。”